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邵玉銘：邁向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

蘇聯風雲人物：葉利欽自傳

大陸報告：吸毒、販毒、戒毒

北京傳單：到亞運會去

李貴仁：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88

1990. 9

編者按：不久前本刊收到來自北京的一份傳單，呼籲中國各界同胞在亞運會期間，打破專制者的限制，以真正的主人身份到亞運會去與各國來客交朋友、談友誼。同時，也希望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學者、民運人士和僑胞，在方便的情況下單獨或組團回國觀摩。

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將於九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對於危機四伏的中共專制政權來說，舉辦亞運會不啻注射一針強心劑。他們希望藉此盛會熱鬧一番，以修補自己聲名狼藉的國際形象，粉飾動盪不安的社會局勢，解脫政治、經濟的嚴重困境，利用人民愛國主義的情緒苟延自己的壽命。所以，盡管國貧民窮，中南海的獨裁者仍要打腫臉充胖子，對內募捐，對外乞討，不惜壓縮已經低得可憐的教育和民生福利經費，耗費巨資修建各種豪華的體育樓堂館所和電子服務設施。這些用人民血汗築造的世界一流設備，實際上只是為少數專制者做政治交易裝門面，人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好處。

亞運會的宗旨是加強亞洲及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在亞運會期間，每個中國公民有權與各國運動員、工作人員和記者廣泛接觸交流、彼此溝通瞭解。因此，我們呼籲各界同胞，大家到亞運會去！我們不僅僅做場內的觀眾，而且要爭取在一切場合與外國客人接觸，最好能交上幾位知心朋友，可以與他們話家常、談友情、做嚮導，但避開敏感的政治問題。也許會有人出來干涉你的行動，請不必顧慮，因為亞運會提出的口號是「團結、友誼、進步」，所以你的行為合情、合理而又合法，誰來干涉，誰就違背了這個原則。

現在，有那麼少數幾個專制者，因為手上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做了理虧心虛的事，惶惶不可終日，十分害怕中國的百姓和外國人接觸，甚至動用專制機器限制中外人民之間的正常往來，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違法者。我們只有衝破這種專制的閉鎖，才能實現本屆亞運會「團結、友誼、進步」的原則。

同時，我們也希望海外的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民運人士和各界僑胞，在各位身份條件方便的情況下，也能歸國觀摩亞運會，或在亞運會期間公開組團來訪。第十一屆亞運會應該是全中國的壯舉，而絕非中共獨裁者的功勞和專利；所有的成就都是海內外炎黃子孫、中華健兒共同奮鬥的結晶，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權分享這份榮譽。

同胞們，到亞運會去！讓我們在天安門前重逢，在亞運會上歡呼！

北京市民和學生亞運聯絡組
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於北京

請張貼 請傳閱 請抄寫 請寄送
感謝您的合作 感謝您的支持



北京傳單： 到亞運會去



卷頭語

當親愛的讀者拿到這一期雜誌時，請接受我們由衷的謝意。感謝您對本刊的支持與關心。

在這一期中，首先進入讀者視野的將是封二來自北京城的一份傳單。同樣來自大陸的另一篇文章，是一位普通的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李貴仁在法院刑事審判庭上的最後陳述。或許有人會對他所說「不反對馬列主義」感到奇怪，但是也不得不欽佩他維護一個公民權利的勇氣。舉世注目的台灣經驗同樣是來自大陸的同胞關心的熱點，邵玉銘的講演詞對台灣的現狀作了簡明深刻的概括，又對未來作了展望。馬英九、盧修一則分別從朝野兩黨的角度生動地評論了台灣的政治轉型。想來這些文章都會受到大家歡迎。

對中國民運進行理論研究是本刊歷來的宗旨。在這一期中，徐邦泰的「聯而不合、和而不同論」，丁楚的「學會獨立」以及陳一諮的「調整論」，都提出了新的見地。陳軍所作的採訪「各界人士談方勵之」，由名人論名人，也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在風雲變幻的今日蘇聯，葉利欽的名字幾乎與戈巴契夫齊名。本刊這次獨家選載此公的自傳選譯，其精彩內容將使各位讀者眼界大開。因為此文太長，本刊將於下一期刊完。

吳方城關於「人血饅頭」的文章發表以後，讀者議論紛紛，褒貶有加。繼上期發表劉名等人的批評文章後，本期又有幾篇呼應，至此打住。我們以為這些心平氣和的爭論大有益處。從楊小凱、吳方城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這一討論早已超過了「波洛西法案」或「饅頭」的具體爭議，涉及到了中國民運更深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曉珍關於不久前召開的民聯聯委會會議的特別報導，向讀者諸君如實報告了事實經過。中國民聯將一如既往為中國的民主大業而奮鬥。美國國會眾議員米勒與中國民聯總幹事汪岷的通信（刊封三），從一個側面告訴大家民聯在這個領域所作的努力。

本刊經常收到熱心讀者的來信，從文字內容到圖片排列形式，提出種種意見和建議。對此，我們十分感謝。本期我們選載了兩篇。

路識關於中國人應當瞭解的移民法文章本刊已連載三期，由於收稿太遲，最後一篇「如何申請綠卡」只能留待下一期刊出，敬請各位讀者見諒。

。編者。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

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0年9月號88期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1990. 8. 15. 出版

1982. 11. 17. 創刊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封二
封三

北京傳單：到亞運會去

美國國會眾議員米勒致中國民聯總幹事汪岷信

——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權原則

北京市民學生

民運研究

6 聯而不合 和而不同

徐邦泰

9 學會獨立

丁楚

11 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王潤生

16 共產黨在調整·我們也要調整

錢楓整理

——丁楚訪陳一諮

19 六四評之評

林長盛

20 把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結合起來

台灣經驗

25 邁向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

邵玉銘

29 台灣朝野談政治轉型

錢楓整理

——浩然夏令研習營馬英九、盧修一講演錄

本刊特稿

34 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李貴仁

37 各界人士談方勵之

陳軍

時事評論

42 中共的穩定和民運的應策

亞衣

民主牆

45 八九民運反思之反思

牛年生

47 探求中國人的團結之道

李國愚

50 人民公僕特權種種

劍峰

竹幕後面

54 雲南瑞麗縣吸毒調查

方方

57 一個大陸戒毒醫師手記

唐冬明

59 一個右派分子的回憶

軒轅遜

61 「四、一六」社論出自誰手

張琪

董事長：徐邦泰
 社長：胡平
 主編：丁楚言
 執編：何言
 美編：蘇洋偉
 發行：薛偉



蘇聯風雲

62 我是一個不安分守己者

——「葉利欽自傳」選譯

白下
一帆 節譯

人物評傳

74 從夾縫中看毛澤東

76 陳祖德何以登棋壇

余林
余森

調查報告

77 大陸社會發展水平評估

程路

爭鳴園地

79 海外民運必須面向大陸

81 權利的享有與制度的爭取

82 也談「光榮的群體」

83 免費搭車及在野政治

84 愛護民運出頭鳥

吳方城
羅海平
黎曉迪
楊小凱
許力偉

特別報導

85 度過困難的時刻

——記民聯聯委會緊急會議

曉珍

88 87 中共領館的窗口
永不氣餒

——全美學自聯二大側記

嚴英
陳一
孫良

讀者來信

90 注意文章內容的可靠性

91 中國青年需要搖滾

林川
普通中國學生

譯文精選

92 基督在中國大陸復活

鄭翰譯

大事記

95 海內外民運大事記

何言整理

攝影

何言
吳方城

聯而不一 和而不同

海外中國民運已步入一個新階段，本文就新階段中各民運團體應當採取的新方略提出了切實的構想。

徐邦泰

繼七月四日五日，民聯聯委會九位委員目費雲集華府總部「妥善」解決「總部總辭危機」之後，六日至九日，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美學自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和中國自由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驅車回芝加哥的路上，「六四之聲」電台的朋友形容：學自聯二大是海外民運操練初級班，自民黨一大的紛爭水平已經夠上中級班了。然而，在我看來，方勵之獲得自由、學自聯二大和自民黨一大的召開，則標明海外中國民運已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冷靜地分析這一階段中專制與民主雙方力量的消長，尤其是民運團體合併不易的現狀，海外民運團體不妨採取「聯而不一，和而不同」的方略盡力減少外爭內鬪，通過調整鞏固，以求發展壯大。

中共視海外民運：

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國內朋友告訴我，中共高層在討論是否放方勵之夫婦出美國駐華使館時，曾對海外民運力量作過分析研究，結論是八個字：不成氣候，不足為患。在我們這些民運「弄潮兒」看來，江澤民等大官人的話只講對了一半。準確地說，應是：暫時不成氣候，將來必為大患。

誠然，民運團體中都不乏目責之聲。民主中國陣綫挾天時之利，却無地利之便，轟轟烈烈

烈地幾番造勢，直至民主女神號黯然收兵，「明星」間的人和已顯危機。民陣監委主席對組織「行情下跌」頗為痛心疾首。前「中國之春」採訪主任在「時報週刊」上撰文，抨擊民聯最近的財務和人事危機是週期性併發的「打擺子」症。他斷言：「目前各民運團體，多把精力放在如下兩端：(1)巧設名目要錢；(2)用盡手段出名。這種意向已經從潛意識上升到明目張膽的程度。」學自聯在遊說國會和「國慶」示威時曾大顯身手，而一年後的「二大」景況，用「特邀代表」萬潤南的話說「已大不如前了」。中國自由民主黨經「黑堡」和哥倫布兩次籌備會議，以她「鏟除共產暴政」的激烈綱領和中西部留學生的大量參與，頗令中共膽顫心驚。然而，等到鑼鼓開張，我趕去「觀察」到的却是「拒王風波」。盡管後來「漸入佳景」，但是，有位「觀察員」却針對整個民運感嘆到：「以劉表的才具王倫的心態搞政黨，恐怕難成氣候。」

天安門廣場的「明星」柴玲封從德夫婦，在巴黎見到嚴家其主席，第一句話是：「我們出來是找組織的。」高果笑道：「找什麼組織，又不是共產黨。」結果，至今他們倆沒有參加任何政治團體。中國的沙哈羅夫方勵之一直是人們心目中整合海外民運團體的領袖人物。但是，大家都都注意到，方勵之先生到達英國

後，表現得頗為謹慎。他對民陣三個分部敦促他競選民陣主席的呼籲，表示婉拒。他說：「有兩點我必須先弄清楚：第一，目前海外民運的內容是什麼？換言之是做些什麼事？第二，有些事與我的能力相符，可以做出成績？」有人認為，方先生參加任何一個政治團體都是不智的，他可以居以「群龍之首」，而非「群龍之一」。然而亦有人認為，方先生最佳選擇是保持一種超然的精神領袖地位。「上山下海」不管是幹什麼，一旦被「烤焦」，就太可惜了。

對海外民運作以上簡述之後，我們再來看中共在海外的動作。有消息說，中共曾派遣大批人員到海外滲透各民運團體，這本情理之中的事，這裡暫且不作討論。以徐林先生帶出的中共機密文件來看，中共在海外已轉守為攻了，他們檢討在美國的教訓是黨的工作做晚了，以後要把堅定的組織起來，對於反動的要予以清除，「鬪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現在在某種情況下有點像地下黨，美國黨組織不能公開。」他們把美加五萬多留學生劃分為五類，「總的原則是：要依靠、壯大骨幹隊伍（第一類）；團結爭取大多數（第二、三類）；分化瓦解參與反政府活動的人員（第四類）；並狠狠揭露和打擊極少數反政府的骨幹份子（第五類）。」「當前，首先打擊『全美學自聯』

和「全加學聯」等組織的少數壞頭頭，如劉永川、韓聯潮、徐邦泰、瞿曉鋒等。」

但是，正是這份中共機密文件，亦如實地反映了海外民運力量將來必成中共的大患。文件供認：「美加當局這種粗暴干涉我國內政，肆意掠奪我人才的舉動和長期以來對我留學人員思想上的滲透、腐蝕及『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對我留學人員思想的變化和隊伍的分化產生了重大影響：約佔美、加地區公派留學人員總數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近期不會回國，或長期滯留，或移民國外；積極參與反對我政府活動的留學人員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反政府核心骨幹份子約佔百餘人，這些人與美國、加拿大右翼反共勢力、台灣反動勢力和國內逃亡份子相互勾結、策劃和組織反對我政府的活動，妄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政治思想覺悟較高，有較強愛國心的留學生骨幹不足總數的百分之五。」

以在美加留學人員五萬名計，上數比例即四萬多人為持異議的中間派，五千人為積極參與反政府活動的（核心骨幹份子約百餘人），親中共的不足二千五百名。事實上，即四萬七千五百以上的人與中共政權離心，也就是中共現政權已經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留學人員為敵了。方勵之先生指出：「從中國近代史上看，留學生主導了國家的進展與變革，所以留學生居於國家的關鍵地位。」在中國未來的轉變之中，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認同民主的留學生，將是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們不必沮喪，不要放棄。

台灣對海外民運： 樂觀其成，保持距離

海外民運團體中之所以有一種沮喪感，除了對自身不滿之外，另一半則是對台灣方面的抱怨，這種抱怨集中宣洩在「民主女神號」事件上。陳一諮先生評論：民主女神號本來是想給共產黨一記耳光，想不到却打到國民黨臉上

民聯聯委會主任委員徐邦泰



當章孝嚴出任海工會主任來美轉一圈後，我又得知，美國政府已告誡台灣方面，對在美國的中國民運活動不要涉入太深，台灣方面似亦真有其難言的苦衷。

章孝嚴先生在舊金山演講時稱：華僑是革命之母，國民黨是革命之子。後來，章先生在同民運團體負責人座談時反問：「假如沒有國民黨，海外團體怎麼辦？」我當時回答：「還有華僑嘛，當年孫中山先生不就是靠的華僑。」民陣的何維玲女士則笑着說：「我們華僑再找國民黨。」最近，陳一諮先生在舊金山演講時頗動感情，他激烈地抨擊台灣某些人的偏安心態。他說戰國時信陵君等都有養食客三千之風，現在是連食客三十都養不起（他的「中心」頂多養三名）。講到激動處，他拍案而起，大叫「倘若台灣不支持大陸民運，我們自己幹。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真是壯哉斯言。

金錢是政治運作的牛奶。中國自由民主黨聯委會陳厚琦諸君一開始就為牛奶發愁。如今黨已推出，他們計劃籌建「黨營事業」，以商養運。這當然不失為好的計劃，只是實行不易。不過，以現在該黨三委會幹部的幹勁和素質來看，他們一定能實踐起來，但願他們到時候牛奶會有麪包亦會有。

錢達先生曾深有感觸對我說：「四十年來，當別人不反共時，台灣一直堅持反共的立場，現在，當大陸人民都起來反共時，台灣却不反共了，太令人失望。」我則開玩笑地說：「反了四十年，太累了，現在輪流着讓大陸人反。」其實，從本質上講，台灣仍然是反共的，只是基於「安全第一」的考慮，在任何動作上都頗為「火燭小心」罷了。

去年巴黎民陣成立大會上，中華民國立法委員李勝峰、康寧祥分別代表國民黨和民進黨同海外民運人士作廣泛的接觸，明確表示對民陣的支持。作為民陣的顧問，以及民陣台灣關係事務委員會的顧問，我獲知，國府方面對民陣的態度是「樂觀其成，保持距離」。然而，

除了自力更生，海外民運團體應當學會在美國社會尋求資助。人權與民主基金會的建立，已經從國會方面架起一根管道。此外，北加州民運服務中心的成立，也顯示了華僑對中國民運支持的一片赤誠之心。台灣二千萬同胞，海外三千萬華僑，加上難以計數的國際友人，這就是海外民運團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這就是海外民運團體在要求別人給予更多支持的同時，亦應當自我反省，自我調整，以求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發展。以民主女神號為例，這是一種大手筆，事先如能對其可行性作一定的評估和研討，就不會黯然落幕了。馬英九先生是教海洋法的，早先如多一通電話，就不會作

出海上違法廣播的設計。再有，即便不廣播，如能有民陣的某位「明星」隨船由法國至台灣，亦是令人振奮的事。無奈船上唯一的中國人却是台灣女記者。我們大陸人又有什麼理由指責台灣人膽小呢？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我們再好好重新做起來。樂觀其成亦好，保持距離亦好，在中國未來的巨變中，大家一定會發覺，誰都缺少不了誰。

海外民運團體間： 聯而不合，合而不同

中國人習慣於大一統的思維方式。一旦你說聯合，你馬上就想到鑄平山頭，一統天下，要不就四分五裂，一盤散沙。

民陣成立前，我同舊金山一批民運朋友在為未來的新團體起名字，大家湊幾個名字，其中一個是：民主中國聯合陣綫。當時，我的設想是，嚴家其與吾爾開希已宣佈成立中國學運民運委員會，然後加上民聯等等海外團體作為團體會員，聯合成爲民主中國聯合陣綫。這不是鑄平山頭，一統海外，而是建立一種多元的聯而不合的格局。這種格局既具有自治獨立的積極性，又兼有合作協調的統一性。

但是，正如不成熟的運動只能產生不成熟的領袖一樣。海外民運似乎註定要錯失良機，中國人需要更多的磨練。民主中國陣綫的成立，使民聯多了一位患難兄弟。有人問我，民聯爲什麼七八年選長不大？我回答：因爲它在不斷分化。所謂「罷王風波」，導致民聯一批人參加民主黨。「六四」之後，民聯又「輸送」了一批幹部進了民陣；自民黨成立時，我才發現我們聯盟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林偉「跳槽」到自民黨當選爲總幹事，在這之前，他已經主編起「自由論壇」來。他抱怨我們把他當「國民黨起義將領看待」，頗令人愧疚。民陣「二大」即將召開，現在已在向民聯招手，要求再輸送幹部。在生物學看來，分化就是成長，民聯真是功不可沒。問題是這種分化不是母體的壯

大，而是異體性分化（爲什麼會這樣，以後另作別論）。

海外雖有八六四個民運團體，但初具政黨模型的就只有民陣、民聯、自民黨三個。各國的「學自聯」從嚴格意義上說，只是民主性質的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經驗證明，這類政治團體組織上的合併相當困難。民聯與民陣東柏林會議的不歡而散，使年初華府聯席會議上達成的「民聯民陣聯合聲明」的合併意向未能兌現。自民黨的拒王風波的根本原因是留學生組黨派同民主黨合併並不愉快。假若有人提出，現在應當削平山頭，歸於一統，那實在是自尋煩惱。其實，在美加五萬留學生中有三個「黨」亦不算唯中國人才有的紀錄。聖馬利諾共和國只有兩萬人口，但政黨却有七個之多。西方國家在一定時期亦出現「多黨化」的高峰。

問題不在有幾個政黨團體，而在於各團體能否真正在政治光譜中各呈一色。如果各團體自有角色分工，而又能在整體上有聯絡和默契，那海外民運就有福了，要達到此一境界，我們須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各團體要自我調整，正確定位。民主可以是總的目標，但是，有的可以以「反對黨」定位（它絲毫不想消滅執政黨）；有的可以以「反體制黨」定位。這樣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各念各的經，才會生氣勃勃。自民黨保持激烈的初衷，才有別於其它。如果都差不多，那就無聊了。

第二，如何走出方勵之說的「距離」的困境，不搞或少搞「政治手淫」（意指無對象的發洩，郭城發明）。今後可能要做大量默默無聞、細碎、艱苦面向大陸的工作。

第三，以圓桌會議或電話會議的方式建立各團體間的聯絡、默契、合作和統一行動。方勵之先生等流亡在外的「無黨派」民運人士如能出席第二次「圓桌會議」將有助於推進海外民運在低潮期的發展。

總之，眼海外不必建立亦建立不了大一統的民運組織。我們講的聯合，可行之道是聯而不合，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借用孔夫子的話。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美學自聯的正確定位，將事關留學生中極大部份人的政治走向。毫無疑問，學自聯不能忘了自己從何處來，該往何處去。它的宗旨無非兩條：一、維護海外留學生和學者的權益；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它的最大特點是自治獨立，它是留學生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與政黨一樣，有自己的利益、組織和主張，國家權力是它們注意的中心，但它們又與政黨不同：利益集團並不親自參政，並不企圖佔有政治權力，而是用自己的能量影響法律和行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以使本集團獲益。全美學自聯已經在美國成功地發揮了它「壓力集團」的作用。

此外，在美的中國大陸學人的各類專門學會的功能，亦是我們不應忽視的。由於這類學會屬於非政治性的學術性團體，它們埋應比較容易爲中共官方默認和接受。只要「有理、有利、有節」，這類團體在促進交流啟蒙民衆方面當能起民運團體起不到的作用。我主張民運人士以個人身份積極參加這類團體的活動，幫助他們，但不要去干擾他們的正常活動。

不管是大狗小狗都應該叫

我柏克萊的同學余茂春在近乎狂熱地爲自民黨籌建奔走幾個月後，終於心灰意冷。他的心得是：一，網絡式組織比金字塔式組織有效，這點我們早有體會；二，搞民運「個體戶」比搞大組織事半功倍。他宣稱以後要幹個體戶了。

我覺得，大千世界，無所不有。人各有志，不必勉強。恰如契訶夫所言「不管大狗小狗，都應該叫，就按上帝給它的嗓子叫」，那就好。▲

學會獨立

為什麼中國至今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反對運動？關鍵在於知識分子沒學會如何「獨立」。

丁楚

學會獨立是民運的基礎課

很多人在提到東歐的民主運動的差別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一點：東歐國家，甚至包括蘇聯，都存在着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反對派，而在中國，這一獨立的反對派總是很難形成海內外公認的勢力。

問題何在呢？是因為知識份子中的持不同政見者少得微不足道嗎？是因為中共當局的圍剿過於嚴厲而無縫可鑽嗎？其實，中國大陸十年改革中曾多次出現過非常寬鬆的機會，其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蘇聯東歐，在這段時間，也積累了一大批知識界持不同政見者，知識界在八九民運中的普遍傾向可以清楚地表明其潛在數量之可觀。

可是，為什麼中國至今仍未有形成一個有影響的獨立的知識份子反對運動呢？關鍵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沒有學會怎樣「獨立」。

「學會獨立」，這是民主運動的基礎課。

「獨立」意味着可以涉及任何領域

有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獨

立的，他們認為獨立的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不涉及政治。這一看法在學術界和文藝界尤為盛行。

我曾碰到一些藝術家們，當你要求他對某些政治問題發表見解的時候，他們拒絕的理由通常是：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是獨立的藝術家。當然，這種現象在和一些自然科學的學者對話中也常聽到。

我始終不明白，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搞藝術作學問之間有何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始終看不出「不談政治」與「獨立」之間有何必然的邏輯關係。世界上很多最著名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曾和政治結過緣。如大藝術家畢加索、科學家愛因斯坦都曾立場鮮明地反對過法西斯主義，美國很多影星、歌星都曾捲入過反對過越戰運動，誰能因為他們捲入過政治就否認他們的獨立性呢？無獨有偶的是，在東歐蘇聯，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反對派領袖恰恰不是政治學者而是藝術家和科學家。捷克的哈維爾是劇作家、蘇聯的薩哈羅夫是科學家。紐約的中國大陸畫家張宏圖在六四後出於義憤積極參與辦過六四畫展，並親自畫過一些諷刺毛澤東的畫。他對於海外很多華人藝術家冷漠深有感觸，同時也對於藝術要和政治劃清界線的看法不以為然。他就認為，藝術只是一種形式，而政治也

可以成爲這種形式反映的內容之一。張宏圖先生願意用他的畫筆爲民主事業吶喊，我並不認爲他就喪失了獨立藝術家的地位。

相反，一個不敢涉及某一領域的藝術家恰恰不能算作獨立，這說明他的藝術還要受到某種因素的制約。真正獨立的意義恰恰在於可以涉及「任何」領域，其中自然也包括政治。

獨立地和任何團體打交道

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要搞一個什麼活動，往往對參加者的政治色彩頗多禁忌。這種待遇受得最多的是國民黨和中國民聯。很多被稱爲「獨立」或「中立」的會議，都不讓國民黨和民聯的代表參加，似乎一沾上這兩個政治組織色彩，會議就有失獨立或中立了。

中國之春的記者或民聯的成員在過去的七年中已無數次陷入這樣的窘境。當他們要求參加某項「獨立」人士組織的活動或會議時，組織者常常婉轉地拒絕道：「內心裡我是很支持你們的，不過這個會議（或活動）最好保持獨立形象，政治組織參加不太方便。」可是令我奇怪的是，在「六四」之前，我從未聽到有哪個大陸人的會議對共產黨員的與會資格提出過異議。既然是「獨立」的活動，怎麼能夠有這樣的政治歧視？

當然，我很理解這些「獨立」活動組織者的難處，他們擔心共產黨的封殺，而用「獨立」或「中立」的幌子爭取合法的地位。正因為理解這一點，中國民聯的很多成員才甘心默默地當無名英雄，他們隱名埋姓爲這些「獨立」的活動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把 CREDIT 讓給別人。

但是，「理解」並不等於「贊同」。避嫌做法本身就說明這類活動有失「獨立」，因爲其動機很顯然是懼於來自某方的威懾。真正獨立的含義不是不能和某些組織打交道，而是可以與「任何」組織打交道，無論是共產黨還是

國民黨，是民聯還是民陣。

「六四」之後，一些「獨立」人士又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不敢和共產黨接觸了。有些會議審查資格的對象變成共產黨員，同時對中共官方人士避之不及，生怕一沾上就成了叛徒特務。對於這些人的立場自然更容易理解，不過同樣不能認為他們學會了「獨立」。歧視民聯和歧視共產黨性質是一樣的。既然共產黨是一個避不開的現實，有什麼必要掩耳盜鈴？你不承認它並不等於它不存在，至少任何和大陸的交往還免不了和它打交道。對於共產黨，既沒有必要害怕它，也沒有必要歧視它。真正「獨立」的心態是把自己看得和它平等。它幹好事可以表揚，幹壞事可以批評，需要打交道照樣打交道。

「獨立」，並不表現在「做什麼」，而是取決於「怎樣做」。

獨立不是劃清界綫而是模糊界綫

中國某些知識份子參加一些活動時常常對這個活動的背景比其本身意義看得還重，對「與什麼人為伍」比「這件事值不值得做」看得更重。

去年三月份，有三十三名著名知識份子在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呼籲書上簽名。可是，當中共當局告訴大家，簽名者之一陳軍有「中國之春」背景之後，某些著名知識份子竟然要求撤回簽名，理由是「不知道此活動背景複雜」。

我不知道這些要求撤銷簽名的「知識份子」有沒有自己的主見和判斷力。要求釋放魏京生和政治犯是否值得一做的正義之舉？如果是，就簽字，如果認為不是，就不簽。這和其它有什麼人簽字有什麼關係？什麼時候中國的知識份子能夠不看別人的眼色表達自己的立場？

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這種行為方式是和共產黨迫害人的方式分不開的。海外有很多人常常低估了共產黨的氣量，以為在中共眼裡有無數

個禁區，只要有人踏進禁區，就會遭殃。其實實際情況絕非如此，中共眼裡根本就沒有禁區。問題看涉及的是誰，背景是什麼。同樣一篇批評黨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登和在中國之春上登就大不一樣。前者可以是好文章，可是只要印在另一張紙上就可以貼上「反革命宣傳」的標籤。文章裡寫的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背景。同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體改所的人提出來和民主牆的人提出來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問題不在於你說什麼，重要的是誰說。

共產黨的這種迫害人的政策自然塑造了受迫害人的行為規則。人們在做一件事的時候首先不是看這件事該不該做，而是先看其它還有誰參加，背景如何。只要懷疑有國民黨，或中國之春插手，本來該做的事也退避三舍。

這種心態下的知識份子，怎麼能開創出「獨立」的民主運動的空間？

獨立就是不看任何「眼色」行事

有些人可能會辯解說：我們對某些事情的避嫌並不是看共產黨的眼色，而是考慮多數群眾的情緒和理解程度。

但這種辯解同樣不能證明其行為的「獨立」性。如果你要放棄一個原則，是看當局者的眼色還是看大多數群眾的眼色，其性質是一樣的。無論自由、民主、法制、人權都是針對少數人而說的，只有少數人的權利才需要特別強調保護。如果少數人永遠要看大多數人的眼色行事，獨立性還有什麼意義？世界上所有專制都是從多數開始的，而社會的自由、進步都是從少數人開始的，如果少數人不能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我們上哪去找到民主運動的起點？

每一個獨立知識份子的使命並不在於取悅大多數人，而在於追求真理和正義。要學會獨立，首先要忘掉大多數。你相信什麼，就說什麼，

認為什麼值得就說什麼。如果你代表歷史的趨勢，終有一天你會擁有多數，即使不代表主流，那也沒關係，因為你的行動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多元，是民主制的前提，市場本身比買賣什麼東西更重要。

出於對宣傳工具的壟斷，專制統治者在動員多數輿論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而獨立於官方的民主運動必然從少數人開始。為了爭取多數，可以暫時降低綱領和訴求，但保持獨立性的基本原則和行為方式決不能讓步。如果我們一方面在呼籲中共停止對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見的迫害和歧視而同時又在對另一批中國之春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政治迫害和歧視，這不是很滑稽了嗎？

獨立立場與激烈程度無關

有很多人以為，反對專制的態度越激烈，越能證明自己的獨立性。可是實際上綱領口號的激烈程度和獨立的立場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一個獨立的反對派有可能是很溫和的，而有一個很激烈的力量未必學會了如何獨立。

懂得專制主義秘訣的人都明白，共產黨對於激烈言論的恐懼，恐怕還不及那些它控制不住的言論：哪怕這些言論很溫和。共產黨寧願讓激烈的異議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也不會容忍一個它控制不住的民主牆和中國之春。原因很簡單，人民日報上面的異議儘管可以很激烈，但絕非獨立的，中共可以讓它發表，也可以不讓它發表。可是民主牆或中國之春上的異議儘管可以很溫和，但它却是獨立的，中共控制不了的。從反對專制的角度出發，「獨立」比「激烈」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激烈有可能摧毀一個專制，但同樣有可能建立另一個專制。而「獨立」力量甚至可以不具有攻擊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專制的壟斷。只要它能夠使自己活下去，就等於從結構上結束專制主義了。▲

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到處都在講中共合法性的喪失，在什麼意義上中共有過合法性？這一
合法性是怎樣失去的？怎樣才能在中國建立政權合法性的觀念？

王潤生

經過「六四」事件以後，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人們都熱衷於談論一個話題：給中共算命。樂觀者依據蘇聯、東歐發生的變化斷定中共壽數已盡；悲觀論者則依據中共四十年的專制統治的有效性認定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還遙遙無期。本來，做預言是一件很容易出醜的事情，但是人們不能不對將來有一個大概的估計。

爲了增加這種估價的可靠性，我們需要考察歷史中的一些變量因素。我認爲一個最重要的變量因素是：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是否仍然存在？

有不少人認爲中共四十年的統治是靠強力維持的，其實不盡然；如果一個政權在人民的觀念中不具有合法性，僅靠強力是難以持久地維持的。爲了維護一黨專制，中共確實屢屢使用暴虐手段：如鎮反、反右、文革、文字獄，靠壟斷生存資源來壟斷社會賞罰手段以施行「黨天下」等等；但是，它之所以犯了大量罪行而不垮台的重要原因在於，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在民衆的觀念中較普遍地具有合法性。

中共由弱而強，繼而由盛轉衰的歷史，可以說是一個由逐漸贏得民心到逐漸失去民心的過程。歷史常常都是那樣的有趣：一個政權倘若獲得了民衆的普遍支持，即使犯了一些錯誤，出一點偏差也算不了什麼，大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過來，倘若喪失了合法性基

礎，則沒事也會生事，小事變成大事。因此，考察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的過去和現在，是我們分析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的一個極重要的背景參照。

中共政權合法性之根源

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有兩種不同的判斷方式：一種是價值判斷，即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判斷該政權與該價值是否吻合；一種是事實判斷，即觀察該政權管轄下的絕大多數人民是否承認該政權的合法性（代表性）。

如果我們以民主爲政權的合法性之價值標準，那麼可以說，中共從執政之初便不具有合法性。但問題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懷疑它的合法性，他們接受了它，而且基本上是自願地選擇了它的，雖然這個選擇過程沒有經過一套嚴格的程序。也就是說，從事實這個層面看，中共政權在產生之初是具有合法性基礎的。

這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本世紀四十五十年代，在中國的絕大多數民衆中，民主意識還相當淡薄；雖然民主思想和原則在五卅運動前後曾經有過廣泛的傳播，雖然曾有過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的民主實踐，但是在外侮和內亂頻至的情況下，任何走向民主化的嘗試均以失

敗告終；務實的本性和缺乏民主經驗參照的理智誘使中國人民期盼着一個強大的、能解決民族獨立、社會安定、國計民生等問題的政府，而不太重視政治制度上的設計；第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當時仍然是佔主導地位的判斷政權合法性的標準，雖然這個標準帶有相當的模糊性，但人們却可以依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直覺來判斷政權的好壞：凡能使人民安居樂業且政治廉潔的政府便是好政府（合法的），反之則是壞政府（不合法的）。

四十年代末，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軍事上的失誤，而是其合法性的喪失，持續的經濟危機、高通胀、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和肆虐，以及連年內戰（在失去信賴的情況下，內戰的責任自然應算在執政者頭上），使多數中國人基於民本思想，不再承認它是一個可信賴的有代表性的好政府；中共便是在這種條件下執掌政權的；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過是在堤壩已被蛀空的情況下洶湧而來的最後洪峰罷了。

中國共產黨在總體上雖然是最激烈的反傳統派，但在政權的合法性觀念上却自覺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列寧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價值觀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毛澤東則將之修改爲易於爲具有傳統意識的中國民衆接受的一套準則：代表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的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等等。表面看來，中共也接過了民主的口號，但它拒絕對民主作任何形式化或程序化的解釋，而是通過保持其模糊性和任意性來為專制獨裁辯護。

那麼，為什麼在五十一六十年代，中共政權在社會心理層面能有廣泛的合法性呢？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執政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共所做的一些事情及其形象同人民所認定的民本思想大體上是吻合的。這些事情主要有：

(1) 消除外患，增強民族自尊心。八年抗戰塑造了共產黨人的民族英雄形象，朝鮮戰爭志願軍又同當時的頭號軍事強國美國人打了個平手，之後有中印戰爭、越南戰爭、有珍寶島同蘇聯的交手，雖然這些戰爭從軍事上和政治上判斷其得失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但它們至少沒有一次是以慘敗告終的。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中國人向來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在近代百年史上又飽受了割地賠款的屈辱；因此，無論是獲勝的戰爭還是打成平手的戰爭，都具有縫合內心創傷的奇效；作為戰爭組織者的共產黨人，自然而然被看作民族的代表。

(2) 土地改革。這是早年的國民黨人想做而沒做的事情；共產黨人做了，五十年代初他們幫助數億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這一條，在中國歷史上歷代開明君主那裡，都會被證明為是凝聚民心，促使經濟繁榮的有效手段。雖然後來的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制度再度剝奪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但由於這種做法超越了人們的歷史經驗，它的新鮮性使人們容易對它抱有幻想，因而在短期內大多數農民都難以意識到它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3) 工業化的奇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中共通過集權和強迫國有化等手段迅速集中資金、資源、人才，較快地建立了一套雖然粗糙但却較為系統的工業化體系；雖然這是以犧牲自由和數億農民利益為代價的，而且計劃經濟

的後遺症較之它最初創造的奇蹟也許要弊大利小，但在最初，它却有效地增加了國力並大大地鼓勵了人們對未來的樂觀和自信，也使得不少天真的人們相信了共產黨人將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天堂的許願。

(4) 通過工業化過程中創造的就業機會，通過嚴厲的社會治安措施，再加上多年戰亂後人心思定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五十年代，整個社會大體上是穩定的；剛剛從亂世中走過來的中國人民格外珍惜這種和平和建設的氣氛，因此他們相當願意同政府合作。

(5) 廉政建設。一般說來，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但也有例外。中共的集權程度極高，但由於嚴格的計劃經濟和單一的國有制，官員行賄受賄的機會並不多；而且中共有着一整套帶有清教徒色彩的道德規範，這套規範不僅通過黨內生活和社會輿論起作用，而且中共還通過工資、社會福利、榮譽、各種機會的分配來強化這些規範的約束力，使其成為具有準法律效用的行為準則，這使得中共各層官員直至七十年代大體上還能保持一個較好的道德形象。

如果說上述五條大體上能夠解釋中共政權在五十年代能夠收攏民心的原因的話，那麼，在經過了殘酷的「反右」、災難性的大躍進和文革之後，中共為什麼仍未盡失民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卡里斯瑪權威效應十資訊壟斷。

由於共產黨人在執政前後一段時間裡的成就，又由於有意製造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其執政的二十多年中，在中國大陸始終扮演著卡里斯瑪權威的角色。卡里斯瑪權威的一大特徵是：在其魅力喪失之前，人們盲目地相信他所提出的一切價值、理想、預言和許諾。由於他那被神聖的光環包裹着的巨大的身影的遮蔽作用，即使有了懷疑的充分依據，要懷疑和否定他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反右的災難、大躍進的災難、文革的災難，却都沒有構成

對政權的致命威脅，大多數受苦受難的人民當時仍然迷信「偉大的舵手能帶領我們渡過難關」。可能那時也有一些富有自由和懷疑氣質的潛在的反對派，但由於資訊的高度壟斷，由於「輿論一律」，反對派除了成為專制機器上的祭品之外，其作用微乎其微。

改革產生了合法性危機

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始於十年前的改革之初。雖然在民主牆時期魏京生等人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口號沒有引起廣泛的共鳴，但在情感和經驗的層面，當時的整個中國社會已經充盈了一股對中共執政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逐漸衍生為信仰危機，之後又表現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否定，繼而又發展到對中共執政的信任危機，最後催生了「八九」民運。「八九」民運標誌着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危機的爆發，而它的結果則導致了現政權的合法性的喪失。

合法性危機的逐漸產生並日趨嚴重主要同以下四個原因相關：

首先，對中共執政的歷史的回顧和反省使大陸人民逐漸認識到了作為「救世主」的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苦難。八〇年中共改革派發起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從哲學上說是幼稚的，在政治上也是較保守的，但却為人們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歷史和評價歷史的機會。在否定了「兩個凡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有限度地肯定了毛澤東之後，盡管當權者力圖把文革前的十七年描繪成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口子一開，要堵也堵不住了；隨後，「反右」和大躍進被否定了，合作化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也受到質疑，很大一部份中共黨內殘酷的權力鬭爭史大白於天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共產黨人曾經是有着一層耀耀的道德光環的，等到他們的經歷和生活細節被通過各種渠道披露出來之後，人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只不過是一些冷酷無情、荒淫無恥、欺下瞞上的僞君子。此外，人們發現，在中共統治下，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級官員在內，幾乎家家都有一部血淚史。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那幾年，在全國上下已經形成了一股風氣，誰都樂於向別人訴說自己的不幸經歷和苦難遭遇，誰都恥於向別人肯定自己是共產制度的獲益者；中共黨內的開明派爲了贏得民心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一副同過去告別的樣子。

其次，對外開放和發達的資訊條件給人民提供了比較的機會。沒有比較就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對外開放和收錄機、電視機的普及使人們開始瞭解外面的世界，其結果是：一些自覺的知識份子開始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爲參照來反省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絕大多數人民也至少在事實上認定了：無論是社會發展程度還是人民生活水平，蘇聯不如美國、東歐不如西歐、東德不如西德、北韓不如南韓、大陸不如台灣。這種事實比較雖然簡單化，但它引伸出來的觀念——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却是任何宣傳都改變不了的。因此我們看到，在經過了幾次徒勞無益的爲自己的統治塗脂抹粉的努力之後，中共只剩下了兩個爲社會主義辯護的理由，一是實踐形態的社會主義不等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人們可以通過改革找到一種真正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一理由其實已包含着對自身歷史的否定）；其二是中國大陸「地少人多底子薄」，因此不能同別人比。（這一理由非常惡劣地包含了爲自己的未來辯護的用心；在邏輯上，同它所提出的現代化目標也是不相容的。）

共產黨執政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全部根據是它所許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優越於任何制度的諾言，因此，社會主義信念的破產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第三，日趨嚴重的腐敗加劇了人民同官僚集團的對立。至少從八四年城市改革開始，中共統治者階層與人民的矛盾超出了一般的緊張

關係，逐漸演化爲相互提防和仇恨心理。其原因是，從那起，不僅傳統的拉關係、走後門、隱蔽性特權分配愈演愈烈，而且經濟上的雙軌制給大大小小的掌權者提供了濫用權力的機會，於是貪污受賄之風盛行全國，官倒走私肆虐無忌，請客送禮則幾乎成爲普遍的行爲定勢；管批文權的發批文財、管物資的發調撥財、管經貿的發「回扣」財、管人頭的發人事財，官員們的道德形象落到中共執政歷史上的最低點。更可怕的是，儘管所有的官員都有可能從這種狀態中撈到好處，但由於這裡的利益分配是非公開的、不可控的，呈現出一種「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的模式，因而它不僅給官員的鋌而走險不斷提供強刺激，還使所有的官員都以爲別人比自己撈得更多，生發出一種因分贓不均而產生的不公平感來。在中國歷史上，公平和廉潔問題向來是最敏感的兩個問題，因此到了一九八八年，整個大陸瀰漫着一種當時被稱之爲「世紀末感」的情緒，即使在輿論被控制的情況下，「危機」的字眼在報章上也隨處可見；連相當部份的共產黨官員在內，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大潰敗前夕的感覺，大家都覺得整個社會已經不可救藥，都無可奈何地等着出事。

第四，十年來新文化的產生和啟蒙運動的興起爲人民觀察評價現實提供了新的理論參照和價值標準。這是一場自覺的知識份子運動。雖然這場運動有許多欠缺，例如對現實的批判過於隱諱、極端地排斥傳統、帶有明顯的非理性主義色彩和反文化色彩、缺少建設性等等；但它的正面價值也是明顯的：對民主政治的呼喚，對「官本位制」、「清官政治」的清算，對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提倡以及通過引入班駁陸離的各種思想理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氣氛等等，一方面在人民當中基本取代了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在部份知識份子當中形成了明確的民主政治要求。它對中國歷史的更深刻的的作用還在於：它培養了一整代自我中

心的、有着強烈的個人權利意識的、否定傳統和蔑視任何權威的新人，即所謂的「第四代人」，正是這一代人構成了「八九」中國民運的主力。他們的自願自不合作的性格也許對於未來中國建設有着負面的影響，但他們身上已不再具有前幾代人所明顯具有的奴化性格，他們的敏感和反抗性使他們極容易走向對現存制度的否定，而他們的「不信邪」也極容易走向對現存制度的抗爭。

屠殺使合法性完全喪失

一九八九年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反映了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總爆發。但是，直到「六四」以前，這場運動都不僅對中國的民



主前途帶來了希望，同時也為中共渡過其合法性危機提供了機會。危機並不總意味着死亡。儘管當時中國的老百姓對執政者已經相當失望了，但他們還沒有絕望，絕大多數人當時都沒有推翻共產黨的打算，人們不僅在策略上，而且在內心深處都還不太贊同「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甚至整個運動提出的政治要求中都沒有——要求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對一黨專政有潛在的挑戰性。因此，如果像中共內部的改良派如趙紫陽那樣接受或部份地接受民衆要求的話，不僅可以順應民意，而且可以部份地解決導致其合法性危機的社會問題和黨內問題，從而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但是，中共黨內的腐朽勢力沒有這樣做，他們的「面子」、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因嚴重危機感而產生的「輸不起」的心理誤導了他們的思路。他們向手無寸鐵的人們開槍了。「六四」大屠殺是一把雙刃的劍，既扼殺了中國社會的一線生機，也同時毀掉了統治者自己。至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在人們的心中完全喪失了。其典型標誌着：這個政權的苟延殘喘已經完全靠暴力和高壓維繫了，連它的謊言和欺騙也不再起作用了。甚至在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方面，中國的御用文人們已經理屈詞窮。過去他們把中共描繪成中華民族的救星以證明其統治的合理（這還算是一種「曉之以理」），「六四」以後，他們說得最多的理由只剩下兩條：一是不堅持中共的領導便有內亂危險（向人民誘之以利）；二是現政權是用千百萬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強盜邏輯）。

對中國人合法觀念分析

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從危機到喪失的過程，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一個印象：民主思想在中國大陸已經深入人心，民主化浪潮將再度席

捲整個中國。這種看法如果說不是錯誤的話，至少也是過於樂觀的估計。

在大陸，確實有少數覺醒的知識份子是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去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他們的參照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民主理論；只有民選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而民選則遵循着一整套自由選舉的規則；民意必須具有相應的渠道去表達，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等。

但是，以此為參照而要求民主，批判現實的知識份子在大陸只屬少數。民主墻時期當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構想時，理解者和響應者寥寥；八〇年的大學生競選雖然對部份青年知識份子是一次民主政治的洗禮，可由於為時短暫且無實質性成果而未深入人心；八六年醞釀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只是少數人的事，其影響基本上沒有擴散到社會上去；在意識形態方面，直到「八九」民運爆發之前，整個大陸仍未有一套從正面闡釋民主政治的理論，只有個別理論家搜索枯腸地從馬克思的經典中去尋找一些詞句來設法認同西方的民主制，譬如從利益多元論出發推出階級或階層論再推出政治主張多元化的合理性進而證明多黨政治的必要性（蘇紹智先生的觀點）。但即使是這種帶着馬克思主義印記的觀點，在當時仍被視為具叛逆性的大膽之論，認同者寥寥，傳媒更不敢接受。

在民主思想的傳播方面有所作為者也很少，一般地空喊民主口號的不乏其人，但幾乎沒有批判一黨專政的言論（方勵之除外）。時至一九八九年初，少數較為激進的知識份子仍只是期望加強中共黨內的民主和主張修憲，修憲的主張雖然暗含逼向「四項基本原則」的矛頭，但由於隱晦，只有少數圈內人才看得出來，因而其啟蒙意義有限。

與中共「肝膽相照」的幾個花瓶黨在這方面更是戰戰兢兢，他們只搞過一次非常可憐的「跪着造反」：一九八八年，當中共當局重彈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之老調時，他們要求去掉那個「下」字，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而當中共官員表示可以考慮接受該「意見」時，他們便大有受寵若驚之感，滿以為通過這麼個文字遊戲便可以同共產黨平起平坐了。

至於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民衆，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懷疑和否定則仍然是基於傳統的合法性觀念。這些觀念包括：(1)「民貴君輕」的儒家傳統，這一觀念的理論形態雖然一再被摧殘（最初是被共產黨人嘲弄，這幾年又被新啟蒙派的知識份子批判），但它的世俗化形態却通過文藝作品、民間故事、自發的社會輿論等方式保留下來，如「清官期待意識」、「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白薯」的觀念等等；(2)共產黨自身的意識形態，如「人民公僕論」、「為人民服務」、「反對官僚主義」等等，它的理論形態雖然也由於中共道德形象的一落千丈而遭到普遍的譏笑，但幾十年的薰陶還是使民衆常常不自覺地以此作為「以子以牙，攻子之盾」的武器，甚至人們對「六四」屠殺的憤恨和否定，也部份地以毛澤東提供的價值準則為依據：「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一些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八九」民運中最有號召力的口號是「懲辦官倒，清除腐敗」，大多數民衆是基於對社會不平和為政不廉的不滿以及對餓食學生的同情而投入這場運動的；這表明，他們的反政府舉措主要是基於傳統的價值而不是民主的目標。

歷史和現狀的幾點啟示

根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喪失的過程及其原因，根據中國大陸民衆合法性觀念的現狀，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如果中共洗心革面，接受民主的政治規則的話，它仍有可能保有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回頭路是絕對走不通的。經過

「六四」，中國統治者想要重新贏得民眾對它的信任幾乎是不可能的，它至多只能通過做好幾件事來減輕人民對它的厭惡程度，例如：(1) 保證經濟穩步而又有相當速度的發展；(2) 切實解決社會公平問題；(3) 切實解決廉潔建設問題。這幾件事同民眾的現實要求最為貼近。但是，這幾件事的解決均有賴於逐步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前十年的改革經歷業已表明：惟有推行其目標指向市場化的改革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一方面企圖在經濟中走出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巢臼，另一方面又企圖在政治上沿襲斯大林主義的老路，不僅最終解決不了經濟問題，而且還會生出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政治腐敗來。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輿論監督、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多黨政治對執政者形成的壓力，所有的社會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乞靈於執政黨自身的紀檢、政治高壓和政治運動是無濟於事的。何況，繼中國民主運動之後，蘇聯、東歐的民主化浪潮給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好的示範，形隻影單地繼續推行專制統治只會遭到國內外人民更深的敵視。

因此，中共如果明智的話，它的唯一出路是接受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則，最低限度也應該走西歐共產黨人的道路：承認政治多元化，切實代表某一階層或階級的利益，在議會政治中接受人民的選擇；或者更進一步，走社會民主黨人的道路，這條路或許會為它帶來更大的希望。另一方面，對自身建設成就的誇耀、「學雷鋒」、輿論控制等，這些玩意在五〇—六〇年代曾經是中共相當有效的法寶，但使這些法寶在當年靈驗的條件如今一個都不存在了：(1) 中共作為人民救星的神話已徹底破產，人民對現政權的信任已降到冰點；(2) 共產主義的所謂理想即使在中共黨員中也少有真誠的信徒了，中共關於明天的許諾已不再有絲毫感召力；(3) 全面的腐敗已使中共難以從內部找到足夠的健康的力量與之對抗；曾經起過動力作用的道德優越感在如今的官員身上已喪失得乾乾淨淨；(4)

以克里瑪型權威統一思想和意志的時代早已逝去；(5) 發達的資訊條件使完全壟斷輿論已成為不可能，謊言和欺騙的效用已極其有限。

第二，獨裁政治在中國仍未完全失去其賴以存活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民主思想的啟蒙和傳播任重而道遠。我們可以斷定：對於那些手上沾血的中共黨內的腐朽勢力來說，即使他們改換形象，要挽回民心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卻沒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種類的專制政治（尤其是開明的或比較開明的）在中國已經窮途末路。雖然「八九」民運使中國人民經受了一次民主思想的洗禮，雖然繼之而來的世界民主化浪潮對於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的覺醒具有巨大的催生作用，但有幾個重要事實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一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的否定並非基於民主價值而是基於傳統觀念，他們所期盼的主要是政府的廉潔、公平和有效率；二是包括知識份子在内的大多數民眾對民主的價值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序規則知之甚少，對中共統治帶來的災難，多數人都不會從制度層面去檢討其原因，而是習慣於把帳算在一兩個「昏君」、「奸臣」頭上；三是由於中國歷史的暗示作用，也由於對民主政治的無知，中共政權的管理者階層較普遍地對政治變革患有恐懼症，這裡的所謂歷史經驗包括：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殘酷場面，中共自身的「打土豪、分田地」、「鎮反」的經歷；文化大革命群眾造反的經歷等等。因此他們容易把民主化過程想像為改朝換代的過程，對身家性命的憂慮使他們本能地靠近政治上極端保守的立場。

基於此，我以為，在今後的民主啟蒙運動中，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都有必要花大力氣做好三件事：(1) 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闡述民主原則和民主的程序規則的價值和意義；(2) 從專制政治之弊端的角度重新分析和評價中國歷史尤其是近四十年的中共執政史，從經驗層面清算列寧、斯大林主義的政權理論；(3) 具體地設

計和展示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以及社會各階層、各種政治力量（包括中共）在這個過程中的可能前途和特定的角色定位。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亦有可作培養民主意識的養料，一概地排斥傳統恐怕是捨近求遠、勞而無功的做法。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是個很複雜的混合體，其中的某些至今仍有影響的成份也確實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例如「草民意識」、「成者王、敗者寇」的是否觀、「得天下者坐天下」的俗文化觀念，這些都是專制政治在社會心理方面的保護層；但是並非所有的東西都同民主原則相抵觸，譬如「民貴君輕」的儒家傳統，俗文化當中的「清官期待」意識。儘管它們不同於現代民主思想，但却都暗含了民主的價值成份。它們同民主原則的相通之處在於，它們包容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目標：政府行為取向應當符合民意，政府應當公正、廉潔且有效地為民眾辦事。它們同民主原則的不同之處只是：它們僅有價值取向而缺乏保證這些價值實現的制度設計（或者說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規則）。這就是說，按現代民主思想體系去度量，這些傳統只不過是有質無形，有價值理性而無工具理性罷了；這也意味着，從這些觀念出發是可以邏輯地引伸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來的，或者說它們至少可以為現代民主制度作證。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異質文化的移入如果不同本土文化發生某種程度的聯姻的話，是很難生根存活的，而幾千年的傳統在民眾的心理層面或俗文化層面的積澱僅憑秀才的幾聲「吶喊」是幾乎不可能根除的；何況正是這樣一些傳統，動員了中國民眾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挑戰。回想幾年來國內文化界對傳統文化的猛烈抨擊，我個人最大的體會是：企圖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文化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們無法把傳統變成廢墟；其次撤開傳統的重建只會事倍功半甚至勞而無功。面對這塊駁雜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我們所要做的僅僅是：修補——少一點減法，多一點加法。▲

共產黨在調整 我們也要調整

丁楚訪陳一諮

錢楓整理

丁楚：那天在捷徑俱樂部，我聽你說了一句話：中共正在調整，我們也需要調整，我對這個觀點非常感興趣，你能不能具體闡述一下。

陳一諮：「六四」屠殺在中國、在世界都造成了很大反響。它使得中國的最後一線希望——共產黨能領導好中國的希望破滅了。中國十年改革的進程也終止了。現在的政策：(1)與十年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格局發生了衝突；(2)與老百姓的要求產生了衝突；(3)與世界潮流發生了衝突。這使李鵬的政策推行不下去。

許多人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性：八億農民，老百姓素質不高。這是個事實。由於計劃經濟的結果，農村戶口的八億農民沒有政治經濟的抉擇權。所以，中國農村對政治經濟問題的反應，要比城市有一個落差；中小城市與大城市相比，要有一個落差；大城市和北京相比，又要有一個落差。所以，在中央集權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北京作為一個決策中心如果不能穩定，那李鵬政權也就不能穩定。我以前曾開玩笑說李鵬要想使北京穩定，只有兩個辦法：(1)趕走三〇〇萬北京人；(2)遷都。但這兩條中的任何一條他都做不到。

現在無論是大陸出來的人回去，還是海外華人回去，或是外國人去中國，私下交談，老

百姓都對這個政府充滿了失望、憤怒和對抗。雖然對抗的方式各種各樣。比如這次「六四」，北京十幾所大學都在校園裡組織了各種活動。(丁楚插話：扔小瓶子。)我們從外電報導中只看到了北大，據我瞭解，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都上街了。從近代史看來，一個建國四十年之大國，在自己的首都用坦克、機槍、達姆彈殺害自己年輕的學生和居民，真是史無前例。由此而造成的人們在心理上的與政府的對抗，今後將很難消除。蘇聯、東歐的變化更增強上這種對抗心理。

守舊派和強硬派的領導人，對這一年之後的局勢有些束手無策。改變目前的路綫，等於他們的失敗；不改變目前的路綫，則維持不下去。民衆在感到絕望、失望的同時，對政府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這使中央內部發生了非常尖銳的分歧。因為有些人手上還沒有沾着血，有些人還比較瞭解民情，有些人不改革不行。他們與那些少數的被稱為「屠城」派的強硬、保守、僵化的路綫、政治發生了分歧與衝突。於是，政府一方面增加統治成本；通過大量的便衣、跟蹤、監聽活動繼續實行高壓；另一方面則採取懷柔政策，對自己的姿態作一些調整。

有三方面原因促使他們作這些調整。一是國內目前的局面。有些人說現在是「外鬆內緊

「其實應該說是「上緊下鬆」。上面搞清查，下面根本不埋這一套，而且互相之間再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那種群眾鬧群眾的局面了。大家共同保護着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出了各種貢獻的人；二是「六四」以後海外華人空前覺醒，看到了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性，紛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共產黨在十年改革開放中建立起的那種形象已破壞殆盡，它不可能再用欺騙手段去對付海外華人。但是海外華人也有這麼一種情緒，出來多少年，對國內的制度再不滿意，他也希望國內人民能過得好，國家強大。當然現在大家都認識到了，要強大不變革這種禍國殃民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北京政權要再採用一種赤膊上陣的強硬態度會更加孤立；第三是「六四」屠殺也打破了外國對中國的幻想，特別是中國的一些老朋友，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是在怎樣的一種制度下生存、掙扎，他們也覺醒了，對於這個殺人的政權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因此，這個政府不作出一些調整是不行的。

江澤民最近的一些言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繼續堅持說去年的民主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另一方面當記者問他時，他又說當時他不在北京。這就是說當時他不能不按這個調子唱，而心裡是否同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現在北京的領導人幾乎個個都通過自己的家屬，下

級向外傳遞信息；我不是殺人者。這說明他們也意識到了去年「六四」帶來的嚴重問題，以及政權的難以維持。於是他們一面繼續擺出強硬的姿態，一面又做出緩和的動作，對海外又拉又打，這就是說，面對世界性的潮流，他們開始調整了，這些調整可能會迷惑一些人，對他們政權的穩定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調整也為它產生問題和早日垮台帶來了基礎。在它垮台的時候，會有一部份人動搖，但也會使一部份人更堅決。這種更堅決不是在言辭和行動上表現得更激烈，而是更成熟地採用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表現得更冷靜，因為我們代表了人心、方向和正義。我們要既順應歷史潮流，又從現狀考慮如何一步步地推進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

所以我說，共產黨在調整，我們更要調整。誰調整得好，誰就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取得某種成功。

共產黨的調整不佔天時、人和，但佔地利。它掌握着權力，可以利用權力系統進行調整，在某些局部地區也可能獲得成功。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對我們來說，要把對「六四」事件的某些憤激轉變為一種理智、冷靜的反思，理性地探索這個政權為什麼會產生，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思索為什麼我們一步步的探索都失敗了，怎樣才能成功？蘇聯、東歐變化之後，許多人都在反思，但我覺得，這些反思還沒有成為我們戰略、戰術上的調整，成為我們在海外這批中國人為結束一黨專制，建設民主中國的共識。雖然從主流上講，我們是佔有優勢的，但在客觀條件上，主觀認識程度上，還是有很多問題的。

丁楚：

你提出的共產黨在調整，我們也需要調整的看法，已經足以使許多人深思了。要把它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馬上就可以打動人。

陳一諮：

作為一個愛國的，想做些事的人，我感覺

到海外來是一種悲哀。我出來之後確實感到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但是，在中國人之間，我覺得做事又非常難。幾乎每到一處，我都感到得天時之利，但卻沒有地利之便。沒有地利之便，我們能有真正的人和？真有人和之順，我們也能成大事。但是，中國人所到之處，往往很難團結。

民主運動，如果不批判、反省自己身上存着的共產黨文化，那就很難成功。我覺得民聯選比民陣好一些，因為在海外的時間長，內心比較平衡。雖然也有一些共產黨文化的影響，但它已經借鑒了西方社會中許多好的東西。有的人不在位、不當權，就表現出泛民主、反權威的態度；一在位，一當權，就表現出專斷、獨裁的特點。這裡有傳統文化的因素，更有共產黨文化的影響。比如說泛民主反權威，這就是一種農民的均平思想造成的；而從共產黨的文化來說，它就是一種被歪曲了的絕對的平等觀，把一種人格意義上的平等理解成把人的體力和智力拉平。因此，組織上形成的決議，他表面上服從，到背後做小動作，往往都是先君子，後小人。不是大家把問題擺出來，形成共識，一起來做，建立規則。這是我們成事的極大障礙，也使許多組織成爲一盤散沙。我說民陣的問題要比民聯嚴重，是因為民陣成員多是在改革中在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的一個階層，而出來之後，他們沒有大鍋飯做保證，生存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在沒有解決生存問題的情況下，他去從事民主活動，結果就採用了共產黨的鬭爭手段與方法。在一己私利的支配下，他可以不要手段地吹捧自己，打擊和陷害別人，甚至是朋友、戰友。還可以做出各種人類劣根性中最惡劣的事情。這說明，在大鍋飯被打破之後，他們缺乏自立、求生存的能力，也缺乏起碼的做人道德。我覺得，搞不好，我們自己就成了我們所反對的東西。

共產黨把中國傳統說的仁、義、禮、誠都破壞了。我不認爲中國的人性特別壞而外國的

人性特別好，幾千年來，人性沒有什麼變化，所變化的只是兩個東西：(1)制度環境；(2)技術手段。制度環境的變化是制止人的惡，發揮人的善；技術手段的變化是使人更便於駕馭外部世界，得到物質的滿足。鑒定一種制度好壞的標準，就是它是把人的好的東西發掘出來了，還是把人的惡的東西煽動出來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人的惡的東西都釋放出來了，想到這些常常覺得心都在流血，痛苦極了。

我曾跟一個朋友討論，傳統政治基本上是一種宮廷政治、陰謀政治；現代政治則是一種民主、精英政治。權力總是掌握在少數人之中。但是，(1)權力要受到限制；(2)權力要受到監督；(3)要有大多數人參與。改造國民性就是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進行。我們現在則可以在國外的環境中進行。問題是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來塑造一代新人。所以我說的我們也要調整就不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調整，還要以制度層面上，以及共產黨文化的影響上，人的改變上去探討研究問題。否則我認爲我們不能勝任今後建立一個民主中國的重任。這個想法可能太理想化了，但我們總得向這個方向努力啊。

丁楚：

這裡就是一個實驗場嘛。就這麼幾千將百人你都搞不好，那回去後十億人你怎麼收拾。陳一諮：

就是，假設中國發生變動了，我們誰能去收拾一個中國？我覺得今後中國改革要依靠五種人：一是在十年文革、十年改革中受到了磨煉的人；二是到了海外，受了系統教育的人；三是台灣、香港、西藏培養出來的一部份人；四是海外華人中有志於建設民主中國的人；五是還有一些外國朋友。要把這五種人團結協調起來，沉下心來幹事。

丁楚：

還有一個關於兩岸調整的問題。最近共產黨在調整，國民黨也在調整。這個發展趨勢將

使海外民主活動發生些什麼變化？我們的機會何在？

陳一諮：

兩岸關係的鬆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爲了眼前的事件，而犧牲國家的、民族的、民衆的利益，我覺得這樣的政治家是不可取的。我看台灣會用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去換取大陸的不犯台。但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沒有體制保證，個人的諾言再好也沒有用。實際上，中共不可能以武力犯台，這只是一種威懾。一個越南戰爭，就花費了二十億人民幣。但中共要保持這種壓力和威懾，因爲它看清了台灣的那種偏安、膽怯。從歷史上看，野蠻的民族往往戰勝文明的民族，講理的人碰上不講道理的人就沒法講道理，所以文明的人有時就躲着野蠻的人。

丁楚：

請你談談成立研究中心的計劃和打算。

陳一諮：

我們成立研究中心，主要是因爲東歐形勢的劇烈變化；怎麼通過東歐的變化去促成中國的變化；一旦有變時我們該拿出些什麼辦法。現在如果不做這件事，那麼一旦有機會就會失去。真正結束中國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中國，可能就在今後的十至十五年內。屆時，一代領導人離開崗位，後來的領導人沒有威望，地方擁經自重，形成強大的地方和弱軟的中央的對抗。這就會產生震蕩，一黨專制就維持不下去。

要避免因政見不同而容不得政敵。英國革命時達成了協議，互相不迫害政敵。這是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而不要像前一輩人那樣趕盡殺絕，你死我活。我們不是爲了黨派的利益，而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復興。許多國內朋友，包括一些強硬派的子弟向我問好，表示某種善意，我都表示接受。我說，我們可以政見不同，但不能學老一代，這樣中國才有希望。他們也不贊成這樣，他們也有後顧之憂，他們

也看到了世界潮流。

丁楚：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對現狀表示悲觀。因爲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在後面都學得很不錯，你說的那些劣根性都存在。這些人的理想主義色彩恐怕都沒有第一代共產黨人強。而他們連理想主義都沒有的話，那他們會不會講規則，就很難說。

陳一諮：

我們從東歐的變化中看到，一黨專制一結束，首先便遇到了政治制度的重新構造問題。而政治制度的重新構造又要與經濟的發展程度相協調，還要社會穩定，要有新的政策。至於法律、文化的重建，那還需要三十至五十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誰在五至八年內能在以上幾方面拿出辦法，並有實行這種辦法的人，誰就能站住腳。當然還要考慮如何恢復你所提出的喪失了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我們在海外的這批人應該有所作爲。十年的土插隊有了十年改革，而如今的洋插隊則應該造就一批國際性的政治家、經濟專家、法律專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重建一個新中國。否則的話我們就又陷入了歷史的循環。

丁楚：

歷史總是這樣，到了一端之後，再把它彈回來。所以大家鬧來鬧去，發現鬧到後面沒有用嘛，你黑我也黑。你黑自有更黑的人來治你。到最後大家都覺得，我們確實需要政治。到那時，歷史才會反彈回來。

陳一諮：

你這一點說得太對了。我八九年到日本去，日本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問我：爲什麼日本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我說，您看哪？他說我們日本兩次大戰的變革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所有能解決的問題都變成了程序制度與規則，使許多事有所依從，使國民性從中得到改造。你們中國之所以解決不了問題，就是把能解決的問題和不能解決的問題都當作意識

形態問題去爭論，始終建不起一套程序制度與規則。所以，現在我們研究中心就考慮到我們是在美國社會，一切要按照美國的規則程序去辦事。

丁楚：

你設計這套制度的依據是什麼？

陳一諮：

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的幾個律師提出的架構。

丁楚：

任何西方的研究機構都是按照這個程序建立起來的嗎？

陳一諮：

那當然有許多模式，我只是說我們要按照外國的規則來做事。我們研究中心規定爲是非盈利的、非政治性的學術組織，我們要吸收五種人搞研究：(1)搞過大陸改革的；(2)在國外呆了五至八年的；(3)香港、台灣的；(4)海外華人；(5)外國朋友。我們已建立七個學部和五個綜合研究小組，重點研究中國新政治制度、新經濟制度、新社會政策、國家統一等。既要研究我們將來的實施目標，更要研究發展過程，避免最壞的可能性，爭取最好的可能性。希望三年之後，我們能搞出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分析報告、專題報告和對策報告。我們也希望從中發現人才、組織人才。

丁楚：

今後，如果機會來了，誰能拿出一個相對來說是最完整、成熟的方案，誰就能主導這個方向。

陳一諮：

你這話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爲不是一個方案，而是若干個方案，很可能是五種人在不同的區域實行不同的方案，爾後地方政府授權中央政府幹些什麼。

丁楚：

這樣中國政府就像美國政府一樣，反過來了。這就好了。

陳一諮：

中國地方那麼大，人口那麼多，發展那麼不平衡，誰也不可能拿出一個最佳方案。因此我們要給出不同的方案。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研究證明，在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速度問題上，最關鍵的是組織結構。而大陸和台灣、西德和東德、南韓和北韓的比較，關鍵都是組織結構問題。如果組織結構不合理，我們要吃很大的虧。

丁楚：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海外比較有效的組織方式是網絡結構，每一個小的團體單獨存在，專業化程度強、內耗小，聯絡感情都容易。當有大行動的時候，就每個團體都推出一個代表組織成協調機構，完了就散掉。

陳一諮：

總之，海外組織要形成一種聯合，或稱聯盟。海外力量只有形成了一種態勢，才能促進國內民主力量的增長。共產黨的特點是外強中

六四評之評

霍北剛

討論六四的文章，大體上有一共同的模式：「當時如果……就好了」。

這種「事後有先見之明」式的討論，很有好處。因為現在提出的每一項見解，對於六四來說，雖然是「馬後炮」，但是對於未來的鬭爭而言，却是指路明燈。高明的棋手，一局過後，不論輸贏，要「覆盤」許多次，從中找出雙方當時所可能採取的最巧妙的應對、最兇悍的殺着、最深謀遠慮的陰招……這樣，才能增進本事，以利再戰。

由此觀之，站在民運的立場，替民運打算，出主意想辦法的文章較多，站在共產黨頑固派的立場，研究其一切可能的反動毒辣手段的文章較少。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光打如意算盤，假設對手只是坐等捶打的呆靶，不是克敵致勝之道。

討論文章中，分析六四民運「失敗」的原因者甚多。六四民運是否「失敗」呢？這要看你把六四民運的任務如何定位。

如果你要求六四民運一舉結束共產王朝的獨裁統治，那麼六四民運無疑是一失敗。

如果你要求從六四民運開始，共產王朝的獨裁統治逐步退讓，一路順風的從歷史舞台上淡淡而逝，那麼六四民運也無疑是一失敗。

如果你認為在中國社會的歷史封建背景和共產黨現有的組織力量 and 武裝力量之下，在中國實現民主消滅專制是一場長期的殘酷的鬭爭，而把六四民運看作是這長期的殘酷的鬭爭中的一個戰役，則六四民運並非失敗，而是勝利！

勝利表現在：

- 一、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
- 二、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聲援；
- 三、形成了民主力量的組織；
- 四、在國內、在國際上孤立了共產黨頑固派；
- 五、加深了共產黨內部的裂痕；
- 六、促進了民主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成熟。

乾、欺軟怕硬，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它就怕你。因為很明顯，軍事的方法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潮流的；文化的辦法是潛移默化的；經濟的辦法是一把雙面刃，我們只有輿論和政治的辦法。而政治辦法最好的就是形成大的壓力，而形成大的壓力的關鍵是各組織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互相策應，分工協作。相同的事情共同去做，不同的事情各自去做，不就完了嗎？▲

六四民運前後不到兩個月，短短的這一場鬭爭，取得如此顯赫的戰果，能不說是一場偉大的勝利？

失敗論的論據不外：(1)血的代價；(2)共產黨加強鎮壓。實際上，只要是認真的和共產黨作鬭爭，這兩點永遠不可避免。就是不作任何鬭爭，這兩點也避免不了。文革前的老百姓不是乖的？文革不還是來了？血的代價、加強鎮壓，不是遠甚於今日？

共產黨的本質，即是殘酷。幾十年的歷史，是鐵的見證。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當初見好就收，不就對了？」見好就收，共產黨也寬大為懷，既往不咎，不搞秋後算帳，作如此想的人是不是在作夢？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共產黨饒過誰來？作順民而死於共產黨之手的，不是比死於六四四四克之下的多成千上萬倍？

策略上的進與退，當然是可以研討的。但是想杜絕犧牲，那是不可能的。

六四民運是取得歷史階段性偉大勝利的一場戰役，但是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戰役。這種階段性的戰役以及所付出的代價，是必要的。一個入吃飯吃到第三碗才飽，嘆道：「早知如此，何必吃第一、二碗飯？」

你想，有這樣的便宜事麼？◆

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結合

愛國主義成了中國民主力量與中共專制政權的爭奪對象。愛國主義包含有民主原則，因此，需要同時高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兩面大旗。

林長盛

自鴉片戰爭以來，愛國主義一直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於中華民族在近代外遭帝國主義強權的侵略，內受貧窮落後與戰亂的困擾，於是愛國主義就成了外抗強權，內圖富強的強大武器。各種政治力量都不遺餘力地搶奪愛國主義的大旗，通過它來號召和組織大眾，建立和維持其統治的合法存在。中國近代歷史清楚地表明，誰抓住了愛國主義的大旗，誰就抓住了中國的命運。

現在愛國主義又成了中國民主力量與中共專制政權爭奪的對象。在八九民運中，愛國主義無論在激勵民主派的鬥志上，在發動和爭取廣大群眾參與和支持上，還是在對抗中共對民運的誹謗與鎮壓上，都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七十年代末以來，在馬列主義的破產和信仰危機的強烈衝擊下，中共力圖把愛國主義變成其思想與道義的最後基礎，以維持其專制獨裁統治。現在愛國主義，正如方勵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已成了中共「最後的口號」。

愛國主義是八九民運的巨大動力

在「民主中國」創刊號上，齊墨先生發表了「愛國與自由」一文，提出「民主運動不宜打出愛國主義旗號」的觀點。作者的愛國主義

論點基本可以概括為：第一，愛國主義以國家為本位，要求個人為國家作出貢獻乃至犧牲生命；而民主主義則以個人自由為基礎，要求國家為個人的利益服務，這樣在愛國主義與民主自由之間始終存在着矛盾。相反，愛國主義與專制主義却不衝突，愛國主義經常被獨裁者用來作為建立和加強專制獨裁的工具。

第二，在中國近代史上，救亡圖存的巨大壓力形成了強大的愛國主義動力，造成了愛國高於自由，集體高於個體的至高無上原則；最後在愛國主義驅動下，對民族的獨立與國家的富強的追求壓倒了對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追求。

第三，八九民運是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勵下產生的，廣大學生抱着救國救民的使命與決心投入了運動；而這種崇高偉大的愛國主義激情最後導致民運策略上的失敗，使學生們「寧願選擇死守廣場也不願選擇別的民主運動的方式」，造成了一場愛國主義的悲劇。

第四，雖然用個人主義至上原則取代愛國主義至上原則在中國要冒很大風險，但民主運人士一定要認識到愛國主義的負面影響，民主運動也必須破解愛國主義的情結。結論則是在沒有外敵侵略和威脅的情況下，民主運動「沒有任何必要再打出愛國主義的旗號」。

毫無疑問，齊墨先生對愛國主義提出了一

些深刻而有見解的看法，然而某些觀點和結論却很值得仔細推敲。首先，愛國主義確實是以國家，以集體為基礎的；而現代民主主義則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兩者的基礎根本不同。一個強調國家的獨立與富強，一個要求個人的自由與利益。然而僅此並不能在理論上，也不能在實踐上證明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事實上，雖然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在政治基礎上極為不同，但兩者具有着某些非常重要的共同政治原則；在實踐上，則即有愛國主義導致專制獨裁的先例，也有愛國主義促進民主主義的先例。

另外，愛國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確實壓倒了民主主義。這點突出地表現在孫中山由民主主義者向民族主義者和從面向英美到面向蘇俄的轉變上。在三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出於救國目的更作為整體放棄了對民主的要求，接受了獨裁專制。但仔細觀察，民主主義在中國近代史被愛國主義所壓倒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價值上的衝突，而是由於民主主義被認為在追求獨立與富強上的功能不足。今天回顧歷史，我們不僅應認識到當時的歷史環境是造成愛國主義壓倒民主主義的重要客觀原因，同時也不能不深刻地檢討中國知識份子的實用主義的哲學和急功近利的心態是造成拋棄民主主義的重要主觀原因。

非常明顯，誰也無法否定愛國主義是八九民運的巨大動力，同樣誰也不能不看到民主主義對八九民運的強大推動作用。因此，如果只看到，或只強調愛國主義對八九民運的歷史作用，顯然會妨礙對八九民運，以至對整個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深刻與全面認識。而這種對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動力的片面認識又很可能導致巨大的政治失誤。此外，說八九民運在策略上的失誤乃是出於愛國主義的激情所致也似乎有些牽強。不要說我們今天仍在對八九民運經驗和得失進行探討，即便得出了結論，很明顯八九民運在策略上的失誤也絕非僅僅是愛國主義的激情所至。

無疑，認清愛國主義對民主主義的負面影響對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然而在沒有把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關係搞清楚之前，在沒有把當代中國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考慮進去之前，就冒然得出民主運動不需要愛國主義旗號的結論不僅在理論上表現的不成

熟，而且在政治上也顯得極為幼稚。當劉曉波說「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說我叛國，我就是目殺的行為。在探討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到底需不需要愛國主義旗號時，我們不僅需要深刻地理解愛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與民主主義的相互關係，而且也要認識到我們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具體的政治和文化實體內搞民主運動。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得接受這一現實。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認識這一現實的基礎上，利用這一現實，改造這一現實。」

事實上，愛國主義的內含遠遠超出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範圍；它與民主主義的關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都極為複雜，遠非齊墨先生所論述的那麼簡單。另外，愛國主義不僅在不同的國家有着不同的內容和基礎，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着不同的重點和任務。因此，不對愛國主義作全面與科學的探討，就輕易地得出民主運動不需要愛國主義旗號的結

論，不僅是對愛國主義本身的誤解，更嚴重的是會對民主運動造成重大的政治失誤。

愛國主義內含民主的原則

愛國主義，即民族主義，只是近現代歷史的產物。雖然在古代的東方和西方都有過所謂的「愛國主義」說法，但那時的愛國主義並不是今天我們所講的愛國主義，因為當時並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國家。除了古希臘的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外，所有的古代東西國家都不為土地上的人民所有，而只是某些人的私有物。因此，在西方通過聯姻一個國家可能會消失或擴大；在東方一個家族王朝的滅亡通常就意味着一個國家的滅亡。嚴格講，古代國家是「家國」，也就是「家天下」，而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國家。因為古代國家是立基於統治者存亡之上，有統治者才有國家，無統治者則無國家。因此，愛國就是愛君，就是忠君。

與古代的国家相比，現代的民族國家具有三項特殊的本質。首先，國家不再與統治者的存亡連在一起了，而是與民族聯繫在一起。這樣無論一個統治者或一個統治團體是被內部力量，還是被外部敵人所推翻或消滅，那只是意味著那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的消失，而國家則依然存在，因為民族是不會消失的。這樣像古代那種因聯姻或王朝覆滅而使國家滅亡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了。而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政治實體，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民族的生存與獨立，這就是國家的「生存與獨立原則」。

第二，由於國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之上，因此它必然為全體人民所共有。由此，它不僅不再只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私有物了，而且具有了一種高於一切個人和社會團體之上的地位與權力，這就是「國家主權原則」。也就是說，國家高於階級，高於統治者，高於政府。這種主權通常是通過全體人民的公意來表達的。同時，由於國家歸人民所有，因此離開人民大眾



八九民運的愛國熱忱

的認可，任何個人或團體都沒有權利代表國家進行統治，這樣國家主權在實質上就是人民主權。這就是國家的「人民主權原則」。

第三，根據國家立基於民族的基礎之上，為全體人民所有，國家主權的本質就是人民主權的原則，所以每個人都有着參與國家事務的天然權利，這就產生了政治上的「大眾參與原則」。因此，如果有任何個人或團體，試圖剝奪人民大眾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就不僅是對國家主權者的否認，也是對他們自己的否認，由此他們也就成了國家與民族的敵人。

由於現代國家所具有的這些本質，才使每個人把國家看成是自己的歸宿所在，才對國家產生了感情和忠心，才產生了愛國主義的情緒。這也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能成爲近現代世界中威力強大，四海皆準，持久不衰的意識形態的原因所在。雖然愛國主義以國家爲其本位，但由於它建立在人民主權和大眾參與的原則之上，而這些原則也正是民主的基本信條，因此很難說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必然相互衝突。相反它們之間却有着某種相互依存的關係，這一點可以從西方近現代政治的發展脈絡中看出。

近代西方的政治演變是從民族國家的形成開始的。十四、五世紀以來，西歐的國王們在民衆的支持下，突破了教皇的權威，摧毀了封建的割據，使政治實體開始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上，於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出現了。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雖使王權得到巨大的增長，但由於它既不是建立在神權上，也不是建立在血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民族的代表和大眾的認同與支持上，於是國家就不再屬於神或某個家族了，而是屬於人民。這樣，社會的權力不僅在物質上，也在信念上逐步地從國王、貴族和教士手中轉移到了民衆手中，結果造成第三階級的興起和民主革命的產生。這點突出地表現在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國家主權論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上。可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是西方

民主革命的政治先導。離開了民族國家，很難想像民主革命在西方的產生。因此，僅僅從愛國主義以國家爲本位，民主主義以個人爲本位就得出愛國主義必然與民主主義相衝突的結論，顯然並不符合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發展。

雖然愛國主義的基本特點和政治本質有着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國家，愛國主義有着很不同的形式和精神。例如在納粹德國，愛國主義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神族主義精神，和惡劣的文化優越感，以及無恥的侵略擴張意識。而在美國，愛國主義却是與個人自由聯繫在一起。它反映出一種個人主義的精神，而不是集體主義的精神。對美國人而言，他們愛國家乃是因爲國家爲他們服務，保障他們的自由與權利。在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由於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愛國主義表現出強烈的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願望以及追求國家繁榮與富強的決心。

在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裡，愛國主義也表現出極爲不同的政治內容，並產生出非常不同的歷史任務。在遭受外國威脅和侵略的時候，愛國主義的內容是反抗外部敵人的侵略和壓迫，其任務是爭取和捍衛民族的獨立。而在沒有外部侵略的和平時期，愛國主義的主要任務是建設一個繁榮、富強與公正的國家，讓人民享受富裕、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在這兩種環境中，愛國主義不僅是激勵和團結人民大眾爲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鬥的強大精神，也是促使和監督統治者和政府爲實現那些任務的有力武器。如果一個統治者或一個政府不能實現那些任務，更不用說危害那些任務了，愛國主義給人民以權利和責任去更換統治者或政府。

雖然愛國主義內含着民主的原則和動力，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由於愛國主義所追求的歷史任務不同，它與民主主義的關係也有很大的不同。在遭遇外敵威脅與侵略的時候，一個民族的最緊迫任務是生存與獨立，因此高度集中並統一指揮所有的民族資源就成了必然的手

段，這樣人民主權和大眾參與的原則往往會被生存與獨立原則壓制住，這在一個沒有深厚民主傳統的國家裡，最後往往導致專制獨裁的結果來。這一點在法國大革命中表現的極爲明顯。但在沒有外敵威脅的和平時期，讓人民享有富裕、平等和自由的生活自然成了國家的首要任務，這樣人民主權與大眾參與的原則就會發揚出來，利於民主制度的出現和成長。法國著名哲學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民主在美國」裡，對國際環境和民主主義的這種關係曾作過精闢的論述。由此可見，外來威脅經常會使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背道而馳，而和平環境則會使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相互提攜。這與齊墨先生的在沒有外國的威脅和侵略的情況下，民主運動沒有必要打出愛國主義旗號的論點正好相反。

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 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兩大動力

八九民運雖然失敗了，但它却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意義非凡的真理，那就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是由兩大力量推動的。這兩大動力就是爭取自由民主的民主主義和拯救國家危難的愛國主義。

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是八九民運的基本動力。廣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一方面強烈地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要求結社的權利，並決心「不自由毋寧死」；另外一方面又深爲當代中國的深重危機而痛苦，感到了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要爲拯救中華民族而獻身。這種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相互結合即是八九民運的重要特點，同時也體現出當代中國民運的根本性質，就是民主與救國的統一。

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看，這是第二次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相結合。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結合始於戊戌變法而終於五四運動。那次結合的結果是既沒有促進

自由與民主也沒有實現獨立與富強，最後愛國主義壓倒了民主主義，導致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這樣獨立雖然獲得了，但在中共的殘暴統治下，中國不僅沒有實現民主，也沒有走上富強。因此當看到民主主義第二次與愛國主義結緣時，過去的歷史的結局無疑使齊墨先生感到擔憂。這也許就是齊墨先生反對愛國主義作為民主運動旗號的原因吧！

歷史到底會不會重演，取決於客觀和主觀雙重因素的相同性。在主觀上，第一次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根本目的是救亡圖存。民主在當時只是手段，而民族的生存與獨立才是目的。因此當手段不能實現目的的時候，它自然要被扔掉。事實上，在亡國亡種的嚴重危機下，要想在一個根本就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裡，用民主的手段去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無疑是要失敗的。但在這次結合中，愛國主義雖然仍是目的，但重要的是民主主義已不僅僅只是手段了，它已成了目的。這樣像第一次那樣把民主當作不中用的工具而扔掉的主觀因素已經不存在了。

在客觀上，當今中國的種種危機已不是來自外國的威脅與侵略了，而是出於中共的專制制度和獨裁統治。因此，今天愛國主義的中心任務是清除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使人民能夠享有富裕、自由和平等的生活。這點已經充分地表現在八九民運的愛國主義在內容上與過去愛國主義的不同。這樣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僅在目的上相互一致，因為不論是要民主還是要愛國都反對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和爭取民主自由；而且在手段上也能交互爲用了，因爲在中國這樣的政治與文化環境內，愛國主義的巨大號召力及其內含的人民主權和大眾參與原則對民主運動的發展將有着巨大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只有通過自由民主才可能建立一個富裕、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根據這些主觀和客觀上的因素，可以說愛國主義再次壓倒民主主義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說在第一次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結合時，是愛國主義更需要民主主義的話；在這次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結合中，則是民主主義更需要愛國主義。在近現代世界上，愛國主義對人民大眾的激勵作用本來就遠遠超過了民主主義。而在教育水平上普遍低下，經濟上貧窮落後、政治上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民主主義則更難喚起廣大人民的響應。這正如齊墨先生所言，民主主義在中國到現在還只是知識份子的獨奏，而愛國主義却能打動大眾的心。因此，我們如果不想犯政治上的幼稚病，就得深刻地理解愛國主義在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不但高舉民主主義的大旗，而且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把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有力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大業。而在現實上，這種結合不僅有着深刻的必要性，而且有着完全的可能性。

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對於中國民運的發展將具有着重大的意義。首先，愛國主義具有着極大的激發群眾的力量。它不僅容易爲大眾所理解，而且能打動人的感情。這對於發動廣大人民參與民主運動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其次，愛國主義可以爲民主運動提供強大的合法力量，化解中共對民運的誹謗與攻擊。在今天的中國，以愛國主義作爲口號要比以個人自由爲口號更能得到一般大眾的支持和同情。最後，高舉愛國主義的旗號可以剝奪掉中共身上最後的畫皮。現在中共唯一的政治口號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了。因此我們不能把愛國主義的旗號拱讓給中共，而應把它的畫皮剝掉，使其變成徹頭徹尾的政治僵屍。

由於愛國主義所內含的人民主權和大眾參與原則的民主性質，因此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完全是可能的。其次，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給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結合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條件，使兩者能夠真正地統一起來。最重要的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實際上在八九民運中已結合在一起了，今天我們所需

愛國者舉報罪犯鄧小平



要作的就是要認識當代中國民運的本質，並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成這一結合。

高舉民主、愛國的兩面大旗

鑒於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兩大基本動力，因此民運的基本戰略就不僅要高舉民主主義的大旗，也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在當前形勢下，實現這一戰略需要進行兩項工作，即批判中共所謂的「愛國主義」和進行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相結合的理論建設。

用真正的愛國主義去徹底批判中共的所謂

「愛國主義」是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項重大的、刻不容緩的任務。現在，愛國主義已成了中共最後的政治欺騙工具和攻擊民主運動的惡毒武器。馬列主義在中國和世界範圍的破產使中共開始乞靈於愛國主義，企圖用愛國主義來愚昧人民和鞏固它的專制統治。同時中共還用愛國主義來誹謗和攻擊民主運動，妄圖使民主運動與出賣國家和背叛民族利益連在一起，從而在政治上把民主運動孤立起來，達到消滅民主運動的目的。因此，中國民主力量必須準備與中共就愛國主義打一場爭奪戰，絕不能把愛國主義的大旗讓給中共。

民主力量不僅有着十分必要的打這場爭奪戰，而且有着必勝的條件打贏這場爭奪戰，因為中共不僅不愛國，相反是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要打好這場爭奪戰，民主力量首先要揭發中共專制統治禍國殃民的歷史罪行。四十年來中共的專制統治，不僅沒有使中華民族在經濟上富強起來，相反把國家搞得一窮二白，把中國弄到了被開除「球籍」的地步；在政治上中共不但沒有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與人權，相反却堅持獨裁暴政，肆意迫害與屠殺人民大眾，把中國搞成了人間的地獄。貧窮落後與獨裁暴政不僅使中國人的尊嚴與人格丟光，也使中華民族的榮譽與驕傲喪盡。其次，民主力量還要徹底批判中共所謂的「愛國主義」。中共完全繼承了古代封建專制的傳統，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心態，把國家壟斷成其私有，把人民箝制或其奴隸。從這種心態出發，中共製造出了共產黨就等於國家和民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和愛共產黨就是愛國的謬論。於是，過去封建帝王的「家天下」就被中共現代化成當今的「黨天下」。很明顯，無論從中共四十年的所作所為上，還是從其所謂的「愛國主義」本質上，中共都是禍國殃民的民族罪人。因此，民主運動有着義不容辭的責任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中共禍國殃民的罪行，把拯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重任承擔起來。

完成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相結合的理論建設是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項重大任務。在今天的中國，雖然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已具備了充分的客觀條件，但是沒有深刻與透徹的理論建設，它們的結合還是不會實現的。今天很多民主運人士對愛國主義的擔憂就是缺乏這一理論建設的明證。

實現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結合的關鍵一步是用民主主義把愛國主義實質化，也就是用民主主義來充實愛國主義的內容。與其他的一些主義相比，愛國主義是一種比較特殊的主義。愛國主義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明確的追求目標、並內含着一些極為重要的政治原則，但却沒有與那些目標和原則相應的一套政治與經濟制度設計。這與民主主義和馬列主義是極為不同的，因為無論民主主義，還是馬列主義，它們不僅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目標與原則，而且還有與那些目標與原則相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設計。例如，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包括政治上的選舉制、多黨制、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經濟上的產財私有制和市場機制；而馬列主義的制度設計，在政治上是一黨獨裁制和權力的高度集中，在經濟上則是財產公有制和計劃體制。由於愛國主義的這一特點，因而它必須與其他政治主義相結合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這樣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內，愛國主義就會與不同的主義結合在一起。

用民主主義充實愛國主義的內容就是用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來實現愛國主義的社會目標和政治原則。愛國主義的目標是實現民族的獨立與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和富強的現代國家。在今天的中國，民族獨立已經實現，現在的任務是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和富強國家。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和當代世界的發展已經證明，只有用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才能使一個國家實現自由、平等和富強。同樣，愛國主義的人民主權和大眾參與政治原則也只有通過像選舉制和多黨制那樣的民主主義制度設計才能實現。因此

當前民主力量應該向人民大力宣傳，造成當今中國貧窮、落後、腐敗和黑暗的根源就是中共的專制獨裁制度，而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和富強中國的關鍵是建立民主制度。這樣，民主主義追求個人自由與利益的目標和愛國主義建立富強與公正國家的目標就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在一起了。

實現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還需要認真分清傳統的所謂「愛國主義」和現代的真正「愛國主義」在本質上的不同。如前所述，傳統的「愛國主義」並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它把君主或統治者作為國家，因而忠於君主和服從統治者就等於愛國。今天，中共專制制度則把共產黨凌駕於國家和民族之上，形成不是共產黨屬於國家，而是國家屬於共產黨的狀況。這樣通過以共產黨代替君主，在換湯不換藥的基礎上，中共把傳統的忠君「愛國主義」加以現代化，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與麻醉。因此，民主力量必須徹底認清傳統「愛國主義」與現代愛國主義的不同，並把這些不同向人民大眾加以廣泛地說明。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將會對民主造成極不利的影響，不僅會使民運丟掉愛國主義的政治大旗，無法運用它的強大力量；還會造成人民大眾對愛國主義認識上的思想混亂，為中共一小撮獨夫民賊或其他可能的野心家所利用。

※ ※ ※ ※

總之，如果我們能真正地理解愛國主義的真髓和當代中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把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妥善地結合起來，愛國主義將不僅不會成爲中國民主化的阻力，相反它會成爲民主運動提供強大的推動力量，成爲批判中共專制制度與發動群眾參與民主運動的有力武器。在這裡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因爲愛國主義的國家本位觀和其助長過專制主義的歷史，而對愛國主義持簡單的排斥態度。▲

邁向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

編者按：

第三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於七月三日至六日在紐約舉行。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書面致詞，行政院前院長李煥、新聞局局長兼政府發言人邵玉銘、內政部長許水德、研考會主任馬英九和衛生署署長張博雅分別在會上作了講演。會議期間，邵玉銘局長向本刊特約記者表示歡迎「中國之春」雜誌早日進入台灣發行。徵得作者同意，本刊轉載邵玉銘先生在研討會上的講詞。

邵玉銘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玉銘承蒙貴會邀請來此演說，至為感謝，也覺得萬分榮幸。我願藉此難得的機會與諸位中美友人交換意見。今日適逢美國國慶日，使我覺得這次會議深具美國民族「大熔爐」的象徵意義。

猶記得本人回到台灣的八年之前，曾在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度裡渡過了將近二十個寒暑。所以這次來美國，個人確實感覺有如「回家」一樣。尤其倍覺溫馨的是，我曾擔任過美國中部地區的華人學術聯誼會會長——這個聯誼會也是此次研討會的成員之一——因此本人這次與會，頗有故友重逢的欣慰。

今天本人很高興和諸位談談中華民國的現況、對其一九九〇年代以及之後的展望。

中華民國的「成長疼痛」

自一九八七年七月中華民國解除戒嚴以來

的三年，開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且令人振奮的變化。然而，隨着這些改變而來的是諸多新問題的發生與挑戰，引起人們對這個國家社會以及政治不安的關切。諸位平時都密切注視台灣情勢，深悉這些問題，容我再對這些變化做一

次回顧。變化得最大的應是在政治方面。反對黨的成立及合法化，使得街頭及立法院內的抗爭與示威直線上升，政治也不再只有一種聲音。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去年十二月的國會大選中獲得明顯的勝利，但得票率却是數十年來最低者。甚至在執政黨內，目前對某些問題也有公開的辯論與個人的爭執。

在經濟方面，多年來兩位數字的成長率已不再現。工資上揚、投資減退、貨幣升值、股市狂飆，股市成交量迭創高峰，近來旋又重挫，至今仍起伏不已。

社會治安日形惡化，犯罪升高，使得恐懼與不安均有增加。新生的暴發戶把浪費與奢華

之風，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造成社會上極大的不滿與疏離。傳統的中國文化與價值失去了光輝，在台灣愈趨國際化的同時，西方之影響也隨之滲入。

至於中華民國的大陸政策，似乎各奔東西。有人要求對大陸更開放與經濟聯繫更密切；也有人要求對於天安門事件的屠夫們給予更嚴厲的譴責。

面對這些問題，我等現代中國的觀察者應如何評價今日的台灣？這些問題是否將成爲中華民國繼續生存發展的基本威脅？我們是否像許多人一樣，認定這些問題即是這個國家的痼疾或絕症？我們的診斷又是什麼？

經過一番仔細而審慎的思考，個人認爲我們當能發現中華民國所遭遇的問題，大體上是一「成長的疼痛」或「陣痛」；對一個開發中國家來說，在其邁向成熟而發達的經濟與政治完全民主化轉型時期，這些都是暫時與無可避免的問題，實不必過份憂慮。爲什麼如此說？我

有下列五個理由：

第一，中華民國已走向多元化社會。環保意識的抬頭，婦女地位的提昇，勞工與農民權益之爭取，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遽增等，都衝擊着社會。不同的利益團體為獲取注意與資源，也響起不同的聲音與互相指責。雖然有人懷念那比較平靜的過去，但是利益與理念的多元化誠乃至關緊要之事。新社會的多元化，促使政策的制訂，建立於容忍與妥協之上，它同時也防止了任一團體或階級壟斷我們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資源。當脫序的現象使任何利益團體或施政都遭受損失時，多元化的社會即會力求控制不穩與混亂。今日中華民國的社會多元化，就因此捍衛了民主、保障了經濟與維護了社會正義。

第二，中華民國已進入社會科學家所稱的「後工業社會」。目前我國國民年平均所得已超過八千美元，五分之四人口也目認為中產或上層階級，革命性的改變非僅不必要，而且不可能發生。大部分人民珍惜他們努力的成果，並希望在安定的環境下享受這些成果。失序是

與人們的願望相違背的，要求社會持續穩定與井然有序，成為民眾的呼聲。

第三，人們仍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明顯而立即的危險」，這並非意味人們正處於備戰或生活於恐懼之中，而係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決定與反應深表關切。這種關切激起人們「風雨同舟」的意志，也使其不能有不負責任或漫無節制的行為。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混亂即成為不可能。

第四，國際社會對台灣益增的影響力，緩和了在中華民國內部的極端主義。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也是與世界經濟息息相關的貿易之島。旅遊、教育、及大眾傳播媒體，使得國民充分了解國際大勢與進步思潮。自由、民主、多元化等國際社會的共同指標，也融入了國家與社會的體制之中，浮淺或偏狹的意識型態已不再能獲得眾人的附和。

最後一點，就是政府與執政的國民黨，對國民有堅實的承諾。隨着時代的脚步與民衆的需要，它們保證要為人民提供一個清新及廉能的政府，並確保國家全面的進步。

總而言之，我深信上述五個因素，將使目前台灣社會及政治的不安變成一種暫時性的「成長疼痛」，而非是長期性的病症。

總而言之，欲求對中華民國政經變遷所產生的「成長疼痛」，以及對中華民國一九九〇年代的展望等問題有所了解，則我們必須對台灣的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文化成長，以及對中國大陸政策等方面加以檢討。

政治民主及國家統一

過去三年來，中華民國致力於從權威主義及無競爭的政制，轉變為充滿競爭及多黨的主體制。這種快速的轉變，並未發生重大的社會混亂、破壞或暴力，誠屬難得。

這種轉變可追溯到一九八七年七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毅然取消戒嚴開始。其後僅六個月

，政府又取消發行新報紙的限制，造成報紙與讀者的遽增。今日台灣報紙的數目已超過一百家，每日發行總量高達五百七十萬份。這使只有二千萬人口的台灣，成為世界閱報率最高國家之一，甚且高於美國。更重要的是，這些報紙代表了各種不同的政治與社會觀點，而並未遭到新聞檢查或政府干預。

自一九八九年九月起，中華民國將新的民主架構制定於法律之中。新興政黨的合法化以及選舉罷免法的修訂，均確保了政治競爭與選舉的公平。另外一項旨在勸退資深國會議員的法律獲得通過，用以解決一九四〇年代從大陸選出資深國會議員任職迄今所產生的問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華民國在台灣首次舉辦真正多黨競爭的大選，樹立了我國走向完全民主政治的里程碑。著名的社會批評者，也是「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作者柏楊，即有感而說：「一天比一天更民主……台灣今天是中国數千年文明最為大放異彩者。」（對紐約時報記者談話）。

民主轉型的最後階段始於今年，在五月二十日李總統登輝先生就職演說時宣佈，他將於最短期間內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使台灣回復到常態的民主憲政。這個動員戡亂時期，自中華民國於一九四〇年代與中共相爭以來就一直存在。

就在短短的兩週前，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通過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二六一號釋令。該釋令要求資深國會議員於一九九一年底前完成退職，此將可達成國會順利換血的目標。

隨着民主化過程快速完成，對中華民國而言，僅剩一項基本的政治難題存在，亦即國家認同：是一個統一的中國，抑或一個分離而獨立的台灣？

為確切掌握這個問題，我深信必須從中國悠久的歷史以及透視歷史的角度來尋求答案。中國五千年歷史記錄，清晰地表明了中國在不



李煥先生在晚會上演講。

同年代曾自我分裂，或為外來侵略者所征服，但是中國每一次最後又再統一。我相信中共絕不會接受台灣獨立，正如美國絕不接受一個獨立的夏威夷或加利福尼亞。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國不會只因爲僅是中華民國國名被竄改爲「台灣共和國」，就會給予獨立的台灣以外交承認。

台灣運動在台灣島內將產生嚴重的分裂與衝突，也將引起海外華人社會之憤怒，更將導致中共的強烈而危險的反應。如此而言，台灣只是一個死胡同。而正當海峽兩岸關係改善之際，中國歷史與民族主義，政治現實與國際關係等力量的總合終將消除台灣這一分裂運動。

經濟的發展

過去廿年來，中華民國享有世界最高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在這一空前的紀錄下，我們很難追憶在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的艱辛。中華民國不僅勇於面對並且成功地克服這些嚴重的挑戰。

在過去完善規劃與發展經濟所獲致的經驗引導下，中華民國目前正迎接諸多新的挑戰，力求改善我們國家競爭力，進而加強經濟的發展。我們從人力、資本、工業現代化，以及國際化等四端來觀察，我們具有如下樂觀的理由：

第一，台灣龐大的人力資源仍持續增長中，我國教育經費在過去二十年來，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九，從國民總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四，上升爲百分之五·三。勞動人口受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者，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十一，上升至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遠較其他發展相似的國家爲高。

更重要的是，全國就讀大專院校之人口百分比，除仍低於美、日外，已高出英、法兩國。因之年輕的企業家、商人及工人，均較其長輩受到良好的教育與訓練，這使我們在國際市

場上更具競爭力。

自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播遷來台以來，共有十萬名學生前往海外留學，尤其以赴美國研究學者居多。迄今爲止，大約其中四分之一左右已回國服務，其他則在海外成爲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重要橋樑。今日在座諸位便都是這些重要人才的傑出代表。

第二，台灣資金供應充裕，資金快速增加，成爲經濟持續成長的要因。我國有世界最高的國民儲蓄率。在過去的十年，儲蓄平均佔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政府現已擬訂諸項新措施，譬如改善社會治安、恢復社會秩序以及改進投資環境等。

第三，工業結構的升級與現代化，促使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極具競爭力。生產部門結構的改變，反映在輕、重工業重要性之調整。輕工業在一九八五年佔全部生產部門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在一九八九年却下降爲百分之四十六；重工業却由百分之四十七，升高爲百分之五十四，這反映出結構的改進與競爭力的增強。外資與僑資在一九八九年已增至二十四億美元，也促使我國從勞力密集工業，轉變爲高科技與資本密集工業。

第四，我國經濟政策確認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與走向國際化。我國在其他國家的投資一直在增加中，促進了我國工業發展更趨多元化。一九八八年我國海外投資金額爲六十億美元，至一九八九年已擴大至一百億美元，投資主要目標是美國及東南亞。台灣高居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外來投資國家的首位；也成爲泰國及印尼外來投資國家的第二位。

中華民國經濟的強化及國際化的努力，使台灣的生活水準獲得大幅改善。據我國經濟學家的預測，公元二千年時，台灣民衆將享有美國人民今日同樣的生活水準，屆時台灣的國民平均個人所得每年將超過二萬美元，將使中華民國躋身於世界前二十名經濟大國之列。同時，在公元二千年對外貿易將超過三千五百億美

元，也將使中華民國由目前世界第十二大貿易國晉身爲第十大貿易國。

社會治安

社會治安的維護，已列爲中華民國施政重點之一。我們正採取各項步驟以爲因應，譬如制定「危害治安治罪條例」，以加強社會秩序的維護。此一條例通過後，對於重大刑事案件，諸如綁架、搶劫、勒索、持槍犯罪等，將加重其刑罰。這些措施均已獲得民衆普遍的支持。根據最近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受訪者支持此一加重刑罰之新法。

除此之外，政府展開防止走私及非法偷渡的行動，這些走私及偷渡被視爲是武器以及罪犯的主要來源之一。自上月起，在軍、警及一般大眾通力合作之下，治安情況已獲得改善。我們也努力於矯正台灣因繁榮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譬如遽增的浪費、金融的投機、奢糜的生活型態等，均係資金過多所致。針對此一問題，我們已經用增加投資管道、公營企業民營化、改善投資環境等辦法加以因應。我們預期，在逐漸吸收投資，及資金投向更有生產力的事業以後，這些努力將可達成維護社會治安並刺激經濟成長的雙重效果。

豐富文化內涵

自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愛國學生運動開始，以迄一九八九年大陸民主運動興起，中國知識份子一直爭辯着中國文化與傳統是否過時。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辯論或爭執，雖仍爲一些人所關切，但是在今日的台灣，文化似已達到一種兼容並包的均衡境界。一度被詆譭爲腐朽與過時的儒家哲學及其價值，今日已被認爲是中、韓、星、港等亞洲新興工業四小龍經濟成功的基石。

台灣對與日本及西方先進國家的密切經濟

關係，使台灣完全接觸到國際社會的理念、思維與價值，這些均經引介、消化並融入了中華文化之中。這產生了許多有趣的結果。在台灣典型的雅痞，吸美國烟、穿義大利皮鞋、喝法國白蘭地酒，以及聽奧地利莫札特音樂，但仍吃道地的中國佳餚。他們是真正的現代中國男女代表，充滿了國際的情調並樂此不疲。克普林（KIPPLING）氏堅信東方與西方「兩者永無交聚」之說，也許代表他那時代的觀點，但在台灣，那自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後的辯論已告結束，因為今日台灣已見證了中華文化的復興，以及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化的相互激盪。對於這種現象，我寧願說這是東西文化的水乳交融，而且在未來歲月中它將日益彰顯。

對中國大陸的政策

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政府開放台灣民眾造訪大陸，迄今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次前往大陸。這項非官方的交往增加了台灣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經由這些接觸，我們得以向大陸傳播「台灣經驗」，期望台灣經濟、政治與社會各方面發展的成就，可做為大陸發展的模範。

我們將繼續擴展個人之間的接觸，及資訊的傳佈。然而在經貿關係上，我們仍保留一些禁制。我們將先致力於改變大陸人民與中共當局的心理與思想。但在爭取彼岸「心智」向我們之任務未達成之前，我們將不以經濟力量壯大中共之「軀體」，因為這個政權就在一年之前屠殺了上千的民眾，使所謂的「天安門」永沾血腥。

我們大陸政策背後的基本策略，就是要由「量變」來達成中國大陸的「質變」。近年來，外國人及華僑每年有數千萬人次訪問大陸。若人每人僅停留一週計，且假若該週內與一百位大陸同胞有所接觸，那麼這些數千萬訪客便和大陸大部分人民有了接觸。我們不難想像這

些接觸的潛在影響力。今日大陸家庭，每戶每月的平均收入僅六十美元，房舍破舊且擁擠不堪，沒有基本的言論、思想，甚至生育子女的自由，請問這樣的中國家庭又怎能不嚮往台灣、香港或美國最普通訪客所享有的自由與富裕？展望未來，中國大陸人心的逐漸改變必將日盛一日。



此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二千萬人民，以及遍佈海外的三千萬華僑，更構成一股反對中國共產黨不可抗拒的强大民主力量。我們相信，雖然中國人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我們都熱愛中國，也都具有推翻中共暴政的決心。當美國在世界各地扮演了推倒世界共產主義舉足輕重的角色之際，中華民國在台灣同樣也會把共產主義從中國大地上連根拔起。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天安門屠殺」之後，一波又一波的自由浪潮已橫掃全世界，中共已成了自由與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共產主義孤島。去年六月在天安門廣場壯烈犧牲的英魂，曾經力抗橫逆，使我們今日得以生存於自由與和平之中。現在讓我引述大陸著名詩人北島所寫而曾為柴玲女士所轉述的幾段詩，來印證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永恒追求：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剩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絕不跪在地下，
以顯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中，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二百十四年前之今日，美國人民開啟了對自由與民主的實驗，它終成為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明燈。我們深信這盞明燈的光熱，是最近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東德、尼加拉瓜，甚至蘇聯本身共產主義傾頹之原因。全世界的中國人均已棄絕了中共暴政。目前已有十萬中國大陸的學生在海外留學。這些稟賦優異的年輕愛國者，將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們堅信廿一世紀的來臨，不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將邁入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先進國家之林，共產主義的最後據點亦將被摧毀，而中國人民終將統一於一個自由與民主的體制之下。

謝謝各位。

台灣朝野談政治轉型

浩然夏令研習營

馬英九、盧修一講演錄

錢楓整理

馬英九

(國民黨員，行政院研考會主任)

今天想分六個部份談。1.前言；2.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與政治革新；3.政治改革的原因；4.政治改革的成效，各界的反應與政治改革存在的問題；5.最近國是會議的召開與成果；6.台灣改革的前景。

台灣的三波改革

台灣的政治改革這四十年來有好幾波，我想先概說一下最近二十年來的情況，然後再集中談談近五年來的情況。

這二十年來，以我個人的觀察，大約有三波的改革。前兩波可以說都是由於外交上的衝擊而引發的，第三波則完全可以說是自發的。十八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它有五點很重要的意義：1.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七二年尼克森訪問大陸並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這對台灣衝擊非常大；2.七一年台灣發起了一個保釣運動，這個運動對台灣、香港、美國等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影響；3.中華民國憲法的臨時條款作了第四度的修正，而這次修正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了要在自由地區選出真格的中央民選代表的內容。這是中央政府在遷台後第一次真正

意識到海峽兩岸的分裂，儘管這種意識還不是很明確，但已經在臨時條款中反映出來了。一個是自由地區，一個是所謂的大陸光復地區，自由地區可以辦理選舉，而不是一定要等到大陸光復之後再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從那時起，我們的國會，中央級的選舉就開始活躍起來。所以說那幾年的政治局面比較活躍與七二年的臨時條款修正有很大的關係；4.那年六月蔣經國先生組閣，擔任行政院院長。他開始了十大建設，也就是開創了所謂的蔣經國時代；5.海外知識分子從那時以後出現了一左一右「分裂」的情況。這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大的改革。

那以後比較具體的改革措施就是政、法、檢分立。原來我們台灣的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都屬於當時的司法行政部管，早就有人提出應該把它們歸還給司法部，但一直沒人去做。另一點就是偵察辯護制度的建立。這在我們學法律的人看來，這是很重要的。過去在偵察階段的時候，被告不能請律師，所以常常會發生刑囚的情形。被告一到了法庭上之後，就說我們所說的那些話都是被打出來的。建立了偵察辯護制度之後，在偵察階段中律師可以在場。雖然還不夠完備，但刑囚的事件越來越少。因此到了八五、八六年左右，就出現了第三波

的改革。這個改革的背景以我個人來看可以說是在一九八四年，也就是蔣經國先生被選為第二任總統。八四年十月發生了江南案，旅美作家江南被竹聯幫殺死，竹聯幫說是奉了我們國防部情報局的命令去殺的，結果掀起了軒然大波。再加上當時台灣發生了嚴重的擠兌事件，金融界受到很大影響，兩個部長接着下台。這使我們在國內國外的形像受到了很大的損害。我個人的感覺是，這可能就是促成改革的很重要的原因。當時中共的改革已在國際上獲得了一些正面的評價，兩相對比，也對台灣造成了一些衝擊。

一個歷史性會議

就在這年年底，國民黨決定在八六年三月舉行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會議。三月廿九日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開了三天，開完之後各種意見很多。在會前大家就有一個共識，認為有改造之時而無改造之名。因為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就曾經有過改造，但是幾十年來，大家發現還有許多問題無法解決。所以三中全會後建議案成千，於是就成立了一個議案小組，把所有的議案歸納為六個大議題：1.解除戒嚴；2.開放組黨；3.國會改革；4.地方自治的法制化；5.黨務改革；6.社會風氣與治

安改善。其中關鍵問題是前面四個。我們是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全國戒嚴的，因為當時是與中共內戰的關係。到了台灣之後，戒嚴持續。戒嚴有戒嚴法，戒嚴以後就停止了一些由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自由權力，尤其是在一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



蔣經國時代——改革開始

自由等方面。所以我們說開放黨禁，因為在戒嚴期間不准組黨。現在民進黨的顧問當時就是在六一年要與人一起組建中國民主黨，結果兩人一起入獄坐牢。所以說，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有很密切的關係。再就是國會改革。大家知道，中華民國的三個權力機構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都是在大陸地區選舉的，可是一到台灣之後，大陸地區無法再辦理選舉，經大法官解釋，就允許國會繼續行使職權。在這種情況下，就造成了國會中有一些人是不需要改選的（主要指那些大陸地區來的代表）。七二年是個關鍵。七二年選出的立委、監委和

國大代表是要按照他的任期來改選的，這就在國會中造成了兩種不同的代表之爭：要改選；不要改選。這個結構上的問題也造成往後幾年國會與立法院之間抗爭的主要根源。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問題也是因為兩岸分裂造成的。本來中華民國在大陸期間是三十五個省，十二個院轄市和二個地方自治區，可到台灣之後只有一個省，中央和省的機構重疊了，再加上縣、鄉兩級政權，這四級政府很影響行政效率。同時台灣省政府所依據的法令還是民國十幾年所制訂的一個省政府的組織法。所以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問題變得非常迫切。這也是八五、八六年第三波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到八六年三月開完三中全會，四月國民黨中央成立十二人小組，開始推動這些改革。經過多次聚會討論，到了九月對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有了一個大致上的共識。那年十月七日經國先生接見了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那時我擔任經國先生的英文翻譯。在這之前，我在歐洲訪問時，就感覺到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宣佈，因為當時黨內對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看法差不多已經醞釀成熟了。那一天《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選帶了三個記者一起來，他們提出的問題很簡單也很直接，那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是不是要解除戒嚴？」「是不是要允許反對黨成立？」經國先生肯定地告訴他們，我們是要這麼做。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下午四點鐘，經國先生說得很慢，我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生怕他們聽錯了。這時我的身體有一種充電似的感受，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歷史性的時刻。解除戒嚴，允許反對黨成立在我們中國的政治上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過後一星期，國民黨就在中常會上正式通過了這個決議。作出這個決議的一星期後，《中國時報》做了一個民意調查，六八%的民眾不知道或不很清楚為什麼要解除戒嚴，當然知識分子是明白的。因為台灣的戒嚴和大陸「六·四」的戒嚴不一樣。四九年台灣剛戒嚴時很嚴格，什麼東西都是軍

法審判；軍事管制，但隨着經濟的發展，逐步地就放寬了。雖然我們的解嚴是在八七年的七月十五日完成的，事實上從六七年以後，軍事審判的範圍就越來越小，所以後來許多人感覺到解嚴與不解嚴沒什麼區別。從八六年十月十五日的中常會以後，往後的兩年中，有三十多項行政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是開放報禁，一是開放大陸探親。這兩條措施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有絕對的影響。

政治改革的原因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些政治改革呢？我對此有三點觀察。1. 以我個人的觀察，國民黨自一八九四年建黨開始，就有一個終極的理想。那時是呼籲排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那是在檀香山設立與中會時的誓言。把這個誓言分析一下，前兩句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後一句「創立合眾政府」便有一些政治的色彩，要使中國民主化。那時還沒有發展出三民主義，提到經濟的層面。後來才提到一個平均地權。所以我以一個國民黨黨員的身份來看，國民黨的一個終極關懷就是民主化，這也是我個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信念。不管在過去的那麼多年中我們做了多少工作，成功或不成功，但這信念始終是一個終極的目標。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你有了這個信念之後，遲早是要兌現的，你不能只是說說而已。2. 台灣實施民主化的條件逐漸成熟。我想我們不能否認實施民主制度是要有一定條件的。首先，教育要非常普及，目前我們小學的入學率已經到了九九·八%。國民黨初到台灣時，大專以上的學生差不多只有六萬人，到現在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已經有一三四萬人。我記得沈君山告訴我，他在一九六〇年拿到留美博士學位回國時，在機場還有人向他獻花，走在路上人們會指點點，說這個人是留美博士。現在留美博士滿街走。所以教育程度主要是普及的結果，很

平等。其次經濟上的發展從一九五一年的人均收入一四八美元增長到了八五、八六年的三〇〇〇美元，所以說是富裕了。而且從所得分配來講，我們是比較平均的，用五等份的方法來算的話，到去年底是四·八：一左右，比起開發中國家，我們是排第一名。我們輸給日本的三：一，但比西德的五：一要強。還有，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一種草根性的民主在四〇年代已逐漸地發展起來。台灣舉行地方選舉，開始推行地域自治是在五〇年七月，當時辦那種選舉還有些怕，怕出亂子。剛開始進行縣議員的選舉還不敢在通都大邑舉行，先在花蓮縣進行縣議員的選舉，因為花蓮縣的交通不方便，在台灣的東部，萬一辦砸了，外面還無從知道。如果成功了，就縣議員，縣、市長一級之地選上去。四十年過去了，台灣的政治文化就這樣一點點樹立起來了。然後這種草根性的民主逐漸使大家都習慣了，大家都知道我們要選舉，通過選舉有人出來。台灣有相當多的政治人物是通過選舉出來的，選舉凝聚了地方上的民意，同時使政治人才有出頭的機會。最後，我覺得還有加強對大陸號召，刷新國際形象的因素。當時大陸的改革在國際媒體上出現了很好的評價，而台灣却因為江南案，國際國內的聲望都很受影響。當時台灣還在戒嚴，儘管我們向所有的朋友解釋這種戒嚴不是那麼回事，但是只要用了「戒嚴」這個詞，就是軍事管制的意思。別人只要用兩個字就可以抹黑我們，我們用二〇〇〇個字來解釋也無濟於事。這是非常不值得的事。經國先生會問我們，「戒嚴」在英文裡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查了七、八種英文辭典，結果就是軍事管制的意思。這對經國先生觸動很大，他覺得台灣沒有那麼多的軍事管制，這是背了一個黑鍋。事實上解嚴前後街上根本就沒有什麼變化，沒有荷槍實彈的士兵，也沒有鐵絲網。憑良心說，鐵絲網是在解嚴後才出現的，因為在解嚴後台灣的各種群眾活動很多。

成效和問題

接下來我們談第四點，政治改革後的成效。解除戒嚴是在八七年七月，開放組黨是在八九年元月完成，至今一共有五十三個政黨在臺灣登記。當然這五十三個政黨中有許多也是所謂的「泡沫政黨」，就是除了三幾個人組成一個政黨外，也沒有什麼活動。再就是國會改革。國會改革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涉及到許多的既得利益。遠在八八年，我們就希望資深的、在大陸選出的國會代表盡快退職。然後我們在八九年二月五日完成了退職條例，他如果退職可以拿一定程度的退職金。可是速度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就在今年六月廿一日，國會議員召開前夕，我們大法官通過了第二六一號的解釋，就是所有的資深中央人民代表都必須在明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退職。這就是我們國會改革的所謂「臨門一脚」，關鍵是使我們資深的中央人民代表失去在法律上繼續行使職權的依據。地方自治的法制化要比國會改革更複雜。我們行政院曾經擬定了台灣省政府和台灣省議會的組織條例，送到立法院去，可是省議會抗議，說你立法院沒權力制訂這個法律，所以它申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在今年五月作出一個解釋，說中央和地方都沒有權力制訂這個法律。那就只有修改憲法來取得這個權力。至於第五項國民黨的黨務改革和第六項社會風氣與治安問題，相對來說就沒有前面的制度改革那麼重要。不過這幾年來國民黨黨務的改革也成為大家關切的項目。我們知道憲政改革固然很重要，除了結構的問題，要讓資深代表退出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的憲政還有一些周邊的工程必須完成。

接下來我再談談各界對我們的改革反應怎樣。在台灣及台灣以外地區的一般反應都非常肯定，尤其是國外的肯定比國內來得多。在國內的人有的覺得改革步子太快，也有的覺得太慢。但大多數人是覺得改革在進行，而社會的政治安定並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美國的一些學者對此感到驚奇，他們覺得像國民黨這樣一個列寧式結構的政黨很難搞成這樣的改革。但很有趣的是，民進黨完全仿效了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這使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制度還有優點值得別人來學（笑聲）。

另外台灣就是因為解嚴的關係出現了許多的聚眾活動，解嚴前我們很少看到防暴警察，解嚴後一年之內台灣就有二千多件聚眾活動，有什麼問題就上街遊行抗議拉白布條。雞農抗議就把雞丟給路人搞得雞飛狗跳，菜農上街抗議就把白菜都扔向路人，場面非常壯觀。當時我們真希望珠寶商也來抗議（眾笑）。當時我們在警力上受到很大的壓力。後來就慢慢少了，因為民眾對於太多的街頭動員感到反感，所以數量就大大減少。

這兩年我們的改革步伐好像稍微慢下來了。今年三月國民大會舉行第八次會議，要選舉我們的第八屆總統的時候，國民大會希望擴大他們的職權，因為他們對立法院實在忍無可忍，立法院要削減他們的預算。結果台灣就爆發了一場很大的政治風暴，學生示威，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總統登輝先生決定接受學生建議，召開國是會議，朝野雙方共同討論，商量來推動我們的憲政改革。國是會議是在六月廿八日、七月四日舉行。國是會議的召開可以說是對國民黨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算一個總賬。首先在國會改革方面大法官已經適時地作了一個解釋，就是明年年底以前資深代表要全部退光，問題在於退光之後我們怎樣把國會充實起來。第二關於地方自治方面在國是會議上也形成了一個相當的共識，大家都認為省、市長應該民選，可是省、市長民選的前提是地方的行政區應再作一次劃分。因為從地方自治的理論來看，如果你中央政府下面只有一個省的話，那還要不要推動地方自治，有沒有這個必要就很難說

。因此我們就覺得必須把行政區作一個調整，一方面配合台灣綜合性的國土開發。第三就是關於中央政體的問題，到底我們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的問題。在國是會議上，大家對於總統民選的看法比較接近。至於用什麼方法來進行民選，是直接投票，還是通過國民大會以總統選舉人團的方式來選舉，確有不同看法。第四是關於改憲的方式。大多數人贊成用修憲的方式而不是用制憲的方式。因為如果制憲的話，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就中斷了。同時制憲要把現有憲法上的所有條文全部打散，用一次攤牌性的方式來解決。目前我們看來，這種方式不知哪一天才能形成共識。只能用修憲的方式來確定憲法該修不該修的緩急先後，這是國是會議上大多數人的共同看法。最後是關於兩岸關係，大家的看法和政府非常接近，共識的程度相當高。這就是國是會議的大概情況。

台灣的前景

最後談談台灣政治改革的前景。我想有幾處是可以向大家報告的：1.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已經成了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這一點朝野的共識逐漸形成，大家的歧見只是在方式程序和時間表上；2.近來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統一與獨立的爭論，這個問題可以把它冷凍起來，也可以成爲一個很尖銳的對抗性問題，這就要看台灣地區朝野之間的智慧了；3.從整體上說台灣地區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儘管說有一個統一的問題，但政治應該走向更開放、更自由、更多元這可以說是我們全體一致的共識。而且現在由於開放報禁的緣故，我們已經形成了相當獨立的新聞界，自由程序相當高。現在在台灣地區登記的報紙已經有一百多家。每天早上我們看報都來不及。有的報紙其實已經虧得一塌糊塗了，但還在繼續辦，主要他們還是希望能爭取到一個市場。報紙多也使我們的新聞自由空間不斷擴大，

沒什麼禁區。所以我覺得前景是比較樂觀的。一方面有一個自由的新聞界，二則朝野都希望改革，三來我們的中產階級相當的穩固。十年來的調查顯示，五〇%—五七%的民衆認爲自己是中產階級。這還不包括中下和中上。中下和中上都包括進去的話佔了八〇%。如果你問他(她)們的父母是什麼階層，他們都認爲他們比他們的父母提升了一個階層。再問他(她)們的子女會屬於什麼階層，他認爲他的子女會比他再上一個階層。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的出現，我想是我們實施民主制度最有效的保障。所以我說我對台灣政治改革的前景是樂觀的。但在具體的過程中，我們的國會議員可能會摔摔打打麥克風，但是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把台灣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謝謝各位。

盧修一(民進黨員，立法委員)

我想用二十分鐘的時間，一方面對剛剛馬英九先生的報告提出一個不一定完全不同的詮釋，那就是着重在批評；另一方面我也對民進黨站在一個反對黨的立場上，它積極的主張與做法是什麼做一下介紹。我分成幾部分來講：1.我對國民黨統治及他們整個政權體制的批判；2.我對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作一個介紹；3.我對民進黨在台灣對政治、國家發展的作用及與國民黨的關係怎樣作些說明。

列寧式的黨國體制

首先，國民黨的統治用簡單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它是一個由列寧式的政黨所建立的黨國體制。這一點我想以大陸來的朋友一定非常清楚。楚黨就是一切的中心，權力的來源和政治活動的發生。這個黨最後集中在政治局的少數幾個人直至一個獨裁者或專權者的手上。在台灣很

長一段時間就是在蔣家兩代父子的手中，可以說台灣在蔣經國逝世以前，一直是在一個強人統治之下。至於說它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紹。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被聯合國取消代表權前，它一直強調自己是中國唯一很好的政權。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以「戡亂」爲名通過的「臨時條款」，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解除，雖然李登輝說要盡快解決。根據「戡亂」條款，那麼中共算什麼？我們馬英九先生說，我只知道它從事什麼，不知道它是什麼。哪怕是選把它當作一個叛亂團體。反正，它總要在表面上維持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它用兩種方法來維持：1.在聯合國維持住中華民國的代表權，保持在安理會的旗幟；2.宣稱我這個國會和中央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因此國會不改選。根據憲法，立法委員三年改選一次，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六年改選一次。但他們不要，就讓一九四八年在大陸當選一直做到今天。到目前爲



▲不少學者公開支持民進黨候選人。

止，除了監察院在台灣地區選出來的人超出了原來在大陸當選的人以外，國民大會的六百多名代表中台灣地區選出的只佔八分之一。因此可以說，一個很荒謬的不合民主原則的國會結構，在表面上說它就是代表全中國。實際上國民黨是怎樣控制這個政權，維持它的地位呢？就是依靠黨、政、軍、特、黨、國民黨；軍、軍隊，黃埔軍校、黃埔禁軍；這支軍隊就是國民黨的軍隊；政，就是整個官僚，行政體系，完全掌握在國民黨手中；另外還有特務。另外它還有三大法寶：一是戒嚴，盡管馬英九先生前面說，這個戒嚴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但它是個緊箍咒，可鬆可緊。它可以說你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但必要時它就說你動搖了它的根本，影響了統治者的聲望，從而約束你的行為。二是黨禁，不准組任何黨。實際上它是不允許反對黨去合法地組織，合法地鬥爭，以取得合法的地位。地方選舉也是如此。他們事實上是利用選舉在地方派系上進行制衡以穩定他們自己的地位。國民黨控制台灣「草根」組織的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讓各個派系之間互相傾軋，搞得精疲力盡，然後它在上面控制，扔一根骨頭給你們搶來搶去，好了，它安全了。三是報禁。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傳播媒體的作用非常重要，國民黨也知道，因此實行報禁。剛才馬英九先生說的那些報紙，實際上許多已經名存實亡。這三大法寶可以幫助國民黨對台灣實行最長期的控制。

國民黨在經濟上實行土地改革之後，推動了幾次五年計劃，使台灣地區的經濟不斷發展，確實不錯。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可以大書特書，這是國民黨的一大自誇，說這是經濟上的一大奇蹟。我要強調說，這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這種經濟掛帥的結果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權益受到犧牲，社會的不公平等等。如果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再搞不好經濟，那麼它的政權再穩固也得垮台，這就是國民黨聰明的地方。也可

以說這是它被攻擊得比較少的地方。但如果不是國民黨，而是別的什麼黨來管理，發展經濟的話，它可能也同樣能取得那樣高的增長，而且附帶的後遺症可能會更少。但這只能說可能，因為他沒有機會這麼做。

國民黨為了讓政治穩定，一直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在教育、文化領域一直強調一個中國、三民主義。教育水準在提高，但是僵化的意識形態，所謂的反共八股到處在泛濫。這是國民黨對人的心靈活動的另外一種鉗制，對出版法等各方面的控制也包含在其中。

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

現在我再介紹一下台灣本土上的反對活動。台灣本土上的反對活動一直持續不衰，這個持續不衰有兩方面的理由：一是台灣有特殊的歷史背景，曾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多年；二是光復之後，「二二八」事件也帶來非常大的創傷，差不多當時所有的社會精英都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死亡人數高達三、四萬人。我們不要忘記，在那時台灣地區已經有了那樣的反對運動。所以，在日佔時期台灣的政治活動就相當活躍，一批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知識分子積極從事著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種反抗活動。二戰結束後，由於他們的期待、教育水準與觀念和當時的大陸政府不同，因此發生了這不幸的事件。在這種情形下，台灣的漢人在從事反對運動時就具備了兩重性格：一是非常民主的；二是反抗外來的異己，他們把國民黨政權看作是外來的。因此一種自主的、本土的色彩非常強的政治活動一直持續不斷。一九六〇年，一些有良知的民主人士希望結合台灣本地的地方自治人物組建一個中國民主黨，但他們却坐了十年牢。這以後，反對黨要有效地成立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但在各種地方選舉之中，政治人物嶄露頭角的不乏其人。像高雄市、台北市就曾兩次擊敗國民黨的市

長候選人。這些都在無形之中慢慢積累了台灣本土的政治活動。這以後，由於新一代人的出現，經濟環境的改變，台灣與外界的溝通，使得國民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控制了，它不得不作一個調整。所以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不斷高漲。到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民進黨正式在台北成立，當年選舉就得了二五%的選票。這樣的結果就推動了國民黨，十月七日下午四點多鐘，蔣經國先生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其實質是民進黨已經成立。這使整個台灣的民主化運動正式開始。大家說，國民黨控制台灣的三大法寶（戒嚴、黨禁、報禁）由於民進黨的成立而失去效用。這以後，所有過去長時被國民黨所壓制的力量都得到盡情地放鬆，各種運動層出不窮，使台灣出現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政治局面。這個閘門一打開，就如萬馬奔騰，一瀉千里，這可以說是民進黨誕生後的最大貢獻，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貢獻。

以台灣為主體

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李貴仁

編者按

李貴仁，男，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為研究生，一九八二年畢業，一九八三年被分配到陝西省人民出版社工作，曾擔任「綠原」雜誌編輯部主任。一九八九年上半年，他在擔任陝西省華岳出版社副總編輯期間，介入學生運動，是陝西省新聞出版界聲援學潮的民主運動的總指揮，於「六四」大屠殺之後被捕。據悉，他可能被判處重刑。

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他在西安市中級法院第一刑事審判庭上為自己辯護，本文根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可惜的是他的陳述的最後部份未被錄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陳述中聲稱自己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不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據熟悉他的人說，這可能是他的真實觀點，也可能是為了不給法庭判其「有罪」提供口實。為了提請國際人權組織和海外民運組織密切關注他的生命安全和未來。本刊未加任何修改發表此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對我的審判純屬非法

我被非法投入監獄八個多月之後，今天又被非法押到法庭審判。這是我一生中具有特殊意義的重大事件，我當然要以嚴肅的態度來認真對待。但我始終認為，接受法庭審判固然不可等閒視之，而更值得重視的是，無論什麼人都要接受另一種審判，那就是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以及自己良心的審判。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李貴仁是經得起任何一種審判的，而另外一些人，特別是那些製造了今天這種審判的人，却經不起任何一種審判！

對我的這次審判，儘管經過了周密的準備，而且披上了大致（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外衣，但在本質上純屬非法，這是因為：強

加給我的罪名是虛構的；審判我所採用的法律形式是虛偽的；審判的決策者組織和進行這次審判的姿態是虛弱的。

在這裡，我要對公訴人高克盛先生表示敬意。他作為檢察官，在指控我犯罪的起訴書上，大致做到了尊重事實，沒有歪曲捏造。當然，在對事實的敘述中也有不確切或不當之處，比如：起訴書中說我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日先後四次組織領導華岳、人民、科技、未來，陝西新聞等出版社五十餘人，二百餘人上街遊行……。準確的說法應為「先後四次組織領導華岳文藝、陝西人民、陝西科技、未來等出版社及陝西省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界數十個單位的幹部群眾三、四十人至三、四百人上街遊行」；又如，起訴書中說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與本社朱鴻等人商議組織一次全社幹部罷工遊行，并指派薛衛士「降半旗使用」，此句的「六月六日」，應



為「六月五日至七日」，「與本社朱鴻等人商議」應為我「先後數次獨自徵求本社二十多名群眾意見，向他們提議搞一次全社罷工」。必須強調指出，在對我起訴的法律文件上提及完全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責的事件時，把我領導的、對所提事件不應負責的幹部的名字也列上，難免給他人造成麻煩，極為不妥。此外，起訴書上使用了我有關事實「供認不諱」的字眼，這未免太荒唐。我從來沒有「供認」什麼，也沒有什麼可「供認」的。我只是坦率表示，我的所作所為全都光明正大，絲毫沒有不可告人之處；我的所作所為全部由我個人負責，不能牽連本單位和外單位的任何群眾；我決不隱諱自己的所作所為，但這既不是什麼「認罪」，也不是什麼「悔過」。如此而已。檢察官先生把我的這種態度稱為「供認不諱」，是對的一種侮辱。

儘管如此，檢察官先生對基本事實的敘述畢竟是較客觀的。我欣賞他的這種態度。但他

根據自己所敘述的事實指控我犯了什麼「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却連最起碼的邏輯也不顧了，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都能看出，這種罪名完全是虛構出來強加給我的，絕對不能成立。

《刑法》第九十條明確規定，所謂「反革命罪」是指「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爲」；檢察官先生認爲我觸犯了的《刑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二項明確規定，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是指「以反革命為目的」，「以反革命標語、傳單或者其他方法宣傳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爲。請問檢察官先生，我的所作所爲難道屬於這種性質或者帶有這種色彩嗎？有什麼根據能證明這一點呢？

檢察官的指控是憑空捏造

值得注意的是，檢察官先生爲了使自己的指控成立，特地在起訴書中加寫了一句我的所作所爲「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檢察官先生十分清楚，只有加上這句關鍵性的斷語，才能依照《刑法》給我定罪，否則，他的指控就泡湯了。然而鐵的事實恰恰證明了這是憑空捏造的謊言，它與我的本質決不相符而完全對立。衆所周知，我決不可能反革命，也不可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無產階級專政，因而決不可能「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恰恰相反，我是堅定的愛國者，也是堅定的革命者，而且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熱愛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支持共產黨；我贊成並致力於走社會主義道路，沿着社會主義的方向深入改革；我對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是熱誠擁護和支持的。我的這種本質，可以從我的實踐活動中得到充分印證。特別能夠說明問題的是，近十多年來，我一直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定的路線、方

針、政策，并把這種精神體現在自己撰寫的大量文章之中，即以我那篇在國內和美國同時發表并流傳到許多國家的碩士學位論文《人道主義——文學的靈魂》而言，通篇所論皆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為宗旨。我在《延河》雜誌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發表的《「黑馬」在真理面前失足》一文，有力地批駁了劉曉波鼓吹的虛無主義、反理性主義，人與社會只能對立等觀點，《文匯報》、《文藝報》、《文摘報》等報刊紛紛摘轉，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緊接着，我又在《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七日第五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突破傳統與虛無主義》一文，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駁錯誤觀點。此文在當時受到了中宣部的表揚。同年三月十七日，我在《文匯報》以將近整版篇幅發表了《「現代意識」和文學本質》一文，更深入地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和批駁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影響也很大。在一九八九年春天發行的《華人世

界》改刊第二期的「國內版」和「海外版」上，同時發表了我再次批駁劉曉波的文章《未竟之偉業向何處去》，此文對劉曉波徹底否定「五、四」運動，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全盤西化和殖民化、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制等一系列觀點作了無情抨擊，在國內外的反響都很強烈。總之，多年來我在國內外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旗幟鮮明地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為維護共產黨的領導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深入進行改革，都是發揮了顯著作用的；我以此為前提對一系列錯誤觀點的批判更是尖銳有力，發揮了強大的戰鬥作用，其深度、力度和影響，其社會效果，在陝西省的文藝界和理論界，大概要算最突出的，在全國範圍內，也要算是很突出的。既然如此，又怎能把我劃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行列，甚至胡說什麼我「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以此給我定罪呢？這豈不是一個根本的顛倒嗎？這該叫國內外的人們如何理解？這是否符合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

？這對黨的事業、全民族的事業有利還是有害？硬這樣幹，難道不怕天下人恥笑嗎？幾十年來，像這樣把忠誠的革命之類的鬧劇，已經演得太多了，因此給國家民族造成的災難，已經太慘重了，難道還不該省悟，還要再這樣幹下去嗎？

我抱着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態度從事活動

即便拋開我的本質和一貫表現不論，即便只把問題局限於檢察官所列舉的我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所作所爲，也決不可能得出結論說我「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相反，同樣只能證明檢察官先生這句斷語是毫無根據的，是爲了給我加罪而杜撰的。檢察官先生所列舉的我的所作所爲，包括組織領導遊行，給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同志發電報，以及在本單位提議罷工，都是出於憂國憂民，其目的是要求黨和政府採取積極妥善的措施，盡可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合理要求，使問題得到解決而避免激化矛盾。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社會動亂，相反則會導致動亂，使國家受損失，使人民遭禍殃。從另一方面來看，我那時的所作所爲，同當時通過各種新聞媒介所傳播的黨中央的意圖是一致的，我是抱着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態度從事有關活動的。我在新城廣場演說的主旨就是要求大家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持改革，防止倒退。即從我的所作所爲的具體內容和性質而論，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既未參加過任何組織，也未同任何組織發生過任何關係；我不僅自己從未搞過打砸搶燒殺，而且反對別人搞打砸搶燒殺；我堅決反對社會動亂，并在可能出現動亂局面時告誡本單位的同志千萬不要介入動亂。我只是在五月中旬以後，作爲人民中的一分子，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以當時普遍採用的形式表達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罷了，這些意願包括懲治

官倒，反對腐敗，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肯定和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等等，全都是正確而合理的。廣大人民群眾無罪，我當然也無罪。總之，在我的所作所為中，絕無「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意圖和行動，檢察官先生加上的這句斷語，同我的所作所為風牛馬不相及，根本沾不上邊。

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

是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

事實是這樣的清楚，而檢察官先生却硬要對我作出完全違背事實的指控，這究竟是為什麼？毋庸諱言，關鍵在於我的所作所為明確表達了我對國家大事的意見，而且表達了我對黨和國家的個別領導人的意見，甚至堅決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的職務，追究他們反人民的罪責。但這只不過是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罷了，何罪之有？怎能引申為「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憲法》第五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請問檢察官先生，憲法所規定的這些條款還算數不算數呢？如果還算數，那麼，我帶領群眾遊行，我給

黨總書記發電報，我通過諸如此類的途徑和方式表達自己對國家大事的意見，不就是完全合法的嗎？我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罷免李鵬、楊尚昆等人的職務，並追究他們反人民的罪責，不同樣是完全合法的嗎？是誰根據什麼剝奪了我的合法公民權，又是誰根據什麼給了李鵬、楊尚昆等人以不許批評、不許要求罷免、不許追究有關責任的特權呢？按照檢察官先生的邏輯，似乎批評和反對李鵬、楊尚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就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這種邏輯講得通嗎？李鵬、楊尚昆作為黨和國家的個別領導人，不能等同於黨和國家，不能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是最起碼的政治常識，檢察官先生難道不懂？再說，我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並追究他們的罪責，是向黨的總書記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要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來實現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不可能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目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是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決不可能被它們推翻。這個道理是何等的簡單而又淺顯，檢察官先生難道也不懂嗎？

鎮壓人民的人才犯了滔天大罪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所謂「呼喊反動口號」。但這已經是不值一駁的了。檢察官先生列舉了我撰寫并帶領群眾呼喊的一部分口號，然而，其中有哪一條是反動的，為什麼是反動的，檢察官先生卻沒有論證。這是因為他根本無法論證。那麼，我又何必辯駁呢？如果有人硬要把「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救救絕食的孩子們」、「要民主不要獨裁」、「要光明不要黑暗」和「罷免李鵬、楊尚昆」也說成反動口號，我需要的只是冷笑一聲。當然，檢察官先生也許會說「抗議流氓政府」應該算作

反動口號。可惜這同樣站不住腳。公民對某一屆政府的作為不滿，提出批評和抗議，甚至要求依法更換組成本屆政府的國家工作人員，如上所述是憲法賦予的權利，這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有根本區別的，因為其目的和結果都只能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承諾，及時洗刷它蒙上的污垢。檢察官先生如果不抱偏見，那就應該也這樣認識問題，而不應該拾起「反動口號」之類棍棒亂打。

不錯，在我的所作所為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提議罷工，並準備為「北京死難烈士」降半旗。這是檢察官先生指控我犯罪的又一個所謂的理由。儘管這次行動沒有成功，但我仍應承擔全部責任。然而問題同樣在於：這究竟算不算犯罪？眾所周知，我提議罷工是為了解抗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反對他們以暴力方式製造流血事件。當人民在這種暴力下慘遭劫難時，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我又怎能沉默？我痛哭。我憤怒了。我起來抗議了！我只能做到這一點。我做得很不夠。但我畢竟無愧於人民！我沒有犯罪！當然，有人犯了罪，但不是我，不是人民，而是那些鎮壓人民的人犯了滔天大罪！檢察官先生，如果你還希望維護法律的尊嚴，如果你也有良知，那麼，你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承認和宣布這一點。否則，你將受到歷史的嘲笑。法官先生，你也如此。關於強加給我的罪名純屬虛構，我已經不必再講什麼。至於審判我所採用的法律形式是虛偽的，也無須多加論證。檢察官先生和法官先生，你們誰也不必諱言，對我的起訴也罷，審判也罷，都不是由你們根據法律獨立進行的。這一切，都是由法庭後面，或者說法庭外面、法庭上面的某種力量根據某種政治需要而非根據法律決定和左右的。《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各界人士談方勵之

陳軍



方勵之離開大陸以來，他的行踪，他未來的選擇，特別是他如何處理與海外民運的關係，成了衆人矚目的焦點。

方勵之從致鄧小平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以來，歷經赴布希宴會被阻，走避美國大使館和戲劇性的離境事件，無一不在新聞界和社會上造成巨大反響。然而方勵之與社會上任何公衆人物一樣，難免受到一些評議。其中方勵之在八九民運中的立場尤其受到不同的議論。

爲了幫助大家了解來自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看法，使各種觀點能夠得到理性的交流和成熟的討論，也同時給方勵之本人作爲某種參考。筆者採訪了如下幾位朋友：姓名按採訪順序列：

吾爾開希、萬潤南、宦國蒼、陳一咨、嚴家其、沈彤。

爲了節省篇幅和便於閱讀，筆者將問題分(1)——(5)號，被採訪者的回答也依此排列。至於題外的討論，按每個人回答的順序列出。採訪根據錄音輯成。

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月

問題(1)：你在國內對方勵之有怎樣的了解？有沒有讀過他寫的東西，你對他有怎樣的認識和評論？

問題(2)：方勵之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六·四則是這個進程的一個轉折點。今天檢討六·四失敗的教訓，不少人痛省中國知識分子「怕當黑手，不敢作旗手」這種「理念超前，角色尷尬」的矛盾心態，致使整個運動在精神上，組織上，策略上，無法與上幾代人的努力承接一致，而歸於失敗。你認爲這樣的批評是否適合於方勵之這樣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

問題(3)：對方勵之先生「六·四」以後走避美國大使館，這次離境前寫了三點聲明。作爲中國這種民族主義較濃厚的國家，你是否以爲，方勵之以後在國內的影響是否會像馬里蘭大學丘宏達教授說的那樣，「將逐漸減弱」？另外也有人將方勵之與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作類比，對此你怎麼看？

問題(4)：方勵之出來之時，正值海外民運的低潮期。在海外的民運團體和留學生中的大部分人中間，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希望方勵之能夠出來，擔當整合海外民運的重任，對此你怎麼看？

問題(5)：方勵之給自己訂的三一律是：一、不離開學術界；二、不做職業政治家；三、盡量發揮個人的政治制衡作用。在對西方媒體發表談話的時候，方勵之明確表示不會具體參

加某一個政治組織，而會以一個執不同政見者的身份，繼續在西方爲中國的人權呼籲，而不會將自己定位在政治領袖人物的位置上，有人對此感到可惜。對此你怎麼看？

▲萬潤南答(1)：我與方勵之在國內的某次聚會上見過一面，知道他的不少事。在我看來方勵之是個民主理念十分清楚的人，在他這代人中間他的民主素養和作出的貢獻無疑是十分突出的。

答(2)：我認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是靠某幾個人推動的。它是社會力量綜合發展的結果。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民主化逐漸推進的根源。方先生對民主理念的認識和完善，也是與十年改革分不開的。當然六·四是民主運動進程中達到的一次高潮，在高潮到來的時候，每個人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每個人都會以他覺得最合適的方式來反應，方勵之的選擇也是基於這一點。從國內出來的人都比較理解方勵之的處境，知道他是出於愛護學運才注意保持距離的，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今天反省六·四的經驗教訓是很重要的，但不能用現在得到的結論去要求昨天的每一個人。

答(3)：首先必須看到中國不是南非，不是捷克，中國就是中國，所以方勵之不是曼德拉，不是哈維爾，也不是薩哈羅夫。方勵之就是中國的方勵之，方勵之以他自己的也是我認爲

是最好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通常比較只是人們的一種期許而已，不能將此反過來去苛求一個處在特定環境中的現實的人。

中國將來面臨許多問題，期待一兩個人發揮作用，這本來就是不對的，不民主的想法。方勵之在未來中國的政治格局中，自有自己的位置，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會有自己的聲音。

答(4)：這種期待我也有，而且方勵之出來整合海外民運，也不是不可能的。海外的整合就是人的整合，大家對方勵之的認同本身就是整合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不能因為方勵之沒有參加某一個會，沒有表態一個態就認為沒有這個可能，事實上海外民運的整合是個較長期的過程。

答(5)：我以為個人與組織各有各的功能，如能將兩者結合，那當然好，如果不能也未必就是不好。我倒希望海外關心民運的人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海外需要什麼樣的領袖，當然一個人的影響和名氣重要，但它是唯一的嗎？

問：你剛才批評了有些人討論方勵之時用了較苛刻的標準，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是有些人盲目崇拜方勵之，不考慮他的個人意願和能力，想當然的要求方勵之出來做領袖。如果想對此表示異議，或者執批評態度的話，就會導致激烈的反應。他們認為檢討方勵之的得失，不利於民運的整體形象，還會給共產黨的輿論宣傳找到根據，你是否以為這是一種偶像的崇拜？

答：我認為任何人的得失，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討論，這是民主的一個基本原則，不能說這個原則只適用於一部分人。鄧小平之所以成爲獨裁者，就是因爲他的很多原則只是對別人，而把他自己排除在外。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再者，一個人如果不能被批評，他就很難在一個政治組織裡發揮作用，談到政治領袖是需要一些條件，但一個必須的條件是，他自己願意做。現在有一種論點，說這個人合適做領袖，那一個人也合適做領袖。而這

些合適的人自己又不願意做，我看不願意做本身就是一種不合適。

問：在今年民運重要的「二大」會上，你是否有什麼計劃？

答：每個人做決定除了要遵從民主程序以外，還必須考慮民心。在目前民陣絕大部分人都希望方勵之出來做領袖的情況下，我們要做的是順從民意。我們會向方先生說明這些情況，希望他能夠出來。當然我們也會尊重方勵之的個人選擇。在這種情形下，我想我個人的決定會根據當時當地的需要才能作出。

▲陳一咨答(1)：在國內我與方先生沒有接觸過，但是我們都知道他，也很欽佩他。因爲他敢於講真話，敢於批評時局中的弊端。在對民主，自由，特別是對人權方面的呼籲，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但另一方面大家覺得他對中國問題的了解也有很多不夠的地方。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如何通過啓蒙去影響社會，如何通過具體的社會參與去推動歷史。在這方面大家對他也不同的評論。

答(2)：我想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只是處在覺醒的過程中，他們還未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我們總結「六·四」經驗教訓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知識分子這種不成熟。另一方面，對方勵之這類爲民主化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過於苛求。其原因在於，在中國缺乏政治活動空間的情況下，形成不了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在北京，二三十個人的小圈子裡大家都有些共識。但在社會上，增加一分共識，組織程度就要增加十分，風險就要增加百分。「六·四」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爲各種力量在那樣的情況下，很難在民運的目標，戰略，策略，領袖人物的選擇上達到較高的共識。

答：(3)這種分析有它的道理，但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果方勵之當時讓官方提進監獄，並加以各種罪名抹黑他的形象，甚至於採取很不人道的待遇，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作出這樣大的犧牲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我們不能期

待別人作這樣的犧牲。方勵之走避美國大使館，國內的民衆有批評的看法，這是能夠理解的。但是經過了八九民運的大部分民衆，對方勵之還是持着同情的態度。另一方面，方勵之長期呆在美國大使館，也給了民衆一個啓示。在現代的社會裡，北京政府也不能爲所欲爲。方勵之出來的這件事上，有國家與國家現實政治利益的考慮和交易。方勵之出來之後，了解了海外的民運發展以後，可以作出很多的貢獻。當然就長遠的目標和歸宿考慮，我們是應當爭取回到大陸。

答(4)：我認爲方勵之繼續做一個科學家，而不去做職業政治家，這是對的。我覺得海外的人都應當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貢獻，來推動大陸方面的積極變化。我自己也想通過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來促進大陸的變化，在這一點上我很支持方先生的決定。談到通過個人發揮作用，這是每個人的選擇。薩哈羅夫有薩哈多夫的作用，瓦文薩有瓦文薩的作用。從推動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瓦文薩在波蘭動員了更廣泛的社會力量，薩哈羅夫在蘇聯的思想界和知識界也鼓舞相當一批人。中國在未來的五十年有一個危險期，它也同時提供了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對方勵之提出很高的期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對他也很有期望，但不能強人所難，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方式發揮作用。

問：在任何從事反對運動的力量和組織中，最難解決的是領袖人物或領袖集團的形成問題。目前的海外民運，各團體似乎都存在着派別問題，各組織因爲沒有服衆的領袖人物，使這些派別的爭執很難得到妥善的解決。從而造成整個民運勢能減弱，公信力下降。在目前合適出來整合民運的方勵之尚無明確表示的情況下，你有什麼分析建議？

答：我想這裡有三個問題，第一是在任何斯大林體制下，由於我前面已提到的原因，即獨立的個人獨立的組織完全被消滅了，因此在



美國在方勵之出國中

起了什麼作用？



有條件的時刻，任何的一個組合都會遭遇很多困難。今天的羅馬尼亞是個很好的例子。第二是：目前的大陸內部，由於全面控制，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在海外的民運組織，雖然有很高的期望，但苦於離開了現實的政治舞台，往往做的一切都是虛構的演習。因此很難辨別什麼行為是必要，什麼是不必要，同樣，我們也沒有識別領袖的實際標準。現在海外有不少的名人，但這些名人是否能成為政治領袖，尚需一個長期的過程得到驗證。當年孫中山搞同盟會，經歷過一個很長的磨合過程。政治組織內部的民主程序，並不能產生最高的效率，但能避免作出最糟糕的決定，民主程序未必能產生最好的領袖，但能制約最壞的領袖。第三個是，除了形成領袖人物和骨幹隊伍以外，我們還要有明確的對內對外政策。這個政策在重大問題上有自己的原則，隨着形勢之變化又能講策略。六·四剛發生的時候，大部份人因激憤和衝動，聽不進理性的聲音，現在國內的形勢有了一些鬆動，在共產黨調整的情況下，我們作出相應的調整，反而立場動搖，這只能造成自己的混亂。上面這三個方面的問題給了我們難題，也給我們機會。人才是在解決問題上，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顯現的。目前海外在綱領上，策略上的分歧討論，同樣是很有意思的。但這些討論的範圍很小，我們通常發現，在那些枝末細節的問題上，人事關係的問題上，却流傳着大量的流言蜚語，這說明海外的民運仍處在一個初級發展的階段上。

問：你是否能告訴我在今年的民陣「二大」上，你是否會競選新的職務？

答：我本人參加了民陣，這只是我個人的選擇，我目前重心還是放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籌建和運作上。這個中心目前有許綽雲、余英時、沈君山、丘宏達、費景漢、蘇紹智、黎安友、谷德曼和我九位組成的董事會，中心建立的目的是想藉學術研究來促進大陸內部積極的變化。另外在大陸發生變化的時候，中

心能夠提出相應的解決之案，以便讓中國人有選擇的餘地，第三是通過各種的研究和其它活動，讓能做的人走到一起，形成更多的共識。這樣我就不能在民陣方面作更多具體的參與，作為民陣的成員，我希望民陣能夠搞好，這也是客觀的需要，我當然會為此盡自己的責任。

▲吾爾開希答(1)：我與方勵之沒有見過面，廣場的時候，王丹給我介紹了許多。王丹認為，方勵之是有骨氣的人，對這一點我最佩服，如同我佩服劉曉波那樣。另外王丹說方教授是很理性的人，主要就這兩點。對於方先生的民主理念，大家都已經有目共睹了。剛聽到方勵之出來的消息，大家都擔心方勵之是否會因為這一年的挫折，或由於不了解海外的情況，對民運持觀望的態度。但是，方的三點聲明則完全打消了我的這種顧慮，我相信方勵之的很快就會投身海外的民運。

答(3)：中國的情況與南非或東歐的情況不一樣，六·四之後的北京政府完全處在非理性的狀態，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和我們流亡海外都是被迫的一種選擇。當然，如果我當時沒有能夠逃出來，現在仍在大陸內部逃亡，憑我的骨氣，我可以說，我不會出來，就是有機會也不會。方教授不一樣，他能出來對海外整個民運會有很大的影響。退一步講，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方教授去坐牢，所以我對方教授進美國大使館表示理解和支持。方勵之沒有參加八九民運，我個人認為是一種遺憾，但當時的情況下個人作這樣的選擇，我們也能想像和理解。過去就不談它了，重要的現在怎麼去做。

答(4)：我認為第一方勵之應該出來整合民運，發揮自己的作為，第二，如果他一旦介入，難免會失一些分。這正好說明了中國民運之艱難性所在，也是它的悲壯性所在。中國人四十年來一直沒有民主的概念，有的話也只是將其理解為忍讓，但中國人又不善於忍讓。由於這些陋習，方教授直接介入民運，必然要受

到一些損失，如果完全不介入，損失雖然沒有，但却違背了方教授的原衷。我認為一個有志於民主事業有開胸襟的人，應當能夠作出個人損失這樣一些犧牲。

答(5)：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出現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其結果讓人傷心。方勵之曾經在歷史上承擔過很重要的責任，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歷史向前發展，然而當這個歷史以自身的慣性向前推展，並將一個新的責任交給他的時候，他如果沒出來承擔的話，這是我們中國民運的一個悲劇。這個情形在六、四期間已經出現過。我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吧？我相信，我盼望，我甚至用流着血的那種盼望，希望出現方勵之這樣的人物，不再打擊我們的信心。

問：從事海外民運，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往往是事倍功半。現在正值海外民運低潮期，有些人或負氣退出，或認為與自己清高的原則不符，變得消極悲觀怨天尤人。但是一個政治人物的智慧，能力和擔當的勇氣恰好在困難的情勢下，才能顯現出來。不知你自己今後的打算是如何？會不會在民陣二大退下來？

答：我不會急流勇退，我不是一個在逆境中不能承擔責任的人。過去一年中我碰到了很多的困難，也遭致了不少的議論，但這對我只是繼續努力的動力。我在二大也許不再競選職位，這倒不是我個人的信心問題，而是遵循一條路走不通，闖一闖別的路的原則。急流勇進固然是一條原則，但不成功，去開闢另外的方向也是一條做人的原則。以後我會繼續為民陣盡自己的努力。

▲宦國蒼答(2)：怕做黑手或者被怕用來抹黑學運，按照北京政府的分類與指控來說，並不是個人可以掌握的事。因此沒有很大的說服力。如果這次沒有方勵之這樣的黑手，中共還會找出別的人。方勵之並不是學運後面的唯一黑手，實際上他也沒有什麼介入。如果因為怕共產黨說某人是黑手，某人就不敢介入的話，那

就永遠不會有人介入運動。想通過自己的行為來維護學運的純潔性，這個說法完全沒有道理。學生運動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制，在這裡也談不上純潔或不純潔的問題。僅僅因為這樣的原因，方勵之沒有介入民運，我看是說不過去的。因為基於同樣的解釋，劉曉波、萬潤南、陳一咨都不應該介入民運，大家都這樣考慮的話，就談不上運動本身了。

問：你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從方勵之出境的問題上，你認為中美雙方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答：對方勵之這樣的出境，說老實話，我沒想到這件事解決得這麼快。現在來看釋放方勵之北京政府是為了爭取西方國家的貸款，特別是日本的貸款，另外北京也想緩和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再則他們也看到了放方勵之出去，比將其留在國內受到的壓力更小，出去方勵之的影響可能還會縮小。總之在讓方離開中國的這件事上，北京撈到了不少實質性的好處。美國這方面，他們不希望中國回到十年以前的封閉狀態，他們想把中國拉回到開放與改革的軌道上。他們試圖維繫兩國之間的關係，不讓它繼續惡化。他們還把希望放在朱鎔基、李瑞環這樣的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在鄧死後，取代李鵬、楊尚昆這樣的保守派。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經過十年改革，特別是經過八、九民運，又不同於鄧小平剛剛復出的時代。另外中國實際的政治情形，也比他們所能想像的要複雜的多。比如朱鎔基，大家都認為他是改革派裡的重要人物。實際上當年是陳雲派他去的上海。他歷來反對市場經濟，相信的是計劃經濟，不同之處，僅在於他比較了解計劃經濟而已。同樣對李瑞環，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證明，他將來一定能有什麼作為。

答(3)(4)(5)：我不認為方勵之出來以後，一定會減弱他在中國的影響。無論如何，他出來以後，他能做的事總比他日前在大陸做的事要多得多。至於方勵之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則取

決於他個人的選擇。他可以選擇作為一個執不同政見者，為人權繼續奮鬥，人權以外的問題，我想他了解得不多，但這無關緊要，他也可以選擇作一個政治活動家。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個人性的，憑方在過去的作為和今天在國際上的影響，他完全可以勝任薩哈羅夫那樣的角色。不同的是中國的薩哈羅夫現在國外。作一個政治活動家需要的能力和知識不一樣，要解決的問題也複雜得多，像曼德拉，阿拉法特或者瓦文薩這樣的角色。扮演這種角色，方勵之也有自己的條件。比如說他的影響要比其他人要大得多，在國際社會上募款也容易得多，如果運作得當，各民運組織間的整合也可能成功。但也有些問題是他不能解決的，比如各民運團體之間的內鬥問題，海外民運今天能夠做事的範圍等。但他的難處是，他個人是否有作政治家的氣質，眼光和胸襟，這也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們看到已經從國內出來的人名中，由於彼此間的不能合作，使他們有實效的政治生命變得很短。

答(4)：我聽到方勵之出來很高興，因為他能夠起到將海外民運整合起來的作用。具體的說，我想到兩點，一是方勵之不能擔任民陣的主席，當然更重要的是能否將海外各民運力量聯合到一起，因為民陣出來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二是與方勵之一起討論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的將來。所以在海外民運今天的情形下，方勵之出來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轉機。

▲嚴家其答(1)：一九七九年我在社科院哲學所的時候，方勵之來講過幾次天文學與哲學的關係，當時我們就互相知道，但也不算非常熟悉。他當時在為「宇宙大爆炸」尋找哲學基礎。他不同意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理論，表現了其獨立思考的精神，政治上則談得很少。七九年認識以後，在國內我們接觸得不多。方勵之走進美國大使館以後，我去年九月在民陣成立以後，給他寫過一封信，他在十月份給我回了一封信，用英文寫的，表示他的處境比較

困難，對民陣的成立表示很高興。今天下午方給我打了電話，說他八月要到巴黎來跟大家見面談一談。方勵之實際上對外面的情況很了解，他不會放棄為實現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他歷來就是這麼做的，問題是他想找一個合適自己的方式去做。

問：方勵之是否參加今年在美國西部的民陣二大？對外面請他出任民陣主席有什麼看法？

答：方勵之告訴我，由於他原來已有所安排，所以九月份不會去舊金山參加我們的「二大」。

答(2)：我認為六、四期間，知識份子都不願意被中共說成黑手，不僅方勵之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在廣場作的簽名呼籲也不是因為想做黑手，只是從知識分子的良心去表達我們希望社會進步的意願。所以方勵之當時的做法，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當時有人去找方勵之簽名，我相信他一定會簽名。第一次簽名運動就是從他這裡開始的。另外從海外的角度與在國內的處境有明顯的不同，我現在出來了，言論自由的程度就比在國內大的多。因此方勵之當時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

答(3)：我不完全同意這種比較。我們出來的時候，別人也有這樣的看法。如果你去問問柴玲，問問封從德，在國內被四處追捕，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有走上流亡的道路。像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我在國內被通緝的時候，也想到過去自首。當時的情形下，自首也不是變節，如果被抓了，很有可能被槍斃。所以方勵之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

答(5)：我認為方勵之兩種角色都會扮演，他既會像薩哈羅夫那樣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為中國的人權呼籲。他也會通過另外的方式，促進海外民運的整合。整合並不是搞一個更大的組織，或在民陣現有的基礎加以擴大。或者民聯和民陣的合併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想方勵

之還在考慮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大家應該跟他一起共同努力。

問：聽說你今年不準備在二大上再次競選主席，你將來的個人計劃是什麼？

答：現在海外的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去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我自己也在盡力而為。今年九月份我不做民陣主席了，但為中國民運努力的想法不會改變。現在海外民運應該考慮未來中國的發展，研究一部新的憲法等，而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如何搞一個嚴密的組織方面。方勵之現在的考慮，是為整個民運着想，尋求一個更好的參與方式。我今後也會以合適自己的方式為民運貢獻力量。我們的目標不是在海外，還是將來回到大陸去。

▲沈彤答(1)：我與方勵之本人不太熟，但與李淑嫻教授很熟。當時北大有王丹的「民主沙龍」和我們的奧林匹亞科學院。李淑嫻是我們的指導老師。她基本上每個星期三都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方勵之由於比較敏感，參加學生的活動就少一些。方勵之的文章讀過兩篇。一篇是他參加布希宴會的被阻風波介紹，另一篇是「在絕望與希望之間」，兩篇都貼在北大的校園。與國內大部分知識分子模糊的立場相比，方勵之的價值與貢獻，倒不在於他的想法有多少深刻，而在於其明確的政治立場和積極的參與態度。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我尊敬的愛因斯坦和薩哈羅夫。

答(2)：在運動一開始，方勵之怕介入成爲黑手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學生這邊包括王丹，也有避嫌的想法。當時方勵之已成了鄧小平的私敵，讓他參與運動是弊比利大。但運動發展到了後期，以「五·一七宣言」爲標誌，運動的性質從要求反貪污，爭對話發展到了要求政治制度改革，推進民主化的新高度，單純的學生運動也因各階層的介入變成了全社會的運動。嚴家其，包遵信，溫元凱都參加了，方勵之這時不參加進去是個很大的遺憾。現在有模糊的說法，認爲「八·九民運」被共產黨利用了

。假如方勵之當時出來，整個運動的民間色彩就會更鮮明，性質也會更清楚一些的。

答(3)：通常講影響是要有範圍的。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由於共產黨刻意的抹黑，把方勵之說成是西化的代表，造成的部分影響已經是很消極的。但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間，方勵之是挺受歡迎的。方勵之進入大使館，我不認爲失了什麼分。失分在沒有參加八·九民運。當時和我常在一起的陳明遠也認爲這是不對的。方勵之如果到了海外就應該參與海外的民運，不參與是不明智的。中國沒有象曼德拉這樣的人物，是因為中國人的運氣不好。

答(4)：作爲一個留學生和海外積極參與民運的一分子，我很贊同方勵之所作的選擇。根據我的觀察，海外民運能做的是四個方面的事：

1. 通過國際性的人權組織，爲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努力；
 2. 加強與各國政府的聯繫，在各國外交政策的對華部份，要求向中共施加壓力，促其釋放政治犯和制度改革；
 3. 在海外通過各種活動，學習民主，積累政治經驗，了解國際社會，爲將來回國作好準備；
 4. 組織建設，這一點與未來回到國內去發展未必有什麼延續性。
- 方勵之不想直接介入的只是第四方面的事，也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現在花時間較多也是在這件事上。其它的三個方面，全面來評價實在做得很差。我主張搞明星政治，在海外方勵之應該以個人的感召力去發揮作用，去影響西方的輿論界和政府，而不應該去參加搞組織和其它沒有實效的活動。



中共的穩定和民運的應策

中共已從六四屠殺之後的「谷底」艱難地爬出。海外民運力量應當承認這種「穩定」局面並採取相應的對策。

亞衣

「六四」屠殺以後，在中共的政治術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要算「穩定」這個詞了。從十一屆四中全會到七屆三次人代會，從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到主管意識形態的李瑞環，一再強調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經濟穩定以及人心之穩定。連得王震此人，也裝模作樣與外國人大談什麼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人民日報」甚至還發表了題為「穩定壓倒一切」的社論。好一個「壓倒一切」！它表明了中共領導層一個相當迫切的意向：把追求穩定當作今日大陸的頭等大事。

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很有必要討論一下中共高唱的穩定論到底是什麼東西。

中共傳統的操作循環

縱觀中共四十年統治史，雖然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所整對象各異，但基本上都循着一個類同的操作週期。這就是，運動一開始講發動群眾，放手鬭爭，大轟大嗡；運動後期講落實政策，適度安撫，團結安定。或者叫「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孤立打擊「一小撮」，（即使對這「一小撮」，也要「給出路」）；或者叫「政治思想鬭爭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從鎮反、肅反、反右到四清及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革命這個大運動中的各個小運動，例如「

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等，無不如此。有人說共產黨搞運動搞成了精，此話一點不假。在這樣週而復始的操作循環中，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這位階級鬭爭大師極其自我欣賞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例如五十年代後期，剛給幾十萬文人學子戴上了「右派份子」帽子，毛澤東就說要搞一個包含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再如六十年代後期，打垮了劉少奇集團，毛澤東及時宣佈「九大」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又如七十年代初期，從肉體上消滅了林彪，毛澤東又大力倡導包括「要團結不要分裂」在內的「三要三不要」原則。在文革期間，他曾幾次想把自己放出來的魔鬼收回盒中，甚至不惜重新啟用「棉裡藏針」的鄧小平以「整頓為綱」，搞出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

切莫小看了毛澤東及其後繼者這種「革命的兩手」的實際效果。我以為這正是為什麼共產黨壞事做絕，但依然得以一次次度過危機的部份原因。共產黨的目標是鞏固自己的政權。前述操作週期的每一環節，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它要殘酷鎮壓危及這個政權的民眾的任何反抗，也要適度化解由於鎮壓而引起的同樣不利於政權鞏固的反彈。而對於每一次被鎮壓、被摧殘、被侮辱及被損害的當事人及其家

屬來說，無論他們是黨內政敵還是草民百姓，當掌權者把已經被打入第十八層地獄的「罪人」提升到第十七層時，由於人性的弱點，他們也會對創子手表示某種感激。想一想當年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的右派份子，在聽到他們的問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的激動心情吧！想一想文化革命中因為弄壞了「寶像」或喊錯了口號被判死刑而又被寬大為「緩期執行」的「犯人」及其家屬的神態吧！共產黨的「週期穩定論」也是建築在他們對這等中國民眾心理的深深瞭解上的。當然，他們還同時利用了人所共有的遺忘機制，用週期的安撫與穩定去幫助受害者們把往事遺忘。

鄧小平集團的新手筆

我主張聯繫共產黨四十年的罪惡史來看待它現時的穩定戰略，但同時又不認為今日是昨天的重復。繼承毛澤東衣鉢的鄧小平集團面臨着新的歷史難題：在鎮壓上，他們投入成本過高，在穩定上，所費代價又顯太大。去年他們讓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平民和學生，從而在赤裸共產黨專制的殘酷性方面超過了毛澤東時代；事後急於收拾亂局，窮於應付，在對政權的自信心方面又遠不及毛澤東。他們自知坐在一堆火藥桶上，決意鏟

除一切足以引爆的裝置。於是，他們急不可待地把「穩定」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既然是穩定「壓倒一切」，那麼，就可以用「穩定」來封住一切持不同政見者的嘴巴。在這裡，「穩定」成了堅決鎮壓的最好借口。一有風吹草動，當權者就可以宣佈你破壞「穩定」，要搞「動亂」。在消滅一切「動亂」之萌芽上，中共領導層下定決心，決不退讓半步。所以，上天安門廣場送一個小花圈的工人、在校園裡發表幾句演說的學生，一律照抓不怠。同時，已被捕人員只要順從悔過認錯，也不管你是真是假，當局也照放不誤。

既然穩定壓倒一切，那麼，也可以用穩定堵絕黨內政敵批評。這一點早在鄧小平去年對姚依林、李鵬等人的講話中就顯示了出來，他以強硬的態度宣佈「兩年內不討論經濟理論問題」。他深知中共處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之中，這是黨內各派系明爭暗鬥的最好時機。他用「穩定」擋住了政敵們的攻擊。事實上豈止經濟理論不許討論？其他涉及鄧小平在十年改革中的理論是非一概不許討論。這一年來，鄧小平集團頗為有效地造成了一種「三不」局面。即理論上不爭論，政策上不糾正，組織上不變動。雖死水一潭，却真風平浪靜。這就是鄧小平說的「一動不如一靜」。

為求穩定，鄧小平集團確實採取了在共產黨統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讓步。對黨內「支持動亂」的趙紫陽及其助手遲遲不作結論，分批釋放了八百多名被捕人士，把侯德健逐回台灣，讓頭號持不同政見者，躲入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自由地出國來到西方世界。且不討論其原因，僅就事實本身而言，這一些都是鄧小平集團的新做法，是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手筆。

中共各派系的平衡點

事實上，「穩定」已成了中共當權者內各個派系的平衡點，是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海

外傳播媒介歷來十分熱衷於渲染中共內部派系的矛盾，一會兒是鄧小平與陳雲如此暗鬥，一會兒是李鵬與李瑞環這般明爭。道聽途說，加油添醋，呼風喚雨。誠然，就追求新聞價值而言，這些作法無可厚非。但從中國民主運動的遠程方略來說，却存有大忌：過於強調中共各派的不同點而忽略了他們的共同點。

請回憶一下毛澤東時代，最高統帥指點江山，一語九鼎，在他左右則有紅臉、黑臉或者白臉灰臉相輔佐，各種角色一應俱全。彼時國外媒體也曾熱衷於猜度中共黨內「健康力量」何在，結果是鏡花水月。嚴格說來，劉少奇、周恩來或者林彪、陳伯達與毛澤東究竟有多少區別？今天的鄧小平同樣需要而且擁有各種各



侯德健返台也是中共放人的計劃之一？

樣的幫手。看不到共產黨統治集團中間這種角色分工，看不到他們共同的利害所在，中國善良的百姓們終歸免不了再上一次當，就如當年北大學生在天安門遊行隊伍中一展「小平您好」的橫幅一樣。

我並不否認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或王震、李鵬有千種萬類之差別，但是從根本上來看，在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上，在對異己力量的鎮壓上，在所謂「打江山坐江山」的理念上，他們又是一致的。當他們意識到首要的任務是避免共產黨這艘破艦沉沒時，他們就在一年前共同舉起了屠刀，之後又一致贊同以穩定來「壓倒一切」。

賀敬之被罷免的消息傳來，有些人喜形於色，認為這是一個標明鄧小平集團轉向的訊號。倘若真的被罷，也是破壞了「穩定」大局所致。李瑞環敢於說出一大串「不同凡響」的話，但是，他不會在鄧小平分配給他的角色上「越位」，一旦他走得過遠，影響了中共集團的穩定，他會丟官。

應當承認：中共爬出了谷底

中共領導集團稱其穩定政策收到了成效，它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有些人則認為中共的穩定是虛假的，它困難重重，危機四伏，風雨飄搖。不久前某著名民運人士斷言李鵬政權一年來遭到了「全面失敗」；另一位著名民運人士料定這個政權的壽命還有兩三年（悄悄地修正了他一年前宣佈李鵬兩年垮台的預言）。

究竟應該怎樣恰如其分地估價中共政局的現狀與前景？我以為，說中共的穩定為虛假，其言無錯。從根本上看，任何一個極權體制都不是穩定的，因為它不是開放社會，而是封閉社會。封閉社會不具備導致社會系統穩定運行的負反饋機制或雙向通訊流機制。它只具有週

期性的正反饋造成的系統的振盪和不穩定，最後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封閉社會不是良好的處於動態平衡中的耗散結構。從這些定義上來說，中共極權統治當然不可能是穩定的。

但是，社會系統在時間上的跨度很大，因此在一個局部階段，即使是與環境交流甚少的封閉系統，也可能有一種暫時的穩定，而中共統治集團，確實處在這種暫時的穩定之中。儘管我們許多人都不願意承認，但這畢竟是事實。

從國際上看，美國延長了對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西方七國高峰會議決定放鬆對中共制裁，日本恢復給予大筆貸款，沙特阿拉伯與中共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政府中止了正式外交關係。在國內，江澤民一路跑了好幾個革命老根據地，去百姓家問寒問暖；李鵬深夜闖入上海居民家瞭解住房緊張問題；萬里邀請大學生上人民大會堂打橋牌，這些戲大致都演得不錯。在對知識份子的安撫方面，也已見成效。一年前大陸知識界可謂萬馬齊喑，在官方報紙上出現的文教科技理論各界「擁護平暴」的報導中，被迫出場者大多隱去姓名。現在則不大一樣，除開那些老左派如魚得水外，不少中性人物也亮出姓名，在各種座談會上大談學習江總書記講話的「深刻體會」。至於在經濟方面，據留美同學經濟學會回國考察組的報告，雖然潛伏有危機，但表面上還平穩，沒有崩潰跡象，尤其在物價等敏感問題上，矛盾並不尖銳。

總之可以這麼說，中共領導集團無論在國際舞台還是在國內政局中，已經從六四屠殺後跌入的谷底艱難地爬了出來，其趨勢是在上升而非繼續下落。

海外民運的新應策

面對中共的暫時穩定以及這個獨裁政權所固有的韌性，海外民運團體以及一切為建立民

表面一派平靜：北京王府井大街



主中國而奮鬥的個人，都需要冷靜地思索一下新的對策。在此，我僅提出以下粗淺的建言。

第一，對於中共政局當前相對穩定的現狀，應予以實事求是的承認和認真對待。駝鳥政策不可取，盲目樂觀或其他焦躁情緒都要不得。至於算命先生式的預言，最好不要再重復，因為這種做法一來嚇不垮敵人，二來也壯不了自己真正的聲勢。

第二，利用中共「穩定」的口號，呼籲中共徹底放棄一切不利於社會穩定的鎮壓措施。

即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逮捕、關押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釋放一切被捕的民運人士，不管是否知名人士還是普通百姓，對於未被釋放者，應予以人道主義待遇，按照法律程序審判。

第三，幫助大陸民衆積蓄力量和資源，進行「合法鬭爭」。海外各民運組織要捨得面向大陸做長期艱苦的工作。要突破中共對信息資源的壟斷，讓更多關於海外民運組織活動及全世界民主運動潮流的消息進入大陸。要幫助在大陸的青年學生行使自己出國求學深造的法定權利，幫助大陸學者自由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努力爭取在海外留學生自由返回大陸不受迫害以及再次出國的合法權利。

同時我們也要預見到，由於大陸政治形勢的穩定與緩和，在海外民運中也會出現相應的爭論和意見分歧。在這一方面，我以為有兩個傾向可能重新抬頭。其一，是對中共黨內「改革派」寄望過高。所謂「趙紫陽可能復出」的傳言，正是這種期望的曲折反映。這種期望可能會使海外民運中的一部份人發生變動，而中共也會巧妙地利用這種變動作某種分化瓦解工作；其二，是有意無意地為鄧小平對六四屠殺的罪責加以開脫，把他描繪成一個輕信下屬謊報軍情而犯錯誤的情有可原者，渲染他在六四後的後悔情緒。所謂「李鵬政權」的提法，實際上是試圖用李鵬作為鄧小平集團的替罪羊，強調其個人責任，而粉飾整個共產黨領導集團的罪行。

※ ※ ※

中共為奪取政權用了二十八年，為鞏固政權又費時四十年。它早就該死但至今未死。這個獨裁體制有其特別的頑固性，當前它所獲得的穩定，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惟有長期的努力奮鬥，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我們一定要抓住每一個偶然的機會，但決不能坐等這樣那樣的突發事件從天而降。▲

八九民運反思之反思

牛年生

胡平先生在「中國之春」最近兩期連續發表的「八九民運反思」一至四章，內容極其豐富。他分析了當時存在或不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從各種不同角度，討論了八九民運的成敗得失及其教訓。我想，胡平的「反思」可以像一些電視劇一樣一直連續下去，直到下一次民運高潮的到來。若不幸下次高潮遲遲不來，則可編成一本完整的教科書，供研究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中外學者參考。胡平先生的大論如一氣呵成，而細讀其每一章節，每一段落，都自成一體，充滿了豐富的哲理並交織着嚴密的邏輯，令人拍案叫絕。然而我在欽佩之餘，卻感若有所失。

苦思半夜，似乎悟出一點心得，在此與胡平先生商榷。

政治事件並非一定可以論成敗

胡平的「八九民運反思」，套用鄧小平的話，可謂是圍繞着「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乃是「八九民運遭到了失敗，而且這一失敗並非不可避免」；「兩個基本點」則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一個中心」的大前提很重要。正如胡平指出，如果八九民運是勝利了或者是注定要失敗，那麼「反思」就將是另一種寫法了。因此，我想先對這「一個中心」提出疑問，即「八九民運如何論成敗？」

一場政治運動或一項軍事行動，必先有其目標，然後可以論成敗。胡平先生對成功作了十分準確的定義，「後果符合目的」。拿群眾性的運動來說，（並非一定是政治性的），工人可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民衆可以要求政府建立或取消某項法令，也就是說，運動有一個具體的目標，而且這樣的藝術一般都有較良好的組織，發展也比較有節制。還有一種運動，是屬於抗議性質的，一般比較激烈，但組

織卻鬆散，往往也沒明確目標，如果說有目標，那主要目標就是製造社會影響。胡平認為，「八九民運的目的是爭取基本的自由權利，建立和擴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而我的印象中，在持續近兩個月的風潮中，始終不曾出現一個明確的目標，更不用說一個如此概念化的綱領。這樣的綱領，無疑存在於胡平先生的頭腦裡或稿紙上，卻顯然沒有在當時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之中立足。學生和民衆們喊出的「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都只能算是表示激憤的口號，也就是說是一種抗議。（如果明確要求懲治某一貪官，或修改憲法中某一條文，則當別論。）到了後期，有人喊「打倒李鵬」，甚至要鄧小平下台，與其說是政治口號，不如說是情緒進一步激化的表現。所以我認為「八九民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抗議示威。套用一句「老牌修正主義份子」伯恩斯的名言，即「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既然沒有目標，成敗又何從談起呢？胡平在分析「打不贏就跑」時指出了政治與軍事的多不同處，有一點他沒提到，即政治事件並非一定可以論成敗。

當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提過一個明確的要求，即與黨政高級領導人直接對話，並同全國作現場轉播。這個要求開始被拒絕，後來實際上由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代表而達到了。胡平認為這是「見好就收」的又一好時機，這一點我想很多人都同意。然而同學們並未見好就收，或者說「收」和「退」的意見始終有點佔上風。這不光是因為胡平所說的，學生們被李鵬的虛張聲勢所迷惑，沒有意識到政府已經作了重大讓步，失了面子，該給它台階下了，更程度上是因為學生們，包括他們的領袖們，未必把這一對話及現場直播，作為他們當時的「最高綱領」，或者說他們並沒有什麼綱領，目標，當然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結果就成了「運動就是一切」。

八九民運，確切地說，是中共統治下數十年來民衆積怨的一次空前大爆發，好像高壓鍋裡的蒸汽沖出安全閥時的尖鳴，因此，勢必發展成如胡平所指出的「像一匹脫韁的野馬」。而一些比較高瞻遠矚的海外民運人士，則從中看到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勝利的曙光。在他們心目中，早有一番戰略部署，於是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示威、請願、遊行、絕食，統統放在自己假想的棋盤上，有點像是過一過「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癮，正像我們學理科的，喜歡把一切宏觀、微觀的運動，包括噴發的蒸汽和脫韁的野馬，統統納入自己熟悉的方程式一樣。這當然無可非議。但當事態的發展和自己的棋譜未能符合時，也不願真實世界中與自己的棋譜上是否同一盤棋，就出來判斷成敗勝負及其原因，難免會有失偏頗。

民運不是炒股票

我們再看胡平的「兩個基本點」，「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是股票商所熟悉的術語，並非新鮮的理論。這個道理幾乎人人都懂，然而事實上要做到卻極其困難。縱然有各種各樣的指數、統計作參考，當事人也極難判斷，預測股市的漲落趨勢。即使運氣好，來了個低價買，高價賣出，「見好就收」，撈上一筆，過幾天，幾週後，或許發現自己已脫手的股票又漲了幾成，則後悔「收」得太早，放走了財神。這還算運氣的，如果「見壞就上」，孤注一擲往裡投，結果股市照跌不誤，幾個月甚至幾天之內讓人破產，這樣的例子也不少見。金融分析家們，確實在這八個字上大作文章，他們根據過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內股市的波動及當時的各種跡象，可以寫出一本又一本諸如「華爾街指南」的書來，甚至許諾「把你發財」。這些書大於初涉股市的人，確實有啓蒙作用，但誰要指望按照書中的密訣一定能發財，恐怕會輸不過，炒股票的時候，至少還可以「收、放、自如」，一個電話打給經紀人，就解決問題。但是在政治運動中，往往就沒那麼容易。特別是在八九民運中，組織是那樣鬆散，領袖們的威信又不那麼高，沒有人具有對群眾「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能力。即使某人

獨具慧眼，看准了「行情」，又叫他如何去收，如何去放呢。六四以後有一回重看電影「甘地」，我和一些朋友們也想過，如果在六四之前由方勵之、嚴家其這樣的名人，像甘地一樣，絕食呼籲學生們停止佔領廣場，回到學校去。如果成功的話，不但大大加強他們的民運領袖形象，連當局也要敬畏他們三分，因為他們既有力量勒住「脫繮的野馬」，當然更可以重整旗鼓，策馬再戰，將來發動更大的示威。可惜的是，八九民運自始至終沒有這樣有力的領導和緊密的組織，而且通訊工具仍在當局手中，方、嚴等人若在家中絕食，恐怕也沒有那麼大影響。一句話，不存在嚴密的組織，不存在甘地那樣深得人心的領袖，「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就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胡平文中曾正確地指出：「總結經驗不可脫離實際」。我不理解，他為何要在這當時根本無法實現的八個字上作這許多文章。我覺得應該反思的倒是，為什麼直到如今，無論在海內外，都沒有有一個真正的民運領袖人物。有人當然會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不再需要救世主。」不幸的是，這只是一種最廉價的自我安慰而已；而且英雄太多了，並不一定是好事，至少「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就難以做到。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八九民運的成敗問題上來。前面已經說過，沒有明確目標的行動，難以論成敗，還是分析它的影響較為有切實。胡平認為，八九民運的結局，使得我們原本已充足的東西——對現存法制的反抗情緒——變得更多，而使得我們原本缺乏的東西——表達這種反抗意識的機會——變得更少，權衡這一得一失的實際效果，是得不償失。這樣分析很有意思，但問題是這一得一失沒有像財務賬那麼簡單，無法作數量上的比較。何況八九民運的影響，還不止這兩筆賬。

八九民運的國際影響

我不贊成對八九民運輕易論成敗，但如果一定要論，那麼，胡平先生「反思」一文中始終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八九民運的國際影響。胡平曾指出，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製造國際輿論，不正是很重要的一種功利麼？如果

說，八九民運也要其目標的話，製造影響是最首要的，王丹曾表示，選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際而絕食抗議，正是為此。這個目的顯然是達到了，而且達到的程度高出他們原來的想象。最近，美國國會將辯論是否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值得深思的是，中國是全世界共產黨國家之中，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享受這一待遇的除了美國對外政策中要拉攏中共的因素之外，這完全是因為中共掌權四十年來對中國人民的倒行逆施鮮為世人所知。儘管有一些知情作家、記者的揭露，如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的「苦海餘生」（Alive in the Bitter Sea）等，但遠遠沒有影響到西方的輿論，因為這些專論專著沒有也不可能進入「尋常百姓家」。只有這一次，中共當局的兇暴、橫蠻，為維護獨裁統治而不擇手段，在世界公眾面前得以徹底曝露。去年六月四日，北京長安街上的血雨腥風，通過現代化的媒介，傳遍世界的每一角落。因而六四之後，布什總統兩度派密使訪華，全美各大報刊，不論自由、保守，同聲譴責。不久前筆者所在州的副州長要參加一個低層代表團訪華，還特地徵求當地中國

學生的意見。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原因很簡單，用一位美國專欄作家的話來說，「中國已成了世界（第二個）南非」。這樣深遠的影響，是民運人士，特別是在海外的，千萬不可低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生運動的目標達到了，柴玲關於「人民覺醒」的預言也實現了。而胡平先生忽略了這樣效果，或者只是籠統歸納為「一場失敗的運動的正面遺產」，也許是同為很少注意到國際環境和輿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之故。

世界輿論的轉變，或者說是覺醒，是北京市民、學生的生命與群眾換來的，代價無比沉重。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今日的「知名度」，可以說都是八九民運的「成果」。如果沒有這一次的「失敗」，海外民運人士縱然人人有生花之筆，如簧之舌，恐怕也不能造成今日影響之萬一，在「六四」一週年之際，面對英烈在天之靈，我們這些偷生海外的人，在反思之餘，應該意識到：如果說「運動就是一切」尚能震撼中南海的宮廷；「反思就是一切」，甚至於沉溺於文字、邏輯遊戲之中，就顯得不足了。

新書徵訂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

胡平著

本書收錄了“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等七篇論文，對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及其他一系列重大哲學謬誤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

定價：美金七點五元，另加郵費一元。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地址：P. O. Box 701400, Flushing,

New York, NY 11370-9998

電話：(718)429-6777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房志遠著

本書收錄了房志遠以丁楚、張鋼、楊天樹等筆名發表的“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形之手，無力回天”等十幾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中共政權注定要滅亡的命運。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

定價：美金八元，另加郵費一元。

探求中國人的團結之道

中國人的團結史都是失敗史。我們應當另辟蹊徑，尋找適合中國人凝聚的方式和條件。

李國愚

團結，對中國人來說，是個歷久猶新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尋求自身團結之道的歷史。但是，迄今為止，中國人的團結史都是失敗史。從近百年前孫中山痛斥中國人像一盤散沙，到最近的民陣主席嚴家其感嘆中國人團結之難，都在顯示團結問題是困擾中國幾代精英份子的老大難問題。

莫非中國人不懂得團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將近百年來呼籲團結的言論匯編成冊，其篇幅可能與一部辭海不相上下；如果你向周圍的同胞訴說團結的道理，可能發現對方比你懂得更多。中國人並非不懂得團結的好處，只是找不到團結的有效途徑而已。

是否中國人的確像柏楊所諷喻的那樣會受到歷史的詛咒？如果確是這樣，那麼一部份人可能安於天命，但也有少數人會想，難道我們真的不能找到解開歷史詛咒的秘訣？

中國人的團結史是令人沮喪的，但不甘於命運安排的人會這樣反思：

既然中國人並非不懂得團結的道理，是否以往尋求團結之道的人們在方法上、路向上出了差錯？我們是否可以試圖改變方式尋找到新的出路？

如果這種思路有啟發性的話，那麼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未知的但誘人的新天地。

幾年前我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曾提出過這樣的見解：

工程學上有個重要的常識概念叫「因材設計」。一個工程師應該按照現有的材料來設計他的建築藍圖。同樣道理，如果認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又無良策改變這種狀況，就不妨嘗試按照一盤散沙的特性來尋找其凝聚方式。物理學常識告訴我們：各種物質的凝聚方式及條件是各不相同的。中國文化的特質決定了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是氣態結構，而日本民族是金屬結構。試圖將日本人的團結經驗移植到中國人身上是徒勞無功的，應該另闢蹊徑，尋找適宜中國人凝聚的方式和條件。

經過近一兩年來的研究，我發現影響中國人團結還有如下一些因素：

一、中華民族從文化整體上看缺乏宗教信仰，又沒有日本民族那種權威主義傳統，精神深層上缺乏終極領袖的情懷，民間文化層面雖有多種宗教存在，但缺乏威懾人心的權威性。精神界這種多中心即無中心狀況，影響到文化心理上，較容易產生誰也不服誰的現象。

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看，世界上幾個團結性較強的民族都有單一的宗教信仰或崇拜偶像。

因此從文化心理上來看，中國人註定了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這可能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起碼是個很難逾越的障礙。

這個見解是冷酷的，令人沮喪的。但並不等於我就同章極端悲觀主義者的結論：「中國人是不可能搞好團結的。」我認為應抱着這樣的心態：在承認有先天性缺陷的基礎上，尋找與眾不同的方式，或許能另創一番新天地。或者說，我們應像一些傷殘人士那樣，不甘命運的安排，我們準備作出比別人更多的勞動，忍受更多的苦楚，但我們到底是可以成功的。

二、中國人的獨立生存能力較強，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也較強。從維持基本生存需要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對團體的依賴性不強，因此對團結沒有很強的需求感、迫切感。

三、以往歷次大大小小搞聯合搞團結的嘗試，對於大多數當事人來說，未受其利先受其害，使不少人心灰意冷：「靠自己也活得不錯，何必要去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這是相當部份人的心境寫照。

四、中國人在現實中沒有面臨亡種亡國的危險，因此沒有一種強化團結的外部壓力。大家知道，當面臨生存威脅時，內部團結是較易解決的。

五、應當注意到，中國人的團結問題被重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與這個時代的大背景

分不開的。這個大背景是：西方文明衝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念在崩潰中，中國人並不能完全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但自己又未有能力創造一個新的價值觀。在這樣一個社會失範的情況下，註定了一個民族會長期處於內部混亂的狀態，搞好團結並非易事，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二)

中國人要想在團結問題上有所突破，首先在觀念上有所突破。過往中國人團結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熱衷於搞唯我獨尊的團結。我們常看到一些人，他們其實熱心的是否併別的勢力。他們希望出現的是「以我為中心」的「團結」局面，但缺乏「自己要活下去，也讓別人活下去」的心態。我們常見到這樣的現象：不同的團體之間，在規模還很小時，或許能勉強互相容忍，大體上相安無事；但發展到稍具規模時，大一統的心態就顯露出來了：要麼千方百計把別的團體兼併，要麼絞盡腦汁把別人除去而後快，總之不能容忍別人的分庭抗禮。這種現象，在觀點立場越接近的團體之間，出現得越頻繁，鬭爭得越兇狠。對於這種「近緣狼圍」現象，社會行動科學家的研究認為是一種人類劣性的表現，不過在中國人中間表現尤其

。我們今天所追求的大聯合，不應是大魚吃小魚的聯合，而時平等相待，互敬互讓，求同存異基礎上的聯合。這點認識，強勢團體尤其要注意。不能以「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這種理念會輕易抹煞別人的合理權益，應注意既要照顧整體或多數人的利益，又要照顧個體或少數人的利益。

在組織大聯合的問題上，我覺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派觀點組織的大聯合經驗值得借鑒。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會記得，一個地區同派組織大聯合的過程中，一般來說事

先並沒有要求取消原有的小組織，而是在原有小組織的基礎上協商生產大型組織新的領導機構，由於形勢的發展往往由大型組織的領導機構發揮主導作用，這樣，原有小團體的作用就逐漸名存實亡了。這種逐漸的組織聯合方式，今天對我們還可能適用。

另外，日本自由民主黨的聯合經驗亦值得我們借鑒。日本自民黨也是由幾個小黨合併而成，它能成爲戰後幾十年的執政黨，其黨內活動規範化自有其成熟之處，我們應組織專人研究其經驗。

(三)

中國人團體要搞好內部團結，在處理人際關係問題上有些觀念與方式需要重新改弦換轍，否則，團結只是句空話。

一、中國人在心理上普遍未能適應現代社會中契約關係的需要，處理人際關係仍承襲人情社會的處事方式。其表現爲：

(1) 不習慣用成文法作規範人們行爲的準則，許多重要問題都沒有明確界定，當發生內部衝突時，就難免爭吵不休了。

(2) 交待別人辦事，不習慣按契約社會「先小人，後君子」的準則處理，礙於情面，不願把壞話說在前頭，期待別人去自我領悟。由於事先沒有把權責，可能的獎懲說清楚，到出事時鬧得很不愉快。

(3) 對別人有滿意意見，不願意當面或在會上指出，習慣於背後隨便講，傷害了同事間的感情及和睦關係。由於背後搞小動作的風氣瀰漫，結果陰謀政治盛行。中國人花在揣測別人意圖、防範別人陰謀上的時間和精力，比花在正常工作上的還要多幾倍。

二、我們常看到中國人團體中有這種現象：有的人熱衷於爭名譽爭權利，但如有機會讓他爭到手，他對應負起的責任和工作，並不熱心去完成。中國人常犯「內鬪內行，外爭外行

」的毛病，這可能與傳統文化中「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果」的教誨有關。

中國人要獲得成就感，首先要在他所處的群體中獲得名譽、地位，然後他才能做事。因此，中國人將相當多的精力消耗在爭名份上，而不是在做事上。這種「攘外必先安內」心態，應當拋棄了。

猶太人、日本之所以能有大成就，關鍵在於他們並不是首先在內部爭名份，而是將精力首先放在拓展生存空間的事情上。當他在對外擴張事業取得成就，他的團體自然給予他相應的名譽。這是一種良性循環的過程。等人們集中精力於對外擴張事業方面，必然減少對內爭執的興趣，將內鬪減到一個低水平。中國人應學會這一點將熱衷爭名份的心態轉變爲熱衷向外擴張事業的心態，待取得成就後，再回頭在團體內爭取名譽。這方面，中共的趙紫陽、萬里；國民黨的王惕吾、余紀忠；民聯的吳方城、余叢都是好例子。

三、中國人搞團體，往往只注重於拉幫結派和權力分配，對章程的制定、內部制度的設立，不甚重視，在授權前，不注意設置機制，對領導人進行有效制衡；在授權時不主動積極監督。礙於人情時，不願經常檢查當政者的行爲是否端正，除非與他有積怨。中國人對待領導者往往採取極端主義的態度：要麼放任不管，要麼徹底打倒。當權者之所以幹壞事的嗜量越來越大，相當程度上是在授權者的放縱下逐漸崩壞的。

(四)

在組織設計上，應該怎樣做才有利於團體內的團結呢？

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可以概括爲如下幾點：

一、提高法治水準——以往中國人團體內經常紛爭不已，其實是由於這些團體內部法治

措施不完善，還停留在中國傳統的人治氛圍中。換句話說，是在現代政治的軀殼中，保留着傳統政治的靈魂。

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團體所定的章程中，往往權責不清楚，是非界定不明確，有的條例甚至為人治提供合法化依據的。由於法治水準不高，內部紛爭不已是順理成章的事。唯有提高法治，才能消除混亂。

二、實行分權制衡的原則——除了三權分立外，還應設置這樣的分權原則：「有權的沒錢，有錢的沒權」。即：有行政權的人沒有財權；有財權的人沒有行政權。美國是由國會而不是由總統來控制國家的財政權的。

民運團體的歷史經驗表明：掌握最高行政權的人同時擁有財政權，這個團體很容易受到這種優勢人物的脅迫，甚至誘發極大的內部動蕩。民聯四大之後，由於採取了分權制衡的措施，雖然也發生過內鬪，但與過去相比，內鬪造成的危害性大為降低了。實踐證明：合理的權力配置，是減輕內鬪危害性的有力措施。

三、在政治權威上，應該設計為虛君制，即是：有最高名份的人沒有行政權，有行政權的人沒有最高名份。這種設計，是特意逆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文化心理而動的設計。

為什麼我認為需要設置這種機制呢？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最高名份的人通常都擁有最高行政權。這種雙重優勢與「真命天子」的傳統思想交織在一起，特別容易使當權者忘乎所以。如果改為虛君制，使有最高行政權的人在心理上感覺還矮人一截；有最高名份的人用權沒有那麼得心應手，可能有助於改變濫用權力的傾向。虛君制的設立，實際上就是在最高權力層設置二元機制，以便自動制衡。在新舊政治文化轉型期，這點有特別的積極意義。

(五) 要搞好一個團體內的團結，領導者的素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領導者處於主導地位，他

的所作所為是影響到全局的，因此對領導者的個人素質要求比其他人更高。我認為，領導者的修養起碼要達到如下幾點：

一、不要派性太強——派性強的人往往排斥性強。他可能工作能力很強、效率很高，但心胸狹窄，目光短淺，容不得異己。熱衷於搞拉一派，壓一派的小動作，日久天長，會積怨過深，不利於團體內的安定團結。在這點上，民運團體宜作「寧要弱君，不要暴君」的選擇。

二、要善於團結大多數人一起工作，對於互相積怨很深的幹部，要善用智慧處理好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分配工作時注意拉大他們之間的距離，減少磨擦機會。

三、要注意利益平衡分配——一個團體內

雖然不可能做到絕對平均的利益分配，但大體上的均等，差別不太懸殊，這是領導者需要時刻注意的問題。

以上簡略地從聯合前後的觀念上、組織架構上、人際關係上、領導素質上討論了與團結有關的一些細節問題。這些問題不但關係到目前要推行的組織大聯合，亦關係到重塑民族政治文化的問題。因此意義是深遠重大的。

寫到這裡，我們不妨作這樣的猜想：達賴喇嘛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領袖正在旁邊默默地注視着我們搞大聯合的進展，他們正在心裡盤算着：如果你們這些中國大陸民主派都不能搞好自身的團結，怎能奢望着你們所鼓吹的聯邦制能給我們帶來實在的好處呢？▲

新書徵訂

丁楚《民主運動的孫子兵法》

民主中國書林推出丁楚先生的大作：
《民主運動的孫子兵法》(定價六美元一冊，
郵購包括稅費六美元半)。

丁楚先生任《中國之春》主編，下筆犀利，立論精闢，其大作近年傳遍海內外。為配合“六、四”週年紀念活動，民主中國書林特將丁楚先生的專集付梓印出。欲購者支票抬頭請寫：Democratic China Books
勿忘地址為：870 Market St. 914,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291-9951

拍一



合即



人民公僕

特權種種

在中國大陸，公僕關係是顛倒的。所謂的「人民公僕」，有着明和暗的各種特權。

中共黨章和大陸和憲法裡明文規定，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人民是國家和主人。
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我們只要分析一下社會財富和幾個分配渠道，就不難發現在這個社會中，公僕關係是怎樣顛倒過來的。

投資、信貸是官僚牟利的資本

國民收入的分配，以「國家財政預算」的形式，到人民代表大會去走走過場，然後錢便劃到政府的各個部門。如農業投資，劃給農村經濟工作委員會，工業投資，劃到經濟工作委員會。工業投資一般數量較大，還得進一步分到各個職能部門，如冶金的投資，得到重工業的管理部門工業局類似的機構，食品行業的投資分給食品工業辦公室，然後再往下分。
以工業投資為例，輕工中的食品行業的投資，分配到食品工業辦公室後，往下便是各企業。在大陸，往往是僧多粥少，要錢的企業多

歡迎標至同下基層!



歡迎檢查同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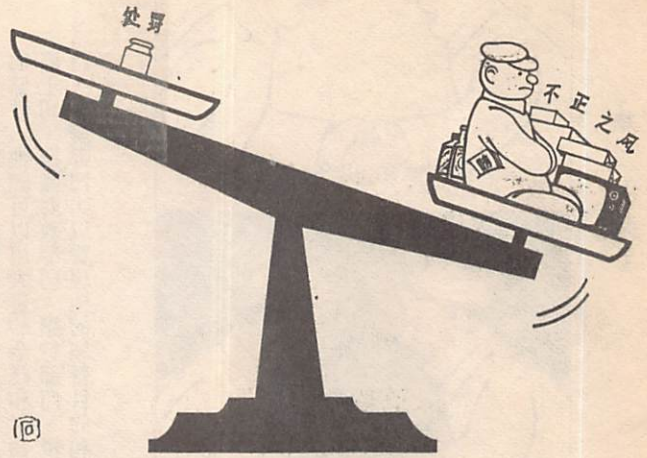
(香港) 劍峰

要的數額也大。投資額少於企業的數額。錢分到最低一個管理部門之後，給誰，不給誰，給多給少，也有一套報批審核的程序。在裡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根據投資後對掌握投資的實權人物的有利或無利，或者利大、利小來決定。
如一個省有五十家食品加工的企業，一個年度國家投資五百萬圓人民幣作為技改資金。從同行業競爭的角度，每家都需要錢，那麼給誰呢？有的可能得一百萬，有的可能得二十萬，多數企業可能是一點也沒有。關鍵是看企業的領導腦筋是否開竅和膽子的大與小。辦法就只有一個，收買投放資金的主管官員。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直接收買如食品辦的主任；另一條是收買他的頂頭上司。由上司給他打招呼，把投資給某個企業。或者干脆雙管齊下。怎樣去收買呢？一種是物資，彩電、冰箱、錄相機、茅台酒……有的干脆送現金。數百圓、數千圓、數萬圓不等。數量的大小取決於投資額的大小。至於物資的來源或現金的來源，收受者可是不管的，收後沒有任何字據，也無法查證。由企業負責人自己相辦法處理。當然「羊

毛出在羊身上」。膽小的，沒有門路和辦法的企業，國家也就不會有投資給它。
一項投資的落實到企業，往往要經過好多個部門的審批，每經過一個關卡，就得扒掉一層皮，錢最後到企業的帳上，在未到之前就已經預支出去一部分了。
至於錢投下去後是否有效益？是否能夠收回？發放投資的人可是不管的，因為資金是企業使用。使用的情況好壞，是企業自己的事。發放投資者只是一個是否慎理的問題。由於企業及整個經濟環境是處於一個動態中，情況千變萬化難以說清。加上一筆資金的投放涉及到許多個實權人物，即使投下的錢沒有任何效益或收不回來，也無法追究投放經辦人的責任。
銀行部門對貸款的發放也大致如此。貸款給誰，不給誰，並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根據企業的需要來定，而是看誰在貸款時，除承諾償付由國家規定的息而外，是否另給多少物資或者現金。仍然是收受物資或現金後不給任何字據，願者上鉤。很多有發展前途的企業，因為無法弄到生產所必需的資金而陷於癱瘓，甚至瀕於破產。
投資和信貸成了中共官僚牟利的資本。

基建、緊俏商品成了中共官僚獲利的財源
在大陸，基本建設投資的使用，是一個中共官員爭着幹的事，因為它是肥差，是致富的財源。
基建一般分為土建和機械設備的購置、安裝等等。
在大陸、房屋修建工程隊許許多多是個體或集體經營。像這樣的工程隊，其主要的特點是財會上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即財會收支可以不建帳。這一特點給工程隊的負責人（也叫包工頭）用大量的金錢進行賄賂提供了方便。方法簡單、方便，但又保險可靠。在造預算時，對所需的建築材料和輔助材料，從數量和單價上適當增大，人工工作量也增大，這樣，使房屋的實際造價高於實際需要的造價。然後用高出的部份中的一部份去收買基建的主管負責人

要的數額也大。投資額少於企業的數額。錢分到最低一個管理部門之後，給誰，不給誰，給多給少，也有一套報批審核的程序。在裡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根據投資後對掌握投資的實權人物的有利或無利，或者利大、利小來決定。
如一個省有五十家食品加工的企業，一個年度國家投資五百萬圓人民幣作為技改資金。從同行業競爭的角度，每家都需要錢，那麼給誰呢？有的可能得一百萬，有的可能得二十萬，多數企業可能是一點也沒有。關鍵是看企業的領導腦筋是否開竅和膽子的大與小。辦法就只有一個，收買投放資金的主管官員。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直接收買如食品辦的主任；另一條是收買他的頂頭上司。由上司給他打招呼，把投資給某個企業。或者干脆雙管齊下。怎樣去收買呢？一種是物資，彩電、冰箱、錄相機、茅台酒……有的干脆送現金。數百圓、數千圓、數萬圓不等。數量的大小取決於投資額的大小。至於物資的來源或現金的來源，收受者可是不管的，收後沒有任何字據，也無法查證。由企業負責人自己相辦法處理。當然「羊



關鍵在何處

，以獲得工程的承攬權。

在承攬建築權的爭奪中，競爭是很激烈的，除了建築隊伍的技術信譽外，主要是看誰為承攬權付出的代價大。也有一個招標承攬的程序。也有一個審計的程序。但實際上包工頭所收買的不僅只是基建主管的負責人，連建設管理部門的有關人員，甚至連確定資金投放部門的有關人員都得收買。數額的總和佔整個基建投資額的百分之五—十五。收受者仍然是不出據任何字據，出問題查無證據。

在基建投資的另一項主要支出，設備機器的購置上，也存在着相同性質的情形。在設備機器的購置過程中，由買方按設備機器的實際價格多付給賣方一部分錢，然後賣方把買方多付的錢抽出來，返回給買方經辦的個人。在大陸稱之為「回扣」。「回扣」在個體或集體性質的企業裡，僅財會上很好處理。一些國營大企業財會上較健全，不好處理類似的帳目，但大企業可以拉住一些小企業，由大企業提供主

機設備，小企業提供輔機設備。然後由小企業書面來辦「回扣」一類的事。

在大陸，一些緊俏商品，如一段時期內建築上所用的鋼材、木材、水泥、家電當中的彩電、冰箱等等，由於社會上緊缺，因而國家計劃價低，市場上議價高。又由於兩種價之間有一個較大的差額，因而在緊缺物資上，從開始作計劃到商品的發出，每經過一道關卡，都要給主管人員一定的報酬方能通過。

火車、飛機也是中共牟利的工具

在中國大陸，長途的貨運和客運主要是靠火車。由於貨物運輸量和旅客運輸量都很大，因此鐵路運輸是運輸部門中最繁忙的一個部門，同是也是舞弊情況最多的一個部門。

在貨運中，根據不同的運輸鐵路線和車站，每個五十噸或者六十噸的貨車廂，收「好處費」二百圓至二千圓人民幣不等。如果沒有「好處費」，用戶可以報申請，報使用數量的計劃，但報上去後，將會永無消息，每次推問均會得到沒有車皮的答復。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潤滑劑」（即好處費）。

火車票也是那些握有實權的人致富之來源，「六·四」前，一張從廣州至北京的硬臥車票，按規定價六十多圓人民幣，但從售票窗口買不到。從票販子手中買一張得花人民幣貳百圓。與之交談，得知他是「三道販子」。第一道是售票人（鐵路部門）拿給廣州當地人。廣州當地人為第二道販子。然後再拿給外地（如東北、四川等省人民）人。外地人為三道販子，這樣，雖經幾次倒手，利薄一些，但對第一、二道販子來說都是既省事，又安全，可以薄利多銷。

飛機在大陸是最高檔次的交通工具，票價較貴，但由於有速度快，省時、省事特點，掌握機票的人也是不可低估的富翁。我所知道的從某大城市到廣州，每張機票比規定價高人民幣五十圓。一架波音七三七，可載旅客一百六十名，每航班有八千圓的額外收入流進私人的腰包。當然實際情況會少一些，因政府要人乘坐是沒有人敢收取額外費用的。

飛機票額外費用的收受很巧妙，且頗費周折。售票窗口有的不直接賣機票，而是憑售票處預先發給的紙條進行售票。飛機票同其它的票不同。要憑證件登記。並把乘客的姓名填寫上，這就使得票販子不能預先把票買出來再進行倒手。於是就設計了先排隊發紙條，然後憑紙條售票的辦法。票販子把紙條買出來肯定是先付給發紙條的人一次錢，然後在把紙條轉賣給旅客時除了收回他付出的錢外，再加上他的「辛苦費」。兩筆費用的價值就是那張紙條的價值。

火車票、飛機票的加價倒賣，雖然最終是由票販子來完成，但根源於掌握這些票的幹部身上，沒有這些幹部利用職權謀私，僅是票販子是無法做這樣的生意的。

「企業承包」使非法的東西合法化

在大陸，隨着中共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共把農村中實行的一家一戶承包經營的方法引用到工業企業的管理中來，實行「企業承包」。把屬於國有的企業通過目標承包的辦法，承包給企業負責人個人經營。以圖把企業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經營狀況較為密切地聯繫起來，從而有利於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經營積極性，使企業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願望的似乎不錯，但實際又是怎樣的呢？

一、企業承包給企業主管單位的負責同企業的負責人在經濟上的相互勾結提供了可乘之機。

企業承包分兩種類型：一種是定盈利或者虧損指標（企業條件差的定虧損指標，減虧視為盈利），然後按照經營情況的好壞對企業承包人進行獎懲。另一種是實行包幹，每年上繳利潤多少或者減少虧損多少，上繳盈利後的乘在餘部份或減虧的多餘部份歸承包者；虧損或超過指標的虧損由承包者賠償。以上兩種類型，無論哪一種情況，都給企業的發包人（主管單位及負責人）和企業的承包者（企業負責人）提供了經濟是相互勾結，非法牟利的可乘之機，使非法的東西合法化。原因很簡單，問題出在經濟指標的制定上。因為指標是個有彈性的東西，它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尺度，也可以



第二次握手

高，也可以低。雖有招標的環節，但誰都知道，中國是個關係決定一切的社會。如果與企業主管單位的負責人沒有較好的關係，即使把企業承包過來，也會在經營中遇到許多節外生枝的麻煩。最終以經營上的失敗告終，或者向主管上司進行賄賂，補上經濟勾結一環，才會可能善終。

二、承包後的企業，使經營中的非法行為為合法化企業承包後，使企業的所有權（為國家）與企業的經營權（屬企業）發生了分離。這樣使國家對企業的指導和監督削弱。因為承辦人只承擔合條款上的義務，日常經營活動則由承辦人獨立自主的經營。隨着企業自主權的增大，企業負責人對企業內的生產、經營、財會等方面的支配權處於主宰的地位。特別是實行包幹承包的企業，更是可以任所欲為，基建上的開支是否合理、成本核算是否真實……其它人均無權過問，給企業負責人貪污、賄賂等不法行為開了政策上的綠燈。由於企業承辦人具如此便利的條件，他們可以用大量的金錢和財物去賄賂上司、賄賂財政部門、銀行部門、稅務部門、物資部門，以實現他的經營目的和個人目的。

三、承包後的企業，工人不僅喪失了管理上的參與權和監督權，而且還會喪失工作的權利。

企業承包的一個主要內容，是人事自主權。即承辦人有權組客，決定企業的領導成員和聘用、辭退工人。大陸由於人滿為患，勞動後備軍比比皆是，給企業承辦人任意辭退職工提供了可能，因為辭退後可以隨上招用其它人。

四、承包後的企業，工人被剝削加重。承包後的企業，企業承辦人可以決定企業內部的工資形式（計件工資或計時工資）和工資數額的高低。在勞動市場競爭劇烈的情況下，工人雖然是低工資，高勞動強度，為生計，也員有被迫地幹下去。這樣受剝削的程度必然加重，而且還沒有反抗的權利，中共是不允許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的。

下面我們再看看中共在教育部門、醫療衛生部門、工商稅務部門、司法紀檢部門、組織人事部門裡，形形色色的實權人物又是怎樣以權謀私的呢？

在大陸，為校能够招收的學生數量和實際需要接受教育的人的數量差距很大，讀書人學競爭是很激烈的，考生為了進入一所好的學校，為一個好的事業，除考試成績之外，也得走後門，拉關係。有些分低不錄錄取分數的學生，要想進學校大門，更得花費錢財。入學如此，學生分配時更是如此。對學生來說，畢業分配比什麼都重要，因為在大陸人們工作的地點和工作單位是不能自由選擇的。分出學校後，要改變是很難的，所以學生和學生家長把學生的畢業分配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為使學生能够分配在大城市和好的單位工作，多大的代價都願意付出。很多人還苦於無門路送禮。

醫院是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光顧的地方。大陸的國家幹部都是實行公費醫療，看病不用自己掏錢。那種無病裝病，小病大養的情況是常有的。病人去醫院看病有個給好藥和

以權換錢和以錢換權

給差藥；批准住院和不批准住院；住高級病房和住差的病房；是高明的醫生看還是醫術差的醫生看；是一般馬虎了事還是精心治療，這些都同患者與醫生或醫院的實權人物關係的親疏有聯繫的。關係的親近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有的干脆與親戚朋友勾通，把醫院的藥品用公費醫療證明開出去轉手倒賣。

工商稅務部門在大陸是油水充足的部門，因為它們所管理的是工業廠礦、商業企業，各種各樣的個體戶。允許生產、經營什麼和不允許生產、經營什麼以及違紀違法的情況的處理，是工商負責。生產經營稅及各種各樣的稅，是由稅務部門負責收繳。工礦企業、商業企業及各種個體戶，為了獲得某種商品的生產經營權或違紀違法後得到庇護及偷稅、漏稅等，必須對工商稅務部門的實權人物進行賄賂。而且數額還必須很大才有效。

司法、紀檢部門在中國大陸也不上「清水衙門」。打官司在中國從來都是「堂堂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花錢與不花錢不一樣，花錢多與花錢少不一樣。根據有錢、無錢或錢多、錢少，大事可化成小事，小事可化成無事；反之小事可化成大事，無事也可變成有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在中共的司法、紀檢中比之皆是，貪贓實法大有人在。同時還有黑電話「斬紅吃黑」的手法。以抓賭為例，從賭徒身上和賭桌上沒收的錢，當場不計數，收去後經辦人私分一部分，只上繳一部分。賭徒誰敢聲張，如要告發，不但查無實據，而且還會招致輕則皮肉受苦，重則牢獄之災。真可謂求財有法。

組織人事部門由於操有決定幹部升遷，國家職工聘用，辭退的大權，亦是不可低估的實惠部門。在中國大陸，中共的官員不像西方國家的官員，公開站出來競選，說自己能擔任什麼職務，並且發表自己的施政綱領，以獲得民衆的支持，選擇上台，中共的官員是由上級任命的。官位是權力的代名詞，誰有官職，誰就有權，誰就獲得了生財的機會，因此在官職的爭奪上，幹部之間極盡鑽營之能事。除了政治上相互傾軋外，把金錢、物資作為求官的「潤滑劑」，去籠絡組織

部門的權勢人物，以求得自己的升遷。一般百姓參加工作或者調動工作，遷移戶口，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我認識的一個朋友，在某大城市，從街道派出所調到區公安局，花了一千多圓的人民幣作為「潤滑劑」方才實現了調動。北京按有關政策，父母身邊沒子女，調一個子女到身邊照顧老年人，亦花了六千圓人民幣方才打通各個關節。進入了北京。許多人由於方法不當，或財力不夠，付出一一定的代價後一無所獲，官司都沒有地方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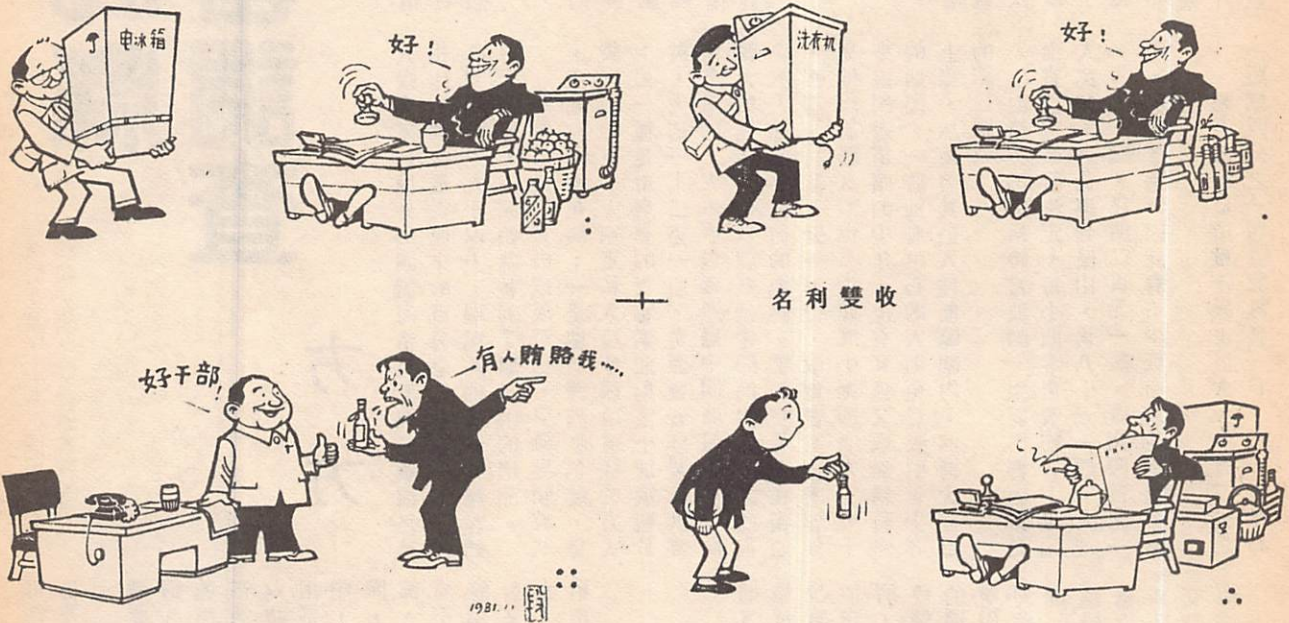
在中共代表社會掌握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公有財產亦成爲了官僚間權力之爭的工具。我認識的一位在企業工作的朋友，他的上司間爲了權力之爭，活活地拖垮了一個企業，這位朋友的上司或支持者是一個外來幹部，這個上司的對立面是一個地方幹部（地頭蛇）。這個地方幹部爲了打擊這個外來幹部，通過他在銀行部門的親信。從資金上卡住這個企業脖子，由於這個企業沒有進行生產所需的資金，最後活活被拖垮。實權人物爲了挾持某個企業，保住某個幹部和地盤，鞏固他的勢力範圍，哪怕沒有前途的企業，仍可以

「肅貪」——賊喊捉賊的醜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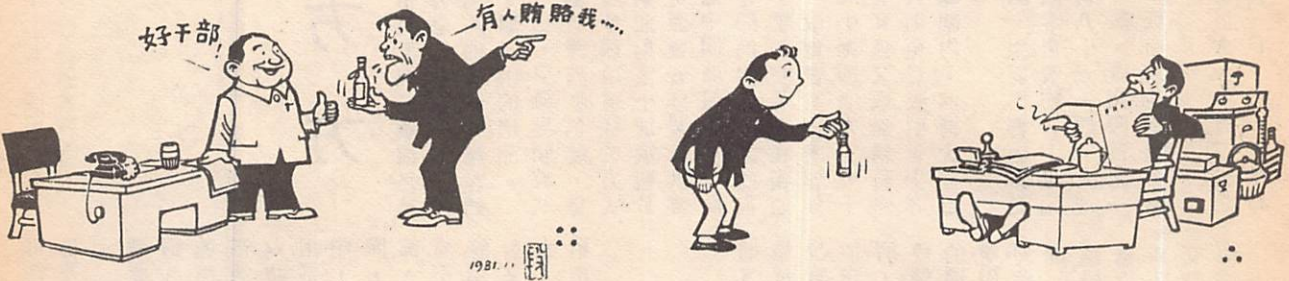
中共特權階層的實權人物，各級都在以權謀私。特別是較有代表性的「官倒」，賣「批文」，賣緊俏商品的計劃指標，倒賣緊俏物資……結果增加了流通的中間環節，增大生產成本，拱抬市場物價。並用以權換來的錢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使兩極分化加劇，導致了人民普遍的不滿，終於釀成了席捲中國大地，震動世界的「八九民運」。「八九民運」被中共用坦克、機關槍、裝甲車鎮壓下去後，中共爲了平息民憤，上演了一場大貪污反小貪污、大官倒反小官倒、大腐敗反小腐敗，借肅貪整肅政敵的醜劇。

要說中國大陸的腐敗，最大的腐敗是政治權力的腐敗。「官位世襲」制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產物。

說到「官倒」，國務院下面四家部一級



名利雙收



的公司是全國最大的官倒，康華公司爲首。誰反得了？「六·四」後，爲了平民憤，使問題消失，干脆把公司撤了，現在不敢查，今後也無法查。中央級的如此，省、地、縣一級的也是如此。凡是有強大政治後台的經濟案件，都是沒有人敢去深究的，只是把那些問題較明顯的，又沒有實權人物庇護的人，推一部分人出來裝裝門面，掩人耳目。

在反貪污、受賄的同時，又發生新的貪污、受賄。因爲那些以權謀私的人，利用職權，非法牟利。當有人提到他們的問題的時候，趕緊用錢賄賂有關人員，把問題掩住。如一個朋友告訴我，某省某地區的一個駐外辦事處主任，與一家酒廠的廠長相勾結，倒賣該廠的產品，非法牟利不下百萬，已是公開的秘密。但由於該地區不少的領導因爲收了這個辦事處主任的錢財，成了這個辦事處主任的「關係戶」，即庇護人，沒有人敢去查這個案件，怕牽動一大串。不僅如此，這個辦事處主任還花錢買通了「關部門的辦案人員，把一樁由他所主謀的涉紀經商案件，責任推到他的一個合伙人身上。他獲了利，而這個合伙人分文未得，反而成了替罪羊。這類的例子，在大陸是很多的。

大陸的每一次運動，都給官僚政客們提供了打擊政敵和排斥異己的機構，如中共「六·四」後把趙紫陽改革派的人物海南省省長梁湘，以其經濟上的問題爲借口，撤掉了他省長的職務。還是知名度較高的例子。知名度不高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六·四後中共的肅貪運動，在實質上是一場賊喊捉賊的醜劇。中共的幹部隊伍腐敗，不是個人的問題和現象，而是由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一種普遍現象。無論外表口號喊得多響，調唱得多高，都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要腐敗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而且還會愈演愈烈。

經過相對全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實質上是「中共特權階層所有制」。要根除社會腐敗現象，首先必須廢除生產資料的「中共特權階層所有制」。

雲南瑞麗縣 吸毒調查

方方

近幾年來，毒品，這個世界性的公敵已悄悄地侵入了中國大陸，並在中國的某些地區蔓延泛濫開來。其現狀之嚴重，已超出人們的想像。

雲南省瑞麗縣，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地區，它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它直接面臨着來自境外的毒品的威脅。全世界知名的毒品生產基地「金三角」的腹地雖然主要是在緬甸、老撾、泰國三國交界處，但也有人認為，緬甸東北部山區大部均可劃為「金三角」地區。中國雲南西南邊境一帶與金三角地區邊緣緊緊相連，而瑞麗縣更是三面受圍。

毒品來源：鴉片與海洛英

瑞麗縣流行的毒品為鴉片和海洛英兩種。鴉片是傳統藥物，在雲南省的吸食歷史估計有百餘年之久。而其中又以雲南所產者最佳，號稱「雲土」，為鴉片中之精品。解放前這裡吸食鴉片成風，稍有餘財的家庭都要設置烟席以招待來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五十年代初期實行強硬的禁絕措施，是日鴉片流毒中國以來禁絕最徹底的一次。但這裡並未完全禁絕：因為烟毒來源容易，邊民們在邊境兩邊來去自由。因此仍有少數烟民在偷偷吸食鴉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瑞麗開始有少數

人吸食來自境外的四號海洛英。與三號海洛英相比，其含量從原來的百分之五左右一下子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瑞麗縣的海洛英癮客們得天獨厚，一開始就嘗到了烟毒中的精品。

四號海洛英為白或淡黃色，呈疏鬆顆粒狀，主要有兩種包裝：一是塑料薄膜軟包裝，每袋五〇〇克，大宗走私入境多採用這樣的方式；另一種是用廢棄的青霉素注射液小玻璃瓶分裝，大約一—二克一瓶，是販賣者分裝後供零售之用的。大宗販賣者通過中間商轉手，一個較大的窩子往往只對幾個中間商出售，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其確切的地點。零售交易多在街頭、路邊、村落、野外進行，販賣者有背着嬰兒的民族婦女，也有街頭擺小攤的老人；有十來歲閑遊街頭的少年，也有又吸又販無精打彩的烟民。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免費吸引青少年上癮，然後將其納入控制範圍內，以擴大自己的銷售區域。

海洛英的價格時常波動，主要影響因素是由查禁寬嚴所決定，每小瓶零售價約廿—卅元人民幣，若偷運到保山、售八十元一瓶、大理一百元一瓶、昆明二百元一瓶、廣州四百元一瓶，利潤暴漲，因此有不少玩命之徒不惜冒險。

癮客的每日用量差異也很大，少者二分之一瓶或四分之一瓶就能維持一日，最多者每日

可吸食五小瓶，也就是說，經濟上每個烟客每日要為此開銷五元、十元至一百多元。

藥物進入體內的主要渠道為吸入、食入和靜脈注射三種。鴉片為吸入或食入，用烟槍或烟斗吸入，或者用芭蕉葉與鴉片一同熬製再晒乾後用水烟筒吸入，也有人燒製後食用的。海洛英多是裝入紙烟內吸入，邊吸邊塗抹唾液，以防過度燃燒。吸食時間一長，則往往開始採用靜脈注射給藥，多是癮客自己注射，技術高超，一針見血，左右開弓。開始時注射四肢靜脈，當注射過多四肢血管關閉以後，則尋找頭部、頸部甚至陰莖陰囊部血管注射，自己視綫看不見的地方則照着鏡子注射。注射用針頭針管毫無消毒措施，隨身攜帶，隨時啟用，且一人針多人換用互用，注射用水也是因定制宜，井水、雨水、河水甚至自己的小便都可用來當注射用，因此常有傳染、感染的情況發生。

吸毒上癮的原因

在瑞麗，癮君子們被稱為「烟鬼」或「大烟鬼」。有三種原因會導致上癮：(1)因某種軀體或精神上的痛苦未得到現實地解決時；(2)因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其享樂需求時；(3)誤服或並無特殊目的者。第一種途徑的癮者，多因生病、受傷或遇到精神危機而用毒品來解決軀體或精神上的痛苦，這是在毒品或吸毒相對普遍的環境中最容易採用的對策之一，吸毒可使其變得舒適、安靜、忘却痛苦和煩惱、暫時地得到解脫。有許多年輕的癮君子自稱是因為「玩玩」而上癮的。他們多是較富有且具有一定優越感的年輕人，喜好享樂，無責任感。一旦吸毒之後，他們便發現這是在現實中其它享樂都無法比擬的。第三種上癮者多是誤吸或是一社交性吸毒「而上癮的。當他們發現上癮之後已悔晚矣。

隨着癮癖的發展，烟民對毒品的依賴日復



昔日美麗的瑞麗，是否已被毒品污染？

戒毒的艱難

也有部份烟民真的戒癮了，但真正是自己出於自願的很少，多是由於家庭的壓力或社會的壓力促其戒毒，因此，戒毒常需要在外界的監督和強制下方可順利進行。當最後一次毒品攝入八至十二小時以後，開始出現軀體戒斷症狀，如周身疼痛不適，渾身冷熱交替發作，「冷雞症」、腹瀉等，此時患者表現得焦慮不安，求藥願望異常強烈。此時他們可編造各種理由脫離監護，伺機外出尋得毒品。在瑞麗，就是在公安機關辦的縣戒烟所還曾有過烟民揭瓦或破窗外逃的事件發生。在戒斷過程中，烟民們會在身上的某個隱秘部位藏匿毒品，或事先將毒品藏到某處然後再去取。有時托人把毒品包裹在小紙團內用彈弓射給戒毒者。在樓房戒毒，烟民們可用繩索將錢吊下去，下面有販毒者把毒品繫在綫上，烟民們再吊上來。種種辦法，超出人們的想像範圍。停止毒品攝入一至二週後，軀體戒斷症狀逐漸消失，但心理依賴仍然長期存在，甚至終身難忘。一個烟民在戒斷過程中曾說：要讓我在這裡忍受幾天是可以熬得過去的，但出去以後要我忍一輩子就難了。

復染率的問題在瑞麗未做過系統準確的調查，但據當地有關人士估計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到百分之百之間。據我們瞭解到的情況看，戒斷了的還是有，但大部份仍然是重蹈覆轍。

在瑞麗縣的流行病學調查表明，青年、男性、少數民族（特別是景頗族和傣族）、農民等特徵人群為吸毒的高危人群。農業人口中以吸鴉片者居多（百分之六十三），而城鎮人口中却以吸海洛英者居多（百分之七十三）；男性吸海洛英者高於女性（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四十四）；傣族、漢族海洛英吸食者多（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四十三）；景頗族總吸毒率雖最

一日的加深，其日常活動逐漸轉移到以吸毒為中心上來，毒品以外的其它事物均不能引起其注意或興趣，整個人完全沉溺於體驗和設法再體驗毒品導致的快感中。他們變得不能履行自己的各種社會及家庭職責，人也不修邊幅，精神萎靡，日益消瘦，面無血色。此時，家人、朋友、同事的勸說和阻止均已無效。他們在揮霍和吝嗇兩個極端上波動：為吸毒不惜一切代價；但對別人却極其吝嗇，哪怕是自己的親人或最好的伙伴。他們開始變賣自己或家裡的東西以換取毒品，有的開始違法犯罪活動，偷盜、賈淫、欺騙、挪用公款等。這時，烟民就成了十足的烟鬼，對毒品的依賴越來越深，而對毒品耐受性的不斷增加使毒品所能引起的快感越來越小，吸毒由追求快感轉為維持不致出

現戒斷症狀。癮客由吸毒的高峰期向下滑行，開始陷入矛盾和苦惱之中：弄不到錢，弄不到毒品，忍受戒斷症狀的折磨，被人們鄙視和遺棄的感覺……為此，他們也開始為自己的行為悔恨，但同時又不能抵禦毒品的誘惑而繼續吸毒，難以自拔。此時，他們的人格已完全敗壞，人性已被毒癮取代和操縱，身心疲憊衰弱不堪，社會信譽喪失殆盡，社會聯繫也降低到了最低程度。這時他們想擺脫毒品，重新做人的念頭開始閃現，但個人已難以左右自己的行為了。在平靜時對於吸毒的種種危害說得比誰都清楚，可一旦癮發，前面的誓言和詛咒便烟消雲散，毀之一旦，不顧一切又去找毒品過癮。當地群眾和烟民家屬對我們說：這些人的話是不能相信的，沒一句是真話。

，但海洛英吸食率却最低。另外，隨年齡增長，海洛英癮者逐漸減少而鴉片癮者逐漸增多。海洛英成癮很快，也很容易產生耐受性。有了海洛英那種特殊體驗的同時也就已經是上癮了。最初幾次吸用海洛英並不是很舒服的，多數人會感到頭昏、噁心、嘔吐、嗜睡等。有一位首次吸用者在吸了很小劑量後告訴我們，說他有射精後的感覺，渾身軟弱無力，有些飄飄然。開始上癮的標誌是欣快感的產生，但從「難受」到產生欣快感之間的轉換是非常模糊微妙的，兩者之間難以分開。

鴉片在成癮和耐受性發展方面都較為緩慢，成癮前後的症狀與體驗也緩和得多，用後可感到消除疲勞、解除疼痛和軀體不適、精神不快，略有些飄飄然和頭暈的感覺。上癮初期的劑量可維持較長時間不變，其藥效維持時間也長一些。戒斷症狀不及海洛英那麼強烈，但要持久一些。

吸毒的社會危害

吸毒對於家庭的損害是最直接的。家庭成員中有人染上毒癮使家屬蒙受恥辱，還破壞家庭經濟、財產並威脅到家庭成員。

繼家庭受累受害之後，癮君子的人際關係開始遭到破壞，其基本原因是信譽的喪失，原有的人際交往模式很快就崩瓦解。為過癮，他們偷、騙，什麼手段都可以用，人們很快就「不顧、不屑、不敢再和癮客交往了。相反的是癮客和販賣者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癮客們的小團體在一定時間，一定程度上還保持着凝聚力。前一種交流完全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後一種交流則是圍繞吸毒而存在的，因為有着相同的價值觀，對於抵禦社會歧視起了重要作用，並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個體的行爲趨向。但小團體之中却常常因分毒不均而大打出手，因為毒品才是他們的真正主宰。最終，小團體趨於瓦解，吸毒者成爲單獨吸食者，潦倒窮困

，心身交瘁。

烟毒的流行對於社會的影響比之對個人、家庭的影響要來得間接而緩慢，但却廣泛而深遠。據瑞麗縣公安局估計，當地一半以上的盜竊案件均與烟民有直接關係，他們什麼都偷，小到瓜果蔬菜，大到拖拉機、摩托車，偷到後馬上脫手，使人民生活和社会治安受到極大威脅。而且，在烟民中間容易產生暴力衝突；烟毒流行產生新的烟民，刺激起毒品的生產和販賣活動，成爲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毒品泛濫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鴉片據信是在唐朝傳入我國，但廣爲流行是在清朝中葉。解放後雖然禁烟，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仍有極少數人未能完全戒斷。

二、因緣因素。瑞麗縣邊境沿綫與金三角邊境直接接壤，境外大片山林中均有種植罌粟者，且配有武裝保護。在畹町境外棒腮就有一海洛英加工廠，使之成爲一個大的海洛英交易地。毒品走私利潤極豐，使一些玩命之徒甘冒風險，當地一些居民也以此爲生，形成烟毒來源。而且，中緬雙方在毒品問題上也未能協調一致，因而造成販運或吸食的邊民哪邊癮就往哪邊跑。

三、治療、應急手段。這是傳統的吸毒原因。據民間認爲，鴉片可以治療咳嗽、腹瀉等疾病，至於精神因素的治療與應急，在一個毒品流行的環境中，爲人們所選擇也是可想而知。

四、模仿和社會學習。青少年中有很大一部份人就是因此吸上癮的。

五、素質問題。我們發現農村、少數民族中吸毒者較城鎮、漢族爲多，文化素質低下者吸毒也較文化素質高者爲多。烟民之中，大多是市井無賴之輩，他們吃喝嫖賭，五毒俱全，最終走向吸毒，以滿足其感官刺激的慾望。▲

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

江之楓著

由政治家邁向賭徒只需微挪寸步！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政治橋局中，陰陽謀的鬼牌出得如何？中共鐵幕後最高層運作又如何？本書作者將以其身居南海大內中的親歷見聞向您展示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紫禁城內那一幅幅風雲際會、詭秘多變、勾心鬪角的中共最核心機密。各篇章在台譯「中央日報」連載後，引起海內外轟動，專家們稱「此乃中共第四次大洩密」；高官們視其爲「認識中共高層體制運作的書」。承作者江之楓先生慨允，由「民主中國書林」出版海外中文及英文版。中文版已問世，數量有限，機不可失，欲購者請趁早將支票或美金匯票匯出。

支票（美國以外請用美金匯票）

書價：\$12.89

另加郵費 美國境內：\$0.90

抬頭：CPRA

加拿大：\$3.25

亞洲：\$7.37

地址：76-11 ROOSEVELL AVE BOX 162

歐洲：\$5.50

南美：\$5.50

JACKSON HEIGHTS N. Y. 11372

電話：(718) 507-4739

一個大陸戒毒醫師手記

幾年前曾有香港青年來大陸「自我戒毒」，現在，這裡已不是淨土，也建起了「戒毒所」。

唐冬明

陰差陽錯

說來好笑。我這個名牌醫學院藥物系畢業的碩士，竟搖身一變，成了位於這個南方小城的戒毒所的臨床醫師。我沒有任何抱怨的意思，因為這也是自己的選擇。我永遠忘不了三年前在上海華亭賓館的那個深夜，兩個面容憔悴，披著長髮的男青年手拿一百元外匯券向我討買香烟的情景。他們是來大陸旅遊，順便想對自己強制戒毒的香港青年。他們知道大陸是「無毒區」，有錢也買不到毒品，是「天然戒毒所」。他們關在房裡實在熬不住了，才想猛抽香烟緩和一下，可手頭却一枝烟也沒有。我把口袋裡僅有的大半包健牌香烟給了他們，沒有收一分錢。我對這兩位頗為坦誠的第一次見面者只說了一句話：「我是醫生」。

於是，我跑到靠近省府的這一縣城，參與籌建名為「藥物疾病醫療康復中心」的戒毒所。良心使我不假思索地答應了「組織上」的動員，當然，也順帶解決了我長達八年的夫妻分居的問題——這個小城是我妻子工作所在地。「水往低處流」我從上海調往此地遠比她調上海便當一百倍。我已經滿足了這個「天倫之樂」雖然現在我只能每星期回家一次，因為病人離不開；而且我還不能跟小學二年級的女兒說爸

爸在哪一家醫院工作，為什麼她不能到這個醫院去看我。她一看準怕，因為這兒有三道雙鎖的大小鐵門，還有高高的牆。

我現在才知道，我們這兒的同胞，同樣是青年，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的模樣要比三年前我見到的香港客更慘，他們也是毒品這個魔鬼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昔日的無毒區為何也造起了戒毒所。所以我開始記兩本筆記，一本是對病人的藥物治療筆記，另一本則是他們的病因筆記。病人們對我都很誠實。

對自己行兇的搶劫犯

這一位是從拘留所轉來的。那天，身無分文且烟癮難熬的他開始瞄準一家儲蓄所。可惜櫃台上的鐵柵欄難住了他。他把目標轉向隔壁一家食品店。光天化日之下他迅速沖到收款員身邊，把桌上和抽屜裡的鈔票全部抓進了己隨身帶的小書包。營業員和食客們全驚呆了，幾位身高力壯的正義之士站起來想把已經走到門口的他攔住，只見他「刷」地拔出兩把雪亮的匕首，左右開弓。人們自然地往後退，他舉起匕首，一刀向自己大腿上扎下，隨後倒在血泊之中……此時，他忍不住烟癮襲來，只好「放血」，這樣可以好受些。這裡好幾個病人

身上都有大小傷口。

搶劫罪算得上，行凶殺人罪却顯得勉強，而且又是毒品所致，於是，他成了我的第十二個病人。

他的大腿上的傷口極不平整。一看就知道在拘留所沒有得到及時清洗，包紮和治療。我常常教他按摩傷口，於是我們說得很多。他告訴我，他曾兩次參加高考未被錄取。他說他很崇拜大學生，而第一次糊裡糊塗被朋友拉去「嘗嘗」海洛英，正是在聽說北京死了好多大學生以後。「如果我考上了大學，現在肯定也死了。」他常常冷冷地說。

從「黑」到「白」的姑娘

這又是一個由於偶然原因而墮落的吸毒者。盡管海洛英在她白皙的臉上留下了戴灰色的沉澱，但仍然能看出往日俏麗的面容。她曾經是省內小有名氣的個體服裝設計師，兼時裝表演隊首席模特兒。她的吸毒從「黑」開始的，後來才上「白」。所謂「黑」，指的是鴉片，所謂「白」指的是海洛英。後者由前者精煉而成，價格更貴，但吸食更方便，不需要烟床，烟槍，一張鋁箔，甚至一個廢棄的易拉罐即可。從她在馬路邊替人裁剪縫製衣服開始，直

至成爲上了電視的服裝模特兒和服裝設計師，打交道最多的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稅務局。從科員，科長到副局長，局長，還有顧問，送禮的單子一長串。她從不遺漏。可是叫她想不通的是，明明他們讓她多送兩條外烟，兩瓶茅台酒，說是可少繳一千元稅，三個月後搞什麼清查，却又說她故意漏稅，罰三千元。她設計的服裝在廣州打出了牌子，晚報上剛剛報導了一條消息，當夜電話鈴聲不斷，兩個局長和八個副局長都在電話裡向她表示「祝賀」，還說了一通「有福同享」，「飲水思源」之類的話。她甚至想給他們每人每月發一百元「免騷擾費」，可是這些局長們又說共產黨不興這一套，望着銀行存款單上的六位數字，她真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些當官的。她常常感到無聊。省城所有好玩的地方她都去過，什麼卡拉OK，黑燈舞會，柔軟酒家，特別節目錄相室，可是回到家裡，總是剩下一種莫名的惆悵。

一天，一位中學時代的女同學約她去一個她「從未玩過」的新鮮地方。她不相信在這兒還有她沒玩過的地方。可是到了那裡，她一下子呆住了，在這頗爲氣派的花園洋房的二樓，有一間不大的房間，裡面排有約十張小木床，人們歪七歪八躺着，各人捧着一根杆子，呼呼嚕嚕吸什麼東西。滿屋烟霧，散發着一種奇香，可稱是真正的香烟。當時她腦袋裡一下子出現的是，電影《林則徐》中的鏡頭。記不清是小學還是中學看了好幾遍的老電影。那裡有官兵搜查烟館的場面。天哪！要是林大人活到現在……她的頭皮在發麻。女友却熟練地操起烟槍，燒起烟泡，勸她試一試，「包你什麼煩惱都消除」。不是說要上癮嗎？「不會」，女友告訴她，自己來這兒吸了好幾次，一點癮也沒有，想來就來，不想來就不來，自由自在。

女友說的不錯，抽了以後自我感覺蠻好。心曠神怡。她依然瀟灑，根本沒有電影裡說的那種烟鬼犯癮的狼狽相。後來自己又單獨去了

幾次，每次不過五、六元錢的化費，比一張舞會票還便宜。直到大約一個月以後，她才第一次烟癮發作！渾身發痛，發燙，天旋地轉。她抓住女友大罵也無濟於事。於是，她的烟量也逐漸增大，從每天一泡上升到每天四、五泡，幾個小時躺在烟床上起不了身；不用說銀行存款了，那個最初幫她起家的小裁縫店面也賣了，當然，無論哪位局長都不會與她「有難同當」的。

以毒攻毒？

說實話，也有人真是爲治病而引毒上身的。這是一位中年人，身強力壯，自己攢了錢買了部小轎車，一年後換了大卡車，在粵、桂、滇專跑長途。凭着自已的技術和勞力，每年淨入三萬元。可惜他常常爲自己嚴重的關節炎而苦惱不已。

那是在通往廣州的公路上，天氣陰濕，黃河牌大貨車寬大的駕駛室裡坐着他的副手，還有一位新交的搭車朋友。他只覺得渾身骨頭架子像散了似的，酸痛難熬，恨不得躺下來讓別人在他背上敲打一番或亂踩一通。他一枝接一枝地抽着香烟，嘴巴裡抱怨着爲什麼外國烟老板不造一種一抽下去，骨頭就不痛的香烟。那位新朋友遞給他一枝烟，說這就是可以治關節炎的烟。司機猛抽了幾口，覺得氣味奇特。真怪，一枝抽下來，奇迹發生了，骨頭不酸痛，精神特別好，力氣使不完。那位朋友告訴他，香烟同是萬寶路，只是在上面加了一點白粉。

什麼藥粉？「海洛英」。「毒品？你想害我？」他猛一剎車，怒目圓睜對着這位新朋友。「吸多了是毒，吸少了是藥」，新朋友不緊不慢地回答。「你知道爲什麼醫院裡那些難寬的藥要兌證明嗎？裡頭多少有點什麼鴉片海洛英的。以前我們常吃的十滴水裡就有，不過數量極少。只要你自己管得住，這可是你這個老

關節痛的良藥！吃多了當然是毒。鹽不能不吃吧，可讓你一次吃一斤，也不成了毒藥？」這位朋友說得也真有理，而且這樣吸法也不貴，一克四號海洛英一百元，開始可管十天。可是，這玩意越吸越多，一直到後來，每天要開支烟錢一百多哪！吸毒「吸掉了」他那輛威風凜凜的大卡車，「吸掉了」他的所有生意，那個老毛病關節炎也并未見好，烟癮一來，疼得死去活來。

這裡不是淨土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到內地來旅遊兼自我戒毒的香港青年了。如果他們知道單我們這一省城就破獲了近百處地下烟館時，他們會驚呆的。這黑色和白色的魔鬼，真殘害着一批批無辜者。這裡已不是淨土。我這個戒毒所收了四十餘名男女自願戒毒者，可是還有更多的吸毒者漂流在外。他們不願意上我們這個戒毒所，盡管我們稱之爲「康復中心」。有的想偷偷地自己戒，但談何容易！戒賭難，戒毒更難，前者主要是心理問題，後者還有生理和病理問題。有時我不無天真地想，寧願他們是賭徒，不願他們成烟民。不過，如果所有吸毒者都來戒毒，而且都願意自費，那麼，我們這戒毒所規模再擴大十倍也還不夠。醫生何在？心理指導者何在？護士何在？經費何在？再說，出了戒毒所的人又如何適當安置他們避免再次染毒？

想到這裡，我只有苦笑，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醫生，而是像政府總理或至少是一個省長在愛國愛民了。我只能從事我的臨床和藥理戒毒研究。但願我能在這個專業領域爲那些被黑的與白的魔鬼迷住的苦難男女女盡點責。每天深夜，在寫完了這一本筆記以後，我總是更其詳細地書寫另一本筆記——治療筆記，對我說來，那本更重要。

一個右派分子

的回憶

軒轅遜

一、
「看報啦！看報啦！毛主席解放右派的消息！」

一九五九年九月廿日早晨，大學剛開校門，幾個報童就在校門口大喊大叫。這個國家實在偉大，連報童都是政治家，知道大學裏有右派，右派正在盼望摘「帽子」，所以今天的叫賣聲，比平常高八度。

毛主席要解放右派，這消息多麼叫人高興啊！人們都堅信不疑，毛主席一定會解放右派，因為他說過，只有低頭認錯，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就可以摘帽。現在已經改造兩年，百分之九十九都已低頭認罪，而且是一認罪再認罪，「自我批判」寫了幾十萬字，勞動中又狠狠地改造自己，幹最重、最苦、最髒的活，一天幹十幾個小時，決心脫胎換骨。總該饒了吧？何況右派又是個啥問題？只不過提了幾點意見，說了幾句話，還是在書記動員之下說出來的，目的是幫助黨整風。一片赤誠。但「帽子」已經戴了兩年，人早已被壓得低頭彎腰，告罪求饒，無論是懲罰，還是報復，都已達到目的，「帽子」應該摘掉了，就是不全摘，也該摘一半。

二、
當許多人對大赦寄以希望時，我們這群剛剛從山區回來的青年教師右派，却完全相反。一年半的山溝勞改，一年半的反思，我們認識了毛澤東其人，理解了反右其事。大躍進時期，深夜燃起篝火運轉。午夜間歇時，歷史系的難友老吳在篝火旁對我說：「一代梟雄，亘古罕見，大災大難還在後邊！」

九月十五日，我們從山區回到大學，十六日黨委書記古介宗就召集我們訓話。我是全校唯一不認罪不簽字的「花崗岩腦袋」，還曾經要求古介宗辯論，我們是老搭檔了。兩年前未能和他辯論，今天他來訓話，我很想看看他如何訓話，同時他讓我看我勞改後的尊容。因此走進黨委大會議室，我坐到他最前面去，靠近主席台。

大約等了半小時，古介宗走進會議室來。室內死一般寂靜，那氣氛好像公安局長巡察監獄。書記走上主席台，坐在正中。掏出一大前門，抓出一枝，在桌上猛搗幾下，燃着，狠吸一口，然後像飛機噴撒殺蟲藥一樣，噴出一股長烟。習慣地敲掉烟灰，呷一口茶。抬頭一看，突然看

到我豁然坐在他前面。大約瞞了我三秒鐘，即刻喊道：「×××！你……不承認是右派，不承認又怎麼樣？還不是一樣戴上「帽子，送去勞改？」啊？哈！哈！哈！

古介宗的笑着，使我立刻想到山區的一句俗語：不怕夜貓子叫，就怕夜貓子笑。山裏人把貓頭鷹叫做「夜貓子」，因為它總是夜間出沒。這種怪物叫起來雖然很恐怖，但尚且可忍受，如果笑起來，那就不得了，那就要死人了！而它往往在子夜時分笑，那笑聲就更加陰深恐怖。因此，老鄉說，聽到夜貓子叫，不死也要脫一層皮！

古介宗看我好似木刻石雕，毫無反應，便接着說：「聽說你們都希望摘掉帽子，這好嘛！不過不是那麼簡單吧？啊？犯的什麼罪呀？反黨反社會主義呀！要改造過來，那麼容易嗎？啊！要脫胎換骨咧！沒脫胎換骨，那個反動立場就能轉變？自欺欺人吧？啊？……」

室內陰冷，死寂，那頂「帽子」的分量頓時加重起來，令人窒息。不過我倒要自由一點，舉目左顧右盼。有人掏出烟來，大口大口地吸，噴出的烟繚比古介宗還長；有人用右手指在左掌心寫字，似乎以此避開這個世界；也有人兩眼直盯着古介宗，好像在質問：一年半之前，你是怎樣講的？

一九五八年初，送我們去山區之前，古介宗也曾召見我們，也是在這裏，那時他「鼓勵」我們努力改造：

「你們犯了錯誤。犯了錯誤可以改嘛，是不是呀？你們都是青年教師，是黨培養的，黨摸着頭長大的，黨不會放棄你們，而要挽救你們。為此，黨決定送你們到山區去改造一段時間，幫助你們盡快回到革命隊伍裏來，希望你們珍惜這次機會，愉快地去，建設山區，改造世界觀，在勞動中轉變立場，很快就會摘掉帽子回來。你們要相信黨，相信黨的政策。」

今天似乎是另一個古介宗。書記的變色已足可令人深思了，還盼什麼摘帽？

三、
古介宗訓話結束，此時進來一個人。

此人細瘦矮小，頭扁頸長，橫眉豎目，嘴突鼻揚，似笑實恨，一臉陰氣，活像一條直立起來的黃鼠狼，只差尾巴。

巴。這種東北特產，自重不過半斤，却能一口咬死七斤重的大火雞，不是吃肉，而是吸血。

大學城裏從來沒有過這種人，我們誰也不認識他。政治系的難友王胖子說，此人原係政治系學生黨員，當年在班上一舉抓過二十五名右派，超過全班同學的一半。古介宗親自提名，選為全校「一號反右標兵」，令其提前畢業、留校，並破例提拔為大學黨委委員。王胖子說：「見到他就腿肚子轉筋。」

「這位是全校右派監督改造小組主任王野同志，專職負責你們的改造，你們要服從！下面由王主任給你們分配工作。」

王野圓睜兩顆豆眼，直瞪着我們達五秒之久。之後突然從喉裏噴出一堆字來：
「監改小組對你們的要求是：低頭認罪，繳械投降；革面洗心，重新做人。頑固到底，死路一條！現在分配工作，注意聽！」

這個主任，聲音沙啞。北方叫「公鴨嗓」。王胖子說，五七年批判右派，他每天都嘶嘶力竭，把聲帶喊破了。不過火鴨嗓比較常見，並不出奇。罕見的是他說話時，有一個輔助動作：眨眼。說話眨眼睛者亦常見，但他的眨眼與眾不同，上眼瞼上啓快，下眼瞼上落慢；上落只需一秒，下落却需三—四秒。他一眨眼，我就想到山溝的一種長尾蜥蜴，那蜥蜴一眨眼之後，接着就是向獵物進攻。

王野一聲令下，我們統統被分配到大學機械廠去了。那裏是全校極右份子的勞改工廠，我們都是一般右派，而非極右。大家面面相覷，但無人作聲。

王野察到了，立即大喊一聲：
「把你們送到機械廠去，對我們改造有利！明天開始上工，會後一律搬到集體宿舍去！散會！」

走出黨委會會議室，我深深感到，大學還不如山區，山區雖然每天勞動十六—二十小時，但離古介宗遠，也聽不到王野的火鴨嗓。老吳看到我面有所思，走近我，悄悄地叮囑：「形勢有變，黨內出了老彭集團，螺絲釘擰得更緊了！小心！」

彭德懷遭難，回來第二天我就聽說了。本來我不承認是右派，不簽字。現在我倒願意承認了。彭德懷都反黨了，我當然是右派！

四、
我搬進了右派集體宿舍。

這裏原來是學生宿舍，學生住時每個房間八人，現在住十二人。六張木製雙層床，把房間擠得滿滿的。床的上層已接近天棚，空間很少；床下堆滿了破鞋、爛襪以及被老鼠咬過的書報。床上被褥，沾滿了污垢，攪不清顏色，似乎不是活人用的東西，而是出土文物。房間裏一股刺鼻的酸臭味。

這裏的難友們一律穿勞改服，一種深藍色的粗布工作服。多數已被機器咬破，少數已被水燒穿，幾乎所有人的背、肩上都印着一個又一個汗水留下的白圈。每個人臉上

都掛着一層灰，頭髮蓬鬆，鬍鬚面，遠看像乞丐，近看像囚犯。以前我還沒體會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就是「反面教員」！大學裏不僅需要教員，還需要反面教員，這的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不過，難友們精神很好，眼睛裏閃爍着希望。他們許多人是我聽過的，聽過我的課。他們熱情地招呼我：「老師……把我圍起來，和我說話，我幾乎流下淚來。」

這裏有兩名中文系的學生，一個叫王伯安，一個叫王正坤。由於教過的學生太多，往往學生認識我，我不認識學生。這兩位我卻認識，因為他倆特殊——都是退役軍人，年齡都大過我，但他倆特別尊師，又很喜歡我教的課，堂上堂下都很活躍。兩人原來都是志願軍，都在朝鮮打過仗，一個參加過上甘嶺戰役，一個參加過馬良山戰役，都在火線上立過功，退役時都是連級幹部，入學之後仍然穿軍裝，戴軍帽，見到教師行舉手禮，講話坦誠、直率，頗有軍人風度。現在也穿着破爛的勞改服，滿身油污，樣子比其他戰友更狼狽。

「老師，你怎麼沒回系？」王伯安問，還是那樣直率。

「先在這裏勞動幾天，特赦之後再回去，豈不更好？」王正坤代我回答。

顯然他們都對特赦抱着希望，好像大赦令一下，「帽子」就沒了，大家就可以回到教室去了。不懂他倆，似乎這裏每個人都抱着「特赦」的幻想。我感到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教他們丟掉幻想，做好準備，迎接專政的升級。然而我又不放心，我不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兩年來由於看錯了，說了真話，惹來許多麻煩，吃了不少苦頭，我也變得世故了。但我又不能迎合他們，欺騙他們，於是我說：

「事情不要想得太大樂觀，樂觀容易失望。」

「可以樂觀的時候，樂觀一下也沒妨。」馬上有人反駁。

「特赦——就是頭號罪犯都可以赦，右派還能例外？」有人幾乎衝動起來。

中國知識份子的愚忠與痴信，幾乎是先天的，根深蒂固。所以在政客眼裏，可以騙一次再騙一次，永遠騙下去都不會引起懷疑。只要開動宣傳機器，就有人相信，甚至將惡的訊號，理解為善的信息，何等悲哀！

五、

九月卅日，特赦宣佈了。人民日報發表的特赦名單之中，只有溥儀等幾個特赦罪犯；特赦右派，一個也沒有！人們竊竊私議，連連搖頭。

不過，也有右派獲赦的消息，全國各地都有右派摘帽，本省本市也不例外。

這裏全校三百九十七名右派之中，也有六人摘「帽」。

第一次給右派摘「帽」，這是大事件。古介宗召開全體教職學員大會，親自宣讀「中央文件」。文件中的毛澤

東批示，古介宗將聲調提高八度，好似奉宣聖旨一般，唱出來：「帽子——只能分期分批地摘。改造好了的——摘，沒改造好的——不能摘！不能一風吹，一風吹——不符合實際！」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再按照古介宗定的全校每年摘六頂「帽子」的速度，大家算了一下，三百九十五名右派，大約需要六十六年才能摘完。這恰恰符合實際，毛澤東說過：「總有一部分人，會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這就是說，六十六年之後，廿一世紀初，仍有沒摘帽的，只要那時還有右派活在世上。

這次大會，給了人們一個啓示：右派升級了！

升級——這裏是階級鬥爭的術語。一九四九年之前，富農和地主不同，富農不算階級敵人，四九年之後升級了，和地主一樣了。兩年前，反右當時，毛澤東說右派是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思是不同於地、富、反、壞等四類分子。現在升級了，和地、富、反、壞一樣了。報刊上已經正式使用「五類分子」這個術語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都已正式使用了。

集體宿舍的樂觀氣氛一掃而光。機械廠的全體右派之中，只有一人摘「帽」，此人是出名的「一號釘子」，專門盯梢難友，向王野報告。難友們給了他一個綽號「老偵」。王野給他摘「帽」，將他樹為「改造標兵」，叫大家向他學習。然而結果却適得其反。本來大家還有一點「積極性」，不論是真是假，口頭上還承認犯了錯誤，表示願意改造自己。現在看到，十年特赦，才僅僅赦了一個「一號釘子」，摘帽的幻想，徹底破滅了，情緒急轉直下，再也不相信還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了。

十月一日、二日，放假兩天。右派分子無假，但因各單位都放假，機械廠的管理幹部也都放假，單單右派上工，怕不安全，因此右派也放假。但放假也不准出門，王野說：「整理內務，講講衛生。」的確該講講衛生，房間裏那股特有的酸臭味，也隨着「右派升級」而升級了。但誰有心情講衛生呢？本來就不准做人，還講什麼衛生呢？

這兩天，宿舍裏最突出的表現是吸烟。本來不吸烟的人，也都吸起來。一位難友，家在鄉村。妻子來探望，帶來一大包自己種的「關東烟」，現在拿出來，供大家享受，於是人人捲一枝，噴雲吐霧，搞得房間好似往昔節日的廟堂。

王伯安和王正坤，本來都吸烟。戴上「帽子」之後，毅然戒了，表示決心改造，從頭革命。現在也吸起來。他倆會捲，吸完一枝，又捲一枝。王伯安連吸三枝之後，走近我，恍然大悟似地說：

「他媽的，什麼特赦？大騙局！」聲音之大，震動全室。

「小點聲！太放肆！」我壓制他。

王正坤聽到了，即刻走過來：

「怕什麼？大不了坐牢去。坐牢都比在這裏好，還有個別刑滿釋放。他媽的戴帽勞改——無期徒刑！」

「不要說了！」我竭力把他們的衝動壓下去。

不過，我知道，壓下去也無濟於事了，這個新動向，王野很快就會接到報告。

六、

十月三日晚，王野來到集體宿舍，主持「學習與批判」。這是每天晚上的例行改造活動，除非放假或黨委開會，王野一定來。所謂「學習」——就是通過學習文件，加深認「罪」；所謂「批判」，就是交代這一天在腦袋裏出現過反黨思想。王野認為，右派的腦袋每天都會產生新的反黨思想。

但今天不同往日。王野一踏進宿舍的大門，就大喊大叫：「開會！到大廳開會！」

大廳——就是一間大房，批判大會都在這裏開，在這裏聽王野批和罵，或者王野聽大家互批、互罵。所以一到大廳開會，大家就知道，無非是那一套。然而這次不是。王野站在前面，沒批也沒罵，兩顆豆眼像兩股鬼火一般，瞪着我們，利那間扯起公鴨噪聲起來：

「王伯安！王正坤！交代反黨言行！」

場內死寂，空氣都凝固了。但是被點名的兩個王，概不理會，好像沒聽到，這個現象不尋常，沉默——就是反抗！往日一旦在大會上被點名，誰也不敢沉默。這空前的沉默，令到王野嗷嗷叫起來：

「改造兩年了，還死不認罪！把反黨思想藏進骨子裏，有機會就向黨進攻！與人民為敵到底！還想不想摘帽？」

如果是往日，這樣嗷嗷一叫，足可將對方嚇倒。但這次他估錯了。沒等他講完，王伯安霍地站起來，用當年打衝鋒的吼聲喊道：

「姓王的！老子上甘嶺打過美帝，你算個——！」

王正坤更激烈，捶胸罵起來：

「老子在馬良山上立過軍功，你算個屁！」

罵完更加衝動，索性跑到前面，舉起拳頭：

「你欺人太甚！我打你這個狗養的！」

一拳將王野打了一個趔趄。王野比黃鼠狼還快，一溜烟竄出門外。

大廳的空氣似乎緊張到就要爆炸。每個人都意識到：事態太嚴重了！右派分子打了監改小組主任，這是階級敵人向無產專政進攻，這是階級報復！這將是怎樣的結局？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從門外傳來陌生的喊聲：

「王伯安！王正坤！外面有人找！」

兩人遲疑了一下，同時走出門外。

「不許動！舉起手來！你倆被捕了！」這是門外的聲音。

隨之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王伯安、王正坤被抓走了，此後沒聽到他倆的任何消息。但他倆的名字却掛在王野嘴邊了，動輒就向我們喊：「想改造？還是想學王伯安、王正坤？兩條路自己選！」

「四·二六」社論出自誰手

「四·二六」社論的作者，並非江之楓所說的徐惟誠，而是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范榮康。本文披露了此人的某些內情。

張琪

臭名昭著的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到底出自誰之手？這個問題在海外頗有爭議。日前讀到江之楓先生的「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一書，盡管書中對中共高層人物在八九民運中的運作方法，揭露得比較正確，但對「四·二六社論」的作者，却用了想當然的方法，張冠李戴，說成是「徐惟誠」所作。其實，當時徐某人只不過是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經濟工作的副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鬭爭後，被趙紫陽批示為「飯選得給他吃，只是不應該再再過問意識形態鬭爭」，因而並沒有資格寫這樣一篇直接傳達鄧大人「聖旨」的「重要文章」。

那麼，這篇社論到底是誰寫的呢？筆者最近回大陸向有關知情人調查，才知，它是當時擔任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輯、黨委副書記的范榮康所作。

海外熟悉范榮康大名的人不很多，這位老兄是人民日報的一支筆，其夫人的名氣比他大，（寫過一部很有影響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的女作家馮蓉蓉），但他是人民日報大院裡真正能說上幾句話的人物。「文革」前，他就很有才華，「文革」後期，此兄寫了一篇後來對他仕途很不利的文章，即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那篇歪曲事實的「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後來，盡管他擔任過習仲勛的政治秘書，又有習仲勛向胡耀邦力荐，最後擔任了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但中央機關第一把手的權，始終未入他手——這可能也是他終生的遺憾吧！

閑話少說，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北京一批大學生借胡耀邦逝世，發起了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序幕，素有政治敏感的范榮康，預見即將有一場政治風波降臨神州大地，他正想坐看事態發展，以注定自己的腳應該放在那一邊時，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他召喚到了中南海那位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啟立辦公室裡。胡啟立將一篇剛送達的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小樣，放到他面前，要他立即起草人民日報社論「明天見報」。

時間是那麽短暫，他已沒辦法按慣例向他的老首長習仲勛請示——如果他有時打一個電話，後來的文章很可能是另一種寫法，因為習仲勛是並不贊成鄧小平這一殺氣騰騰的講話的。但現在顯然已經來不及了，於是，范榮康硬著頭皮，鋪開稿紙，這篇進一步引發民主運動的「社論」便從他的筆下流了出去。

「社論」引發「動亂」。「四·二六」社論，極大地激怒了首都學生和市民，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向着當權統治者願望的反面，迅猛地發展着。對此，范榮康看得比一般的當權者更為清楚，在人民日報一次編委會上，他無內疚地說：「看來，我這次注定要當悲劇人物了。」當然，他也採取了一些彌救措施：一，痛哭。在人民日報社內的大院裡，他說到社論不止一次地在同事和下屬面前痛哭失聲，以示痛心疾首；二，擅自在人民日報「人民論壇」

專欄發表其夫人，素以「解放派」作家著稱的諷刺文章「救救孩子！」表示他們倆對大學生愛國之心的支持；三，是公開表態——在人民日報社一次幹部大會上他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講話時鼓動說：在這樣一場全民族的民主運動中，我們人民日報的記者如果不出來，那將是很不正常的。今天我看到一批大學生要推倒人民日報大院的圍牆，其志可佳！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希望！用這樣露骨的語言，支持八九民運，在中共副部長級官員中，恐怕僅他一人，這也許就是他從執筆社論後走向負面的一種表現吧！

新開界的同仁，對范氏的兩種表現，評價不一，而中共當局則是極為惱火。高狄、邵華澤之流進駐人民日報後，執意要把范榮康搞掉，但李瑞環對他却没有惡意，他的開明政策需要他。因此，在二李的矛盾中，范氏的地位還不算太動搖。▲

落實治理整頓措施
鐵路重點區段治



RENMIN RIBAO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個不穩定、不寧靜的社會，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應有的。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和發展。...

我是一個不安分守己者

「葉利欽自傳」選譯

白下
一帆

節譯

選譯者按：

一九八九年蘇聯著名政治家葉利欽寫成名為「一個不安分守己者的自述」的自傳，由於該書的爆炸性內容而不能在蘇聯刊行。但該書立即被譯為德文，成為德國的暢銷書。

葉利欽在書中回顧了一生走過的道路，特別詳細地記錄了他進入蘇共政治局後的充滿傳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和他在風雲變幻的蘇聯政局上的酸甜苦辣，讀來有震撼人力的感染力。他彷彿把我們帶進了神秘莫測的蘇共政治局和最高蘇維埃的會場上，讓我們親歷了他同蘇聯其

他領導人的矛盾和較量，特別是他

同戈爾巴喬夫的恩怨。由於葉利欽所處的特殊地位也使該書成為蘇聯巨變的歷史見證。它像一幅時代畫卷，翔實、細膩地描述了目前蘇聯的改革。葉利欽在書中談到的有關政治制度、所有制、農業、軍隊、克格勃等方面的改革設想，對於我們設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會有許多啟發。

最近，葉利欽新當選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再次成為蘇聯最高權力中心的風雲人物。他提出的共和國自治激進改革和市場經濟等政治倡議，在俄羅斯大地上

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今天他與戈爾

巴喬夫同是蘇聯知名度最高的政治家。最新出版的「莫斯科新聞」（一九九〇年七月號）評論道：「你們（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都握有重權，一個掌管着國家，另一個掌管着共和國，你們必須冷靜、機智、慎重、理智地為這條船掌舵，服從人民的意願。我們支持你們！」但在今年七月十二日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葉利欽突然宣佈退黨，在代表們「恥辱」的叫罵聲中走上了體制外改革的不歸路，再次在蘇聯引起強烈衝擊。為此我們特從該書中選譯出部份片斷供讀者欣賞。



捲土重來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彷彿我的政治生命結束了。現在我則是一個政治賤民。顯赫的黨的頭銜前面都帶有一個「前」字：前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前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斯大林時代，過時的政治幹部都得槍斃；而赫魯曉夫把他們送去養老；在勃涅日列夫蕭條時代，這些人則被發配到小國當大使。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代又創新例，跌了一跤的人還可嘗試重新回

到政治生活中來。

當時戈爾巴喬夫給我這個失去了所有頭銜的人打來電話，讓我當蘇聯國家建築部長，我接受了，因為我在那個時刻已經完全無所謂人住，我是不會讓你進入政治的！當時他顯然相信了這句會成爲現實，但他始料未及，正是他自己設計和推動的民主改革，使總書記的話不再像獨裁者的話那樣立刻成爲整個帝國鐵的法律。另一個時代終於到來了。一年半過去了。今天是一九八九年三月廿

五日，明天將舉行人民代表的選舉。本來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人：莫斯科市民一定會把大部份選票投給我，選我當他們的代表。我和尤里·布拉科夫是莫斯科第一區的候選人。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民意測驗都表明了這點，選舉前的整個氣氛也很接近這個結果。我自己內心的聲音也告訴我：明天一切都會正常。

幸運的是，我在競選期間幾乎每天都能和選民們在一起。他們給了我新的力量，堅定了我的信念，我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生活下去，也不能夠再那樣生活了。那個膽小怕事的時代結束了。

黨的龐大機器有一個有限的且不太複雜的任務，即必須保證使我落選。完成這小小的任務本來應該沒什麼問題。此外還有這個「卓越」的選舉程序——區代表大會應把不好對付的人篩掉——再加上權力無限的區黨委。黨的手上還掌握了一個龐大、聽話的宣傳機器，他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儘管黨和官僚機器什麼都有人，但他們還是完成不了任務。在幾個月裡他們從進行對我造謠中傷的宣傳到用中央委員會全會作出決議阻止我參加選舉，一切都幹了，但人們對我的支持反而越來越強大。

我也只是一個人，有缺點，還有一個難對付的倔強性格。我迷惑過，我犯過錯誤，很可能因此而選不上。但即便是這台機器看好的布拉科夫選上了，他要順從地滿足他的提名人的意願，同樣是一個大的幻覺。我們中間的一個，不論是他還是我，只有聽從人民而不是這台機器，滿足人民的要求而不是黨和官僚機器的教條要求，才能勝任今天這個人民代表的角色。

我相信莫斯科市民會選我的。只是要稍稍有點耐心……

背水一戰

一九八八年中，我下決心參加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的選舉。我不知道這個決定是否正確，我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我要利用這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機會，走出政治隔離，重登政壇。如果我落選了，那麼我能夠想像那個黨將是如何歡欣鼓舞。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人民不願選他呀……

我的親朋好友們都勸我不要參加，因為時機對我非常不利。在過去半年裡我的名字一直是一個禁忌，我存在，同時又不存在。此外，按現有的選舉制度，部長不能當人民代表。所

葉利欽向選民發表演說



以我必須放棄我的職位。即使我選上了，我的未來仍然是一片模糊。按現有制度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很可能會讓我在最高蘇維埃選舉時落選，這樣我就不能在那裡工作。我只有一个成為失業者的前景。

我必須做出決定。

現在全國各地都有電報發來。所有上千人的大工廠都提名我當他們的候選人。從這些郵

件中都可以研究蘇聯的地理了。

將要到來的選舉是一場既折磨人而又耗費精力的戰鬥。為此還有骯髒的詭計和見不得人的攻擊。在這種條件下我有準備走完一條漫長而又疲備的競選之途嗎？我深思着、懷疑着、幾乎要改變自己的決定。但事實上，也許是從我知道這次選舉之時起，它就已在我心中深思熟慮過了。我如果捲進這個令人瘋狂的事情中去，很可能會撞得頭破血流。但我不能不這樣做。

第一步已經邁了出去。我成功地通過了在區代表大會上對候選人的篩選。選不選我，現在只取決於人民了。這已經是一個勝利，儘管還不是最後的勝利，但已相差無幾。

我雖然在近兩個選區裡得到了提名（按蘇聯選舉制度允許公民成為不同的多個選區的候選人），但那台機器，那個起操縱和控制作用的區代表大會還是可以把每一個不順眼的候選人去掉。大多數區代表大會都是由工作單位派出的人組成的，主要是黨的書記，他們的副手，以及單位中的政工幹部。操縱這樣的聽眾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蘇聯各地都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抗議，認為這些區代表大會盜竊了人民真正參加選舉的權力。而這場稱之為「蘇聯人民代表選舉」鬧劇的組織者則幸災樂禍，為他們煞費苦心的計劃如此成功感到高興。但他們還是算計錯了。因為不是在所有的地方他們都可以得逞。

我在深思熟慮後參加的第一個區代表大會是在珀爾姆州的伯爾斯尼基舉行的。以前我曾在這個城市生活過，不少人還能記得起葉利欽這個名字。有幾個工作單位把我提名為候選人。只要黨的機構不把區代表大會弄成死水一團，我在這裡關過關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我設計了一步較為不同尋常的棋。在莫斯科去珀爾姆最後一班飛機沒有我而起飛之後，我登上了飛往列寧格勒的飛機，那裡的朋友們正等着我，他們把我帶到一個軍用機場。那裡

也有忠誠的幫助者。我搭乘一架螺旋槳運輸機去珀爾姆，飛機的轟響震耳欲聾。清早到達時，我的追隨者們正等着我。這樣，只用了不多的時間我就在區代表大會開始時及時趕到了現場。我的出現使組織者大吃一驚，連州黨委的人都沒有及時趕到。我在講話中介紹了我的政綱並回答了公衆提問。一切都萬無一失，投票開始時，我已經放心，整個氣氛暗示我，我會越過選舉征程的第一個關口。我確實獲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

此後舉行的是在首都的區代表大會。儘管我在伯爾斯尼基獲得了勝利，我還是決定參加莫斯科區的代表大會。但我放棄在與我所贊賞的人相衝突的地方當候選人。比如在奧克特亞伯爾州安德列·薩哈羅夫參加競選。我打電話告訴他，爲了他我放棄當候選人。可是他最終在蘇聯科學院當上了候選人。那裡可以作爲公衆性組織直接向代表大會選送候選人。

每參加一個區代表大會，我都獲得新的經驗。典型的例子是加加林區的代表大會。參加的每一個競爭者都很強，這當中有作家和評論家尤里·車爾尼採科、軍事歷史學家迪米特利·沃爾科果諾夫、電影導演埃爾達爾·利阿薩諾夫以及宇航員阿歷克賽·雷奧諾夫。總共有十名候選人。每個人都在大會發言，要求把全部十名候選人列入選票上的名單，使人民在投票時可以自己決定要選誰。

由於每個人的演講都非常富有激情、具有說服力，公衆的僵硬態度有人鬆動，最後幾乎沒人堅持把不順眼的候選人篩掉。但情形發生了變化！主席團想出了一個接一個的詭計，並決定不把所有的候選人都列入選票中！從來是高興、滿意和樂觀的埃爾達爾·阿利薩諾夫真想大發雷霆。選舉人都衝向麥克風痛斥主席團，公衆堅決要求把所有的候選人都列入選票。操縱爲一方，反操縱爲另一方，抗爭一直持續到午夜兩點。最後公衆獲得了勝利，所有的候選人都列入了選票。我輕鬆愉快地離開了這個

區代表大會會場，因爲健全的理智在歡慶勝利，人們同時也感到驚訝，在我們之上有着一個多麼可怕的權力機器，一個詭計多端、龐大無比、斯大林式的機構和一群貪官污吏！

葉列欽不能通過 可惜太遲了……

我真不敢相信：葉利欽已經成爲莫斯科第一選區的候選人了。不管這台機器的領導人多麼不情願，絕望地與之對抗，但這還是發生了。在每張選票上我還有 S.H.I. 工廠的總經理尤里·布拉科夫的名字。

但是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規矩！在莫斯科第一區代表大會上有人想讓我落選。大廳裡有千把人，其中兩百人提出了十個候選人，其餘八百人都是經過仔細挑選出來的、聽話的選舉人，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每個人都知道區代表大會將怎樣結束。那台機器提出兩個候選人：布拉科夫和宇航員格奧爾基·格萊契科。我唯一的希望在於，公衆能打破事先黨的內定，把十個候選人全部寫進選票。那麼我才真會有機會。在開會前，全體蘇維埃委員會候選人在我的倡議下寫了一封聯名信，要求把所有候選人寫入選票，他們都願意簽名，因爲沒有人願意演一場從頭到尾都已一句句寫死的戲。

我感覺到會場上的氣氛與以往大不相同。所有的人都死死記住「格萊契科和布拉科夫」這兩個名字，因爲他們接受了前幾次區代表大會的教訓。按議程每位候選人先介紹自己的競選綱領，然後回答提問。書面提問五分鐘，口頭提問七分。人們向我共提出了上百個書面問題。我知道大廳裡有人帶着寫好的、具有挑釁性的問題，他們都在等着表演組織者的信號，以便「開始」行動。所以我採用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戰術：通常候選人總是挑有問題的問題回答，我現在則反其道而行之——從所有向我提出的問題裡找出那些最不公平、最不舒服、專門進行人身攻擊的問題來回答。

我回答了「爲什麼你背叛莫斯科黨組織，突然對困難感到害怕了？」或「憑什麼你女兒可以搬進新房？」當時就缺警察的傳票或有人來調查不正當關係了！我的回答把主持人的計劃攪得亂七八糟，把人們想在口頭提出的反面問題搶先一步和盤托出。面對這些提問者，我回答得輕鬆、心平氣和。我看到公衆漸漸鬆動了，產生了新的希望。

我們也準備了一個炸彈。會前格奧爾基·格萊契科找到我說，他想退出競選，理由是他認爲我當蘇維埃委員會的候選人太公正。最重要的是他不願意出來反對我。我當然拒絕了他的難以採納的建議，但他堅持說：「我已經決定了。」那時我才請他在投票前不久再提出辭呈。格萊契科做得是那麽漂亮，以至我們會發現損失了一位偉大的演員。會上他緊張得汗流浹背。快要投票前每個人又得到一分鐘發言的機會，即所謂最後的贈言。輪到格萊契科時，他平靜地走向講台，說：「我請求取消我的候選人資格。」

對組織者來說這無疑是當頭一棒。所有計劃要投格萊契科和布拉科夫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了投票的自由。只要選舉採用無記名方式，現在人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良心投我的票了。這一計成功了。結果我得票超過了半數。所有候選人都對我表示衷心祝賀。我們之間的氣氛非常友好，這也是受了選舉結果的影響。

從現在起又將揭開了選舉的新的一章。因爲我跨越每一道障礙的成功希望越大，那些人所施加的阻力也隨之增加，對那些人來說我參加競選實在是一場災難，動搖了人們對舊秩序堅不可摧的信念，儘管他們並不在乎這種制度早已腐朽。不管怎麼說，葉利欽不能通過，可

是太遲了……

大約在早晨三點鐘，莫斯科市第一區的區代表大會結束了。三個小時以後我坐在飛往我的家鄉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飛機上。我已向我

的追隨者們布置下任務，發電報向那些請我當候選人的區表示感謝，並宣佈我將在另一個暫時還不想透露名字的區競選的決定。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只是因為我不忍心只用電報向鄉親們宣佈我不當他們的候選人了。

在莫斯科嘗試一下

在那些我能百分之百獲得成功的選區放棄候選人資格，而留在莫斯科競選，對於我的這個決定，無論反對者還是追隨者都認為是一個大錯誤，是裝風雅、不道德、自高自大。我該怎麼回答呢？在莫斯科競選人民代表，要冒很大的風險。這是我最後的從政的機會。當我吃力地越過這條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後，突然發現了一個新的自我。這真是出人意料。

盡管困難重重，我必須在蘇聯最重要的莫斯科選區嘗試一下。並不是過份的自信和虛榮促使我這樣做，而是我必須向自己以及所有支持我的人證明，我們自己決定命運的另一個時代到來了，儘管有來自高層的壓力，儘管有國家機器的陰謀，但我們作出自己的選擇。

如果我放棄在莫斯科的候選人資格，代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競選，那我的競選事實上已經勝利地結束了。我只需等到三月二十六日選舉日，第二天早晨醒來瞭解一下我得勝的具體結果即可。毫無疑問，大多數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人是支持我的。

我估計我在首都選舉成功的機會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競選是我在八七年中央委員會十月全會講話的延續。只不過當時我是孤立的，並且黨內和官僚機構的上層都反對我。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雖然那些人仍在反對我，但已不是孤獨的奮鬥者了。莫斯科上百萬的人民都站在我一邊。

早晨我到達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盡管我一分鐘都沒睡着，但一回到家鄉，所有的疲勞和過去幾天的緊張都消失了。我從機場直接去

了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民的集會，集會持續了三個小時，在休息時，朋友們親切地向我問候。隨後，我立即去第二個在一家大工廠會堂舉行的集會，那裡等待我的是一千個人和一百五十個寫在紙上的問題，每隔兩個問題就有這樣的句子：「您放棄莫斯科吧！那裡的人會把您宰了，莫斯科人會算計您的。」

直到深夜一點集會才結束。我竭盡全力向鄉親們解釋，無論如何我也必須在莫斯科參加競選。顯然他們理解我，因為他們說，如果我在三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選區失敗的話，他們必定在這一天讓所有的候選人失敗，從而讓我有機會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選區的補選中取勝。他們又補充說，只要有一點機會，每個人都會放棄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登記參加選舉，而飛去莫斯科投我的票。這就是我的鄉親們！

可惜我不能同我的朋友們坐下聊天，又必須起程了。我匆匆去看望了一下我的母親，擁



莫斯科：葉利欽在這裡開闢戰場。

抱了她，然後就走了。

最關鍵的一天

今天是星期天，最後一天。我在家裡所有人的身上都感到了一種輕微的焦躁不安。不知怎麼這種情緒也感染了我。只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們才能覺察到我身上所出現的異常。有一次我從窗口向外望去，驚訝地看到在院子裡已經有許多西方電視攝影組提著攝像機在門口等著。幾個月來外國記者的跟隨幾乎與我的追隨者在我身邊一樣理所當然。在最近幾天我幾乎無法單獨行動。要躲過他們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們的工作和職業，這一點我自然理解。然而要求承受住這種壓力則確實很難。今天報界的喧嘩將達到頂點。

我們幾乎是穿著節日的盛裝走出我們的住宅，因為選舉是全體人民的節日。記者們立即向我們湧來。其中主要是西方記者，蘇聯記者幾乎沒有。他們拍攝了我們全家列隊從我們的住宅走到伏龍芝區少年宮選舉會場的情景。少年宮前的廣場簡直可怕。大約有近百人舉著照相機、聚光燈、閃光燈和錄音機包圍了我，纏住我並向我提問。這些人爭先恐後的說着，毫無秩序地用各種語言向我喊叫着。我隨着人群走上了一樓，登了記，拿到了選票。

當我朝着選舉箱走去的時候，無數鏡頭對準了我。不知處於什麼原因我突然覺得這一切都滑溜。這使我回想起不久前上千張類似的照片。我們那個老態龍鐘的領導人拿着選舉名單長久地站在選舉箱前。他顯然很喜歡這樣的儀式，喜歡他自己和即將在第二天報刊雜誌的扉頁上刊登出來的引人注目的照片：「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萊奧尼特·伊裡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選舉會場。」

在各式各樣的照相機和攝像機對準我的時候，我迅速地把選票投入選舉箱，然後疾步走

向出口。所有的記者向我湧來，撞倒了為秘密表決而搭起的小房子。選舉委員會的成員被捲入了混亂之中，為此我感到抱歉。我想用最快速度走到室外，以便讓喧嘩的記者們離開少年宮。

大約有半個小時我無法衝出緊密的包圍圈。我回答了關於選舉、關於我取勝的機會、我的未來和過去的問題。最後我突圍了。在記者們的追隨下我和我的家人急急匆匆、幾乎一路跑步來到住在附近的大女兒家裡。在那兒我們有了安全感，可以安靜地弄清情況。今天是最關鍵的一天。今天將產生選舉結果並向黨的機構彙報票數。

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選舉點都有我的忠實的助手。他們密切地注視，以便使一切正常通行並向我通報第一批測算結果。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對選票、實際上是對每一票表示擔憂。我們非常吃驚地獲悉，中央已作出決定，將蘇聯在二十九個國家的駐外機構的全體成員算在莫斯科選區。這是最後一次想影響選舉結果的企圖。眾所周知，來自國外的選票將會令人很不愉快，因為在每個大使館中職員都會以大使的選擇作為標準。所以我必須在莫斯科的選票中獲得明顯的優勢，這樣外國的選票就無法對整個選舉結果產生太大的影響。

當新聞記者們從門口撤走後，我們便從藏身之所走了出來。我們在城市裡散步。在莫斯科的散步給我們帶來了一些輕鬆感。從我們身邊走過的人們向我們打招呼，微笑並祝願我們成功。

晚上我被告知第一批選票的預測結果。在所有選區內我取得了明顯的優勢。現在沒有人能阻止我的勝利了。

三次生命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有人把選舉結果

告訴了我：百分之八十九點六的選民投了我的票。如果在正規的選舉中得票數要比這個數字低。但是人們被激怒了。有人想詆譭我、阻撓我，這反而使我獲得了更多的選票。

現在可以聽到一種新的流行說法：選民並不是投票利欽的票，而是對黨的機器投反對票。這句話似乎會使我生氣，然而我與黨內官僚所作的力量懸殊的鬭爭顯然並不是徒勞的。如果葉利欽的名字會使人聯想到反對黨的機器鬭爭，那麼我在中央委員會十月全會和在第十九屆黨代會上的發言才有了意義。

我真想休息一會兒。可是我又面臨着新的煩惱和問題。我已經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主席尼古萊·雷日科夫提出了辭職。按照選舉法，一個人民代表不能同時任部長。從今天起我便正式失業了。

我接了一個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人向我表示祝賀並告訴我，他們那裡也選了激進的人當代表。州委第一書記波比金一敗塗地。他讓人在一個他認為順從的邊遠鄉村選區為他提名。他是這個地區的唯一候選人，其他候選人都在區代表大會上被篩下去了。儘管如此人民還是讓他落選了。

家裡的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所有的人都想向我表示祝賀並祝我成功。我與妻子奈娜商量好離開莫斯科好好休息幾星期。

有時候我似乎覺得自己已有過三次生命，第一次雖然艱辛困難，但却和其他人一樣：上大學、工作、建立家庭以及作為一個經濟界領導人和黨的領導人的經歷。這一生命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央全會的那一天結束了。從那以後開始了我作為政治流放犯的第二次生命。我與人民的聯繫突然被隔開了，作為一個人和一個政治家我要為生存而奮鬥。在我獲得選舉勝利的那一天開始了我的第三次生命。從那時起到現在還不滿一年。如果說我的前兩個階段鮮為人知的話，那麼選舉之後我所作的一切，都由新聞界傳播了出去，再也沒有什麼秘密了。

牧師忘記把我從「洗禮盆」中取出

我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出生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塔利查區的布特卡村。我所有的先輩都是生活在那裡的農民。我的父母親也是在布特卡結的婚。村裡有兩家大姓，葉利欽和斯達利金，我母親就姓斯達利金。很快我就作為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來到了世界。

母親常常跟我說起我受洗的事。當時整個縣只有一個小小的教堂和一個東正教牧師，他要管許多村子。那時的出生率是非常高的。因為一個月只洗禮一次，在那一天對牧師來說總是極其疲勞。受洗儀式以最原始的方式進行：一個雙耳大木盆裝着聖水，把嬰兒的頭掀進去，牧師再把哭喊的小孩高高舉起，為他祝福，給他起個名字，並寫進教區記事錄裡。按鄉下的習俗，父母們都給牧師帶一杯私做的燒酒或伏特加酒。

我到下午才輪上，牧師已經累得不行。母親克勞蒂姬·瓦希爾耶夫娜和父親尼科萊·伊格納切維奇把我遞了過去，牧師把我放進那個雙耳大木盆裡，却忘記把我取出來！他光顧着與別人說話了。

我的父母親站在離「洗禮盆」稍遠的地方，一開始沒明白怎麼回事。接着我母親就衝過去，把我撈了出來。我又緩過氣來了……我不想說，這段故事確定了我跟宗教的關係。但是畢竟有些影響……牧師不急不忙，只是說：「咳，他要是能經受得住，他一定非常有力氣。應該叫波里斯。」就這樣我得了個波里斯·尼科萊耶維奇的名字。

我的童年非常艱苦。沒有什麼吃的，因為我們的收成總是非常糟糕。集體化運動熱火朝天，所有的人都被劃進了集體農莊。此外土匪東流西竄，幾乎每天都有開槍、謀殺和偷竊的事情發生。

我們生活得非常貧困，只有一座小小的房子

子和一頭母牛。還會有過一匹馬，但它很快就死了，我們再沒有牲口犁地。和其他人一樣我們也入了集體農莊。一九三五年母牛也死了，生活變得更加難以忍受，六十多歲的祖父也出去挨家挨戶給人修爐子。他是農民，但會木匠和瓦匠的活，其實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很能幹的人。

六歲起就承擔一切家務

當時我父親決定隨便到什麼地方找一個建築工地幹活，以挽救這個家庭。他知道毗鄰的珀爾姆州礦聯合工廠的珀爾斯尼基建築工地需要建築工人。一家人把僅有的東西都扔上馬車，套上車，走向三十二公里外的火車站。父親在珀爾斯尼基的建築工地上當工人，養家糊口。一家人住在那時代典型的木板房裡。這樣的房子倒還保留至今，到處都是。板房有一條公用



蘇聯教堂，熱鬧非凡。

蘇聯小公民在受洗



的走廊；二十間小房間，當然沒有一點舒適可言，廁所是露天的；水也必須從外面井裡提進來。別人送給我們一些東西。我們還買了一頭羊。我的弟弟妹妹們也來到了世界。全家六口人外加那頭羊，緊緊地、一個排一個地睡在地板上。從六歲起我就承擔全部家務事。我必須照顧年幼的弟妹，給最小的妹妹搖搖籃，看着弟弟不出什麼事，削土豆、洗碗、提水……童年時學過縫紉的母親給人當裁縫。她性

格溫柔、開通，幫助所有的人，給大家做衣服，這家做一條裙子，那邊的親戚和鄰居做一件衣服，常常做活到深夜。為這些人做活她從不收錢。只有在人家有時給半個小麪包或吃的東西時，她才收下。相反，我父親和祖父一樣性格倔強。可能我繼承了他的性格。

爲了我，父母親常常吵架，父親的主要教育手段是抽鞭子，我若偷吃了什麼，他就使勁處罰我。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比如說鄰居的蘋果樹遭竊，或在學校裡向德語老師做鬼臉、調皮什麼的，父親就一言不發取出鞭子。每次總是一片靜默，只有母親哭泣着，喊着：「不許碰他！」父親只對我說：「趴在那兒。」我自然是咬緊牙關，不出一聲，任他怎麼咆哮。母親突然衝過去，搶下他手中的皮鞭，擋住我們之間。她是我的保護神，總是如此。

父親總是發明點什麼花樣。比如他夢想有一台能砌牆的機器。他畫了草圖，搞出機械製圖，比劃着，計算着，再劃上去。那是他永恒的夢，直到今天這種機器也沒人發明出來，儘管整個研究所都會爲之絞盡腦汁：砌磚、提料桶、勾縫、抹平、再重複。他把各種細節都想到了，並做成設計計劃書。可他卻從來也沒有把計劃變成現實。父親去世時七十二歲，而我的祖父、叔祖父、曾祖父都活到九十多歲。我母親現在八十三歲了，和我弟弟一起住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在學校裡成績總是五分」

我上中小學時，跟着家裡遷移，換了許多學校。每次我都能趕上拉下的課程。在學校裡我的成績總是五分。中學畢業後，我又以全五分考上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綜合技術大學。我非常喜歡體育，什麼活動都參加，尤其喜歡打排球。常常是白天出去參加比賽，晚上補上缺下的課。我不需太多睡覺這點使我獲益匪淺。有一回，我最喜愛的排球幾乎讓我送命。

也許我過份疲勞了，每天訓練六到八小時，夜裡還要趕功課，因爲我只想成績單上見到五分。不知怎麼了，我得了心絞痛，發燒四十度還去訓練。可我的心臟受不了了。心跳達一五〇多下，我虛脫了。別人把我送進了醫院。醫生說我至少要臥床休息四個月，才有可能讓心臟恢復。否則會留下心臟後遺症。幾天後，我就出院了，我回到了伯爾斯尼基父母的身邊。在那裡我慢慢地康復。剛開始我只站一會兒，心裡就打鼓。不久後我回到體育館，在場上走了幾分鐘，接了幾個球，突然又不行了。同伴們扶我到座椅上。這下我真的慌了。我想，現在我完了，心臟壞了，從此要與體育絕緣了。可我還想繼續運動。開始，我在場上呆一分鐘，後來兩分鐘、五分鐘，不久就可以堅持一場球了。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後我去找醫生，她對我說：「唔，儘管您衰竭了，但可以看出來這段時間您還是很努力的。您的心臟現在已經完全正常了。」

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後我只有一個月的學習時間了。我必須把五個月才能寫完的畢業論文一個月內趕完。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電視塔」。當時幾乎還沒有這種結構的建築，所以必須自己找答案。此外，在這個新興的、未開墾的領域裡，沒有人能給予我特別的幫助。所有的圖都得自己畫。盡管如此，我的畢業論文還是得了個五分。

大學生活結束了，經常聚在一起的朋友們約定，以後我們每五年利用假期聚一次，從一九五五年我們學業結束起，三十四年過去了，我們從來沒有違約。有一次我們還帶上小孩聚在一起，一共有八十七個人呢！我們從來不悠閑地度假，而總搞些探險活動。我們徒步去塔伽、烏拉爾和「黃金之圈」，沿着小道從莫斯科去弗拉蒂米爾。一次我們划船沿着卡瑪河和伏爾加河飄蕩，又有一次我們在格倫德施克海邊露營，還有一次我們泛舟而下，從耶尼塞到迪克森島，每一次我們都想出點新花樣。直到

今天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一九九〇年我們又計劃共同度假。

我想提一下，一九八七年十月全會後的戲劇性日子裡，他們所有的人都來問候我，支持我。這才是真正的朋友。

一年幹了十二個工種的工程師

和每個大學畢業生一樣，一到建築工地，人家建議我當領班。我說我還不想當領班。在上學時我曾想過，綜合技術大學的教授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有的教師跟生產從未接觸過，專業課程太學院化，與建築實際聯繫不上。因此我認爲不把所有的事都摸清楚，就直接去領導一個建築班組，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打算犧牲一年，把建築工地上的十二個不同工種的手工勞動都體驗一遍，每個工種一個月。就這樣我跟着砌牆大隊幹了一個月，然後是粉刷工，先做簡單的，再做複雜的。此外，我不是只幹一個工班，而是幹一個半工班，使整個過程加快些。工人們盡管都笑話這個想和人民打成一片，野心勃勃的年輕工程師，但還是幫助他、鼓勵他、支持他。

很快我就成了合格的砌牆工和混凝土工。另外，我覺得混凝土的工作很重，盡管我的力氣足夠大，可還是感覺很重。人們推着裝滿混凝土的小推車快速越過很窄的跳板，運上高高的澆灌架。只要小推車稍有傾斜，重心偏一點，就會翻倒。我從三米高的地方摔下來過好幾回，還算幸運，盡管問題處處，到最後我還是在掌握了它。然後我去當木工。一個月後我又去開水泥翻斗車，那時我還沒有駕駛執照，我開着三十噸的大卡車，簡直不當一會事。怎麼那麼巧，在跨越鐵路時熄了火。我在正忙着搬弄時，火車來了。火車的速度很快。跨越鐵軌的地方既沒有欄桿也沒有看護人。火車會把卡車連同我一塊捲走。幸好我還想到可以換檔讓卡車衝幾步出去，弄了幾回已聽到火車的利

車聲。我感覺到它已停不下來了，巨大的機身帶着憤怒向我撲來。我又踩了一下離合器使卡車向前挪，卡車終於動了，剛從鐵軌上挪下來幾公分，火車就緊挨着衝了過去。

我從車上下來，在路邊坐了一會兒，然後把水泥運到工地。我跟同事說，就差那麼一點點我就要進棺材了。其實我可以從車上跳下來，但那樣我要賠償損失，而且非常貴。當時我沒有分文積蓄，現在也沒有。我還是在大學時代象徵性地放了五個盧布在儲蓄簿上，就那麼多了。

後來我還幹過木工、裝修工、玻璃工、裝配工、油漆工，把這一切這學會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我覺得沒有捷徑可尋。

我在當高架吊車司機時，還經歷過一個小故事，讓我緊張得要命。我們在烏拉爾工廠蓋宿舍，下班離開工地後我想已經都檢查了一遍，也切斷了電源。但我忘了一件事，工作結束後必須用特殊的剎車將吊車固定在軌道上。我們的住地離工地不遠。那天晚上突然起了狂風，風雨交加。我從窗子向外看去，發現高架吊車在慢慢移動。當時我可能只穿了一條短褲，衝出去奔向吊車，我在黑暗中尋找開刀接上電源，急急忙忙地沿着窄窄的扶梯爬上了駕駛台。吊車繼續向軌道尾端滑去。在那裡將會翻倒。司機室裡是一片黑暗，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想着怎樣把吊車吊臂的制動裝置鬆開，真不錯，吊臂隨着風向轉了，不再像船帆那樣，可是吊車還沒停。我又把速度放在倒車位置的最高檔上，吊車慢慢地停住了。啊，真危險！我妻子從房子裡衝出來喊道：「快下來，吊車要倒啦。」但我只想到要救吊車。我從吊車上爬下來，把吊車固定住。那個晚上當然我們誰也沒睡好。我做了長長的夢，我爬上了吊車，隨着吊車摔得粉身碎骨。

就這樣一年內，我學了十二個工種。我走到工段長那裡說，現在我可以當領班了。後來他們把我安排在許多不同的崗位上。我們建設

了烏拉爾的工業中心、一個水泥廠、廠房、輔助設備、宿舍、公寓、文化宮、幼兒園、學校、技術學校等等。

後來我當過工段長，第十三管理區的總工程師。三十二歲時，我已是一個大型聯合企業的總工程師兼總經理。

我入黨也有段故事。在通過我入黨的會上，書記向我提了一個問題，馬克思「資本論」裡哪一卷哪一頁講過資本——商品的關係？我知道他根本沒認真讀過馬克思的書，既不知道在哪一卷哪一頁，也不知道說說說說說資本——商品的關係。我半嚴肅半開玩笑地回答，但如同出膛的子彈一樣快，「第二卷第三八七頁」。書記認真地說：「真不錯，你讀馬克思著作很認真。」就這樣我被通過了。

請到中央委員會報到

我當了近七年的建築部門負責人，然後才當上了州委書記。一年後我被送去莫斯科參加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社會科學院的一個為期一個月的短訓班。課程開始後兩星期，正好開中央委員會全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利亞波夫被選為中央委員會書記。那天短訓班負責人科洛廖夫在上課中說，葉利欽必須在？二點以前到中央委員會報到。短訓班中的其他人都是老手，他們立刻與我擁抱，想從我這兒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盡管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去中央委員會，但我心裡感覺到這次談話將意味着什麼，可我還是壓抑着內心的激動。

在中央委員會我首先見到的是負責組織的中央委員會書記卡皮托諾夫。他問了幾個問題，諸如我的學生時代，我和州委其他同志的關係。我回答一切正常。他對我沒說什麼，也沒有解釋我為什麼被叫到中央委員會來，反而讓我去找基裡連科。在那裡提問又重復了一遍，也是什麼都沒說。然後去見蘇斯洛夫。這次提問稍微具體些，我的能力是否夠？我瞭解不瞭

解我們州的黨組織？這次也不加解釋，然後說勃列日涅夫要見我。我必須立即去克里姆林宮，兩位中央委員會書記卡皮托諾夫和利亞波夫陪同我一起去。我們走到入口大廳時，有人傳話過來，「您們進來吧，正等着您們呢。」我先邁一步，其他兩人跟在後面。勃列日涅夫坐在會議桌的正前方。當我走向他時，他站起來向我問好。問兩位書記：「他已經決定接管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領導工作了嗎？」卡皮托

在現時蘇聯，勃列日涅夫成了停滯時代的一個象徵。



諾夫向他解釋還沒有對我說呢？「怎麼他還不知道？那他肯定會接受領導工作？」就這樣開始了交談。勃列日涅夫說，政治局做了決定，建議我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這對我來說真是意外。這是一個很大的州。但我回答說，既然政治局和州裡的黨員對我這麼信任，我將全力以赴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一起

「怎麼樣？還好嗎。」勃列日涅夫問我。這對我來說真是意外。這是一個很大的州。但我回答說，既然政治局和州裡的黨員對我這麼信任，我將全力以赴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一起

站了起來，他突然說：「不過您還不能成爲中央委員會成員，因爲黨代會剛剛開完，選舉已經結束了。」當他說出這句話時，他的聲音使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他覺察到我還沒有最高蘇維埃委員的標記：「您還不是委員？」「我是委員。」他眼睛奇怪地看着兩位書記：「爲什麼他是委員？」我嚴肅地回答，我是州蘇維埃委員。大家都笑了，因爲州蘇維埃委員在這層根本不算什麼委員。

幾天以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召開了州委員會全會。中央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拉蘇莫夫也出席了這次全會。會議一切都正常，拉蘇莫夫宣佈說，由於利亞波夫被選爲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建議葉利欽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我將簡短發言的要點記在小紙片上。與以往一樣，提案得到了一致同意。人們向我祝賀。我在簡短發言中說出了我的政綱要點。我的想法非常簡單：首先要照顧好所有的人，只有良好的生活人們才會提高工作效率。這個原則我一直沿用至今。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有四十五個城市，城市和鄉村共有六十個區、市級黨組織。我已經計劃每年至少到處走一次，我也一直這麼做了。旅行對我來說不是一次郊遊，而是很嚴肅的工作。我看望了許多黨員、專家、工人、集體農莊的農民和其他人。

第一書記的權力實際上是無限的。但要是用這個權力來實現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目標，還是很有限制的。它不能夠給州裡的人民提供足夠的食品，給所有的居民提供足夠的住房。但在杜伊斯堡給某人換一個好工作，或分一間好房子，那還是足夠的。當時的州委第一書記是一個上帝、是沙皇、是一州之王。無論對什麼問題第一書記的意見都是最後的決定。我常常利用這個權力，但只是爲了人民，從沒有爲我個人謀利。我要讓經濟發展的大齒輪轉得更快些。人們都盛裝待發，聽從我，在我看來企業的工作效率由此提高了。

爲了參加第二十六屆黨代會我做了充分的準備。我想打破我們國家這種沉悶、停滯不前的局面。我的發言儘管很富有戰鬥性，但是針對勃列日涅夫的指責仍然很軟弱。當時我缺乏經驗，更重要的是缺乏向我們這個生鏽了的黨和官僚機器宣戰的政治勇氣。此外，我認識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也太少，不能對許多事情發生影響。

當戈爾巴喬夫當選爲中央委員會農業書記的時候，我們都很高興地向他表示祝賀。都以為從現在起事情就會向前發展。其實並不然，他似乎不瞭解問題的癥結何在，他嘗試着改變一些小步，却並沒有給農業部門帶來明顯的進步。我認識戈爾巴喬夫還是在我們都是第一書記的時候，他是斯塔夫洛珀爾大區書記，我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書記。剛開始是電話接觸。我們常常需要互相幫助。他希望從烏拉爾得到鋼鐵和木材，我們想從斯塔夫洛珀爾得到糧食和食品。

他當選爲中央委員會書記時，我走去與他握手。祝賀他。以後我還常常去拜訪他。每次我去他辦公室時，我們都互相擁抱，我們的關係很好。我想他進了中央委員會後變了很多。他更加開放、坦誠了。農業狀況的改善與他有許多關係，他積極工作，與各加盟共和國及各州的關係都很好。

作爲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我和烏拉爾軍區的領導人希爾琛科、提亞古諾夫、加施科夫等關係很融洽。我經常去看望部隊和戰士們，與官兵一起參加演習。

一年未抓住一個間諜

我和克格勃州局的人關係也很好。克格勃負責科爾尼洛夫參加州委的會議，他也是州委的候補委員。我也常去他們的州局，瞭解克格勃工作的情況，研究他們的結構，參觀各個部門。當然我知道有些事我是看不到的，儘管

如此我對克格勃系統還是比較瞭解的。我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對克格勃主席弗拉蒂米爾·克留契科夫的指責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基於我對克格勃各個部門的瞭解。

有一次克格勃副主席皮洛施科夫因事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那還是我上任頭幾年的事。皮洛施科夫、科爾尼洛夫和我三人坐在辦公室裡談話，科爾尼洛夫隨便提到克格勃州局與州黨委合作得很好。突然皮洛施科夫吼道：「科爾尼洛夫將軍，起立。」科爾尼洛夫立即跳起來，站得筆直。我感到很詫異。皮洛施科夫一字一頓地說：「將軍，您得在腦門上寫上，不許與黨的機構密切合作，只能聽從上級。」

我當委州第一書記的整個十年裡，沒找到一個間諜，儘管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科爾尼洛夫對此還是非常擔憂，看來也許是我們工作不力。「在這個地區至少得有個間諜吧。但居然一個也沒有。」

被迫進入克里姆林宮

我接到莫斯科的電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道爾基奇同志想跟您講話。」我們互相問好，他很客氣地問我好不好，他說政治局委託他告訴我，讓我擔任中央委員會建築部長，我只想了幾秒鐘，就拒絕了這一建議。

我沒有向道爾基奇提起當時我腦子裡的想法：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生活、上大學、工作。我喜歡我的工作，盡管成績微小，但重要的是我和當地的人們有着良好的關係，這花了我多年的時間。我覺得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在這兒的任務還沒完成，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當時還不想表明的理由使我作出拒絕。在我的潛意識中覺得，用我現任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當了九年半的州委第一書記來同中央委員會建築部長的職位交換，是不合理



戈巴契夫與夫人賴依莎植下改革之樹

的。我早已說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在生產上佔蘇聯的第三位，它的州委第一書記有着獨特的經驗和知識，應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才對。其實這也是傳統：基裡爾連科的州委第一書記當上了中央委員會書記，瑞亞波斯也是如此，却只讓我當部門的領導。對道爾斯基直接了當的建議，我拒絕了。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我整晚都苦苦思索將來會是如何，我知道電話中的事並沒完。不出所料，第二天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利加喬夫打電話給我。他已瞭解了道爾斯基與我的談話，一開始就大着嗓門。我還是嚴辭拒絕。我說，我堅持留在這兒。利加喬夫提出了一個炸彈式的理由：黨的紀律。政治局已作出決定，我作為共產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去莫斯科。我別無選擇，只能說：「那我來吧。」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我開始了工作。

建築部歸中央委員會書記道爾斯基管，他首先感覺到的是我的獨立意志。我記得，他在召開過一個各州建築部門領導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經歷這樣的講話。道爾斯基在作報告，

不知講些什麼。我奇怪地看到，所有的人都帶着厚厚的筆記本忙着記下每一個字。我聆聽着，只在重要之處記下要點。道爾斯基顯然習慣於人們記下他說的每個字，他反感地瞧瞧我。他並沒有直說，只是過一會兒有意問：「您有什麼問題嗎？可能您記不起來了，盡管提問。」「不」，我說，「我什麼都記得。」他當然清楚，我目前的職位是暫時的，我的情形會迅速改變。所以我和他沒有任何衝突的問題。

為什麼戈巴契夫選中我

當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叫到政治局去的時候，我已經當了幾個月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我並不知道叫我去談什麼。但是當我看到房間裡沒有中央委員會書記，只有政治局委員時，我明白事情涉及到我個人。戈爾巴喬夫大約是這麼開頭的：政治局商量決定由我來領導莫斯科黨組織，也就是說領導大約一百二十萬共產黨員。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站起來說，我認為這個決定不合適。第一我是建築工程師，我想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作一些設想和打算，以便使建築工業生產擺脫困境。為此，我說，我當一個中央委員會書記更有用一些。除此之外，我對莫斯科的領導力量不太瞭解，這將會使我難以開展工作。

戈爾巴喬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們都來說服我。他們說，由我來擔任這一職務很有必要。必須免除格利申的職務。莫斯科黨組織已經老化了，其工作方法和作風不僅不能起到表率作用，而且老是在全國其他黨組織後面。格利申不考慮人民和他們的迫切需要。他的工作很糟糕。他只對那些表面上富麗堂皇、充滿掌聲和激情的、浮誇的會議感興趣。總而言之，必須挽救莫斯科黨組織。

政治局的談話並不是很令人愉快的。是的，我甚至可以說，令人不愉快。他們又一次對



在蘇共二十七次大會上，戈巴契夫（前排中）與葉利欽（第二排左二）

我說起黨的原則：「我們知道，您在那兒將對黨更有利。」我又一次讓步。我認識到，不能允許莫斯科的黨組織再處於這種情況了。我表示同意。

以後我想過，為什麼戈爾巴喬夫正好選中了我。顯然他考慮到我在蘇聯最大的黨組織中當過第一把手，有十年的經驗，考慮到我曾經在生產部門長期工作過。此外他瞭解我的個性，確信我會排除障礙，與敵詐勒索集團作鬥爭。以我的性格和勇氣是能夠做到大刀闊斧地去調整領導力量的。一切都是事先考慮過的。那時候我確實是這一任務最合適的人選。我的心情沉重地接受了這一職位，並不是因為我害怕困難，而是我明白，人們利用我把格利申趕下馬。

實際上必須從零開始。首先必須撤換市黨委辦公室的人員，因為到處都是「格利申的人馬」。我的意見是必須更新市黨委機器，特別是那些長期與格利申一起合作的人。在這個機器停滯時期謙恭的奴性作風已經根深蒂固，並

已進入這些人的肌體和血液之中。讓他們改變思想是不可能的。必須把他們換掉，我就是這麼做的。

整肅莫斯科

我讓莫斯科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普羅米斯洛夫退休。選了SIL 轎車廠總廠長賽金作市蘇維埃主席。撤換了市政府委員會的書記。

然後我去了「莫斯科真理報」的編輯部，與全體工作人員談了四個小時，這是一次嚴肅的、坦誠的談話。報社讓波爾托拉寧當新主編。這之前他一直在「真理報」工作。這個有才、原則性強的記者一下子改變了報社的氣氛。刊登了許多令人感興趣，同時又令人驚愕的文章。比如我還記得有一篇叫「屋門前的馬車」的文章，講的是供私人用的公車。這篇文章當時在莫斯科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些文章不僅尖銳，而且在那時甚至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

我也和莫斯科電視台編輯部談了話。它起了新的總編，煥然一新。打那以後有了報導我們首都的精彩節目：「莫斯科和莫斯科人」、「晚上好，莫斯科！」等等。莫斯科電視台辦活了。

當然不久便有人對莫斯科報社和電視台採取粗暴的抵制態度。不斷有人向戈爾巴喬夫抱怨波爾托拉寧。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對我說：「這都是因為你起用了波爾托拉寧。」我回答他：「波爾托拉寧把報社搞得很好，印數增加了。您還是去關心您的阿法納斯耶夫吧！」那時候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法納斯耶夫掌管的「真理報」的訂戶數下降，儘管它是所有黨員都必須訂閱的報紙。

在莫斯科我繼承了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養成的一些習慣，比如像市民大會。在最初幾次市民大會中有一次是與莫斯科宣傳界人士

對話。在政治啟蒙大樓的大廳裡坐了兩萬人。我先發了言，然後請聽眾向我提問。我將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問題。幸運的是像這樣的問題並不多，但畢竟還是有的。比如：「您現在已經與莫斯科的敲詐勒索集團較量上了。這種事情我們已經歷過一次。赫魯曉夫曾經有過這一打算並想保護我們大家。事實的結果是眾所週知的。假如您還這麼幹下去，兩年之後將是另一個人坐在您的位置上。」這一預言令人驚訝地應驗了，正好兩年之後我被開除出政治局，並被免除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我接到許多檢舉商業和民警機關中腐敗和賄賂的案子。我對此進行了調查，但人們却不



莫斯科的黑幕？

能夠，或許是不願意揭開這一黑幕。內政管理處，市克格勃以及貿易和合作供應部門的新領導都被調查了。撤換了那裡的頭。其他還是一切照舊。

打擊敲榨集團

然而檢舉信越來越多。莫斯科人把他們所看到的事情寫來，但大多數是匿名的。有幾件事被我撞到了。肉類聯合企業經常出事——加工死牲畜、賄賂、偷竊。所有這些事情都被區委第一書記遮掩過去了。在市委辦公室的會議

上我們討論了這件事。

我獲悉一家商店到了小牛肉。我去那兒排隊。在最初幾個月人們還不認識我。當輪到我的時候，我要一公斤小牛肉。回答是：「我們只有牛肉，小牛肉沒有。」「這不對頭，您給經理打電話。」隊伍中有一、兩個人猜到了這是怎麼回事，一下嘩然。我堅持要到隔壁房間。那兒曾經堆放過小牛肉。現在小牛肉已被從窗子裡遞出去裝在一輛車上。這件事引起了一陣騷動，商店的領導被撤職。

我問了一個工廠食堂：「為什麼沒有胡蘿卜？」「沒有供應。」我們與工廠領導一塊核對。據卡車司機們說，胡蘿卜是運來過的，但當天又運走了。沒有單據。

在一家食品店女經理的辦公室裡放着一些裝有精美食品的包包。「這是留給誰的？」「預訂的。」「每個人都能預定嗎？」「沉默。我們緊迫不放。女經理不得不承認，這些訂貨是分給區執行委員會、內政部、區黨委和市裡各個主管部門的。這些包包的內容根據對象的不同級別而有所區別。

沒有人去揭開這個關係網。盡管人們知道我下商店，但是在公開場合下人們有顧慮，不敢與我說話。

有一次我離開一家商店，一個年輕婦女趕上來對我說：「我必須告訴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約好時間在市委談。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她所報告的賄賂網時，仍然感到非常憤怒。一切都考慮得令人吃驚地週到。營業員「必須」榨取顧客的錢，然後在二十四小時內給負責採購物資的人一筆錢。這個採購物資的人可以留一部份錢給自己，另外一部份由商店領導。商店領導們再分，而且是由下往上。在基層他們有自己的牌價。每個人都認識兩、三個人，並與他們聯繫。在大的貿易中心也有賄賂網。

我盡了一切努力保護這個年輕婦女。她很害怕。當她被調到另一家商店時我們在小圈子

裡談了這個情況。我們決定不僅撤換個別犯過錯誤的人，而是撤換基層整個的區段、集團、商店、部門和企業的領導。整整一年時間法院追究了八百個人的責任。然而這只是敲詐勒索集團的一部份。我們無法打擊佔百分之十五的地下經濟和政治敲詐勒索集團。人們不容許我們這麼做。而兩年後我的任期也結束了。

與里加喬夫的衝突

儘管在全國範圍內有了明顯的好轉和鼓舞人心的進展，我還是感覺到我們撞了牆，而且這一次無法再用改建和改革等新的、漂亮的言詞搪塞過去。必須有具體的事實。必須採取新的步驟。然而戈爾巴喬夫並不願意邁出新步子的。他最怕觸動黨的機器和官僚主義這兩個我們制度中最神聖的東西。我在與莫斯科市民對話大會上的發言明顯地比他走得遠。自然是有有人把一切都向他作了彙報。我們的關係冷了下去。

在政治局中我慢慢地覺察到人們不僅對我、而且對我所提出的問題有一種緊張的抵觸情緒。使人感覺到某種陌生。特別是在與利加喬夫就優待和特權的問題上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衝突後，矛盾尖銳化了。我也同樣寸步不讓地與他討論抵制酒類的決議。他提出關閉莫斯科的釀酒廠，對各種含酒精飲料的貿易，甚至包括葡萄酒和啤酒嚴加限制。

他那反酒類的整個運動都是極其淺薄、極其荒誕的。他什麼都沒有考慮過，既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情的經濟因素，也沒有考慮過其社會因素。他作無謂的出擊，使形勢日趨尷尬。我幾次提醒戈爾巴喬夫要對此引起注意。然而他却出於某種原因採取觀望態度，儘管事情非常清楚，不能用奇襲的方式來掃除酒這個幾百年來形成的劣跡。對我的攻擊愈演愈烈。利加喬夫和索羅門采夫組成了共同陣綫以反對我。他們向我舉了一個共和國的例子：在烏克蘭葡

萄酒和燒酒的出售量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六。我答到：「咱們等着瞧，過幾個月那兒會發生什麼事。」果然不久，那兒的人只要是液體什麼都喝，還開始喝劣質燒酒。地下燒酒廠的數量不斷上升。人們並沒有少喝酒。但以前國家從銷售含酒精飲料上的所得轉為了地下燒酒廠的非法收入。中毒以及中毒致死的情況災難性地增加。形勢每況愈下，與此同時利加喬夫却興奮地大談在反對酒類鬥爭中所取得的成就。那時候他是黨內第二號人物，向所有的人發號施令。要想說服他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不能容忍他的固執和淺薄，但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對我來說，是該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走的時候了。

戈巴契夫忍不住了

我還一直在希望戈爾巴喬夫能認清這種半調子措施和這種原地踏步式的政策的荒謬性。我覺得憑他的實用主義和直覺已足以認識到，是該向這個機器宣戰的時候了。要想迎合所有的人，既迎合官僚主義又迎合人民，他是辦不到的。一個人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子。

我請求與他談話。這一非常嚴肅的談話持續了將近兩個半小時。我匆匆地瀏覽了一下我的文件，找到了我在談話後所作的記錄。我記得這次談話使我相當激動，一談完我就把它提綱攜領地記了下來。

最後一次，就像人們在劇院中所說的——第三次鈴聲響了。在討論戈爾巴喬夫慶祝十月革命七十週年講稿的政治局會議上我再也忍不住了。這篇講稿是在三天前發給我們這些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委員會書記們的，以便我們進一步研究。

討論並不好。在座的每個人幾乎都認為必須說幾句。評論基本上是肯定的，加上一些原則性的說明。當輪到我的時候，我着重提出了大約二十點我所持的不同意見。這二十點涉及到黨、黨的機器、如何評價過去、我們國家未

來的發展方案及其他。

突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戈爾巴喬夫忍受不住，中斷會議走了出去。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們都默默地坐在那兒，不知該怎麼辦，怎麼反應。這種情況大約持續了三十分鐘。當戈爾巴喬夫重新出現時他沒有對我評論的內容表態，而是對我進行個人攻擊。現在所發洩出來的顯然是最近這段時間在他心裏所積聚的。除此之外他的態度極其不滿，近乎歇斯底里。我真想離開會議廳，不聽這種近似於侮辱的批評。

除了別的之外我還說到，在莫斯科一切都很快。一切都圍着我轉。說我的性格如何如何，總喜歡批評，現在我竟把這些批評帶到政治局裡來。他辛辛苦苦地準備了講稿，我竟然如此冒昧地向他質問。他的講話很長，大約有四十分鐘。

毫無疑問，此時此刻我恨戈爾巴喬夫。老實說我並沒有料到情況會這樣。我知道他會對我的批評做出反應，但不知道他竟會這樣，這種態度就像在集市，他閉口不談我所說的内容。

其他人默不作聲地坐在那兒，閉着嘴，希望別人不去注意他們。既沒有辯護，也沒有批評。這情景真令人難以忍受。他一說完我便站起來說，我願意再考慮一下我所提出的有些意見。批評中正確的地方我願意在工作中加以考慮。但是他的大部份責備我無法接受，因為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以一種令人難以容忍的態度提出來的。

討論就此結束。大家窘迫地分手。我自然最感到震驚。這便是開端，即那個結尾的開端。自從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戈爾巴喬夫幾乎就不再理會我，儘管我們一週至少有兩次公開會面。他避免向我伸出手來，默默地與我打招呼。再也沒有談話了。

我感覺到，那時候他已決定向我動手。在他順從的人馬中我是一個惹事生非者。（待續）

從夾縫中看毛澤東

回憶毛澤東的作者們儘管自覺地為當權者隱，但其字里行間仍露出不少尾巴……

余林

最近看了一本書，書名是「紅牆內外」，副題是「毛澤東生活實錄」，作者署名為「權延赤」，是大陸昆侖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新中國紀實叢書」中的一種。此書收有八篇文章，都是毛澤東生前警衛、醫生、保姆、舞伴和專用列車的列車員寫的有關毛的回憶錄。

雖然號稱「紀實」，書中「為賢者諱」的地方比比皆是，總之還是要把毛裝扮成樸素和靄、為國盡萃的「好領袖」。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作佐證，本文並不想對其中若干有爭議的說法進行反駁。但是，就書中談到的情況而論，可以看到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許多問題。效擇要列舉如下：

毛澤東的政治權謀

(一)、「高處不勝寒」一文中，衛士李連成自述：「一九五五年出了所謂潘漢年事件，一九五六年我被調到上海參加調查處理。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到南方視察路過上海，見到了我……」接下去又說：「毛澤東望着我，簡單問問我近來情況。他對『潘漢年事件』並不清楚詳情。據我所知，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到上海時，遇國民黨飛機轟炸，公安部門認為潘漢年是國民黨特務，逮捕入獄。這種具體事毛澤東並不過問，最多不過聽人講講。」

這段話語病很大。潘漢年是老地下工作者，當時是上海市副市長，他因特務嫌疑被捕，而李連成以毛澤東的衛士身份前來參加調查，這表明毛顯然是知道詳情的，或者李竟是由毛指派前來當欽差的也未可知。退一步說，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城市的副市長因特務嫌疑被抓，毛却一點也不清楚詳情，起碼也可算昏君。順便提一下，潘漢年及其妻董慧（香港富商之女）於一九五五年入獄後，在一九六五年前後曾短期釋放，一九六七年再次被捕，潘漢年於一九七七年、董慧於一九七九年先後病死獄中。直到一九八二年才獲得所謂「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中共對自己人的手段都如此毒辣，實在令人寒心。

(二)、「在「血肉性格」中，衛士封耀松說一九六一年時，毛澤東要他們幾個衛士到河南去調查「人民公社、大食堂，到底好不好？」並說：「小封，我不放心哪。他們許多事瞞着我，我出去哪裡，他們都能作準備。你們要下去，你們能看到真實情況，要告訴我真實情況：……。」

這又是一段妙文。毛是死抓住權不放的人，何以會知道下邊瞞着他而束手無策？如果此話真是出諸其口，那麼可以看出是他推卸責任的托辭。其次，人民公社、大食堂等等，都是毛自己提出來的，下邊作準備瞞天過海，還不

是爲了投其所好？第三，封耀松到南海當衛士後補習了幾年才算有了初中文化水平，派教育程度那樣低的人去當欽差，能調查出什麼問題來嗎？

(三)、「在陪領袖跳舞」一文中，女文工團員王學文在陪毛澤東跳舞時告訴他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如何在鬪爭大會上用乒乓球做項鍊，掛在王光美脖子上；以及蒯大富踢了王光美，叫她跪下等等。毛「滿面怒容」地說：「胡鬧，蠢麼……」這裡實際上可以看出奸雄的嘴臉。王光美當時還是「第一夫人」，這樣尊嚴掃地的被人作賤，並不是一兩句輕描淡寫的「胡鬧，蠢麼」講過後便可了事了的。當然中共當時也沒有法律，但如果毛真心實意地想制止，一定是做得到的。自己指使打手行兇，同時又假意呵斥，陰險狠毒，莫此爲甚。

(四)、「在「專列進行曲」裡，談到「專用列車」分爲「大列和單包，大列有十幾個車廂，服務對象主要是國賓或中央五大書記」。這樣的特權享受早在一九五三年即已開始，可見所謂的公僕、「人民勤務員」等等完全是哄人的鬼話。

其次，專列服務員不准把字紙帶下車，「凡是帶字的東西都必須上交。」可是，毛澤東却讓服務員姚淑賢把他抄給她的幾行古詩帶下車去。姚說這違反紀律，毛却說：「你爲什麼



毛澤東從農民造反起家，後來又讓幾千萬農民餓死。

要那麼老實？」結果，姚「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十幾年，只違反這麼一次紀律。」先不說這樣的紀律是否太嚴，光就毛勸人違紀這一點而論，至少可以說他是知法犯法，沒有尊重法律或規章制度的起碼意識。

毛澤東的個性修養

(一)、在「紅牆內外的生活」中，衛士田雲

玉論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忽然，他（毛）問我：『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我（田）茫然搖頭。『彭德懷原來叫彭德華，就是要得中華』。」

我大吃一驚，身不由己打了個哆嗦。我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多年，其實還很幼稚，對此類政治大事根本想像不到，簡直以為是做夢。」在那次會議上，彭德懷給免去了國防部長

的要職，並被軟禁起來。這當然因為他對毛的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毛却在他的名字上故文章，從而看出他包藏禍心，這和朱元璋根據自己那套測字術濫殺文武重臣有什麼兩樣？可悲的是明太祖這套荒謬的辦法竟在六百年後的今天在大陸為獨夫所再次採用，不由使人懷疑文明的進步是否在大陸上完全停止了。從原文最後一段加過着重點的話來看，毛在談彭的名字時顯然是十分嚴肅的，決不是開玩笑而已。

(二)、書中多處提到毛澤東老是對別人說：「要夾着尾巴做人。」這和他生前常說的「知識份子動不動就要翹尾巴」倒是合轍的。人非動物，為什麼要有尾巴？又為什麼非得「夾着尾巴做人？」這些話實際上是表現了毛對人——和他同類的人——的甚深的輕蔑，這也是古往今來獨裁者共有的心態。

(三)、書中不少地方談到毛澤東常會說：「弄碗紅燒肉來，還要肥的，我補補腦。」連江青聽了都說他「怎麼改不了農民的習氣。」其實農民習氣倒也無可厚非，而且這與農民習氣也不甚相干。主要的問題是毛連起碼的科學常識也沒有：肥肉可以補腦，這玩笑也實在開得太大了。這樣一個毫無科學頭腦的人，竟在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指導六、七億人如何生活垂三十年之久，其結果必然是國步維艱，生靈塗炭！

以上是隨手拈來的幾點，其他妙文尚多，不能一一細述。我總的感想有兩點。一是歷史事實是不容抹煞的。無論作者們如何企圖文過飾非，從這些官方出版物上也還能看透中共和毛澤東的獨裁本質。二是這樣「有問題」（從中共的立場來說）的作品竟然也能獲准出版，如果不是該出版社的編輯諸公在故弄春秋筆法的話，就是把住政治關、亂砍禁書的本領還沒有學到家。不過我希望這原因乃是前者，至少這表明中國人的良心並未完全泯滅。

陳祖德何以登棋壇

余森

陳祖德稱雄大陸圍棋棋壇，達十餘年之久。當然，他在圍棋方面，是有一定才華的，但其實力，並非穩居第一。相反，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方對旁人進行了無情的抑制纔取得的。下面就談談其中的內幕。

陳祖德在一九六〇年前進入上海市少年圍棋訓練班時，成績並不出色，好幾個和他同期或稍後的同學，比他更受到棋界前輩的矚目。但他有一個過人的長處，那就是善於鑒貌辨色，靠庸領導。上海棋社成立後，成為上海市體育運籌帷幄下邊一個專管棋類活動的官方機構，而陳祖德立刻施展全身解數，巴結上了棋社主任楊明。從此，在楊明的專門指示下，對他進行了精心培養。

日本圍棋代表團於一九六二年首次訪問大陸。當時因中日圍棋交流已中斷多年，日方不明中方虛實，因此組成了陣容堅強的代表團，由名譽九段瀨越憲作爲團長，團員有關東主帥坂田榮男九段、關西主帥橋本宇太郎九段等。這一年，他們僅跟中方中、老年棋手作了比賽，並以壓倒優勢取勝。第二年，日方只派了以六段伊藤友惠爲團長的代表團前來，也就在這一年，中國青年棋手正式出場比賽，並嶄露了頭角。在青年棋手中，最早戰勝日本棋手的是上海趙之華，他勝了業餘強手菊池康郎業餘六段。陳祖德僅勝了安藤英雄業餘四段。當時的老棋手大多認爲趙比陳更有培養前途，可是楊明却力排衆議，以趙的父親是右派、不能培養反動階級的子女爲借口，強調所有的棋手都要下工夫幫助陳祖德提高棋藝，却不讓老棋手和

趙之華下棋。同時楊明還不讓趙的弟弟趙之雲進棋社當運動員，因爲趙之雲經常戰勝陳祖德，進棋社後將構成對陳祖德的又一個威脅。

楊明煞費苦心要捧陳祖德出名。在與日本的交流賽方面，他想出了這樣的辦法。陳祖德在與日本棋手對局時，上海隊不出場的棋手都在賽場後面一間小屋裡同時進行復局和拆棋，研究對付日方的最佳應手。每當局面撲朔迷離之時，陳祖德就離席去便所，實際上是去拆棋室看看別人爲他拆出的好手是怎麼下的。據我在一九六三至六五年的實地觀察，在一局六小時左右的比賽中，陳一般要離席八至十次。我想日方大概也注意到陳的奇異的生理現象，因爲有一次陳在混戰局面中離席時，他的日本棋手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冷笑。

另外，日本棋手很不習慣自己按比賽鐘，這在日本都是由記錄員代勞的。楊明於是再三告誡陳祖德對局時的裁判和記錄：如日方忘記按鐘，不必去提醒他；如陳忘記按鐘，則須立刻糾正。記得日方桑原久七段在與陳祖德對局時，因忘了按鐘，讓陳在他的時間裡用了大半個小時。後來桑原發覺，哇哇大叫，但因被用去的時間無法查究，只好不了了之。桑原那一局妙手迭出，殺得陳祖德無法招架，後因時間用盡，過早進入讀秒，連走劣着，輸掉了這一局。

在全國比賽方面，楊明也有他的花招。當時各省市參加全國圍棋賽的名額是不相等的，以上海和北平爲最多，大約各有十名左右，安徽、福建等省就少些，很多省區根本無人參賽

。一九六四年全國圍棋賽在合肥舉行，楊明就根據上述情況秘密召集上海隊全體隊員訓話道：「我們作爲一個整體，要爭的不是個人榮譽而是集體榮譽，並且可以用些策略來獲得它。團體賽我們只要拚掉北京隊。至於個人賽，由於是單循環，我建議所有上海隊員在與陳祖德對局時都讓他贏，因爲大家的實力都差不多，讓陳祖德先積了若干分再去與別人拚，奪標的希望就要大得多。」當時趙之華就說：「這樣作弊來欺世盜名是不妥的。而且讓分給任何人都可以，爲什麼非要給陳祖德呢？」楊明原係行伍出身，識字不多，又無甚修養，盛怒之下，把見不得人的老底也抖了出來。他說：「陳祖德和你們是不一樣的。他每次外出集訓或比賽，每週必有一信給我匯報全隊的思想生活情況。你們有誰能得到這一點？現在就這樣定了：每人必須讓陳祖德兩分。」可是，賽前，事爲國家體委所聞，要叫楊明檢查，上海體委主任杜前讓楊明詐稱得了急病，連夜逃回上海。從此，陳祖德專在背後打小報告的名聲倒也傳遍了整個棋界。

楊明丟了面子，遷怒於趙之華，認定是他把事情聲張出去的。因此，非但不讓他參加隨後的中日圍棋交流賽，不久還把他踢出棋社，去當上海市青少年體育學校的圍棋教練，這樣就剝奪了他的運動員資格。趙之雲因被上海棋社堅拒於門外，只得把戶口遷往福建以求出路。楊明又向國家體委告狀，說是福建體委到上海來挖人。因此福建體委長期只能讓趙之雲當少年隊的教練，而不敢吸收他進棋隊當運動員。陳祖德還幸災樂禍地跟人說：「楊主任早就說了，他要是聽話些，就讓他在上海當個教練。如今充軍到福建去，可不是自己找死嗎？」當時上海隊另一個年輕選手，也因出身於「黑五類」家庭，處處對陳祖德陪着小心，讓他三分，這樣才算相安無事。而趙之華、之雲兄弟，因爲正直敢言，開罪了權奸及其鷹犬，終於賠上了自己的青春。

大陸社會發展水平評估

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和社會指標課題組」用綜合評分方法對改革十年大陸各地區的發展狀況所作的初步評估。

程路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大陸民主運動，標誌了中共十年改革走進死亡谷，無論歷史將怎樣評價這十年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與過，中國人畢竟在這十年裡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放鬆和希望。

在經濟領域中的明顯進步，使大陸各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變化，如何對各省、市、自治區的社會發展水平作出科學評價，過去傳統的做法，是用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等）來評價發展水平，或用某些單項指標進行評價，這些評價方法，容易忽略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協調發展的真實情況，易誤視。關於如何評價十年改革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是每個關心大陸的海外學者和留學生們所希望知道的，這段歷史的資料對於未來民主建國的政體經規的設計，也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此，本文特簡要介紹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和社會指標課題組」用綜和評分的方法，對改革第十個年頭的中國大陸，進行的大膽而中肯的評估報告，使海外學人對中國大陸十年改革的情況有個基本了解和認識。

這項開始於一九八九年初的調查評估報告，根據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原則，分別採用社會

結構、人口素質、經濟效益、生活質量、社會秩序五個方面的指標系統，用綜和評分法，比較客觀地對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進行了如下的評估：

從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經濟效益、生活質量、社會秩序五個指標系統來衡量，各地區之間差別較大。

一、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優化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它由第三產業比例、非農業人口和勞動力比例、腦力勞動者比例、社會投資（文教衛生、科研、社會福利）比例、城鎮就業率、享受社會保障勞動者比例七個指標組成。這些指標大致反映了社會化、現代化水平、智力結構、就業結構、社會安全感的提高程度。社會結構全國平均為廿分，得分最高的是京津滬，分別為三十四、三十三、三十分，其次是遼、黑、吉三省得分也較高，新疆、山西、內蒙、湖北、江蘇、廣東、浙江七省都在二十分以上，以上這些地區產業結構、智力結構、城鄉結構都相對合理。廣西、貴州、甘肅、河南、湖南、四川等省區只有十分、十二分，社會結構不够合理，如腦力勞動比例都較低，只得零分或一分，第三產業比例和非農業人口比例、安全網等指標也較低，只得一

二分，但這幾省除甘肅外，社會投資比例較高。

二、人口素質。人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它的高低，對社會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從廣義看，它是生活質量的一部分，因為大部分人口素質指標是反映居民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它包括人口自然增長率、平均預期壽命、初中以上人口比例、每萬人口大學生人數、人均教育經費、每萬職工有自然科技人員、每萬人口醫生數等七個指標構成。全國平均為十八分，北京人口素質最高七個指標基本上為滿分，共三十四分，上海略低於北京而得三十三分，天津三十二分，其次是遼寧二十七分，高於全國平均分的還有陝西、江蘇、吉林、山西等省，人口素質最低的除西藏外，是湖南、廣州、江西、安徽等省，都只有十分左右，湖南、廣西、廣州每萬人口大學生最低，內蒙、吉林、黑龍江、江西、河南、廣東、新疆擁有科技人員都最低，西藏、貴州、雲南、江西、青海主要是初中以上人口比例較低，西藏、貴州、雲南平均壽命較低，寧夏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六，居全國之首。

三、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生活質量的提高必須建立在經濟效益的基礎上，而經濟效益的提高又必須取決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和社會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指標選擇了人均國民收入、每百元積累新增的國民收入、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資金利稅率、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人均財政收入、每一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七個指標。經濟效益最高除京、津、滬三市（分別得二十七、二十四、二十六分）外，高於平均值的有遼寧二十五分、江蘇二十三分、浙江、福建二十一、吉林二十分、黑龍江、廣東、湖北各十九分，最低的是西藏九分、青海、陝西各十分。其中人均國民收入和人均財政收入指標西南和西北地區平均較低，中南各省除廣東、湖北外也較低。每一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雲南、貴州、廣西、西藏四省區水平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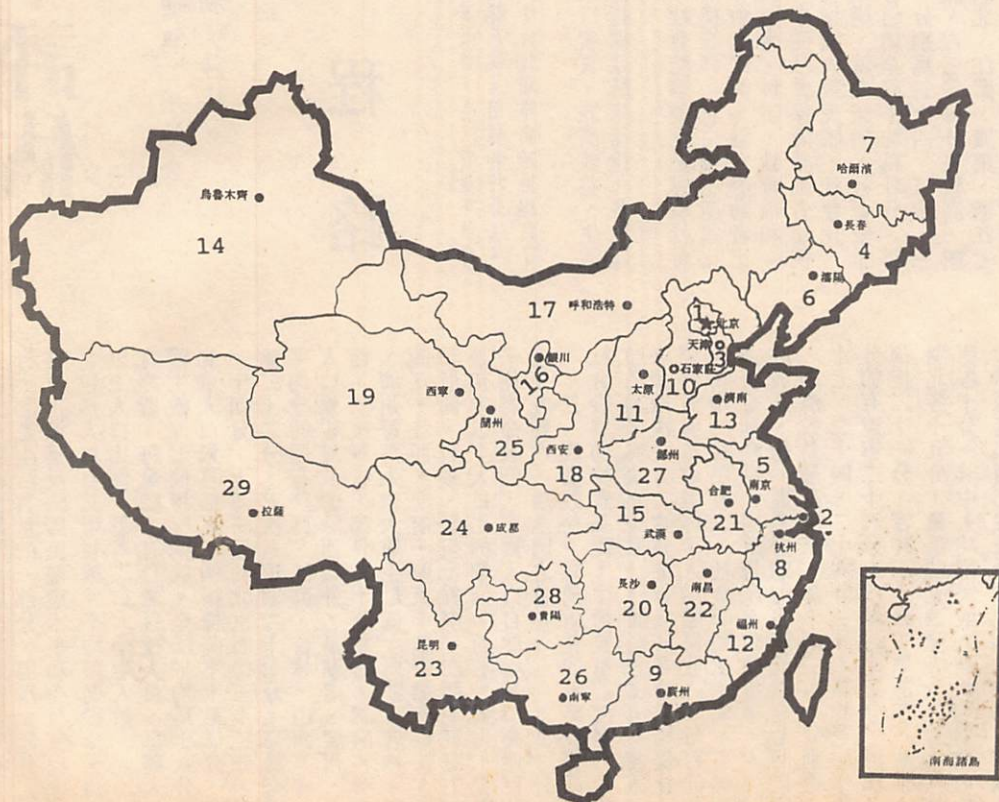
四、生活質量。生活質量的高低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一方面反映了居民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滿足程度，另一方面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促進

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但生活質量的提高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以經濟效益的提高為前提。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繁多，我們選擇了居民消費、人均收入、吃、穿、用、住、能源、通訊、勞保福利、文化支出、物價、環保等共十六個指標，它大致能反映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全國平均為三十四分，以上海為最高得六十一分，北京六十分、天津五十六分、其次是遼寧五十三分、浙江五十二分，在全國平均分以上還有廣東、河北、江蘇、吉林、黑龍江、新疆、山東、青海、寧夏、山西、福建等省，最低是貴州和西藏分別為二十二分和十九分。生活質量中環保方面選擇了四個指標，即廢水、廢氣、廢渣處理率和農村自來水普及率，全國標準分為八分，在八分以上的有河北、上海、廣東、北京、黑龍江、遼寧、吉林、山西、江蘇、浙江、湖南、山東、河南、福建等十四個省市，環保最差的除西藏外四川只有四分，甘肅、青海、內蒙也只有五分。由於環保統計和監測指標還很不健全，目前環保的指標體系還不能確切地、全面地反映環境質量，當前治理污染的能力尚差，總的情況是目前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尤其是水源，據一項全國性生活飲用水質調查，全國約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口尚在飲用有害的污染水，八億農村人口中飲用自來水的僅佔百分之二十，西南、西北各省、內蒙和安徽、湖南、廣西、江西等六省比例都很低。

五、社會秩序。它是社會關係和行為的調控能力，正常和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保證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根據現有統計資料，選擇了刑事案件大案要案立案率、治安案件發案率、交通事故死亡率、工傷事故死亡率、火災發生率等五個指標，全平均為十分，社會秩序得分最高的是河北十五分，其次是安徽、山東、河南、甘四省，都為十四分，這些省的兩案發生率均較低，京滬二市由於人口過於密集，兩案發生率均較高，均得一零分，上海交通事故一九八八年死亡一二五九人，每萬人發生率高達十人，高出全國平均五人的一倍，火災發生率也比全國平均高出一倍，上海社會秩序總分五分，低於全國平均的十

分，京、津分別為八分，最低的是新疆、青海、西藏均為五分。
通過以上五個指標的銜址，一九八八年中國各地區社會發展情況以北京為最，上海次之，廣州、西藏則為最末。全國狀況排列如下：

- 北京第一
- 上海第二
- 天津第三
- 遼寧第四
- 江蘇第五
- 吉林第六
- 黑龍江第七
- 浙江第八
- 廣東第九
- 河北第十
- 山西第十一
- 福建第十二
- 山東第十三
- 新疆第十四
- 湖北第十五
- 寧夏第十六
- 內蒙第十七
- 陝西第十八
- 青海第十九
- 湖南第二十
- 安徽第二十一
- 江西第二十二
- 雲南第二十三
- 四川第二十四
- 甘肅第二十五
- 廣西第二十六
- 河南第二十七
- 貴州第二十八
- 西藏第二十九



（海南省因有的指標分不開，暫包括在廣東省）

海外民運必須面向大陸

在我心中，國內幾千萬學人和十一億民衆，才是真正的大多數。我永遠忘不了他們。

吳方城

拙作「民主·綠卡·人血饅頭」一文發表（「中春」八十五期）後，引起了不小爭議，有人說此文「行文精彩、切中時弊」、「說出了許多人許久以來想說又不敢說的話」，有的則說它「缺乏民主雅量和遠大目光」、「見木不見林」、「蠢也」，是「脫離了大多數」，甚至還有人說此文是「共產黨付了錢」才寫出來的。無論是非如何，此文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看來文中所涉及的問題至少是不容忽視、值得認真加以探討的。

在八十七期「中春」上刊登了劉名先生題為「勸君要有容人雅量和遠大目光」的文章，以及署名分別為「L·A·J-1讀者」和自稱「對民聯的特務手段早有領教」的「一名留學生」的短文和短信，對筆者進行了批評。那封短信用了太多的罵人髒話，已脫離了民主討論的範疇，自不必作答。而劉名先生的大作的確講出了一些道理，再次引我思深一個我一直思考着的問題。因此，在與劉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討論有關「人血饅頭」的問題之前，我想讓我們先看一看海外的民主運動到底應當當作什麼？它應當面向何方？

海外民運面向何方

一九八二年，中國民聯的前身、「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美國宣告建立，與中共獨裁政權相對抗的海外民主運動就此興起。「六四」大屠殺後，民陣、學自聯等一系列民運組織相

繼成立，海外民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些組織發展成員、主辦刊物、宣傳民主，對海外留學生、華僑和所在國的政界作了不少的工作。國內的紅色恐怖把這些願為祖國的未來出力的人們趕到了相隔萬里的大洋彼岸，在這個自由世界裡，他們有可能在自己呼吸自由空氣的同時為祖國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作一點點貢獻。

然而，真正立志於獻身民主事業的人都一時刻不應忘記，雖然自己遠隔重洋，海外民運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權的社會，因此，我們工作的着眼點必須面向中國大陸。我想，這一點大概是海外民運人士所公認的。

既然有了這種共識，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爭論就應當迎刃而解了。也就是說，我們海外的民運組織、民運人士在提任何口號、作任何事情之前，除了應當充分徵求當地群眾的意見、聽取他們的希望與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冷靜考慮這個口號、這件事是否真正對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有利，從長遠上來講是否會帶來消極的後果或後遺症。劉名先生認為我的文章裡有「見木不見林」的觀點，實際上，劉先生恰恰是把「林」和「木」的位置混淆、顛倒了起來，因為海外的留學生對於中國民運來講只能算作「木」，國內億萬人民大眾才是真正的「林」。劉君大概對這一點不會反對的吧？如果這一點肯定了，那麼倘若只想迎合海外部份J-1簽證留學生的口味、迎合他們的私利

而把中國大陸人民的普遍想法和要求置之腦後於不顧，又怎麼能指望民主事業獲得成功？

兩個大多數與「狹小的氣量」

筆者前不久作為特邀代表之一參加了全美學自聯的「二大」，在會場內外遇到了不少新老朋友，其中許多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筆者的那篇文章。除了眾多的支持者（約佔交談者的十分之八）外，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質疑。「你這篇文章指責了一些J-1簽證的人，脫離了大多數。連毛澤東當年都知道團結中農……」一位討論者這樣批評道。

的確，在當前留美的五萬大陸學人當中，持J-1簽證的佔很大比例（不少於四分之三），這在各國留美學生當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與持F-1簽證的人相比，J-1確實是大多數。任何在留學生中從事民運的人是不應當忽視這個大多數的。因而，以上的指責似乎不無道理，要想民運成功怎麼能得罪大多數呢？然而，說這種話的人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實際上存在着兩個大多數，一個是在留學生當中的大多數；一個是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大多數。換言之，他們忘了海外民運事業不僅僅與數萬名J-1「大多數」有關，而是一個涉及到國內幾千萬學人和十一億人民自由、幸福的事業。如果說海外從事民主運動不能脫離大多數的話，那麼這個大多數首先是在國內，而不是僅止在海外留學生當中。我想提出這問題的

朋友對此也是能夠同意的吧？

至於「團結中農」問題，筆者當然是完全贊同，而且在行動中也是這樣作的，在「饅頭」一文以及較早發表的「我們是怎樣發展民聯的基層組織的」（「中春」七十八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號）之中已有較詳細的論述，這裡不再重複。

然而，劉名先生對於筆者苦口規勸一些從不關心祖國前途、從未參加過任何民運活動而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烈士鮮血換來的權益的人，竟「不禁喟然長嘆」，嘆筆者「堂堂男子，器量何其狹小耳？」

這種涉及到個人素質和修養的評判大概與這場討論關係不大。不知劉君在大作之先有沒有從頭到尾讀過一遍我的文章。請注意，筆者從未籠統地反對過個人私利，正相反，在拙作中恰恰對某些「權威」們偽道學的欺人之談予以了抨擊，對作為天賦人權組成部份的「私」字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筆者所反對的只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去謀求個人私利、作出沾污了民主崇高的旗幟的行為。稍微客觀一點兒的人們都不難看到，國內的廣大人民、特別是數以千萬計的嚮往民主的青年學生對這種行為會是什麼看法。劉文中聲稱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六四」後美駐華使館「大幅度放寬簽證尺度」，又斷言「未聞流血犧牲的北京市民斥責」一些人在吃「人血饅頭」，這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只要同「六四」後從國內出來的留學生稍稍談一談，就不難發現，國內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對遊說通過波洛西案和一些人打着民主旗號搞個人居留有着強烈的反感。由於對「一」簽證者劃一的免除回國兩年，已使國內與海外的民運加深了隔閡和疏離，難道海外的民運人士對於由此而留下長久的後遺症的這個嚴峻的事實能夠視而不見嗎？

醜陋的中國人

就在筆者這篇引起爭議的文稿投出後不久，又耳聞了幾件令人「喟然長嘆」的事情。

其一，去年六月二日，當血腥的屠殺在即、大軍壓城之時，在某校農學院的一位研究生在電視中看到北京學生與軍隊相對峙的場面時，竟情不自禁地對着螢幕叫道：「快用機槍掃啊，打死了人我們就能在美國留下了！」

其二，在筆者所在學校，有兩個至今仍追隨中共的「職業學生」（「訪問學者」），多年來一直在向大使館打同學們的「小報告」、送黑名單，追查校園裡的民聯成員和其他民運活躍份子。他們為虎作倀，幹了許多不光彩的事，至今仍在秉承使館的意旨，進行「秘密串連」，搞非法的共產黨「地下活動」。然而此時此刻，他們也在若無其事地去辦理申請綠卡，享受美國政府的「保護」了。

其三，最近叛逃的中共駐美大使館三秘帶出了一則消息，即原教育處二等秘書夏穎奇先生，因鎮壓肯塔基大學等地的學生運動有功，特別是在「六四」事件前後所表現出的「忠誠」，最近被破格晉升為一等秘書。

不知劉名先生平時與留學生接觸到底有多少？不知根據什麼宣稱「沒有任何一個留學生公開站出來為中共創子手唱頌歌」。只要稍稍觀察一下就不難發現，正如中共密件所披露的那樣，在海外大陸學人中確有為了種種目的、追隨中共、乃至「為創子手唱頌歌」的人，包括公開唱頌歌的人，盡管不到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五。前面提到的那兩個「職業學生」，就曾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為中共的血腥鎮壓塗脂抹粉，說什麼「對於暴亂就是要鎮壓，不鎮壓怎麼行？」難道類似這樣的人和事，劉君真的在周圍的留學生當中從未聽聞嗎？如果說以上提到的三個例子當中的人是在吃人血饅頭，而且是有意的、起勁地在吃，劉先生大概不會反對吧？

至於那些對國家前途和民主事業漠不關心却又大大方方地享受由烈士的屍骨換來的好處

的人，或許並非都意識到自己是正在吃人血饅頭，對於這樣的人，難道我們不應當去喚醒他們的良知、向他們擊一猛掌嗎？

劉名先生確實是個「堂堂男子」，對以上的人和事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然很有「容人雅量」。但這對腦中尚有熱血、尚懷赤子之心的筆者來說卻實在是作不到的。每當我看到這樣的人、聽到這樣的事，都不禁熱血沸騰、久久難以平靜，忍不住從自己內心深處對這些正大嚼饅頭的人痛心疾首地呼喊一聲：「停止！你們這些醜陋的中國人！」

※ ※ ※ ※

其實，平心靜氣地講，我同劉名先生的想法頗有共同之處。他不是也被八九民運期間的一條標語口號「為了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必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所感動，承認「正是一大批熱血青年的自我犧牲精神，喚起了全民的參與熱情」嗎？他也不是在那裡「寄語」：「對民運漠不關心的逍遙份子」，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值此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足下將何以自處？」嗎？因此，在結束這一討論之前，在對那些渾身沾滿血污、為中共助紂為虐者表示義憤的同時，我願對那些從未參加過民主運動、又因「一」免除回國兩年而心安理得享受居留權益的人，再次重復一遍我在「饅頭」一文中所說的、出自肺腑的話：

「當你籌劃今後如何在美國尋求綠卡、永久居留、描繪自己錦繡前程的同時，想一想那些倒在天安門廣場內外、年輕的軀體被坦克碾碎、永遠不能再復生的人們吧，是他們給你們帶來眼前的一切。如果你們過去從未想到過要對中國民主事業的進程出力，那麼請現在就喚醒你的良知吧，為中國民主、為中國前途作一點事吧——哪怕是一點點。」

權利的享有與

制度的爭取

羅海平

世上常有些貌似難以解決的矛盾。

吳方城先生的文章「民主、綠卡、人血饅頭」(登於「中國之春」八十五期)好像也陷入了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矛盾情境中。其實，民主制度下人的行為規範，同進行中的民主事業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從理論上來說，民主作爲一種政治制度，是一套使人民有權選擇政府形式的運作程序，其隱含的基本思想是：人生而平等，有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權利。中國的民主運動正是以在中國建立一個權力平等的公民社會爲己任。

當前，中國本土正在發生着「逃亡潮」，人們蜂湧地「出國求榮」，身在海外者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抓住一切機會爭取居留，這種行爲既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使然，尤其共產黨一黨專政屠殺暴斂所逼。在一個沒有明天的「共產主義」世界，東德人民的逃亡潮，誘發了柏林牆的坍塌，在頑冥不化的阿爾巴尼亞政府，也不得不對「避難」的人海作出讓步。大批中國留學生滯外不歸，無數才華之士流落海外，其客觀效果是對共產黨罪行的消極反抗。人活在世上，依基本人權而言，似乎並無義務背負「爲國爲民」的十字架，只有責任遵循不傷害他人，不破壞人類生存空間的社會公德。在一般人看來，願意投入自己的時間精力乃至生命去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者，的確可欽可敬，但別人若另有想法和做法，也似乎無可厚非。

可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

就會看到民主權利並非只有個人自由選擇這一面。個人選擇的自由需要由一整套社會制度來維護，我們在這裡所享有的自由選擇的權利，後盾正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作爲公民個人權利的保障，是人類經過千百年不斷探索、抗爭和奮鬥才創立出來的社會體系，這個體系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自然生長。專制勢力的存在，使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成爲曠日持久，生死存亡之戰。君不見東歐社會主義集權大廈傾刻連鎖坍塌的背後，是匈牙利事變、布拉格之春、波蘭團結工會的連年抗爭。只有長期、大規模的、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群體努力，才能爭得向民主社會轉化的契機。在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中國，共產黨四十年統治將獨裁專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邁向民主社會的過程更是艱難、曲折、漫長、血腥。百年奮鬥拚得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實現民主需要更多的中國人「一起來行」。天安門廣場的青年學生與市民用他們的熱血與生命來喚醒國民，但至今許多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階層依然對傷及個人利益的「行」退避三舍。吳先生的文章爲在美學人對支持國內民主運動的「行」不如「解決身份」的「行」那樣踴躍而大聲疾呼，希望刺一刺消極者轉變態度，希望大家在尋求安居樂業的同時莫忘爲中國的民主做一點事，莫讓民主志士們的熱血消褪無痕，更莫與獨裁專制勢力助紂爲虐。這是一個正義的呼聲，他敢就中國學生諱避的敏感問題直陳己見，其誠其勇確實可嘉。試想，如果個個獨善其身，對衆

人心態不聞不問，如果無人爲爭取、激勵更多的投入民主運動而不斷疾呼，民主運動的形成，民主制度的實現顯然就無望了。爲此，筆者支持吳先生的立場。

這一批中國留學生，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批全面接觸外部世界，廣泛領受西方文化薰陶的高等人才。民主精神對這批人才的影響，僅從對吳文的論辯中可見一斑。憑心而論，這批人才如果真有相當部份回國服務，不論是以歸僑、華裔或任何身份，都是民族之幸，都是中國民主進程的促進力量。由於歷史的發展，中國留學生回國的強制性被取消人，但我們對中國民主事業、中華民族與旺所負有的責任並沒有消失，遠方那片熱土對誰而言份量也不輕。選擇的自由源於天賜。在一個完備的民主社會中的人權規範，當然不會等同於民主事業中的行動準則，前者是享受成果，後者是開創新河。開創，少不了奉獻。我們的幸運出逃，在民主事業的過程中並不等於責任的豁免。在我們牽念的那片土地上，專制暴政還在肆虐，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共產黨在撕下全部假面，人心喪盡之後，用以維持統治的最後一個法寶就是逼迫人們服從，消滅任何反抗的機會及行動。我們這一代中國人，註定了不是做專制的沉默受害者和服從者，就是做不屈的叛逆者及抗爭者。無論我們身在何處都逃避不了這一事實。我們與其繼續默從自保，不如起來抗爭，盡已所能投入中國民主運動，力促共產黨獨裁政府早日倒台，讓專制制度結束在我們這代人手中，爲中國未來的發展衝出一條路來。

在尊貴的個人自由權利與崇高的爲國奉獻精神發生矛盾、衝突之時，爲了後者而不惜犧牲前者的志士是英雄，要個人自由也不忘祖國民主事業的平民亦是戰士。對於只看見既得利益，全無責任感的人物，「人而饅頭」之說盡管刺耳，可却不幸而言中。遙對故國，我們如何作人，真是不得不衡量衡量。▲

也談「光榮的群體」

黎曉迪

劉名先生在「勸君要有容人雅量和遠大目光」一文中對吳方城先生的「民主、綠卡、人血饅頭」一文大加鞭撻，並稱中國留美學人是「光榮的群體」。對此本人不敢苟同，特與劉名君商榷。

首先附上照片一張。這是八九年六月三日夜筆者親自在北京拍攝的。

去年夏天筆者作為美國一些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的代表回國參加了北京的民運並於六月三日那個月黑夜目睹了北京大屠殺。我不想說謊，當時我確時害怕過，恐懼過。然而，我能夠投身於這一歷史事件中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代表着幾萬留美學生這一「光榮的群體」。我不能沾污「留美中國學生」這一稱號，哪怕為此而死。

當我再次回到美國時，對這一「光榮的群體」却是另一種認識了。你想開個會討論國內的形勢嗎？與會者寥寥無幾，原因是大家「太忙」（但如果你要開 PARTY，總是不乏積極參加者的）。你想組織個紀念六四的集會嗎？大家不願參加，理由是「我的父母還在國內」。你想徵集簽名或捐款嗎？對不起，那位老兄的回答是：「我要先買了那幾大件再說。」任何有關民運的活動，你要不厭其煩的發通知，甚至挨家挨戶地去敲門，似乎是在祈求着什麼。但如果一位移民局的官員來學校給中國學生講解移民法，不用發通知也會人滿為患。我會多次問題自己：這就是一年前我曾在北京代表過的那個「光榮的群體」嗎？

更奇怪者，有些聲稱不介入政治活動的人，唯一感興趣的就是 J-1 的遊說。這些人藏於密室之中，制定綱領、口號、鼓動他人出頭露面。他們伶牙利齒，老謀深算，令筆者大開

眼界。但如果領館人員來校時，這些人又會出面迎接，百般奉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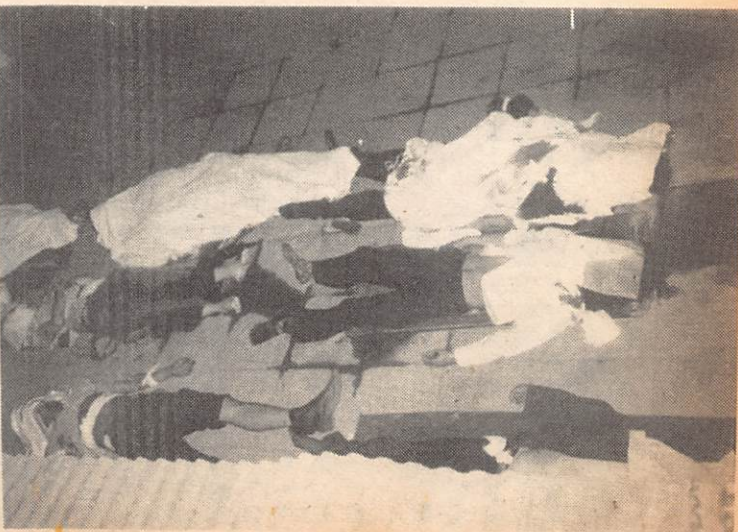
還有這樣一個故事：去年六月初的一天，筆者所在學校的一個持 J-1 簽證的訪問學者竟興奮地大叫：「終於開槍了，咱們全可以留下來了！」不知諸位看官對此作何感想？

讓我承認有人在吃人血饅頭，實在是一個令人痛苦的過程，特別是他們就存在於我曾代表過的「光榮的群體」之中。但是我們不必忌諱這一事實。獨裁者的槍聲打碎了人們對共產黨的幻想，也使很多中國留學生有機會留了下來。有人講那些想留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是六四屠殺的唯一受益者，這話雖然難以接受，但自有其道理。

筆者認為選擇居留地是每個人的自由，也反對中共以「母國需要」為由強迫自費生申請 J-1 簽證，以迫使他們回國。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我們中的一些人以六四為「天賜良機」而留了下來。對於那些以北京屠殺為藉口留在美國而又從不願參加民運的人，最好能讓他們捫心自問，自己是不是在吃「人血饅頭」。

今年初從國內出來的朋友告訴筆者：國內的學生最擔心的就是美國國會通過波洛西法案。因為他們怕中共以此為藉口斷絕了他們唯一的出路——出國留學。國內同學們的這些想法的確有些偏頗，因為不論有沒有波洛西法案，中共都會緊縮留學政策的。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沿着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今後再為自己的求職而遊說國會，勢必增大我們和國內同學們的隔閡，以致形成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將來我們還有何面目去見國內的父老兄弟？

我永遠忘不了去年六月三日之夜在北京木樨地的學生、市民面對着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的



情景：隨着一聲聲的槍聲，學生一個個倒了下去，但整個人群巍然不動，「國際歌」聲迴蕩在北京的上空……與這個「光榮的群體」相比，我們還有什麼權力把這個稱號賦予自己呢？

請劉名先生和諸位讀者再仔細地看看這張照片，想想那些為祖國的民主而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烈士。我們為自己能留在美國而做的努力已夠國內的同胞們寒心了，不必再標榜遊說通過波洛西案，從而使美國政府下達行政命令這一「勝利」了吧！

最後，我非常感謝「中國之春」登謝了吳方城先生的文章。我欽佩吳君敢於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來發表這種「挨罵文學」的勇氣。我也知道「中國之春」為此受到許多指責和壓力。這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它說出了許多積極參加民運的同學的心裡話。文章刊出後，我校園學會復印並推荐此文給全校中國學生。筆者也因為此文開始訂閱「中國之春」雜誌。▲

免費搭車及在野政治

中國的在野政治不但不是純公共財，而是潛在收益極高的事業。柴玲和吾爾開希的成功會成為刺激國內新一代政治「野心家」的一個信號。

楊小凱

吳方城先生提到的免費搭車現象，我十分同情他的感慨。在專制國家，在野政治就是種公共財，誰都想享受，但誰都不願付費，自然是求過於供，產生短缺。但這是所有專制國家的通病，我們只能期望將來中國的民主政體下會有一些機制對從事在野政治的人給以重賞。一是競選勝利後薪水要很高（應十倍於現在鄧小平的工資）；二是競選失敗後要有些補償規則（如美國的費拉羅競選失敗後，其夫逃稅的罪行為被赦免等）；三是參加競選的人滿足一定條件，國家應給以財政支助。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可說是很少選擇，你總不能改變人目私自利的本性吧。政治是種風險極大的賭博（不論在民主國家或專制國家），既然吳先生已賭上了，則埋怨別人免費搭車並無濟於事，只能期望將來的風險收益會十分優厚——一個民主和強盛的中國，一個十億中國人可以自由施展才幹的中國一定會給今天在野政治家帶來豐厚的風險收益的。

不過話說回來，由於中國政治的國際化，中國在野政治的公共財性質已大大改變。在國際政治這個市場上對中國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已部份地解決了免費搭車的問題。首先是劉賓雁、方勵之事件引起海外強烈反響，使他們一夜之間成了世界知名人士，劉賓雁、方勵之都因此撈到了巨大的物質和名譽上的收益，

這就使在野政治在中國不再是純公共財，很多中國知識份子都從這個經驗看到，中國的在野政治不但不是純公共財，而是潛在收益極高的一項事業，有效需求極高。這刺激了戴晴（付凝）及其他知識份子掀起新的不同政見運動高潮。學生中有下意識或明確政治野心（此詞在此毫無貶義，正如美國法律要求總統候選人必須有足夠的政治野心才夠資格一樣）的人也看到了這種潛在的有效需求和可能的高報酬，把不同政見運動發展為公開的反對派運動。他們的眼光的確不錯，這個運動領袖人物後來都一夜之間成了世界級政治明星，物質和名譽上的收益令許多老資格的政治家吃驚，當然風險也極大（有不少人為此坐牢、犧牲了生命）。這些高報酬率使體制內改革派從美國基金會得到的一點資助相形見拙，這也是對很多體制內改革派的一個刺激。

平心而論，劉賓雁是個政治上幼稚得像小孩，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看看他對共產黨五十年政績的固執的讚揚就知道他的犬儒主義性格。我所認識的很多右派份子都說文革初老百姓可以造當權派反的氣氛比五〇年代的馴服工具論氣氛要好，而真正有政治理解力的人絕不會認為中共五十年代的政績能與國民黨三十年代以來在立法、司法上的深厚基礎相比。看看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就可知他對經濟一

竅不通，與張五常的「通過貪污使共產黨特權私產化」的思想比起來，劉賓雁的清官思想實在是淺薄得可笑。在中國有從商實際經驗的人都會對貪官比對清官好感，清官使大家都窮死，什麼事也做不成，貪官使資本主義可以把特權贖買過來（當然這種看法不適用於非共產黨社會，也正如張五常所言，貪污制度化了也不利於特權私產化）。以劉賓雁這種素質不高的人可以贏得「中國不同政見者代表人物」的地位，一方面是國際輿論受共產黨誤導（共產黨批的人國際輿論就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把中國在野政治服務從公共財變成私有財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刺激出人們從事在野政治的「野心」。

像柴玲和吾爾開希這種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在一個民主政治中是不可能坐直升飛機成為政治明星的。柴玲和吾爾開希的成功是共產黨制度的悲劇，在這種制度下真正一流的反對派政治人材永遠不可能成功，成功的總是三流政治家或是政治的門外漢。另一方面，柴玲和吾爾開希的成功會成為刺激國內新一代政治「野心家」的一個信號，它告訴人們中國的在野政治並不是純公共財，而是有豐厚實際收益的私有財，潛在的有效需求是巨大的，這種收益與風險相比可能值得人們冒險從政。想想吾爾開希過去一文不名，六四之後居然可以佔用美國各大電視台價值上千萬的黃金時段信口開河講些美國人認為毫無內容的口號，這收益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從這個意義而言，吳方城和我們大家關心在野政治的人又不能埋怨人家免費搭車。因為選民通過中國政治的國際化間接付了費（雖然是由美國人、香港人、台灣人掏的腰包）。正像電視觀眾通過廣告商對電視節目間接付了費一樣。只是這種付費由於國際輿論被中國共產黨誤導產生了信息歪曲——強迫觀眾看他們不愛看的廣告一樣，報價不是給水平高幹實事的人，而是給了水平低被共產黨直接攻擊的

人。但想這種報酬刺激更多人從事在野政治的效果，我們也不必埋怨太多。政治要講專業化，競選是不能搞業餘的，而要像朱高正那樣，不但自己要專業化，而且要雇很多全職政治助手，一般選民沒有這種直接的政治收益，他們當然沒有興趣從政，他們的功能只是追求他們的利益，讓政治家代表他們的利益而已，你能過份埋怨他們免費搭車嗎？

以我之見，民聯民陣將來還是會有前途的

愛護民運出頭鳥

許力偉

孩時讀「三國」，我總感到奇怪：為什麼打仗的勝負，總取決於雙方兩員一馬當先的主將的武藝高低？好像與士卒的數量和質量沒有關係似的。直到「文化革命」中，親眼目睹幾次小將們的武鬪，才悟出其中的奧秘。

武鬪的場面往往是這樣的：手握棍棒等原始武器的兩陣群眾對峙成兩個相切的弧形（好像一個小寫的X字母），相切的那一點也就是兩陣中最勇敢的兩只「出頭鳥」（即主將），其餘大致根據其勇敢程度排列，越勇敢越靠近該相切點和敵陣，較膽小的站在後邊，實際上只起吶喊助威作用，而並不同敵方真正接觸。因此，兩只「出頭鳥」的強弱自然基本上決定了兩軍的勝負。

由此我想到了「出頭鳥」的作用和意義。中國人歷來對「出頭鳥」有貶義理解的。「槍打出頭鳥」的民諺就反映了一般人的看法。因為「出頭鳥」的命運往往不佳，故大多數人不願充當。然而它對歷史的進步是不可缺的。根據上述對兩陣對峙的描述來看，「出頭鳥」即是隊伍前進的標誌，很大程度上又是隊伍進退的決定者。由此可推斷整個民族的勇敢程度同

這兩個團體不是密謀小團體，一個有一九八〇年民主牆運動為基礎，有一代人與之認同，因此會形成一個群眾性政派（這是現代民主導向的政黨的基礎）；另一個有一九八九年民運為基礎，有可能另一代人（是政治意義上的代不是年齡意義上的代）與之認同，也可能形成群眾性政派。中國政治中常聽說帝王不怕清議（即現在說的言論自由）却怕異己結社「坐大」，正像波蘭團結工會一旦「坐大」，共產黨

其「出頭鳥」的勇敢程度成正比。

如果沒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出頭鳥」冒着丟職、批判和囚禁的危險，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廣場上的王丹、柴玲、吾爾開希，能有如此廣泛的全民參與八九民運嗎？同樣，沒有海外各民運組織的少數「出頭鳥」領頭「反革命」，那有廣大留學生對中國政府的屠殺和反人權行徑進行廣泛持久的抗議活動？

在分析中國為什麼不根除專制的原因時，有些人歸之於中國人的膽怯、懦弱。事實上也是如此，「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在內外近代華人中越來越少，連紐約街頭的搶劫暴徒也深知其要道，專撿華人下手。如果我們大家都採取「多一事勿如少一事」的態度，到頭來受害的只有我們自己。所以，中華民族需要千萬個「出頭鳥」挺身而出，與大暴君和小暴徒們鬪爭，以壯民族的士氣和闢志。當然，人多勢眾，對「出頭鳥」也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出頭鳥」往前衝，如果眾人不緊跟上，那麼「出頭鳥」就會孤軍陷入敵陣，終將寡不敵眾。所以群眾是否能緊跟「出頭鳥」，也決定

的政治壟斷就被打破，以後的政治發展就不能由任何個別團體操縱了。今天民聯民陣「坐大」的大局還未定，但看得出來這種局面的可能性是極大的，這是為什麼共產黨怕民聯民陣怕得要死的原因。至少民聯民陣在海外中國留學生中已經「坐大」了，共產黨在這個社區中已力不從心，無法與民聯民陣較勁了，而這些留學生中的不少人將來都會是中國的中堅，時間不是對中國的反對派極有利嗎？▲

了「出頭鳥」的決心、勇氣及臨場發揮。

因此，我要大聲吶喊，讓我們一起緊跟「出頭鳥」，保護「出頭鳥」。「中國之春」第七十七期上李少民先生在「我對中國民聯的看法」一文中說到：我們必須保護最「反動」的，才能保護次「反動」的，方才能保護我們每一個人有自由發表言論、做人的權利。千萬不要再人人自保，爭先恐後地同最「反動」的劃清界綫了。

最近看到幾份中國政府關於當前留學生政策的文件。他們把留學生分成五類，屬第五類的就是「積極組織、策劃反政府活動的反動骨幹份子」（即本文所指的「出頭鳥」）。文件稱：「他們是揭露和打擊的對象，要在適當的時機選擇其中影響大、情節惡劣的為首份子進行公開的揭露和打擊」。並欲爭取中間，孤立第五類。中共採取的仍然是槍打「出頭鳥」的老戰術。可是，「六四」屠殺之後，世人都徹底看清了中共現政權的法西斯淨潔面目，「出頭鳥」的陣容越來越壯大。

我希望民運「出頭鳥」們不要因為到了海外，面對輿論及人們的熱烈期待而飄飄然起來，要時時清醒地認識到當「出頭鳥」確有危險，站在高處，四面受敵，甚至還得防備來自內部陣營的攻擊，故自己要處處以身作則，不斷切磋武藝，強大自己，才能打勝未來的戰鬪。讓我們人人爭做「出頭鳥」，人人愛護「出頭鳥」。▲

度過困難的時刻

記民聯聯委會緊急會議

曉珍

七月四日到五日，中國民聯聯盟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前在華盛頓召開。這次緊急會議的起因是民聯主席胡平的「總辭」。

六月二十八日，胡平向民聯聯委會和監委會提出包括其本人和四屆總部、「中春」編輯部人員的「總辭」，要求聯委會在一週內對新的總部人選作出安排。風聲很快傳到報界，立刻輿論大嘩，各種傳聞、猜測接踵而來，一家報紙甚至聳人聽聞地聲稱民聯將要「解散」。儘管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人事的更迭，包括領導人的辭職，乃是正常的事。然而，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不能不使民聯上下為之震動。這個已成立七、八年之久的、海外第一個與中共獨裁政權相抗衡的民運團體將如何面對這一危機？她能不能經受得起這次衝擊？這無疑是對民聯再一次的嚴峻考驗。

「三權分立」在行動中

自從民聯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來，鑒於前主要領導人由於盟內民主制度不健全，從個人專權開始，一步步腐化，最終被開除出盟的慘痛教訓，為了使新的領導人不再重蹈覆轍，給組織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盟內建立了聯委會、監委會、總部即立法、監察與行政「三權分立」的民主架構。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權力制衡的

架構，一年來，雖然盟內曾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次又一次這樣的問題，諸如財務困難、一些領導人員的意見分歧、個別基層組織內的矛盾與紛爭，以及前一階段盟外某些人刮起的「抓特務」風等等，整個組織仍能保持穩定的運作。簡而言之，民聯的聯委會有點像民主國家的議會，是全盟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立法機構，監委會則相當於最高法院，是監察與司法機構，而由主席、副主席領導的總部則相當於政府，是行政機構。制訂法律或章程的人不參與行政、不受薪，行政的人無權制訂法律或章程。站在「人性是惡的」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出發點上，這樣一種架構將能比較有效地限制絕對的權力或獨裁，制止「人性惡」的無限擴張，作到權力的相互制衡。

現在，盟內似乎又一次出現危機，這個「三權分立」的架構能否對面而繼續保持組織的團結與穩定呢？對這一架構起着舉足輕重作用的聯盟委員會能不能在此時刻挑起重擔、力挽狂瀾呢？事實作出了回答。

就在得知主席胡平「總辭」的當夜，聯委會立即與監委會和總部通過電話與傳真進行了緊急磋商，決定立即提前召開原訂於七月底舉行的第六次聯委會會議。七月三日深夜到七月四日凌晨，在美國境內的九名聯委委員，遠至

數千里外的加州、德州、喬治亞、肯塔基和新罕布爾州，近至新澤西、馬里蘭和弗吉尼亞，先後搭機或驅車兼程趕到華府民聯總部，在那裡與民聯主席、副主席、監委主任、「中春」主編、總幹事與辦公室主任相會合，一次聯委會的緊急會議便這樣召開了。

在會上，首先宣佈了監委會於七月二日作出的裁決：根據總章，無「總辭」條款，因此，在未徵得總部、編輯部職能人員同意的情况下，「總辭」在法律上缺乏約束力，故不能視之為有效」。因此，僅能認作其個人的辭呈。

接着，主席胡平在會上解釋了他之所以提出辭呈的理由。他說，其主要起因是總部財務幹事在一份財務報告中所提出的財務嚴重超支問題，使他覺得自己已有難咎之責，故本着自責的態度提出辭呈。

熟悉民聯組織運作的人士都知道，類似胡平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包括財務問題在內已屢見不鮮，而民聯過去大都能夠一一加以妥善解決，甚至像罷王事件和幾次「抓特務」風這樣的衝擊也未能使民聯動搖，眼下的困難顯然並不足慮，沒有必要過度緊張。

直言以對，坦誠相見是民聯組織生活中的傳統。針對這一事件，與會的眾多聯委委員們對胡平主席提出了善意的，但又是十分尖銳的批評。大家認為，一個海外的民運團體，在運作中勢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難和問題，作為一個領導人，特別是一個主席應當沉着、冷靜，通過與各方面的溝通與協商加以解決，一出現問題，遇到壓力就提出辭職是一種十分不妥當的態度。尤其目前海外民運正處於暫時低潮，而民聯在經過八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正日益變得成熟、堅強，聲望正在不斷提高之際，出現這樣突如其來的「總辭」，其客觀效果，不但無助於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有可能造成新的政治危機，這恰恰與胡平主席對失誤負責的原意南轅北轍。聯委會認為，胡平主席總辭一舉失當，希望他能挽回影響。

七月四日夜，民聯主席胡平在會上正式撤回辭呈。

亡羊補牢，共渡危機

然而，儘管胡平「總辭」的危機似乎已告結束，但存在的問題仍有待加以解決。為了避免今後出現類似危機時給組織造成重大傷害，為了充分發揮聯委會的職能，共同克服當前困難，從而使我盟民主架構更加堅強，聯委會接着研究、通過了一系列的議案，其中包括：

▲宗繼祥委員提出的關於修訂民聯財政預算的議案。通過精打細算，每月全盟開支縮減百分之二十，財政上出現的暫時問題將不難解決。

▲吳方城委員提出的中國民聯辭職法。自此，今後有關領導人的辭職辦法將有章可循，不致造成再次的「地震」。

▲馮勝平委員提出的聯委會主任委員定期選舉制。通過每三個月一次重新選舉的辦法敦促領導人努力盡職，作到權責一致。

▲徐邦泰主任委員提出的增設聯委會副主任委員的議案。以此進一步加強聯委會的運作。

會上，聯委會當即進行了投票選舉，徐邦泰再次當選為主任委員，吳方城當選為副主任委員。

列席會議的副主席黃奔、總幹事汪岷、辦公室主任張卓之以及「中春」主編丁楚都在會上對改善今後民聯的運作提出了自己的打算和計劃。「中國之春」雜誌已獲准在台灣發行，丁楚將赴台安排具體事項。此外，「中春」澳洲版也已出刊，對正在快速發展中的民聯澳洲各分、支部的工作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總之，與會人員盡管對有些問題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那就是，此時此刻所需要的是全盟上下一致的精誠團結，從而亡羊補牢，共渡危機。

民聯是有希望的

俗話說：「疾風知勁草」，這次突發的「總辭」危機也再次考驗了民聯這個民運團體的內聚力。

為了減緩暫時的財政困難，這次聯委會成員全部自費前來赴會。他們匆匆扔下自己的工作或假期，沒有一點怨言，無論是花幾百元錢自付機票還是開上十幾個小時的汽車，都心甘情願。一位旁觀者感嘆地說：這並不是每個民運組織的領導機構都能作到的。

會上，大家聯署了一份為民聯捐款的倡議書（見附件），決定把自己每個月個人收入的百分之五拿出來捐給民聯。主席胡平和主編丁楚也表示願意捐出一個月的薪金以幫助組織渡過難關。

得知組織出現危機，各地盟友紛紛表示關切。海外不能及時趕來參加會議的聯委委員、日本分部負責人姚月謙，聯委委員大洋洲大區聯絡組負責人陳抒塵和在南美的聯委委員李國愚，都先後打來越洋電話提出意見，詢問會議的進程。盟員張益唐、虞孝成、李兆陽、盧煜中等人還向聯委會和總部寄來了支持信和個人捐款，使與會者深受感動，信心倍增。

「作為一個盟員，我對於總部最近遇到的困難感到極為關切」，現任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自治會會長的張益唐同學在用快遞寄到聯委會會議上的一封信中寫道，「在此關鍵時刻，我願意履行自己的承諾，向你們寄上三〇〇〇美元的捐款。」

「在這裡，我只是作為一名普通盟員，作為一名有良心的中國人，作出自己的奉獻。同時，我願意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向胡平主席及民聯其他負責人，提出我的希望。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去年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奄奄一息的絕食學生；不要忘記在『六四』屠殺中倒下的同胞。想一想他們所作的犧牲是如此之大，而我

們這些在海外自由土地上搞民運的人士，特別是在民運中有了知名度的人，還有什麼理由把自己的私利看得過重呢？我們不能讓民聯的旗幟在我們手中倒下，不能讓海內外一切同情、支持我們的人感到失望，不能讓我們的對手找到把柄來攻擊我們。如果發生那樣的事，那將是我們最大的恥辱。」

盟友們、民聯的領導人們，讓我們記住這些話吧！

民聯是有希望的。
中國的民主事業是有希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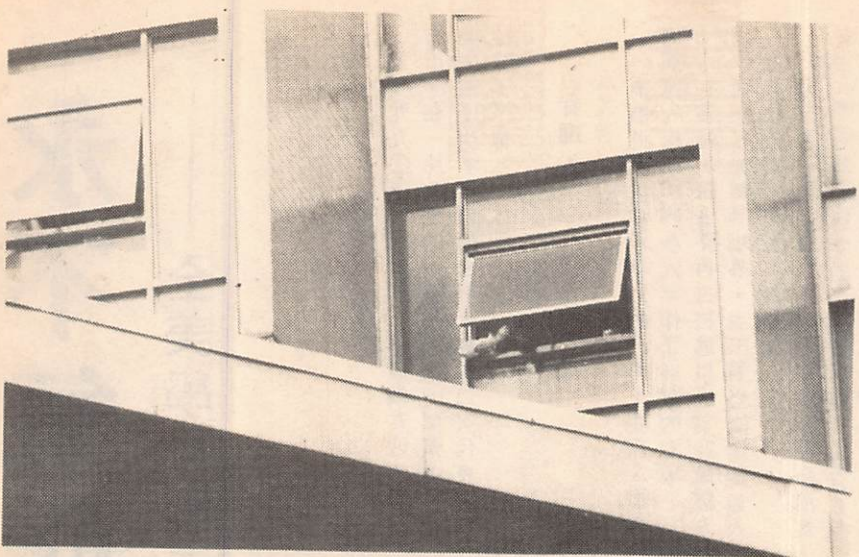
為中國民聯捐款的倡議書

為了解決當前中國民聯出現的暫時財政困難，有助於民聯運作的正常進行，我們決定：把自己每月個人收入的百分之五捐獻給中國民聯。

我們同時倡議：民聯各級領導人和全體盟員都能在此時刻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積極向民聯捐款，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聯委會第六次會議與會者：

吳方城 汪岷 江文
高松文 黃奔 徐明
胡平 宗繼祥 張卓之
任光 呂凡
薛學 丁楚
徐繼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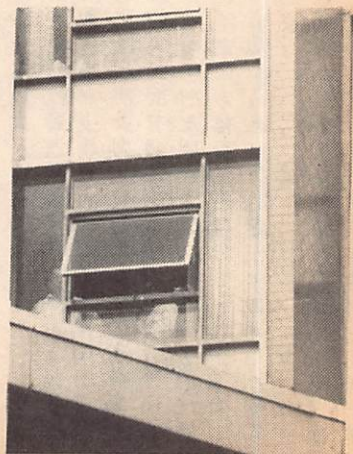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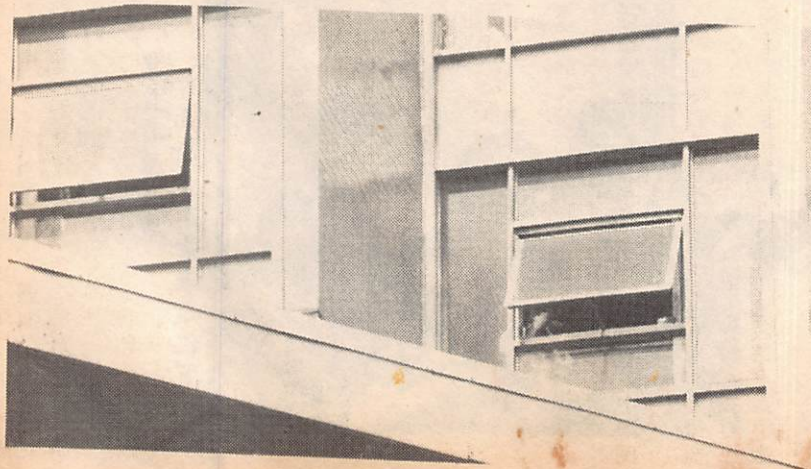
中共領館的窗口

陳一

六月三日，我隨同本校一批同學集體來到紐約中共領事館前的「天安門廣場」，與其他學校的學生、學者及各界僑胞一起，向一年前為中國民主事業而獻出了寶貴生命的死難烈士表示沉痛悼念，並聲討中共領導集團的法西斯罪行。正當我們面對中共總領事館揮拳高呼口號時，我忽然發現領館幾個窗口人影閃動。有幾個人正在探頭探腦。仔細一看，原來他們手中拿着長焦鏡頭相機以及錄相機，對着示威群眾拍攝。原來他們故伎重演，想把參與抗議活動的同學的面目記錄下來，以備「秋後算賬」。中共這一手在去年六四後的大逮捕中確實起了大作用。

看着這些人的卑劣行徑，我怒火中燒。於是，我也舉起我的長焦鏡頭相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他們的醜行記錄了下來。（見照片）

如果在六四以前，在美留學生對於總領事館的這一套特務手法還是存有某種恐懼的，因為大家怕回國遭到政治迫害或者累及家人。現在不同了，認清了中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而且受到天安門廣場英雄們鼓舞的大多數留美學生，決心以各自可能的方式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我們用不着躲躲閃閃，敢於正視那些躲在窗口後面的人。我想在此問問這些人：當民主、自由的旗幟在中國大陸高高飄揚時，你們如何向人民交待，向你們的一切有良心的親友們交待？



永不氣餒

嚴英 孫良

全美學自聯二大側記

一九九〇年七月六日，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在一片會意的掌聲和愉快的氣氛中，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會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拉開了序幕。

普通人

有關此次大會最精彩的一幕——主席、副主席競選的場面，許多人早作了詳盡的報導。在這裡，筆者不再去描述以上這些風雲人物，而把目光轉到場外，看一看幾位像普通人一樣與會但實際上並不普通的人。

與筆者一見如故，來自中西部某校自治會代表、學習材料科學的劉大雄同學，在「六·四」之前，代表美國若干院校的中國同學，專程趕回北京參加了八九民運。在「六·四」大屠殺前後的四個月當中，他只身一人，擄上一台像機，跑遍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木樨地、各大專院校以及醫院各處，冒着槍林彈雨實況採訪，拍攝了一百多張屠城場景的珍貴照片，連同他以自己的親臨目睹所寫的一個長篇回憶錄，冒着危險帶到了國外。在北京期間，他曾被監視、跟踪，甚至被捕入獄，關了二日，後因證據不足而釋放。

「當士兵開槍、你拍攝殺人場面時，不害怕嗎？」筆者問。

「的確害怕。」這位年輕人靦腆地承認道。他身材高大魁梧，然而不善談吐。「但我想到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的囑托，一想到這是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刻，我就不怕了，哪怕是死。」此刻，在他忠厚、樸實的面孔上露出了嚴肅的表情。

「我準備再回國去。」最後，他簡短地說。

他的語調是堅定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這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的決心。中國的希望不正是在這些普通人的身上嗎？

特邀代表

自一年前全美學自聯成立以來，民聯和學自聯分別作為海外第一個公開與中共獨裁政權相對抗的民運團體和「六·四」後建立的、海外第一個大規模的中國學生學者自治組織，建立了良好的兄弟合作關係。特別是近半年來，民聯與學自聯和民陣等組織聯合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六·四」周年大示威、民主大學和對中共的多次抗議行動。這次，中國民聯的三名成員連夜兼程從華盛頓總部驅車趕到這裡，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是聯盟委員會主任委員徐邦泰、副主任委員吳方城和民

學自聯原主席

向新當選者表示祝賀



聯肯塔基分部負責人石劍鵬。

由於這幾位特邀代表是剛剛參加了民聯聯委會緊急會議之後趕來的，許多與會民聯成員和關心民聯的朋友們，包括萬潤南、李祿等人紛紛前來詢問有關民聯主席胡平最近提出「總辭」的事。朋友們都希望久經考驗，已成立將近八年之久，有看「三權分立」民主架構的中國民聯當能通過自身的運作，渡過這次暫時的危機。

不少代表在休息時走到場外擺着的《中國之春》書攤前，與吳方城熱烈地討論起他的那

篇在「中春」八十五期上的引起爭議的文章《民主·綠卡·人血饅頭》。

「你的那篇文章寫得很好，很及時，說出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我們支持你。」一位代表走過來握手該文作者的手說。許多人認爲，這篇文章切中時弊，爲海外民運人士敲響了警鐘。當然，也有的人持不同的看法，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

「我們要切切實實爲民主事業作些事情，」新選爲本屆學自聯美西區理事，來自加州的林長盛在簡短的就職演說中講道：「這樣，當我們卸任的時候，才能理直氣壯地對國內人民說：『我們不是在吃『人血饅頭』！』」他的講話博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與會的民聯代表，除了觀摩會議，現場取經之外，還在會場外搭起了書攤，向代表們出售《中國之春》雜誌並徵集了不少「中春」的新訂戶。他們在這裡與來自各個方面的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交談。再次重逢的老朋友劉永川、萬潤南、李祿、劉亞東自不必說，他們又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特別需要提一下的，是民聯代表與新成立的自由民主黨人士，特別是與陳厚琦主任委員進行了坦誠的相互溝通，實際上，各個民運團體在某些綱領或提法上有所不同，是激進些還是溫和些並不要緊，只要大家不打「橫炮」，矛頭一致對准中共獨裁政權，共同爲在中國實現一個民主社會而努力，是完全沒有理由不團結起來的。

衆所周知，今年年初，在民聯和學自聯這兩個兄弟組織的關係上曾一度出現疑團。一個名叫王暉的人以學自聯「安全保衛組」負責人的名義向各民運組織，乃至輿論界散發了一份關於中國民聯某些領導成員是中共特務的所謂「調查報告」，一度引起喧然大波，造成惡劣影響。六日上午，全美學自聯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深林女士在向大會宣讀的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監委會裁定王暉的「調查報告」不代表學自聯，責令其收回該報告並挽回影響。同

時，監委會還對涉及此事件，應負一定責任的學自聯負責人提出警告。這一公開發惡驅散了一度出現在兩兄弟組織間的烏雲。

令人欣慰的是，以往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現過的一個民運組織與另一個民運組織「劃清界綫」、「新反革命」躲避與排斥「老反革命」的不正常現象在這次會議中已不復出現。「老反革命」的代表徐邦泰和其他特邀代表一起，在大會開幕時坐到了主席台上。

不尋常的新聞人物

在與會者中有一老一少兩位看起來很普通的中國人，却很快成了會上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從胸前戴的名牌上知道，他們原來是正式前來採訪的中共新華社駐美國分社的記者。

熟悉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對於任何在政治上敢於對其挑戰的人都是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對於海外的民主團體，諸如民聯和民陣，他們早被打成了「反動組織」，是從來不與之對話的。對於代表面廣泛的全美學自聯，中共則進退兩難。除了有一次在《人民日報》稱其爲「反動組織」外，以後就不再提了。「學自聯問題很複雜。」最近，一份中共內部文件透露說，「如宣布反動組織，廣大成員如何處理？現在不宣布是反動組織，但要打擊壞頭頭。不能掌握在他們手裡。」一句話，是要以此來分化瓦解學自聯，奪回他在留學生中已喪失的陣地。這次中共派記者前來「採訪」又是爲的什麼呢？是否也是這一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呢？

與談笑風生，活躍開放的其他與會代表不同，這兩位「記者」幾乎一直沉默不語。是記者却不去找人採訪，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像觀察員。每當有同學想走進去與他交談，他們總是立刻變得表情緊張，舉止矜持。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後退兩步，然後是審視一下對方



新華社記者（中，手握卷紙者）與民聯（左）及新聞自由導報（右二）代表在學自聯「二大」上交談。

，或拒絕交談，或在百般斟酌詞句之後，再行作答。這是很可能的。作爲來自一個完全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度，又受命於這個國度專制政權的記者，怎麼敢按自己內心所想而如實回答人們的問題呢？盡管如此，與會代表還是盡可能地找機會同他們交換意見，把海外民運及民運團體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他們聽。人心都是肉長的，尤其是在「六·四」大屠殺使中共徹底暴露了其兇殘面目之後，我們不相信，一個尚有良知的中國人會對正義和真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兩位中共官方新聞機構人士的到來引起了人們的許多議論和猜測：或許中共感到了海外民主運動的威懾，想來看一看動靜？還是看到人心所向而無可奈何，不得不準備接觸和對話呢？無論如何，這次中共官方記者能前來赴會，畢竟是個進步，是值得歡迎的。預定在明年夏天召開的民聯「五大」不也是應向中共的官方代表發出邀請嗎？

故鄉之夢

「攀登高峰望故鄉，黃河萬里長；何處傳來駝鈴聲，聲聲敲心坎。」琴聲悠揚。六日晚，全美中國留學生藝術團為與會代表舉行了《故鄉之夢》的首場演唱會。一曲如泣如訴的《夢駝鈴》把這些海外的遊子們帶回了可愛的故鄉。

「謝謝！謝謝大家！謝謝我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謝謝你的依然喜歡我的歌。」大陸著名歌手鄭緒嵐在演唱了觀眾最喜愛的《太陽島上》和《牧羊曲》之後，紅光滿面，笑容可掬向掌聲雷動的觀眾致謝。她的人和歌，風采不減當年。十年前，她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歌。十年後，她又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唱。

《橄欖樹》、《春江花月夜》、《血染的風采》……這一支又一支的名曲和著名的鋼琴演奏家謝明，著名電影演員白靈等人的精彩表演，贏得了一次又一次熱烈的掌聲。而密執根大學中國留學生編排演出的雕塑劇《廣場》把晚會推向了最高潮。

台上那一幅幅繪聲繪色的去年天安門廣場景象的造型，那男女聲抑揚頓挫的朗誦，把台下觀眾帶回了一年前的北京。人們靜靜地注視、聆聽、浸沉在八九年四月學潮，五月民運，六月曙城的悲愴、痛苦的回憶中。「廣場」上，兩鬢斑白的老教授焦急地望着暈過去的學生；頭頂照日的大嬸提看茶壺；八、九歲的小姑娘 hands 捧着茶杯；頭纏綉帶的同學抱着絕食隊員的頭……台下的觀眾眼睛濕潤了，台下的觀眾面色嚴峻，台下的觀眾握緊了雙拳……全場觀眾起立，無言的熱淚，長久的掌聲……柴玲激動地走上去攙住了那個作演員的小女孩，她身旁的封從德激動不已。身材高大的前天安門糾察隊長張倫拿過話筒，唱出了他的摯友王軍濤入獄前最喜歡的《出征曲》。晚會結束前，全場齊唱《龍的傳人》，齊唱《歷史的傷口》。

祖國啊，我的故鄉，我們的故鄉之夢何時才能圓？

※ ※ ※

隨着全美學自聯「二大」的勝利閉幕，全球學自聯的代表大會也在同一城市召開了。在這次會上，正式決定建立全球性的留學生自治組織，協調世界各國，各地的學自聯的活動。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曾出席過一個學校的畢業

注意文章內容的可靠性

編輯先生：

本人在閱過部份雜誌以後，發覺有幾點值得懷疑之處：

一、「紅旗牌轎車的興衰」一文中，作者未名提到：「南京一週姓個體戶，在購買一輛紅旗車後，一年時間，就在該車後座上強姦或姦污女青年五百餘人，成為轟動一時的『紅旗車案』」。

本人對於文中所述被強姦或姦污的女青年達五百餘人之多，感到難以致信。因為據此數字，那一名周姓個體戶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內，平均每日要引誘並強姦或姦污一點三人以上，並且能在這整整一年中，成功被免緝捕。本人對此數字，表示懷疑。未知貴刊在刊出此文章之前，有否查實文章內容的可靠性？

二、作者沈意在「欽本立不能死！」一文中寫到：「九〇年三月，潛伏在欽本立胃部的癌細胞，由於他十分惡劣的心境，復發了。」

據本人所瞭解，到目前為止，癌症之所致，並未為人所知。而作者在此文却說欽本立的「癌細胞」之所以「復發」，是「由於他十分惡劣的心境」。本人覺得作者此一說法，有誤導成份，不知貴刊對這一點有何看法？

典禮，當人們期待他作一個精彩發言之時，他只說了一句話：

「Never give up!」（永不氣餒）

聽眾急切地等待他講下去，然而，他重複了十幾遍的仍然是這同一句話。

是的，全美學自聯「二大」的成功召開，正是這種「永不氣餒」精神的體現，在當前中國海外外民運正處於暫時低潮的時刻，這種精神乃是無價之寶。◆

本人對貴刊還有以下幾點建議，希望貴刊會研究：

一、貴刊經常刊出不少有趣圖片，可惜並非所有圖片都附有說明，令人難以明白圖片與其同刊文章有何關係。希望貴刊將來能在所有圖片旁都附上說明。

二、貴刊在七月號的封底，刊出了六張相信是在「六四大屠殺」期間所拍的照片（照片沒有說明）。這些照片雖然可貴，但內容實在令人作嘔。不知貴刊有否考慮過將照片藏於雜誌內，並附上警告字眼，可讓讀者們有選擇不看的權利，又不會強迫送信的郵差們看血淋淋的照片？

三、貴刊不時把圖片密密麻麻地刊出。本人覺得這種形式會使人產生雜亂無章之感，亦令人難以清楚看到圖片內容。而刊於七月號一期內封面的圖片，更被粗大字遮蓋，令人無法看到部份照片的內容。貴刊何不考慮只把較有代表性或重要性的圖片放大刊出，使圖片主題更突出？

以上所提之幾點建議，希望貴刊會研究一下。祝貴刊業務蒸蒸日上。

讀者 林川

九零年六月廿七日

中國青年需要搖滾

編輯先生：

我是一名在華盛頓地區就學的普通中國學生，也是「中春」雜誌的讀者，剛剛拜讀了九〇年七月號「中春」雜誌署名「周昆」的文章「北京奇觀：瘋狂的崔健熱」，讀後感到十分生氣，對文中多處不實的描寫以及缺乏深入瞭解的膚淺評論深感遺憾，「中春」的負責先生們怎麼會讓這樣明顯缺乏調查的不真實的文章公諸於眾呢？這不禁使我對「中春」雜誌的可信性也產生懷疑。因為，就大陸的崔健熱我是深深瞭解的，來美之後也一直關心國內關於這方面的情况，從前我也是「北大崔健後援會」的發起人之一，對於「後援會」的形成、性質、活動也是十分清楚，我們很多「後援會」成員來美以後也形成了「北美分會」，隨時與國內聯繫，我想國內的「後援會」的同學們看到了這篇文章也一定會同樣生氣。因為作者先生並不瞭解真實情况，文中多處關於崔健音樂會本身的描寫、時間的記述，以及「北大後援會」的活動均有大量失實之處，我想作者先生一定是在讀了北京青年報楊蘭芳女士的文章「騷動的劇場」後產生一些啟發。鑒於「中春」雜誌的性質，借題發揮而已。但我想鄭重建議，最好不要借用「崔健」這個題！因為你不瞭解，也不懂崔健！當然，作者先生也許日前於北京親臨崔健音樂會現場，但可想由於您的排斥情緒而沒能把音樂會仔細聽好就忙於作文評論了，對於這種態度我是不能贊同的。

不錯，中國的搖滾樂尚不成熟，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的青年就不需要搖滾。邁可·傑可遜雖好，但那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理解與共鳴。崔健的出現給中國的搖滾樂帶

來了希望，他樸實的風格，發自內心的演唱，唱出了我們這代人所表達不出的情感，但我們懂，細心看看崔健寫的歌詞不難發現，他是一位嚴肅的歌手。就風格來說，他的歌中所運用的鎖呐、古等等是中國的獨一無二的，台上的崔健總是一身軍裝，沉重的皮靴，莊重地在麥克風前全身心投入地演唱（而非「亮麗黑色演出服」、「嗚聲嗚氣」等等），正是他這種樸實的台風才得以征服我們的心，因為他是我們中國自己的。我們為崔健驕傲，為我們中國有了自己的搖滾吶喊！

不錯，國內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十分貧乏的，但這不等於在這樣的環境裡同學們就會不加選擇地去「後援」崔健，而是崔健的歌表達了我們的真實情感，像「一無所有」、「不是我不明白」、「假行僧」、「出走」、「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最後一槍」……都是十分優秀的作品，都是崔健本人目編自唱，自己配器完成的，他是一名嚴肅的歌手，在北京，我曾前往觀看了他在北展的彩排，一連十個小時的精心彩排，一絲不苟，他的那種嚴肅認真的態度令我們前去觀看的同學十分敬佩。我們想全中國人都有崔健這種精神，那還有什麼做不到的？

我不想一把文中之不實之處加以糾正了，我想若編輯或作者先生有興趣，我們就可以本文加以切磋。關於「北大崔健後援會」其實算不上一個正式團體，只是共同熱愛崔健音樂的同學們聚在一起，沒有在校方登記，也沒有正式的活動日程安排。所謂第二位「會長」也並非「退學」而是法律系畢業後自願幫助崔健組織演出活動，所謂第三位「會長」在學運中由於他們同學很多參加絕食，他只是前往照顧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後勤，他也並非在「

接受審查」而是於去年學運後來美留學了。「後援會」從來沒有刻意組織同學們在校園搞什麼「崔建新歌演唱會」，那是幾位善彈吉他的同學喜歡湊在一起唱歌而已，他們也唱「齊秦」、「羅大佑」。

當然，崔健也有他自己的弱點，比如我剛剛聽了國內同學寄來的他在成都搞的「亞運會義演」，感到他還是沒什麼突破，寫了幾首新歌，但比起早期的「一無所有」、「不再掩飾」尚有差距，我們「北美分會」十分關注他的近況。為他的不能突破自己而感到焦慮，但要知道，突破自己是最難不過的了。但我們愛的是崔健真實的風格，他是從來不可能唱像「葡萄皮」、「妹妹你大膽地向前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如文中所引歌名）。

至於作者關於大陸中國現況的評論，我不想妄加指點，但如借用「崔健現象」加以發揮就不能令我贊成了，而且文章的主題顯然不在崔健，那麼何必要製作一些情節來適應用意的需要呢？這種作文態度是萬萬不可推崇的。並且也大大傷害了我們這樣普通讀者的感覺，而對於不瞭解情况的讀者則會起更壞的作用。因此，我想「中春」雜誌應該勇於向他的忠實讀者們澄清事實，賠禮道歉。

因剛讀完文章，心情很不平靜，如實道出了許多我本人對崔健的理解，您們可完全不必埋會，但就此事來說，我希望「中春」的負責先生們能本着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重新考慮該文的不良影響。謝謝！文中言重之處，請諒解！

因時間關係，到此打住，希望「中春」的編輯先生們能認真對待我這個普通讀者的意見。我盼望能和周昆先生就此文認真交流一下。再謝！

此致
敬禮！

一個普通的中國留學生

基督在中國大陸復活

中國近代史上的奇特現象：

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揚棄馬列主義，

歸信基督

鄭翰譯

子彈促使了宗教復興

一位北京大學學生說：「歸根到底是由於軍隊在六四屠殺中使用了真槍實彈……要是我們只用了橡皮子彈的話，在學生中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基督教復興……」

如果說基督教信仰的復興與否取決於槍聲射出之子彈的軟硬，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簡直像天方夜譚一樣被人認為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這位姓江的北大年輕學生帶着激情說出上面這句話，却具有令人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大量的中國學生歸信了基督教，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奇特的現象——在一九八九年的下半年中，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份子揚棄了毛式馬列主義，投入到基督教信仰之中。

江姓學生的話可以這麼解釋：由於中國當局出乎意外地使用暴力殘酷鎮壓了學生的民主運動，中國大學生才生平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兩方面的真理，而且這兩方面的真理都引導他們來追求基督。

首先，他們對共產黨失去了一切信心，清楚地看到中共是不可信賴的。這位江姓學生指出：「六四以前，我們（學生們）大多敏銳對政府仍抱有幻想……我們都是國家的棟樑，只期望這場運動能給中國帶來更多好處。」當強調這場學生民主運動決非有意向政府或馬列主義

的體系挑戰時，他說，我們不過期望他們在馬列體系的構架中採取些靈活措施，有個真正的轉變而已，政府殘暴屠殺的手段使我們從這一天真的想法中驚醒過來，看清了我們絕不可對這個制度抱有一絲幻想的事實。

其次，他們發現到的另一方面的真理竟然簡單到不可思議：人性本惡。然而，對於具有中國傳統背景的人來說，這是突破性的發現。正如北京一位基督教徒教授所指出的：「過去五十年中國各種宗教思想，包括毛氏主義在內，均認為人性本善，只是環境導致人變惡了。」然而，如果說人性本善，天安門廣場上為什麼還會發生殘酷大屠殺則令人費解。當時學生的民主運動已成了強弩之末，軍隊本身也有反對開槍屠殺的呼聲，而與西方國家斷絕貿易往來具有極大危害，但中國政府仍然選擇使用暴力鎮壓。北京一位外科大夫說，「六月裡我們目睹了百分之百的惡，它使人毛骨聳然。」六個月後的今天，北京學生臉上震驚、懼怕、恐怖的表情依然清晰可見。他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親眼目睹了這場血腥大屠殺。有個女生說：「我們聽到軍隊向學生開槍的消息時還在自己的宿舍裡，當時根本就覺得這是荒誕不經的謠傳。於是我就同我的男友一道往廣場走去。」她接着泣不成聲地描敘了那終生難忘的一幕：她的男友走向一名士兵，想瞭解情況，

突然間却驚恐地倒地翻滾，他因腦後中彈而亡。

大屠殺使人們的頭腦清醒過來，而對共產制度幻想的拋棄，又使人們內心產生空白。於是學生們紛紛湧向宗教尋求慰藉。但又該選擇什麼宗教呢？江姓學生解釋說：「我們並不想去那些中國傳統宗教中尋求答案，因為它們都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這點我們已經明確知道是不真實的。」他接着說，「我來嘗試基督教，因為它是看來唯一真實的宗教……它告訴人們人人皆有原罪，然而這種罪惡是可以被戰勝的。」

那麼為什麼沒有人去皈依猶太教或伊斯蘭教呢？基督教事實上並非唯一論到人類敗壞墮落的宗教。答案是：猶太教在中國鮮為人知，而某些政治事件使得伊斯蘭教在學生眼中大打折扣。當前中國知識份子仇恨的焦點都集中在兩個人身上，他們是指揮大屠殺的前台人物，即總理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根據一位在北京任教的基督教徒外籍教師反映，「今天中國人最厭惡的就是此二人。」可就是在大屠殺之後，這兩個傢伙都分別到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去訪問，並在那裡受到了隆重歡迎。另一位校方人士說：「如果伊斯蘭教國家能歡迎這些惡魔，我們可不想與他們的宗教打交道……我們看到的是，只有國外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對大

屠殺的反映最強烈！」

有關越來越多學生對基督教感興趣一事，已經有不少外籍基督教教師都持如此看法，却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確認，然而另外三方面互不相關的資料也對這一轉變提供了確鑿的旁證。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來，在各大城市中由官方控制的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教會一直充滿着有心慕道追求的學生。海濱區的三自教會尤其被學生們擠得水洩不通。

有一位在中國任教多年的外籍教師談到，去年六月有一次他參加了週日崇拜之後，被一群好奇慕道的學生圍了整整兩個多小時之久，詢問有關基督教信仰的問題。他說：「過去五年在中國的經歷中，我從來未見過如此情景。現在這種對基督教信仰的興趣猶如火山一樣爆發出來，我所知道的三自教堂在主日崇拜時都人數驟增，正是這些學生湧進了教堂。」

環境廣播公司是一家基督教的廣播公司，據其報導，他們曾收到一封福州市花巷三自教會成員的來信，其中提到在六四之後，有八千多名的學生來到該教堂，熱衷地詢問有關基督教信仰的問題。

幾個大城市的家庭教會也有消息說，有不少剛成為基督徒的大學生來找他們，要求得到進一步的造就。其中不少會去過三目的禮拜堂，但覺那裡的講壇信息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便來找家庭教會。在北京北部一個規模相當的家庭教會的負責人說：「說實在的，如何應付這麼多初信的基督徒，我們已感到力不從心。」

甚至一些世俗的報刊也開始注意到這一轉變。事實上，正是他們首先使用了「復興」一詞。香港一家中文報紙「民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報導說：「中國正開始一場對宗教產生新興趣的復興……在聖誕節期間去教會的學生人數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

也許目前就將這一歸信基督教的轉變稱為「復興」還為時尚早。然而從各個不同層面觀察得出的結論，使人不難瞭解到其蔓延全國的

廣度及其深遠的意義。根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范麗珍博士的觀察，這一轉變從根本上說完全是自發的。她說：「這一現象完全是自發自動的，而且蔓延迅速，其所顯示出的強健生命力，也許就在於它完全是由中國人自覺發起這一點上……外籍基督教教師在校園內的影響畢竟有限。」



基督教自身的魅力吸引了學生

因此縱觀這一現象的廣度和意義，其產生原因，除了以上的江姓學生「真子彈」一說之外，還有待人們去作進一步的探討解釋。

范博士指出：六四事件之後人們對宗教大為興趣，與其說它是原因，倒不如說它是催化劑。因為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福音的興趣一直是有增無減。在上海、廈門、福州這幾個沿海城市中，家庭教會經常由一些頗有名望的大學教師負責帶領。他們報告說，早在大陸民運開始之前，就一直有不少學

生歸信基督教。近來這一學生歸信基督教出現高潮，可以說是這些校園內的基督徒十年來持續不懈地進行福音預工的果效。」

在另一極端的方面，也有人將這場基督教復興與簡單地歸結到現實物質利益方面。例如，有一位上海的學生在談到他為什麼想讀聖經時，作了如下解釋：「印度有印度教，却是十分貧困；中國原來是佛教國家，也是貧窮；看看西方國家吧，那些基督教國家却十分富強——想要瞭解西方國家如何成為富有，這就是我要讀聖經的理由！」中國學生對西方國家十分憧憬，好奇心也促使他們去尋查西方的宗教背景。事實上，這往往成為他們踏上天路歷程的第一步。

歸根到底，應該說是基督教本身的魅力吸引了飽受創傷又失去信念的學生。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說：「基督教信仰的真諦，即強調絕對真理與無條件的愛的合而為一，這一觀念吸引了眾多的學生。」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一直被當權者任意詮釋、修改，同時又使人民折騰不安。在馬克思主義的相對論之下，說說成了天經地義和家常便飯，對此，人民早已厭倦透了。這時，一個宣告擁有絕對的真理——它既是客觀主體，同時又永恒不變，全然聖潔——這樣的宗教，無疑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正如一個學生所指出的，「不再上當受騙，不再被迫相信謊言，不再生活在謊言之中，從中解脫所得到的這種安慰實在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

而且，更多仍活在驚懼中的學生在基督徒中得到了溫暖的愛和慰藉。大屠殺造成的心理震撼是無法估量的，其後果不是使學生將仇恨郁積在心底而悶悶不樂，就是產生試圖鋌而走險，以暴力來復仇的失去理智的衝動。處在絕望茫然或拚死一搏這兩種極端心態下的學生們，發現只有基督徒的愛，才是對他們目前情形最有效的醫治。

儘管還有多方面錯綜複雜的原因，顯而易

見的事實是今天中國大陸上基督徒中知識份子的人數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歷史和中國基督教史上都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而這一全然新生的現象對當局政權與教會都無疑是新的挑戰。

政治當局是否會鎮壓？

大量的社會精英突然間歸信了另一敵對的意識形態，這是否會引起政府當局的恐慌？這一大復興會招致另一場鎮壓嗎？

使人感到驚訝的是，在北京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政府會對此採取強硬手段。這基本上是因為他們覺得當局還沒有領悟到基督教對他們的政權會有什麼威脅。北京的一位基督徒教授說：「政府眼下只能力圖如何苟延殘喘其政治生命，而且他們明白，基督徒是最不太可能使用武裝暴力去推翻他們的。」事實上，在竭力軟化學生的對立情緒方面，中國政府當局也許甚至認為基督教的復興能助其一臂之力。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共當局的寬大為懷。在追捕緝拿民運組織者的前夜，中國各大學校園內的氣氛曾一時極度緊張。然而大屠殺之後緊接而來的改革做法，諸如竊聽電話、強迫寫坦白交待等並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因為這僅僅是會加劇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對立而已，政府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最近幾個月來也不再緊鑼密鼓地大搞政治輿論，並也會對宗教的不同政見者採取一定限度的寬容。

出人意料的是，新的信徒和慕道友大批出現，最感到困擾的竟是教會而不是政府當局。因為它帶來一個棘手的難題——目前現有的中國教會如何應付為數龐大的初信者培養造就工作？

總的來說，大多數初信的大學生不太願意到官方的三自教會去。學生們對在天安門濫施屠殺的政府的厭惡情緒，也一樣波及到所有從屬於政府的組織機構。而三自教會，不論他們

承認與否，都是依附於政府的。同時，多數情況下學生們也同樣對官方教會的陳詞濫調表示反感。

因而絕大部份的學生通常會設法去找家庭教會，於是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家庭教會雖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復興，但大多數是在教育不普及的農村地區，甚至個別地區的家庭教會對知識份子抱有偏見。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來到這樣的家庭教會，他們對自己剛開始的信仰難免有種種疑問，而通常困擾他們的難題使家庭教會感到難以應付。

對於知識份子提出的有關信仰的問題，有些家庭教會的負責人有時過於簡單指責為不虔敬，有些則直接了當地表示他們不具備這些問題相關的知識。因此，護教性的材料供不應求。在北京，學生們甚至只好用手傳抄一些頗具說服力的護教性材料。

這些傳統的家庭教會是否有能力提供實用的教材幫助這些歸信基督的知識份子建立信仰，人們仍需拭目以待。

一九八九年大屠殺悲劇之後，中國基督教可能出現一種嶄新的思潮，而且將在自己獨特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社會精英份子中基督徒在信仰看法上的分歧是不可等閑視之的，其嚴重性在動蕩不安的時代尤為顯著。而范麗珍博士預期，以暴力推翻中共現政權的事可能會在未來兩年內發生。她解釋道：「以歷史的觀點看，一個朝代將會結束的所有徵兆都日益明顯——農村怨聲載道，城市動蕩不安，軍隊山頭林立，經濟停滯不前，而政府又腐朽無能。」然而，一切看來似乎都受到了歷史不可抗拒的規律所支配。文革後的一九七七年，中國有位哲學家在對一群知識份子演講時發問：「為什麼毛澤東會那麼偉大？」「正因為我們都向他屈膝下拜了。」他自答道。在一九八九年，中國的知識份子又一次屈膝下拜，但這一次的對象不再是毛澤東，而是耶穌基督。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歐洲地區：PARISER ST 52 5300 BONN W. GERMANY

港澳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4室

訂費（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機 關：60 美元 200 港幣

普通訂戶：28 美元 96 港幣

學生訂戶：24 美元 84 港幣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航空 _____

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南美洲 US\$35

亞洲、澳洲 US\$45

小 啟

本刊第十八期所刊登張欣等人的「大陸留學生回國考查團調查報告」轉載自中國留美學生經濟學會的NEWSLETTER NO. V- (T)，並有刪節，特此說明。

海內外民運大事記

何言整理

六月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抨擊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指責中共政府出口勞改營的產品，輸出軍火、毒氣及核武器技術，騷擾留學生。

中共駐加拿大領事館三等秘書杜雲生夫婦於上週末「不辭而別」。

台灣民進黨立委朱高正表示二十週以後是新黨「中華社會民主黨」成立的好時機。

七日

美國副總統奎爾代表布希總統會見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柴玲，表示雙方在促進中共改善人權上目標一致。中共駐美使館就此提出強烈抗議。

東德新國會一致通過決議譴責中共鎮壓民運。

八日

蘇聯俄羅斯聯邦國會通過「主權宣言」草案。戈爾巴喬夫表示他將設法與葉利欽修好。

九日

捷克開始四十年來的首次自由選舉。哈維總統領導的「公民論壇」及其盟友贏得壓倒性勝利。

十日

在四十年來保加利亞首次自由選舉中，由前共產黨改革派改名而成的「社會黨」領先。

十一日

中共「瞭望」雜誌發表文章，指責台灣主張的「一國兩府」就是獨台、台獨。

十二日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講話，主張由國共兩黨舉行「對等商談」。

著名作家柏楊發起各國作家致信江澤民，要求釋放作家王若望。

戈爾巴喬夫在聯邦委員會上提議把蘇聯改造成一個鬆散的由各主權國家組成的聯邦。

蘇聯國會首次通過保障新聞自由的法案，並賦予新聞人員和出版人員廣泛的權利。國會還首次擬訂法規界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

戈爾巴喬夫會見波羅的海三國領袖。

俄羅斯共和國國會宣佈俄羅斯為主權國，保留自由脫離蘇聯的權利。

羅馬尼亞首都發生暴亂。群眾示威要求罷黜一切曾在共產黨政府中任職的官員。軍隊及支持伊列士古的礦工開槍鎮壓示威民眾。

十三日

蘇聯國會決定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要求部長會議十月前把有關法律草案準備就緒。

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首府三萬民眾集會要求自由選舉。

中共當局首次對結束柬埔寨內戰提出建議。

十四日

蘇聯總理芮科夫說，共產主義是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達到遙遠理想。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將以行政命令推動市場經濟。

十五日

十六日

中共「瞭望」雜誌載文抨擊「一國兩府」論，建議以國共兩黨為首，邀請各民主黨派舉行政治協商。

十七日

蘇共激進派「民主論壇」成員表示，如果他們的改革要求被拒絕，將創立新黨。

中共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的全國人民代表資格被免除。著名旅美大陸燒傷專家王學威已領取中華民國護照。

十八日

中共人大發言人張虎生透露，尚有

三百五十五名民運份子仍在獄中。歐洲共同市場決定，在今年九月以前暫不解除對中共的制裁。

美國國會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指控中共駐美使領館人員對大陸留美學生「一貫、有計劃」的騷擾。

十九日

六四週年前被中共當局拘押的周舵、高新已被釋放。

經中共強制遣送，著名歌手侯德健重返台灣。

二十日

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領袖、全球最著名的獲釋政治犯曼德拉到達美國訪問，在紐約受到熱烈歡迎。

美國國務院警告北京，騷擾在美國留學生可能損害兩國關係。

廿一日

消息證實，六月四日在北京大學挺身演說的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明琦於十五日被捕。

廿二日

侯德健在台灣澄清，「六四」死難者不超過千人。

曼德拉在聯合國發表演說，呼籲世界各國繼續制裁南非。

廿三日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推荐再刊印一份文化大革命小冊子，表示要「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社會主義」。

廿四日

著名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及其妻子李淑嫻獲准離開中國前往英國。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通過今後四類大陸專業人士可申請來台參觀訪問。

民主中國陣線宣佈，大陸秘密民

主組織「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自文化革命後一直很活躍。民陣與該組織在政治目標上意見一致。

美國國務院代為公佈方勵之夫婦的正式聲明，指出反對「四大堅持」，並將「感謝和歡迎合乎中國社會之進步利益的活動」。

美國白宮發言人發表聲明，對中共決定讓方勵之夫婦離開北京表示歡迎，稱美國與中共就此事沒有任何「交易」，「沒有交換條件」。

曼德拉會晤布希總統，尋求財務支援、政治承認但未獲答覆。

方勵之通過英國皇家學會發表聲明，希望以後能盡所能「協助中國進步發展」。

美國官員認為中共必須進一步改善人權。國務院發言人希望中共公佈獲釋者名單。

日本政府發言人表示中共讓方勵之離境不足以使兩國經濟關係正常化。中共釋放趙紫陽的前重要顧問鮑彤。

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宣佈，中共去年六月鎮壓民主運動前已在澳洲的大約二萬名中國大陸學生，將獲准延長入境簽證四年。

五十五位在美民運人士發表聲明，要求美國國會通過有關大陸人權的條件，每六個月審核一次給中共的最惠國待遇。

國是會議在台北召開，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強調會議以「健全憲政體制」、「謀求國家統一」為兩大目標。

蘇聯共產黨提議改組領導層，廢除政治局及總書記一職，另設黨主席及第一書記，以確保不讓個人擁有過多的權力。黨章草案選規定任何官員不得在同一職務上超過兩個任期。

國際人權聯盟在一項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共駐美單位在恫嚇大陸留美學生的同時，騷擾加入或同情民主運動的美籍華人及非華人美國公民。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強調，中共不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以對付國際干涉主義和台灣島內的分離主義。

蘇聯立陶宛國會決定暫停獨立宣言，以求與莫斯科談判。

方勵之夫婦在倫敦舉行出國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表示不希望答覆有關政治事務的問題。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發佈命令，恢復三位被放逐國外的著名作家的公民身份。

美國司法部擬定新法規，保護那些擔心在本國遭到迫害而向美國尋求庇護的外國人的權利。

東德西德開始在經濟、社會上成為統一的國家，雙方邊界措施完全撤消。

北朝鮮若干高級領導人已群起努力，促使金日成致力於南北統一及對外開放。

被監禁的大陸著名作家王若望的太太羊子要求中共當局對在押民運人士實行人道主義，以公正態度釋放。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黨代會上為改革路線辯護。

東德、西德決定於十二月舉行全國大選。

南北朝鮮同意雙方總理舉行談判。

戈巴契夫表示，如果兩年內沒有改善，領導層必須下台。

中華民國國是會議閉幕，與會者就五大議題達成若干共識。

西方領袖集會倫敦，商討重新塑造北約。阿爾巴尼亞首都湧起逃亡潮，千餘人沖進各國使館要求庇護。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於哥倫布市舉行。全美一百三十所大學三百代表與會。

方勵之呼籲布希總統促使中國大陸更加自由、民主，指控布希人權政策有雙重標準。布希駁斥方勵之批評不符合事實。

布希致電戈巴契夫，支持蘇聯改革計劃，說明北約高峰會議。

全美學自聯選出新任正副主席陳興宇、陳師聚。

西方七國經濟高峰會議達成兩項重大協議：日本將恢復貸款給中共，暫不考慮財政援助蘇聯。

方勵之認為八九民運的最大成就是給許多團體和個人帶來了獨立感。

中國自由民主黨第一屆代表大會在哥倫布市召開，宣告自民黨正式成立，陳厚琦、楊農擔任該黨正副主任。

蘇共二十八次通過戈巴契夫計劃，改組政治局，放鬆中央集權。戈巴契夫連任總書記。

西方七國高峰會議發表政治宣言，放寬世界銀行對中共貸款限制。

全球中國學聯召開聯席會議，通過全球學聯章程。

布希總統重申，如果中共在人權方面進一步改善，西方將再放寬抵制。

裁。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對西方七國同意援助蘇聯經濟表示滿意。

十二日

蘇共激進派代表葉利欽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

美國眾議院歲出入委會貿易小組通過法案，明年是否延長對中共優惠待遇，要視中共改善人權狀況而定。

十三日

蘇聯莫斯科、列寧格勒兩市市長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

阿爾巴尼亞數千難民分赴西方各國。

中共市長代表團團長朱鎔基會晤美國國務卿，說中國大陸現尚有一百五十五名政治犯坐牢。

十四日

包括總理芮科夫在內的蘇聯政府多名重要官員離開蘇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黨政人事分離。

十五日

戈巴契夫下令開放蘇聯國營廣播與電視網路，促進政治多元化和新聞自由。

十六日

莫斯科五萬民衆集會呼籲人們退出共產黨。

戈巴契夫同意新德國加入北約。

蘇聯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通過主權宣告。

方勵之表示鄧小平應對六四事件負責并接受審判。

十七日

南朝鮮總統盧泰愚的發言人宣布，蘇聯已同意與南朝鮮談判，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劫機失敗被日本遣返的張振海被中共法院

判刑八年。

十八日

美國宣布它將撤銷對高棉反抗聯盟的承認，與越南展開談判，以防止紅色高棉重新掌權。

十九日

白宮宣布，布希總統會見美國駐台灣代表

魯樂山。

北京經濟學院證實遭通緝的該校學生翟偉及已被捕。

十九日

中共外交部聲明仍將繼續援助紅色高棉。日本給中共貸款解凍，首筆四億多美元將於九月撥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金桂華說他對趙紫陽的情況不知道。

二十日

民陣、民聯、學自聯再度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共釋放政治犯，取消對民運人士的通緝。

二十日

蘇聯激進派改革者葉利欽提出五百日革新計劃，分四階段將俄羅斯經濟推向自由化。

南朝鮮總統盧泰愚宣布開放板門店五天，讓北朝鮮人民自由來往。

二十一日

中共與蘇聯簽署協定，保護彼此在對方境內投資。

二十二日

中共與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宣布中止與沙的外交關係。

蒙古全國各地舉行六十九年來第一次多黨選舉。

二十三日

南朝鮮出現政治危機，反對派國會議員全體辭職。

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案，鼓勵英國及其他各國給香港人移民簽證。

世界反共聯盟在比利時召開年會，討論改名爲民主自由聯盟。

二十四日

蘇聯準備擬定新聯邦條約，確定聯邦與各加盟共和國新的權力劃分。

二十五日

中共大陸市長代表團訪問聖荷西，遭到民運團體的示威抗議。

二十五日

南北朝鮮簽署十九點協定，決定雙方總理

九月舉行首次會談，順應潮流邁向統一。

二十六日

戈巴契夫表示，需要西方立即的經濟援助，以挽救蘇聯經濟改革計劃。

李鵬在與日本大藏大臣會談時表示，中共不怕西方國家的制裁。

二十七日

中共駐美大使館間接證實，中共駐美大使專用司機張洪及一名上海籍廚師離館出走。

二十八日

「全美中國同學聯合會」第十一屆第一次理事會於紐約召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主席陳興宇應邀與會。

中華民國行政院公布「現階段大陸人士來台參觀訪問作業要點」，自八月一日起開放具專業造詣的大陸人士及民運領袖來台。

二十九日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西藏視察時強調，必須堅決打擊「西藏分裂主義」。

三十日

蘇聯、阿爾巴尼亞決定恢復外交關係。

三十一日

亞太經濟合作部長會議發表聲明，將邀「三個中國」明年入會。錢其琛表示中共無法接受台灣、香港也成爲正式會員。

八月一日

中共新華社報導，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透露，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將在今年內召開。

袁木駁斥趙紫陽將復出的傳言毫無根據。

蘇聯第一個新聞自由法生效，爲新聞人員和發行人提供廣泛的權利保證。

二日

伊拉克軍隊凌晨閃電入侵科威特，佔領首都所有政府大廈。國際油價立即大漲。

大陸芭蕾舞明星林真在華盛頓宣布投奔自由，不滿中共政權，決定留美發展。

由，不滿中共政權，決定留美發展。

下里巴人中文软件

下里巴人中文软件系统是在广泛流传的BYX1.1和CH-SERIE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如下：

1. 独创整句拼音连续输入，能以句、词组、单字输入。声调可有可无。
2. 具有最广泛的硬件适应性，可用于M/C/E/VGA图像卡，HP和POST SCRIPT激光及点阵打印机。
3. 具有最快的速度，最丰富的编辑功能，有最高版面使用率。有临场帮助(HELP)。
4. 不需要特殊硬件，中文操作系统，不留内存常驻程序。
5. 中文码采用广为接受的国标码。英文码采用标准码，可用来编写程序。可简体与繁体互换。
6. 可改动键盘定义，建立组合指令和缩写。

下里巴人中文系统用于IBM/PC及兼容机，DOS版本2.0以上。下里巴人中文系统分两个版本发行：基本和增强系统。

基本系统：基本编辑系统(BYX/2.0)一有整体取代，选择取代，割补，重复操作，字串统计，拼音转中文等功能。基本打印系统(LSP/2.0)用于HP激光及与EPSON兼容点阵打印机。有分栏，字体变换，自动排页，左右对齐等功能。字库为宋体字简体16，24，40点和繁体24点。价格：\$69+S&H(\$5对360K软盘，其它\$3)。加州另加\$5(税)。

增强系统：增强编辑系统(BYX/2.0A)一除包括基本系统所有功能外，还具有改动键盘定义，建立缩写和组合指令(MACRO)功能。增强编排打印系统：(1)LSP/2.0A一除实现基本系统功能外，还具其它增强编排功能。(2)CHROFF/2.0一用于POST SCRIPT激光打印。字体可任意放大缩小，能编排较为复杂的刊物。字库为简体宋体/仿宋体字16(仅宋体)，24，40，48，56，64点和繁体宋体字24点。价格：\$159+S&H(\$8对360K软盘，其它\$5)。加州另加\$11.53(税)。

支票请寄：P.O. BOX 8012, BERKELEY, CA94707

支票抬头：YONGXIN SOFTWARE

注：订购时请注明软盘尺寸。电话：西部(415)-526-2576；东部(617)-424-1592

美國國會議員米勒 致中國民聯總幹事汪岷信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幹事
汪岷先生：

鑒於您對中國國內人權情況的關切，我現在把我最近向國會提出的有關在中國經商的美國公司所應遵循的人權原則的提案副本寄給您。

目前，（中國政府）對於民運人士的監禁、折磨和處決仍在繼續，美國必須明確地、堅定地反對（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壓迫，美國也必須為自由和民主說話。美國工商業可以成爲這種堅定聲音的一部份。自從七十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美中之間貿易聯繫日益發展。因此，美國貿易界是有機會利用這種聯繫來推進（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事業的。

美國公司的長遠利益是和一個不再踐踏中國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的中國發展貿易。倘若美國公司以促進中國改革的目標作爲自己在華活動的行爲規範，並以此推動對華貿易，他們才有可能在未來獲得一個穩定而有利可圖的中國市場。

有鑒於此，我提出了 H.R. 5129 法案，爲在中國包括西藏經商的公司設定九條必須遵循的原則，此法案的宗旨並不是在阻礙國際貿易，而是在於促進改善中國的人權情況，促進中國的開放。

倘若您對此提案有疑點，評論或建議，請和我或者山姆·開普爾聯繫。

您的誠摯的
約翰·米勒

美國眾議院議員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五日

汪岷致米勒

美國國會眾議院
約翰·米勒眾議員

十分榮幸地收到您七月二十五日的來信以及您的 H.R. 5129 法案的提案，對於您對中國人民人權的關切，我個人並代表中國民聯向您致以真摯的謝意。

當寫此信時，我考慮着幾件事。第一，作爲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和愛國者，我們多年

來一直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一直在致力於反對中共保守派以及中國幾千年統治者的「閉關自守」政策，這一次中國的「六四」事件，並不說明中國的改革步伐太快，恰恰相反，是走得太慢，跟不上整個共產主義世界走向民主的「大氣候」而引起中國人民深深不滿所致。因此，我們支持繼續向西方「開放」而又不同意西方無條件的「給予」，其中

實有比經濟價值取向更高的意義；第二，同時又作爲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關切「八九」民運期間以及歷次中國民主運動中受迫害的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的命運，大批的民運人士目前正在監獄遭到秘密扣押、審訊甚至濫刑，種種踐踏人權的事過去發生，目前發生，將來還會不斷發生，給中國人民帶來慘不堪言的痛苦。如果說，北京政府最近在這方面表現出某種節制的話，與其說他們正在改變，不如說是中國人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強烈反對的結果，您的提案就是這種發向橫暴的正義訊息中的重要的一個，缺少了這種訊息，北京當局將會更專制、更法西斯、更蔑視這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人權；第三，中國民主運動從不否定美國對華貿易，即使在目前中國大陸政治黑暗的條件下，也十分重視美中貿易裡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國走向更民主與開放的話，這種利益會越來越顯著。因此，長久以來我們致力於一種人權考慮和對美中貿易政策立場的平衡戰略。在如何平衡得好的問題上，也許還有討論的餘地，但是我以爲，您的提案以及該提案表達的「把商業利益置於人權標準之下，在此前提下推進中美貿易」的精神，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

尊敬的先生，我注意到了最近國會正在討論是否有條件地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並且對您在討論中堅持的正義立場和態度，表示十分的敬佩，您和您的同事們所提供的服務不僅僅是全美性的，而且是全世界性的。

您的誠摯的

汪岷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幹事

一九九零年七月三十日

於華盛頓

【附件一】 HR 5129

對華貿易的附加人權條件提案 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權原則

美國國會確定下列人權原則，以爲在中國包括西藏境內從事商業活動的美國國民所遵守。

- 一、不得使用中國包括西藏境內所產生的「勞改」產品。
- 二、保護因政治原因加入非暴力示威，或因參加未經政府批准的非暴力組織而遭致逮捕，流放的前科記錄而面臨解雇的僱員。
- 三、尋求確保不致不必要地污染周圍環境的生產方式。
- 四、在選擇商業伙伴時，盡可能使用中國包括西藏的獨立企業。
- 五、禁止在合資企業的營業場所派駐軍管人員。
- 六、促進本企業內僱員的結社和集會自由。
- 七、敦促中國當局公佈「六四」之後被捕者名單，結束秘密監禁，允許國際觀察員前往監所調查。
- 八、阻止美資或合資企業內進行政治洗腦。
- 九、促進自由表達，爲此目的美國國民應提請有關當局注意（中國政府）對外國出版物

【附件二】 【附註】 國務院報告（制度）

這一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提出年度報告，載明美國公司是否遵循了上述原則。在本提案業經立法兩年之後，違反本提案的美國公司將失去出口市場的支持，這意味着美國政府官員不得協助這類公司在外國市場上銷售貨物，服務及技術。舉例來說，美國政府官員將不得協助這類公司安排與中國官員的會晤；這類公司可以繼續在中國經商，但不再獲得美國政府的幫助。

在貿易糾紛中，美國政府仍將保護美國企業。因此，喪失出口市場支持並非禁止提供有關出口的一般資料，或拒絕提供這類信息的出版物，如海外貿易報告等。



全美中國學自聯第二屆代表大會會場



中國民聯聯委會第六次會議在華盛頓提前召開

競選學自聯主席：陳興宇、陳師衆與趙海青、楊力新



中國自由民主黨主任陳厚琦



發行：中國之春出版社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32521 號 TEL: 7826772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 46 號信箱 TEL: 3-8496348

澳洲：P.O. BOX 3272, ASHFIELD, NSW 2131 AUSTRALIA

G.P.O. BOX 4881 CC MELBOVRNE VIC 3001 AUSTRALIA

西德：Mr. YANG PARISER STR.52 5300 BONN 1, W.GERMANY TEL: 228-679902

匈牙利：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BUDAPEST, HUNGARY

加拿大：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零售價：(美) 2.50 美元；(加) 3.00 加元；(港) 12.00 港幣

ADDRESS: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TEL: 718-429-6777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